

治国录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陈冠任◎编著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1**

中共党史出版社



欢迎关注“学习理论”
仅供学术科研



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毛泽东是一位非常文雅有礼的人。他非常平静、安详、谨慎、达观。

——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埃德加·富尔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他是八亿人民的心脏和发动机。

——德国政治家施特劳斯

他以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他的伟大国家的历史，而且也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希腊前总理卡拉曼利斯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ISBN 978-7-5098-2430-6



9 787509 824306 >

定价：198.00元（全四册）

仅供个人科研教学



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1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陈冠任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治国录：毛泽东与 1949 年后的中国 / 陈冠任编著.

--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098-2430-6

I. ①治… II. ①陈…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275483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兵 张墨研

复 审：吴 江

终 审：姚 鸿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1030 千字

印 张：86.125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430-6

定 价：198.00 元（全四册）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中，中国的变化以及这个极大的国家的伟大的进步最主要的是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

——挪威前首相努尔德利

前 言

毛泽东是世界最知名的领导人之一。法国人曾说：

“当代很少有哪位领导人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人民的需要和问题。

在他的领导下，正如他所要求的那样，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不再是被饥饿、洪水、疾病和自然灾害的阴影所笼罩的东亚病夫了。

农业得到了发展，而且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包括核武器和卫星，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成了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

毛泽东是被公认为经过长期斗争的、富有组织人民群众的杰出才干的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这种超人的组织才干，不仅体现在夺取战争胜利的斗争中，也特别体现在领导新中国建设伟大强国的壮丽进程中。

欧洲人感叹地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贫穷的中国遇到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这正是奇迹之所在。”确实，在新中国这座熔炉里，毛泽东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希望。用不寻常的组织能力，把几亿曾受压迫的、饥饿和愚昧的中国人，变成了有智慧、勤奋工作的人民。他有力量引导人民越过最艰难的障碍；他将他独特的思想，灌输给国民，引领新中国前

行；他用崇高的理想、杰出的方案、顽强的作风领导人民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把中国人的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65 岁，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取得伟大的成就。这些成就都光辉地证明：在伟大理想的鼓舞下，中华民族能够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使它保持着继续前进的动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他领导和建设新中国走上强大的历程，为中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生活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丰富了人类日益走向强大的发展智慧。毛泽东的成功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他也因此博得了人民的尊重。

《治国录：毛泽东与 1949 年后的中国》生动、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强国 27 年史诗般的壮丽历程，是在中共中央“两个不能否定”论断指导下的、一部关于 1949 年后毛泽东历史功绩及其思想的客观记录，是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史料性著作。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目 录

第一章 转变与改造

- 1.回家买不到车票,毛泽东堂弟要去火车站“扎营”/003
- 2.与斯大林较劲,出访满载而归/012
- 3.毛泽东从苏联回来,连发四次大脾气/020
- 4.是毛泽东亲自在“五一口号”中添上
“毛主席万岁!”吗? /026
- 5.警卫员巧化“衬衣当了孩子尿布”的窘境/037
- 6.国庆节前后的两件事/044
- 7.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051
- 8.送儿子去战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献出了第六位亲人/060
- 9.“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067
- 10.一次信访崛起一个跨国企业/081
- 11.“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毛泽东为
女战斗英雄题写的/089
- 12.国庆观礼风波/095
- 13.毛泽东的选择:“要他俩,还是要中国?”/101
- 14.毛泽东从中南海“突然出走”/120
- 15.毛泽东为育英小学儿童节题词:“好好学习”/127

第二章 完善与起步

1. 治国从治水开始/135
2. “死缓”，毛泽东的一个政策创新/146
3. 大年初一南下调研/154
4. “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69
5. 倡导绿化和“低碳生活”的第一人/179
6. 打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战斗/185
7. 跳出了战争的“死神舞池”/193
8. 在制定宪法的日子/205
9. “毛主席要搞公有，要我们把厂子给多数人，给人民，我们舍得”/218
10. 留有余地，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团结起来/228
11. 一个划时代“动作”/235
12. 投桃报李：为中缅友谊奠基/244
13.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251
14. 新中国沿海建设和开放的思想/267
15. 两位农民劳动模范与毛泽东/278
16. “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294
17. 为了游长江，毛泽东生气了/299
18. “陈伯华是出名的娇滴滴，这次哪来的这么大勇气和胆量？”/308
19. 疯狂的并不仅仅是陈伯华一个人，武汉三镇“全疯了”/315
20. 毛泽东被禁坐飞机的前奏：空中历险/319
21. 毛泽东的惊人思想：要与台湾和平谈判/325
22. “各国友好桥梁的建设者——毛泽东主席”/339

- 23.“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352
- 24.是“放”不是“收”/364
- 25.女共青团员给毛泽东点烟,是“摆照”吗? /379
- 26.“不能只仿,要走独立设计制造的道路”/390
- 27.首倡交警纠正违章先敬礼/400
- 28.关注亿万百姓穿衣的大问题/404
- 29.“将来长江上修上 20 个、30 个桥,黄河上也
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412

第三章 大干快上

- 1.毛泽东访苏,掀起“毛泽东风暴”/433
- 2.“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447
- 3.发起冬泳运动/459
- 4.关注开发新动力和能源/463
- 5.支援农业,最先提出“军转民用”/474
- 6.“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21 世纪中国
汽车的繁荣就很难说”/478
- 7.毛泽东阅批高生日记/487
- 8.成都会议:生动讲述“建设速度”的辩证法/495
- 9.广州棠下农业社之行/515
- 10.毛泽东带着中央委员修十三陵水库/524
- 11.库尔班大叔和毛泽东的故事/532
- 12.“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545
- 13.南巡途中/552

14. 1070 万吨的钢指标是毛泽东一人的过错吗? /563
15. 炮击金门: 美国航空母舰吓不倒毛泽东 /573
16. 喜看铁水奔流, 两次都不过瘾 /592
17. 第一次视察安徽 /603
18. 教育: 主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使社会进步 /608
19. 外出视察: 不要大车队, 也不要人撑伞 /619
20. “不怕路长, 只怕心老” /627
21. 毛泽东下令: 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 /633
22. “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 /645
23. “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 今天
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 /660
24. 倡导“种试验田”: 要高产, 去试验 /676
25. 将军下连队, 当兵一个月 /684

第四章 三年人天大战

1. 毛泽东突然大喊: “李银桥, 你是干什么的?” /693
2. 管住“一张张馋嘴” /699
3. 春荒后北旱南涝: 人为因素加天灾 /703
4. 三十二年归故园 /718
5. “河北粮食要自给” /726
6. 毛泽东是新能源的大力倡导者 /732
7. “外国有的, 我们要有; 外国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 /740
8. 毛泽东给麻雀“平反” /746

- 9.“全民皆兵”/760
- 10.“一个双龙,一个九龙,合起来十一条龙治水呀”/772
- 11.毛泽东破例宴请上海工人代表的良苦用心/780
- 12.“我当主婚人”/788
- 13.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793
- 14.蒙哥马利预言的奇迹,也是毛泽东和
中国的奇迹/808
- 15.七个月不吃肉/822
- 16.“他有这样重要的任务,怎么能把他叫回来?”/835
- 17.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中国“自由行”/843
- 18.毛泽东与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852
- 19.有困难,但也有办法有希望/856
- 20.七千人大会上作自我批评/864
- 21.重压之下支持古巴/872

第五章 航船又前行

- 1.“外交核爆炸”/887
- 2.“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
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897
- 3.小年的科技座谈会/908
- 4.毛泽东大年初一座谈教育,亲自为学生“减负”/918
- 5.发展农村广播,会见非洲专家/931
- 6.“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准备好了,
敌人反而不敢来”/940

- 7.毛泽东不是科学家却提出“物质可以再分”/952
- 8.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962
- 9.毛泽东一生唯一的生日宴会/974
- 10.北京地铁开建,是毛泽东的决策/982
- 11.称赞徐寅生的讲话是个好作品/989
- 12.在韶山,谁都知道毛泽东“难求”/1000
- 13.重上井冈山/1010
- 14.把医疗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024
- 15.毛泽东为大学生“减负”/1036

第六章 “抓革命”与“促生产”

- 1.“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1049
- 2.“王保东”与毛泽东的故事/1060
- 3.“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1066
- 4.广交会前发出“五项通知”,没有
“锁国”也不“闭关”/1073
- 5.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诞生/1082
- 6.赤脚医生让“一无医、二无药”状况得到改变/1090
- 7.警卫部队、身边人员一律不戴毛主席像章/1103
- 8.湖北“三板斧”,紧抓三线建设/1107
- 9.在九大代表名单上删去女儿的名字/1115
- 10.“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由来/1119
- 11.“我看还可以,不要全盘否定啰”/1123

第七章 林彪事件前后

1. 对国际战略格局的重新审视/1133
2. “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1139
3. 援助弱国小国，巧妙地打破了“C形包围”/1143
4. 毛泽东在判处王光美的死刑
报告上批示：“不宜判刑”/1154
5. 长江第一坝，是毛泽东搞建设的又一大手笔/1159
6. 毛泽东开启了中国人的航天梦/1168
7. 毛泽东带着警卫中队扛着枪出发了/1178
8. 毛泽东“考试”湖南电视台，差点暴露了行踪/1182
9. 情况比毛泽东想象的要严重得多/1194
10. “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1206

第八章 耄耋老人的智慧

1. “你已经长成大人了！”/1213
2. “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
不吵架也行”/1221
3. 一手浇灌成长的中赞友谊之花/1237
4.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1245
5. “吃了联合国的饭，就要受人家的管嘛”/1249
6. “毛先生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汪洋的大人物”/1255
7. “四三方案”——对外开放的杰作/1270

- 8.“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277
- 9.派 93 岁的章士钊赴港/1286
- 10.“那就是 1997 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1294
- 11.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303

第九章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 1.念念不忘“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315
- 2.“我们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富啊!”/1321
- 3.毛泽东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金日成讲/1326
- 4.批阅人民来信/1329
- 5.“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1332
- 6.与两位美国年轻人的“跨年午夜会见”/1345
- 7.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了/1353

治国录

毛泽东与 1949 年后的中国

第一章 转变与改造

毛不是仅仅把革命带给中国的人，他还对中国实行了改革，使它朝气蓬勃。因为对他来说，革命不是一种有止境的行动，而是一个要不断更新以保持其目的的有机过程，基本上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改变他的人民的思想和意识。

——加拿大《新闻报》

1. 回家买不到车票,毛泽东堂弟要去火车站“扎营”

有人说:“毛泽东生在韶山冲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生活相比其他穷人就是衣食无忧,本来他完全可以像盐铺商家家庭出身的蒋介石那样‘往高处走’,为富人奋斗,成为富人中的‘领头羊’。可他的灵魂中的‘上帝’偏偏却不是富人,而是工农大众,是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并且领着一大批共产党把自己最神圣的目标订立为建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数穷人当家做主的政权。这是何其伟大!何其高山仰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崭新的希望。

“一切愿意新生的 / 到这里来吧 /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 在等待着”——面对年轻的共和国,诗人这样书写新生的感受。新生的希望,美好生活的愿景,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表达着人民群众对人民政权的信心。

这个新政权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这个崭新的感觉,毛泽东的亲属、韶山冲的老乡们却是以一种别样方式感受到。

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不管毛泽东本人承认不承认，他在全党全军乃至全国的地位和权力都是无人能及的。虽然他没有像袁世凯那样去当皇帝，也没有像蒋介石那样“为富人立国”，但无论多么大公多么无私的人，到了这样的高位，也可能要“照顾”一下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享受“革命胜利的成果”吧。那么，毛泽东会如何照顾自己这些“穷亲戚”呢？让亲朋好友去当国家的部长、院长、会长还是省长、副省长呢？韶山冲的亲朋好友们期待着。

湖南湘潭是于1949年夏末解放的。

8月，第四野战军南下湖南，第46军138师一部进入湘潭，韶山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韶山的乡亲们欢呼雀跃。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获知毛泽东就是国家主席，奔走相告。不少人高兴地说：“今后天下姓毛了！”抱有升官发财的幻想。很快，毛泽东便接到来自老家各种各样的来信，有的要求当官，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介绍求学读书，甚至一些亲戚和乡亲直接坐火车到北京城，找毛泽东来当官发财。

他们的这种心理和做法完全正常。古往今来历史上，哪个皇帝登基后，凡是与之相关的亲朋好友不是鸡犬升天呢？远的不说，就说蒋介石吧，当年在广东打天下时稍微有点出息（时任粤军参谋长），就急匆匆地为同父异母的卖油郎大哥蒋介石卿谋了顺德县长之职（蒋介石卿大字不识，当县长随即当砸锅，不久就下岗）；组建南京政府后，大哥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还是硬让他当了浙江省海关总监，在“肥锅里滚油”，其他亲朋好友，如老师周骏彦，同学俞飞鹏、朱孔阳……都被充插到要害部门任职。国民党各大官小僚，谁人不是父亲当省长，儿子当市长；舅舅当县长，外甥当乡长呢？在旧中国，一人得势，其他人跟着升官发财，很平常，也很正常。

谁知韶山冲的乡亲们来到北京后，不仅没干部当，没被安排工

作，还被毛泽东一一劝了回去，在韶山冲原来干啥照旧还干啥，没官当，也没财发。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时间，拎了两包韶山自产的干笋，赶来了中南海，看望久别的堂、表兄毛泽东。

弟弟们来了，毛泽东特别高兴，兴奋地说：“多年不见了，我也很想念你们！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当晚，他破例丢下手上的工作，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谈话，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

两位弟弟先介绍了韶山这些年的情况，说起不少他们都熟悉的人和事。毛泽东兴致盎然，问这问那，还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显然，离开韶山整整 22 年的他对韶山的一人一事都十分关注、关心，对那里的一土一木都是那么情深，赤子的桑梓之情犹然。三人畅谈到深夜，仍没去休息的意思。负责毛泽东生活的李银桥忍不住去催了好几次，毛泽东还是意犹未尽，对李银桥说：“我们披着蒲席说家门，你就莫催了啰！”

他和两位弟弟谈起了韶山毛家的祖先，说起了自己幼年在韶山时的一些往事。直到夜深，三人终于准备结束话题去睡觉了。谁知这时，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说：“你们来了，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

哪有亲戚才见面，就开口叫人家早点回去的？毛泽东官当大了，就不要穷亲戚，不近人情了？不是。他没有让两位弟弟心里不愉快，接着就对他们解释说：“泽连、云凤，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过去的皇帝一上台，亲戚朋友跟着沾光，鸡犬升天，亲戚当皇亲，喊国舅皇姑，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是革命者，不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人

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两位弟弟也是穷苦人出身，听了哥哥的话，不仅觉得很开眼界，也很顺心意。加上他们也听说了那些回到韶山冲的乡亲的一些话语，明白毛泽东的心思。毛泽连则说：“哥，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的主义，我们很看好！老蒋搞腐败，垮台了。你们为穷人，为人民服务，得人心哩！”

“你们也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教育他们说，“中国打了几十年仗，现在刚刚结束战争，需要恢复元气，医治战争创伤。这需要大家的努力，也包括咱都在内。你们在老家种好田，多打粮食，支援国家，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也是为人民服务。”

“哥，你站得高，看得远。”毛泽连由衷地说，“我们没别的本事，按你的话，回家一定种好田。”

“哥，我们也要为人民服务！”李云凤也表态说，“哥小时候就会写文章，家里人都说你啥事都比乡里人站得高！”

“你们听话，我就很高兴！”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都是亲戚，不能让别人说我毛泽东‘妙手著文章’，铁肩却不担道义啊！你们不当官，不要钱，还多打粮，为人民服务，我得感谢你们！”

至此，早点回家的一切道理，哥俩儿都懂了。

两人在中南海愉快地住了几天，到北京城看了看，算是开了眼界，见了大世面，于是便准备回湖南老家去。

临行前，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由于实行供给制，毛泽东吃用没有私物。李银桥便叫工作人员小韩去管理科领了十斤块糖，准备让哥俩儿带回家招待乡亲们。小韩领了块糖回来时，被毛泽东看到。他立即问道：“这一大包东西是什么？”

小韩告诉说：“是块糖。”

毛泽东获知是给毛泽连、李云凤带回家去的，立即责问道：“拿

这干什么？”

“叫他们路上吃，回家招待乡亲，好歹也好说到主席这里探亲一趟了。”小韩说。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两个人在路上哪吃得了这么多？有两斤足够他们路上吃和招待人了，多余的送回管理科去。”

“这……”小韩有些不愿意。

“国家还很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别人的家属来了怎么办？我们人人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耐心地说。

结果，两斤块糖，毛泽连和李云凤哥俩儿一人一斤，除了那身新衣服外，没别的礼物。

他们离开中南海时，卫士长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坐火车，并交代小金说：“记住，为他们买好回湖南的火车票。”

此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次日早晨，金武森带着哥俩儿坐公交车，很快就来到了前门东火车站。谁知买票的人太多，金武森赶紧去排队买票。

可是，他排了三个多小时，就要排到售票口时，当日的车票全部售完了。无可奈何，他只好把兄弟俩带回了中南海。

毛泽连和李云凤不得不在这里再住了一晚。

大概是因为金武森“不行”，第二天早晨，天刚麻麻亮，阎长林亲自出马，送毛泽连和李云凤去火车站。结果，还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站了老大半天的队，没到售票口，车票就又售完了。他也只好再次把哥俩儿带回了中南海。

毛泽连和李云凤见警卫班连送两次都没走成，商量了一下，便决定自己到火车站去买票。毛泽连找到阎长林说：“阎排长，没想到

来时容易，去时这么难。你们就别管了，我们自己走。”

“我们都买不到票，你们自己咋走？”阎长林奇怪地问。

“我们住到火车站去自己买票。”毛泽连告诉说。

“到火车站去住？”阎长林更是奇怪了。

“是呀！北京这么大，大白天排队肯定买不上票。我们住到那里，连夜排队。不行，就多排它几天，我就不信买不上回去的车票！”

“我们警卫班负责送你们上火车，没送走，任务就没完成。”阎长林说，“这票还得我们去买。”

“不再麻烦你们了！”毛泽连坚持说，“硬事只能硬法子解决。不住到车站去扎营，还是走不成。你们就别管了！”

“天这么冷，住车站会冻坏人的！”阎长林着急地说，“你们不能去！”

哥俩儿还是坚持要到火车站去“扎营”，劝都劝不住。其他战士闻讯，一起围过来，七嘴八舌，劝的劝，拉的拉，好不容易才把两位“犟骡子”劝住。

当晚，阎长林找来警卫班班长武象廷谈话，最后交代任务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既然是政治任务，那就是必须完成并且不得拖延的。武象廷接受任务后，心想自己要是再把人领回来，咋向主席交待？暗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兄弟俩送走。于是，他决定来个“笨鸟先飞”。

第二日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从中南海出了新华门，在街对面上了由西直门开往天桥的有轨电车。很快，三人在前门站下车，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武象廷先把毛泽连和李云凤安排在候车室里，然后对哥俩儿说：“你们等着，我去排队买票。”

尽管这次来得比上两次都早，但当武象廷来到售票处时，这里还是挤满了买票的旅客，熙熙攘攘。他按顺序排上了队。

武象廷排了三至四个小时，好不容易就要到售票口了。看着在前面只有那么两三个人，他心里念叨着，千万别轮到我就没票了啊！没想到，还没念叨完，只听见“啪”地一声，不远处的售票窗口关上了。

他一下就傻眼了，眼睁睁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怎么办？他走到售票口，敲开售票口的小门，对售票员央求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事情！”接着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但售票员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眼看只能把毛家兄弟再次带回中南海去了，他回到候车室，把没买到车票的情况告诉哥俩儿，并且说：“回中南海去吧，无非就是多住上几天！”

毛泽连说：“已经连续三天买不到票，老来回跑，影响多不好。再回到中南海，还以为我们兄弟不愿意走哩！”

李云凤也说：“老麻烦你们警卫班的同志，太不应该了。”

“你回去吧，不要管我们了！”毛泽连坚持说。

“你们想咋办？”武象廷问道。

“武班长，你走吧！”李云凤也劝道，“我们就住在这扎营，今晚连夜排队！”

兄弟俩再次拿出了湖南人非要干成一事的骡子脾气。武象廷更为难了，突然觉得这样对待主席从老家远道而来的亲戚不行，好歹他是当班长的，脑子灵活，想了一下，决定再试一试，便对他们说：“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还到售票口再问问，看能否想个别的办法。”

他来到售票口，再次敲开售票口的小门，央求售票员说：“你能不能为我解决两张到湖南的车票，求求你啦！”

售票员还是回答说：“同志，求也没办法，没票了。”

好在，他这次还没“啪”关掉售票口。武象廷灵机一动，立即问道：“你们车站领导在什么地方？我要见一下你们领导。”

“你从这里往东走，走到头，有一个小夹道往北去，那里就是车站主任办公室。”售票员说，“你去找找主任，看他有不有解决的办法，我是没办法的。”

武象廷说声“谢谢”，抱着一线希望，顺着他指的路线，很快找见了车站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大声问道：“哪位是车站负责人？”

坐在办公桌前一位老同志问道：“同志，你有什么事情？”

武象廷难为情地说：“同志，有一件事本来不想麻烦你们，可实在是没办法，不得不来请你们帮助。”

这位老同志倒是爽快，立即说道：“我就是车站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要紧事，就跟我说吧！只要我能办到，就可以帮助。”

“这事很难开口。按道理我不该来找你，可不找又没办法解决。”于是武象廷便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走了三次三次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

主任听了后，满口答应，并且还责备说：“你咋不早说！”随即，一个劲在武象廷身后搜寻，又问道：“人在哪里呢？”

“在候车室里候着哩，已经等五六个小时了。”

“快，你快去把他们请到这里来，不要叫他们再在候车室了。”

武象廷正要转身去叫他们，车站主任还埋怨说：“你这个同志，咋不早说呢？这点事好办，你把他们交给我，保证把他们安全送回湖南。”

武象廷把毛泽连和李云凤领到了车站办公室，又把毛泽东出的买票的钱给了主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这样，他终于把毛泽连和李

云凤送走了。

政治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报告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让亲戚甚至身边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得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的。

然而，此事尽管武象廷、阎长林等人没说，后来还是从车站那边传了出去。一位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将领听说此事几乎不相信，说：“毛主席的亲戚来北京，回老家居然排了三天队都买不到车票，连送两次都没走成。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啊！”

“事情真的就是如此！哥俩儿差点就到火车站扎营啦！”武象廷说。

“孔祥熙的孔二小姐在撤离重庆时连狗都带上了。同样是运输相当紧张，同样是两党最高领袖的亲属，他们的做法却是天壤之别。得天下失天下，中共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老天之意啊！”老将军由衷地说。

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的亲友们没沾任何的便宜。在新生的人们共和国，没有国舅，也没有皇姑，毛泽东的亲属们种田的，照样种田，教书的，还照样教书，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人的工作、地位有所变化。毛泽东这样的无私，蒋介石是绝对做不到的。他当政后，就把国家变成了自家、妻家、连襟家和恩师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创富家园。就连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也做不到。他在名盛一时后，家里还一直蓄着好几名奴隶。

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的亲戚们连买张火车票回家都这么困难，事后坊间有人由衷地赞扬说：在打天下时，毛泽东已和他的同事们显示出了高超的能力，在治天下时，在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政权，如何对待人民和自己的亲属们的态度上——更准确地

说，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己为本”的立国之本上——毛泽东等人再一次显出了境界上的高超。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治国，先修身，修身正己，才能治好国。毛泽东第一步修身、正己、齐家，做得很好，开局就赢了。

2. 与斯大林较劲，出访满载而归

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愿与“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表示出与各国友好邦交的诚意。10月2日21点45分，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电文说：“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10月3日，保加利亚也发来电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全中国人民之意志”，次日两国建交。10月6日，匈牙利来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政府。然而，美英等西方国家不仅不承认新中国，还顽固地与中国人民为敌，与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对抗，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敌对政策。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决定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维护新生政权和捍卫人民共和国。

1949年12月，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以巩固与苏联的邦交，争取国内建设的外部和平环境。

这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本来，一个政权新成立之初的外交往往是弱勢的，要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当年蒋介石在江浙商人支持下建立南京政府后不到半年就被迫出访日本，以关税、盐税等作保借得巨款，才赶跑李宗仁等人。毛泽东这次出访，却破例没带什么金银，也不出让国家利益，只是准备了一火车皮山东大葱，一火车皮江西蜜橘——就像农村人走亲戚一样，带了些土特产，算是感谢苏联人民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支持。因为斯大林过60岁生日，毛泽东给他准备了两件私人礼品：几匹丝绸和一件屏风——也是乡下走亲戚的架势。然后，他带着一个小队伍和两箱子书，从北京出发了。

路途遥远，专列从东北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经过整整十天漫长旅程，12月16日中午，终于抵达莫斯科。

毛泽东的专列刚刚停下，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人便上车慰问。然后，莫洛托夫在右，布尔加宁在左，扶着毛泽东走下车。毛泽东检阅仪仗队后，站在扩音器前发表了热烈而又简短的演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最后，毛泽东高呼：“中苏友好合作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

这个热情洋溢的演说由费德林翻译的。斯大林是毛泽东喊“万岁”的外国人。但是，在这短短几百字的书面演说中，他却特别重提“苏维埃政府废除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旧事，还说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废除的，不仅旧事重提还垫出了斯大林的“功劳”，意味深长。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送到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虽然在市郊，但楼房有三层。毛泽东和叶子龙、师哲、李家骥住一层，毛泽东在东头，其他人住西头，中间是开会用的大厅。秘书陈伯达和负责警卫的汪东兴等住二层；三层是台球室、电影室。

吃了中饭后，毛泽东来到办公室和卧室，按了按卧室的床，又看了看那高级被褥，皱了皱眉头，对贴身卫士李家骥说：“我睡不了这种高级沙发床，还是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又按了按鸭绒枕头，笑着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

李家骥接话说：“主席，我们把垫子掀开，铺上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点点头，又嘱咐他说：“不过，我们不能麻烦人家。”

机灵的李家骥马上出主意说：“可以请我们大使馆同志帮助解

决。”

然后，毛泽东由他陪着到其他人的办公室和卧室走了一圈，就回办公室看文件了。

李家骥继续安排他的住宿。驻苏大使馆的同志很快就把木板送来了。李家骥开始给毛泽东做“新床”——把苏方的高级被褥换掉，把他在专列上用的旧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和荞麦皮枕头一一放好——“新床”就好了。李家骥的做法让苏方工作人员很疑惑。两位女服务员惊奇地看着他“做新床”，非常不理解，说了一阵俄语便走了，很快，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斯大林卫队卫队长别里别契便随她俩走进来，打着手势问李家骥为什么把原来的卧具换掉。

李家骥哪听得懂这些“叽里咕噜”的话语？立即把俄语翻译师哲请来。师哲向他们解释说：“毛泽东同志有用自己被褥的习惯。”

卫队长和服务员还是想不通：“这么高级的好东西，毛泽东同志为何不住呢？试一试也很好啊！”

师哲又解释说：“那样他才能睡好觉。”

他这么解释，苏联人更是不明白了：哪有睡木板“才能睡好”的“首长同志”啊？！两位女服务员想了好一会，最后还是耸着臂膀表示不理解，但她们接着还是主动帮李家骥忙，协助他整理床铺来了。

据说事后别里别契向苏方负责人进行了汇报。师哲闻讯，不得不再去向别里别契详细介绍毛泽东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和艰苦朴素的品格。他终于明白了，钦佩地伸出大拇指连说：“毛泽东同志真伟大，太俭朴了。”

这样误会才算解除了。

下午两点多钟，毛泽东和工作人员正在休息。突然，三辆高级轿车在别墅门口停下，走下来五六位苏联高级官员。李家骥忙叫师哲说：“苏联来人了。”

“快，我们准备迎接。”师哲说。

两人做好迎接的准备。但等了十多分钟，只听见门口有俄语对话声，却不见开门，更不见苏联领导人进来。后来，几辆轿车上的高官气呼呼地“啪”一关车门，又走人了。

李家骥等人正奇怪时，别里别契进来了。师哲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是两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前来拜会毛泽东同志。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命令，谁也不允许干扰毛泽东同志。所以，没让他们进。他们非要来，我没办法，只好说，我在执行斯大林的命令，请你们必须离开。”

后来李家骥和师哲把此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看来斯大林的命令就是圣旨啊！”

师哲接话说：“都是命令，必须执行。”

毛泽东笑着说：“人家拜访我，我们应该欢迎，结果吃了他们自己人的闭门羹。”

下午4点10分，斯大林亲自打来了电话。师哲立即拿上话筒，告诉毛泽东说：“他问你好，希望保重身体，好好休息。请你接电话。”

毛泽东拿过电话说：“斯大林同志你好，谢谢你的关心。”而后将话筒交给师哲进行翻译。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莫斯科通了电话。

6点整，根据事先安排，毛泽东由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伯达等人陪同到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当毛泽东到来时，斯大林带着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整齐地站成一排迎接。据说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才这么安排，算是破了一次例。

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紧紧握手。斯大林认真端详着毛泽东，亲切又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接着，两人互相介绍了自己的同志。

随后，两人一起去会见室。斯大林边走边赞不绝口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双方入座后，斯大林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则谈了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并表示感谢。

在热情的会谈中，两人除互相肯定对方取得的成绩外，斯大林一再对毛泽东说：“你来趟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说：“我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二是希望到苏联多走走、看看。”

“你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斯大林问。

“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说，“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谁知这个中国式幽默，斯大林却不明白，婉转地询问具体是什么。毛泽东认为“这个东西”的具体题目应由苏方首先提出，因此始终没有说，只是回答说准备让周恩来总理来苏联。斯大林对毛泽东不明朗表态既惊奇又不解，说：“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还让他来干什么呢？”

毛泽东没有吱声。

尽管这次会面气氛很好，但会谈或来访的具体目标却没有确定。双方都想搞一个“东西”，但都想让对方先讲，结果竟弄成了僵局。

其实，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东西”，都是指条约、协议之类的文本。斯大林认为，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还是什么协议，不管多大的事情，他都可以亲自拍板，因为他是苏联党政一把手；而毛泽东也

是中国党政一把手，也有他那种权力，两人当场就可以把一切问题搞定。毛泽东却提出让周恩来来苏联，内心的想法就是准备不随便接受苏方提出的条件，让周与苏方谈判，毛本人不做具体工作，若双方遇到问题了，则有回旋余地。因此，两人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有分歧。

此时斯大林和苏共对毛泽东和中共是友好的。出现僵局后，斯大林态度谨慎而又积极，主动第二次打电话给毛泽东，直接问他有什么愿望和想法，双方应做些什么，是否有新考虑等。他还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等人去拜访毛泽东，摸底让毛先说具体干什么、怎么干。但是，倔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让步，坚持让苏方先说，自己不开口。事情还是僵持着。

一天，苏联专家柯瓦廖夫兴冲冲地带着翻译来看望毛泽东。谁知毛泽东却突然冲他发起了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柯瓦廖夫被毛泽东的样子吓得半天不敢说话，灰溜溜地回去了。

其实，毛泽东对这位柯瓦廖夫倒是没啥意见，发脾气不过是一个外交策略。因为他以为这么一发脾气，柯瓦廖夫定会跑去向斯大林汇报，迫使斯大林采取一个具体办法。

谁知苏共不是中共。柯瓦廖夫根本没资格去面见斯大林，更不敢向他汇报。相反，他无缘无故受了毛泽东一顿火气，怎么也想不通，竟连夜写了一份污蔑毛泽东和中国的材料邮寄给了斯大林。孰不料斯大林把这个材料转给中方，并解释说柯瓦廖夫是搞技术的，不懂政治。但他还是坚持让毛泽东先开口。

会谈中，中苏双方就同盟条约、中苏铁路、旅大港口、双方贸易、

借款、民航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后起草条约、协定文本。苏方先搞了一个草案，中方看后不满意。周恩来和王稼祥、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重搞了一份，苏方看后基本上没改动。随即，双方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外，双方还共同起草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谈判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了主要目的。

2月14日，中苏两国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均出席。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和协议上签字。同日，两国政府发表关于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

毛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准备回国了。

2月17日上午，他和代表团登上专列，告别莫斯科，乘坐专列由原路回国。

又经过整整十日漫长的旅程，27日下午，专列带着一身寒气开进了哈尔滨火车站。

毛泽东的出访圆满结束了。

他这次出访是对新中国“另起炉灶，一边倒”外交策略的落实。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继续进行封锁、“围剿”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一边倒”的做法，多少有些依靠强大的苏联来巩固新生人民政府的味道。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毛泽东选择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就毫无选择地选择了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结盟。此时，新中国只有依靠苏联，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一则可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则可以求得外援，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但是，这次毛泽东的外交之行，却没有像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人那样在外国人前低三下四的出卖主权。

虽然和苏联人有些周折，但问题最后都得到解决，无疑是毛泽东的大智慧。此行他和周恩来唯一的让步是蒋介石政府已承认外蒙独立的前提下在新约中进行了确认，但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维护了中国利益，不仅为蒋介石卖国抹了屁股，还通过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友好争得了中国在长春铁路、旅顺的利益。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外国，一破以往中国要人“一出国门就卖国”的惯例，争取了国家利益，加深了中苏友谊，可谓是满载而归。

3.毛泽东从苏联回来，连发四次大脾气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发了脾气，争取了国家利益，同时也大开了眼界。当他参观苏联的工业化成就时，亲眼看到了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他没有沉迷异国高级的生活享受中乐不思蜀，好强的他反而激起了一股后来追上的决心。

理想的实现往往在现实中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羁绊。其根源是由于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大千世界中的每个人的思想也是错综纷繁，并非人人都是纯洁得毫无私心，奢华和一个“私”字，总是如蚁附膻，在一些人心胸之中挥之不去。这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绊脚石。

毛泽东也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绊脚石。

1950年3月4日，离开北京达88天之久的毛泽东，在东北各地视察后，回到了中南海。在他出访几个月中，贵州、四川、云南、广西、

福建等地已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全部解放，只剩下西藏、海南岛和台湾没有解放，全国基本上获得了解放。这为下一步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奠定了更好的基础。应该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外有收获，内有成绩，心情是十分高兴的。

第二天，副卫士长李银桥去香山接回了驻守在双清别墅的妻子韩桂馨。在吃饭时，毛泽东特意让厨师多准备了几样炒菜，为韩桂馨“贺喜”。

饭后闲谈中，毛泽东兴趣盎然地向小韩问起香山的一些情况。无意中，韩桂馨说起某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还没住进去。毛泽东听着，脸色马上变得难看起来。小韩见状，急忙打住，没再说下去了。

李银桥夫妇以为这件事让毛泽东不高兴一下就过去了。

不料第二天下午，李银桥在菊香书屋见到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正面红耳赤地坐在毛泽东会客室里。周恩来与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也在里面。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位领导干部，显然按捺不住胸中的怒气，冲着他大声吼道：“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差不多了！”

毛泽东从没对手下发过如此大的脾气。这位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气呼呼地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就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还是不罢休，点着他的头说：“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了一点权，有意拆共产党的台！”

他发着脾气，还带着特有的毛氏风格——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也没见毛泽东发过如此大的脾气，面面相觑，也不便多讲一句话。突然，毛泽东将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

周恩来和聂荣臻吓了一跳，惊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人吓得软了身子，险些瘫倒地上。毛泽东又连说两句：“卫兵，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李银桥在一旁悄悄地看了看周恩来和聂荣臻，两人想上前劝劝毛泽东，可不敢动。毛泽东依旧盛怒地说：“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李自成了！”

“主席讲得对！”周恩来终于站起来了，十分严厉地说，“这件事必须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位干部立即表态说：“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组织上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稍稍少了一些怒气，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怒？

因为他认为这种牟取私利的行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不符合，是腐败的体现。

毛泽东对干部腐败一直看得很紧，抓得很严。但处置腐败，他不是只在事后惩罚，而重在事先警醒、教育。抗战即将胜利之际，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公开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李自成的失败，向世人提出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

不能骄傲。文章一出，蒋介石派出笔杆子对文章大张挞伐，骂他胡说。而毛泽东却欢迎之至。延安的《解放日报》立即全文转载，同时发表《防止骄傲自满》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此文，吸取历史教训。中宣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延安还出版了郭文单行本，人手一册，把它列入整风学习的文献。在毛泽东推动下，陕甘宁边区与各根据地掀起了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搞好整风的热潮。

1949年春，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历史进入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谈了防止骄傲自满的问题，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课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作出“防止糖衣炮弹”等系列防腐反腐具体规定。

这些做法和规定为党执政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大动肝火也与他在苏联的感触和回国后路上的见闻有关系。

这次出访苏联，他参观了人家的大工厂和大农场，看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与苏联的巨大差距，也激起了奋起直追、发展经济的决心。2月27日一回哈尔滨，才下火车，他就冒着严寒视察哈尔滨车辆厂，语重心长地告诫干部们说：“不懂就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学。你们要好好学会管工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必须做好。”

当晚，当地省市负责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长途归来接风洗尘，

出于对领袖的热爱，把“便宴”搞得很丰盛。毛泽东看了就有意见，鉴于越共主席胡志明也在场，便没说什么，只吃了半碗大米饭就放碗了。饭后，他派人专门喊来哈尔滨市市长饶斌，耐心地对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饶斌立即表示：“一定照办。”

第二顿饭就简单多了。

次日中午，专列到达长春火车站。东北局和吉林省、长春市领导干部也赶来了。毛泽东来到市区看市容时，发现大街小巷一个人也看不见，立即敏感地问道：“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

“现在正吃中午饭。”有人回答。

他一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没有放过此事，当即说道：“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接着就批评他们说：“你们在说假话，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是想学封建社会的官僚？”

吉林省和长春市干部受了批评，马上下令解除戒严。命令下达后，老百姓三三两两出来了，毛泽东才消了气。

当晚，专列离开长春，来到沈阳。

当毛泽东在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人陪同下来到食堂吃饭时，一进餐厅，他的脸就沉下来了。原因还是老问题：高岗准备的晚餐非常丰盛。毛泽东向胡志明主席让座。就餐中，他吃了点饭，只吃了眼前的空心菜，礼节性地陪胡志明喝了几口葡萄酒，便放下筷子，然后吸起烟沉思起来。

结果，整个晚饭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始终没有掀起“高潮”，最后还剩下不少菜。

饭后，毛泽东来到一楼会议室。其他人也陆续到来。大家闲谈了

一会，毛泽东欠欠身子，就发起言来。他先说今晚饭菜太多，接着就批评高岗等人，不满地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效仿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叶子龙见毛泽东不高兴了，便小声插话问道：“主席，刚才收到的那封电报怎么处理？”

这样，毛泽东才不得不转到别的问题上，说电报处理的事情了。

批评被叶子龙巧妙地“叉开”了。

谁知一贯不记小事的毛泽东却没忘记此事。第二天在东北局、沈阳市领导干部会上，他讲起了回国后这几天的切身感受，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

说到此，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毛泽东从哈尔滨到长春，又到沈阳，三个地方发了三次脾气，对有些干部的思想作风是不满意的，是不高兴的。

他为什么发脾气，因为党内出现了不正之风。而回到北京，他没想到党内的高级干部居然为自己修起了别墅，这样下去，不仅国家建设没有希望，而且党的肌体也要被蛀虫腐蚀。党内的奢华之风和个别人的私念让毛泽东不得不勃然大怒。这些现象可谓应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古语，然而，毛泽东回国后四次发脾气却给党内敲响了警钟，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使得全党高级干部对于执政的危险顿然之间有了高度的警惕。

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就是为国家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在去莫斯科前几日，他在交代工作时就提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要求“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并且做好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回到北京后，他立即提出中央的工作主要是抓财政，及时地转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轨道上去，除统一全国财政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调整现有的工商业，帮助和扶持生产经营有困难的私营工商业。随后，党中央决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费用，以便顺利地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转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把工作重点由原来的解放战争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这是非常及时和敏锐的。从辛亥首义以来，中国一直陷入混战之中，多年的战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以前诸军阀上台，谁也没走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怪圈，战乱是一个主要原因。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结束了战争，近40年以来，中国人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业绩。但是，战争一息，毛泽东就要去搞经济，去抓发展，体现出其杰出的治国智慧和能力。

毛泽东能如愿吗？

4.是毛泽东亲自在“五一口号”中添上“毛主席万岁！”吗？

2010年4月，某杂志发表文章引述了一段史料称：“1950年党中

央发表“五一口号”写道：“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该文作者还特别注明所引用的这段发言出自当时“（中直2—15）”——即中直机关第二组第15期简报。毛泽东真的自己在1950年“五一口号”中添上了“毛主席万岁！”吗？

这首先要从“五一口号”的来由说起。

“五一口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由中共中央发布的宣传口号。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世界工人和劳动者的节日。党内历来有进行庆祝的习惯，并于1948年形成一个发布“五一口号”的惯例。

这缘起于1948年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为纪念这个劳动者的节日，每年党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一些专门庆祝决定，发表宣言、口号，甚至举行集会、游行，刊发一些文章、社论。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分别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1939年4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在延安时期，各界每年都要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1948年的五一节自然也不例外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正率队在太行山麓深处的涉县东西戌村，他首先想起了这个惯例和“新华社的职责”。

廖承志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国民党监狱坐过近十年大牢，但他天性活泼幽默，爱讲笑话，还喜画漫画，可以说是党内另一类型的才子。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他给党中央发去一份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节党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

电文传到西柏坡后，中央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把电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周恩来送交毛泽东，请示宣传口号。

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我们对外公布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五一口号就以这个为主旨吧！”

随后，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此事。五大书记集体决定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五一口号”。

在刘少奇主持下，有关部门起草完毕，一共 24 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全国各方面的劳动者和劳动模范致敬和问候，口号包括：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向解放区努力生产的职工、工程师、技师、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们致敬！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还有一些就是号召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职工和经济工作者以及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最终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努力，等等，最后两条口号，即第 23 条是欢呼性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 24 条也是如此：“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后，刘少奇把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处审阅。

当晚，毛泽东看后，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他将第 5 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第 23 条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却被他一把划掉，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则被他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改动中，他删除了对自己的颂扬，而强调了统一战线和当前革命任务。这个修改无疑是反对个人崇拜。经修改后，当年的“五一口号”由24条变成23条。

4月30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讨论并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时，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毛泽东在“五一口号”中划掉了喊自己万岁的口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五一口号”发布这一日，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为其“合法当上”民国大总统的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他本人当仁不让地就任总统之职，并举行盛大就职典礼，令手下大喊：“蒋总统万岁！”

毛泽东的谦虚与蒋介石的沽名钓誉形成鲜明对比。

这就是“五一口号”第一次喊毛泽东万岁的由来。有趣的是，它被毛泽东本人一笔就划掉了。

现在全国调整工商业的热潮中，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要来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党中央照例要发布“五一口号”。那么毛泽东这次“补上”了自己万岁的口号了吗？

因为某杂志在文章中论证毛泽东为自己写上“毛主席万岁”，引起很大反应。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为此特地查阅了档案。

找到这份口号的原件时，这位同志发现这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共五页纸，35条，最后两条即第34、第35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不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胡乔木起草后，将初稿送刘少奇审阅。原件上，刘少奇用毛笔对其中第9条、第13条、第16条、第17条、第19条、第22条、第25条、第29条、第31条、第32条、第33条、第35条作了具体修改，并删去第34条。

值得一说的，是第33、第35条的修改情况。刘少奇将第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修改后，在原件第一页右侧写道：“毛主席：此件请审阅。如可用，请交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4月18日，刘少奇的修改稿被送到了毛泽东处审阅。

4月21日，毛泽东审看刘少奇送审的“五一口号”修改稿，对其中三条作了修改，一是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

按照惯例，此件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方能正式发出。毛泽东改完后，又在标题《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下加括号写了“草案”二字，并在第一页的上方批示：“尚昆印发。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

随后，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这一页的左上方批示：“乔木同志：请印20份。”

这一份“五一口号”中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什么地方是谁修改的，十分清楚。

按照毛泽东说的“星期三”，是4月26日。会议如何讨论的，暂未查到文字记载。

但随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五一口号”，由34条增加到38条。增加的四条是：“向全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界致敬！”“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协助人民政府救济灾荒！”“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迅速发给土地证，巩固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努力进行春耕！”“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其中，经刘少奇修改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两条口号没有改动。因此，所谓毛泽东在1950年“五一口号”中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并不是事实。事实是：“毛主席万岁！”是胡乔木起草的，刘少奇在审阅时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的。

而“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也不是胡乔木、刘少奇创造的，更不是毛泽东自己创造出来。据说最早喊“毛主席万岁”，是在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们深感自己过去是被人看不起的穷苦人，现在翻了身，还当了光荣的劳动英雄，非常感激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纷纷给毛泽东发出献词。其中，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人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随后，献词刊登在该年12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当时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等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也有“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字句。

这是现今可查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毛主席万岁”。

以后，党内高级干部王稼祥、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1945

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上，朱德做军事报告，报告结束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随后，周恩来在大会讲话结尾也高呼这两句口号。这两个口号便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在党的文件中也经常使用。

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社论，最后写道：“让我们高呼：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救星毛泽东万岁！”

1947年秋，毛泽东去佳县县城看黄河时，在城楼上被老乡们认出来。老乡们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有的立即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向老乡们招手致意：“乡亲们好！同志们好！”

毛泽东热爱人民，人民拥戴毛泽东，两种感情都是很真挚的。类似的场景在陕北时十分常见。

次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内有“毛主席万岁”话语的新华社西北电，全文如下：

在延安周围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墙上门上石牌柱子上都写满了“消灭胡宗南”“打倒蒋介石”等各样标语，但是最大而显著的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一天黑夜游击队标语组摸进了蒋匪某据点村子，将红绿传单散在路上，土地法大纲贴在门上，在一堵又光又平的墙上用仿宋体写了“毛主席万岁”。第二天一早群众都悄悄的传开了“咱游击队昨黑夜回来了，墙上还写下标语啦”。敌保长知道后急忙跑到连部报告，连长气汹汹地说：“活见鬼，我保险游击队的魂也不敢进来”。话未说完，哨兵也跑来报告，并掏出许

多红绿标语。连长命令保长：“赶快派人把标语擦掉”。被派的老百姓就用铁铲依笔划铲掉墨迹这样越铲越深越显，“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倒像是刻的了。连长大骂了一通，并命令士兵刮去“毛”字，写上“蒋”字。但第二天“蒋”字不见了，照旧是“毛主席万岁”。这样改来换去连续了几天，敌人胆寒了，不得不加岗放哨并特别派哨兵专门守在那条标语跟前。就在这一天夜里，刚换哨不久，从村外来了三个人，一个拿箩子刷子，一个拿着擀面杖，领头的提着灯笼边走边叫“马娃子回来”！两个合应“回来了！”敌哨兵忙问：“干什么的”？提灯笼的高声答道：“到老爷庙给我娃叫魂去”。三人就这样走进了村，走到那条标语跟前，提擀杖的首先扑倒了哨兵，提灯笼的照准哨兵就是一刀，拿刷子的把“蒋”字刷掉，从箩里取出笔墨写了个“毛”字，把红绿传单放在路上，三个人又边叫边应的走出了村子。第二天一早便轰动了全村，大家用惊喜的眼光望着那五个放光的大字“毛主席万岁”！

老乡们喊“毛主席万岁”；游击队也喊“毛主席万岁”，甚至以此来震慑敌人；党内也有人喊“毛主席万岁”，而毛泽东本人对这种方式却并不欢迎。

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来电报，说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两日后，8月1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回电，其对有“党内五老”之称的吴玉章的口气却是如此的不同寻常：

吴玉章同志：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

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可基于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同志关系、与最基层群众的鱼水关系，他于类似的、情不自禁的说法和称呼又如何当面黑脸呵斥呢？只能在一些文字上删除、反对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而他这次对吴老批示的严肃语气令人惊讶。

194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进驻北平，在迎接他的人群又出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该报道“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写”部分如下：

五时正，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诸同志……进入西郊机场。林彪将军、聂荣臻将军、贺龙将军立刻趋前迎接，军乐大作，上万的人群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欢迎行列的最先端是工人代表，不少久经革命斗争的老工人，胡子已经斑白了。

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双手握着毛主席的手，紧紧不放。工人阶级和自己的领袖会合一起，那是一幅多么热烈的、动人的场面！

可见此时群众喊“毛主席万岁”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很平常，但皆是出自肺腑和不自觉的呼喊和情绪表达。

9月，全国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齐聚北平的各界人士结尾时往往呼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万岁”口号。如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政协会议上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喊：“毛泽东万岁！”这完全是出自肺腑，从心底里由衷喊出来的。除他以外，还有许多人，如新疆代表团团长艾则孜·赛福鼎在发言最后也不禁高呼：“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陈叔通也喊：“毛主席万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谢雪红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高呼：“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在发言最后也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也振臂呼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

在开国大典上，当群众队伍经过主席台时高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口号是人们表达感情心绪的即兴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语的呼出，完全是群众自发地表达自己的真挚感情，情不由衷地喊出来的。

毛泽东不喜欢喊自己万岁。而老乡们、普通群众喊，他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呢。他不好去阻止，也没办法阻止，但他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

1949年9月30日，他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并宣读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其中有一

句话语是：“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自己给自己“戴帽子”，冠以“领袖”的话语。而在他本人起草宣言时并无此语。在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强烈要求一定要加上“爱戴”、“万岁”、“领袖”之语。事后，他勉强同意用“领袖”这个中性词，还提笔加了“人民”两个字。

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时乃至建国后，毛泽东对“毛主席万岁”口号是不喜欢的。许多人的回忆和文章中都记述过他因此不高兴、不满意甚至生气的话语，就连郭文中所说的陈友群，也有“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之语。毛泽东不愿住皇宫，不愿当皇帝，反对别人喊他“万岁”。他终生没有仿照“国际惯例”在中国提出过“总统”、“国家元首”之类的称呼，只有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神州大地最响亮。

马列主义告诉人们，没有万岁的事物。毛泽东从没喊出过自己万岁，而老百姓喊出来了，民主人士也喊，刘少奇、胡乔木等人也喊。这并不是封建王朝式的“山呼万岁”，而是劳苦大众翻身后的由衷表达，是民主人士感受新旧社会两重天之后情不自禁的感叹，刘少奇、胡乔木等人则是回应了他们心底里的这种表达。他们的回应，严格地说，是出自于对“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情感。

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是党的化身，由此他们写上“毛主席万岁”，而不是“毛泽东万岁”。

毛泽东自己加上自己万岁的口号之事，完全是主观臆想或者道听途说，没有任何史实根据。

5. 警卫员巧化“衬衣当了孩子尿布”的窘境

建国了，当国家主席了，毛泽东革命了一辈子，下一步怎么做？该是享享福了吧。美国《华盛顿邮报》驻香港分社社长马修斯后来如此说：毛泽东“是一个哲学家、诗人、战士和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治领袖。当他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统一了中国后，坚决拒绝了靠吃老本的引诱。反之，他发动了一场仍未结束的运动来改造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国以外的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感到难于理解的……我们有很多人到了中年时，便会感到疲倦，希望平平静静度过余生。毛主席在赢得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军事胜利并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本可以停下来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前进……”^①

建国了，但一切百废俱兴。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这样说的：“1949年，另一次长征开始了，因为，毛泽东说过，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恰恰相反，革命仍将继续。夺取政权只是第一步。中国是一个烂摊子、一个被毁坏的国家，它的敌人以为毛泽东永远不能使它摆脱这种状况。但是，毛泽东相信人民，人民也相信他，这样的信任在以后的二十几年中都得到了证实。”获取人民信任的毛泽东，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后，不是去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像那些功成名就的

^①《悼念毛泽东主席有感》，香港《文汇报》（1976年9月21日），引自1976年9月24日《参考消息》。

人那样吃老本，享清福。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从苏联回到北京后，就开始谋划如何在战后废墟上进行经济复兴。

除了抓财政好转工作，促工商业复兴外，他对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也抓得很紧。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整个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其中，他把农村土地改革列为了首位。

新中国推翻了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崛起，中国社会必须进行革命性变革，才能打碎旧的吃人的制度。全国占人口最多的，是乡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吃不饱、穿不暖的贫苦农民，农民不解放，“人民翻身”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认为，农民要解放，就必须获得土地。耕者无其田，农民把一年辛苦劳动所得都交给地主，就谈不上解放，所谓“翻身”也只是一句自己骗自己的谎话。

为此，毛泽东认为农村、农民要翻身，必须改变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少数地主垄断大部分土地的现实。

其实，自井冈山时代起，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在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伊始，他和红色政权就拟出有关土地改革的法规，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尽管后来革命征途沉浮不定，他始终没忘要让多数农民有地种的梦想。随着革命节节胜利，1946年，党中央领导解放区开展土改运动，1947年制定《土地法大纲》，都极大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运动提上了日程。在出访苏联前夕，毛泽东发电给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就新解放区土改尤其是如何对待富农等问题征询意见。在莫斯科期间，他审定了有关土改的各种法规，还写了许多有指导性的意见和批示，考虑到新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他要求“所

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 1950 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并将全国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江苏、湖北、广东、陕西等九省地区，在 1950 年秋收以后，有条件的可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第二类，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 1951 年秋收以后，可实行土改；第三类，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在 1951 年秋收以前都不实行土改，何时土改另行决定。同时，还明确规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

土改是对农村社会结构“动大手术”，挖封建土地制的墙角，工作千头万绪，到底从哪入手呢？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于 6 月 6 日至 9 日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研究土地改革、调整现有工商业和节减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等问题。

会议开幕后一日，毛泽东要去参加大会，起床后边洗脸边交代卫士李家骥说：“给我找一件新一点的衬衣穿。”

“好哩！”李家骥应着。

可他转而就犯愁了，嘟噜着说：“哪有新的呀？都是补丁的。”

毛泽东说道：“就是你补过的那件。”

毛泽东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的，他的毛裤和毛衣还是长征时穿过的，韩桂馨给修补过，李家骥也补过，毛泽东交代说：“我的衣服破了就补，不能随便丢掉。”这次他点名的“就是穿你补过的那件”，李家骥自然明白是哪一件。因为它并不是新的，而且由于太旧有过一个被撕开的“咧嘴故事”，所以他这么一说，李家骥立即明白是哪一件，可却更犯愁了。

为什么呢？还得从这个故事说起。

那一次李家骥协助毛泽东穿衬衣。谁知因为衣服太旧太薄了，他稍一用力，不小心，“嘶——”后背即开了一个一尺长的口子。

“怎么回事呀？”毛泽东问道。

李家骥说：“主席，衬衣张大嘴了！”

这话很有意思。毛泽东明白撕开了也笑了，对李家骥说：“缝缝以后再穿。”

事后，李家骥把这件撕破了的衬衣缝上了一条白布。几天后换衣服时，毛泽东见到了，还表扬他说：“李家骥，你的针线活还不错呢。”

李家骥笑着回答说：“当兵啥都得会啊！”

“对。”毛泽东点点头，接着又叮嘱说：“这件衬衣可值钱了。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给我丢掉。”

当时李家骥并没在意。孰料这次毛泽东点名要穿它，李家骥一急，灵机一动说：“找不到了。”

毛泽东还是坚持要它：“总在哪个地方，去找一找。”

天哪，现在到哪给找啊！原来，李家骥并不是找不到，而是送给人家孩子当尿布了。从苏联回来后，李银桥和他给毛泽东整理过一次衣服。当时，他见这件旧衬衣一穿就能撕破，虽然缝了白布条，下次连补都没法补了，便自作主张给警卫班战士李凤华的孩子当了尿布。此刻他李家骥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说自己把毛泽东“新一点的”老衬衣送给孩子“当尿布”了，于是硬着头皮说：“还是找不到啊！”

可毛泽东偏偏对这件破衬衣有感情，非要不可，还嘟囔说：“难道这中南海还有人偷我的衬衣？”

一方没有，一方硬要。李家骥有点害怕了，马上借故偷偷地跑出去，向李银桥汇报：“主席非要那件旧衬衣不可。”

李银桥还算比较老练，给他出主意说：“再问你不吭声就行了。”

此时叶子龙来了，发现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于是问道：“你们俩怎么回事？”

李家骥只好如实汇报。叶子龙一听连声说：“坏了坏了，非挨批评不可。”

“那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共同挨批评吧。”李银桥说。

“不用，我先去说，缓和一下矛盾。”叶子龙好像胸中有数似的，先去毛泽东的房子了。

李家骥躲开后，叶子龙进去，让卫士赵鹤桐赶紧去给找了件衬衣。毛泽东见李家骥溜了，生气地对赵鹤桐说：“你把李家骥给我叫来。”

赵鹤桐报告李银桥和叶子龙。三人都慌了神。李银桥是李家骥的顶头上司，只好挺身来给他“挡”，于是两人一起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见他们来了，生气地问道：“李家骥，你是不是把我的那件衬衣丢掉了？我不是说过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给丢掉吗？”

李家骥急得头上冒汗，想好了作检讨的话，正要承认错误时，忽然急中生智，撒了个小谎说：“主席，我哪敢随便给你丢掉呢！我见李风华的孩子没衣服穿，又见那件衬衣确不能补了，就想用这件衬衣给孩子改一件小衣服不是挺好吗。这也不算浪费。所以，我没请示就把它给了李风华爱人，改做孩子衣服了。”

毛泽东听后，发现不是随便丢掉，没有浪费，便“嗯”了声，不但生气反而由怒变喜，说：“好，改给孩子穿，很好。”

这样，李家骥才为自己圆了场，下了台！

若干年之后，李家骥离开了毛泽东，一次与李风华谈及此事。李风华告诉说：“衣服还在我这。”

“咋你留着？”李家骥大吃一惊。

“是的！我没舍得。”

原来李风华拿了这带着白条儿的破衬衣后，见毛泽东如此节俭也非常感动，竟然舍不得给孩子当尿布，而是和爱人悄悄地保存下来了。

两人看着这破旧的衣服，沉浸在难忘的过去时光，感慨万千。李风华说：“有的夫妻俩每月几百元工资，还说苦不堪言，对照主席，真不知要汗颜多少倍！”

“哎，”李家骥说：“如果主席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想窃国之资，谋私之财，又会是多大的资本家啊！而他呢，直到去世都没一点私产！”

这是后话。

这件衣服之事，不过是毛泽东参加七届三中全会时一个插曲。

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总结了建国以来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党下一步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此必须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其中，土改是排在首位的大事情。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投入到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因为他认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实现三个条件，必须获得全国人民包括各党派和其他人士的拥护。为此，他为政协会议起草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发言稿。

6月14日至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是讨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议题，而重点又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政协会议不同于党的会议，代表来自方方面面，且每个人所代表的阶层、人士不一样，因此对于事物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为了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发言。他向与会的党内外同志指出：“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他向准备“过三关”的党外同志发出号召：“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

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同意了党中央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这个草案后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布施行。于是乎，全国开始分期分批土改了。

建国伊始，毛泽东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工作和土改是正确、有效的。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在他写的《毛泽东》一书中，对建国初期毛泽东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他说：“毛和他的同事面临两桩伟大的任务：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开始恢复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来奠定将来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负责引导中国走向政治安定和经济进步的难以理解的人，在许多方面对他担负的使命是非常称职的。”^①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武原主编，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确实，毛泽东从杰出的军事家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转型，向着经济建设领导者迈进。而57岁的他的新起步应该说是成功的，这个开始能持续下去吗，能有成效吗？

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又说：“毛泽东1949年以后尽力解决的问题，比革命战争时期的问题是更难处理的更复杂的。在井冈山、延安时代的问题，就是你死我活斗争到底。而1949年以后抉择不那么容易，这种战斗不是一天内可以定胜负。”^①因此，一切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了。

6. 国庆节前后的两件事

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了新的起步。这个起步是伴随着民族新生的活力而逐渐推进的。虽然目前还有困难，虽然各项工作还很艰难，而人们已经感受到光明前景的来临。

1950年国庆节前夕，秋高气爽的北京一派节日景象。某日，一辆轿车驶进新华门，直抵中南海丰泽园。李银桥立即进门报告：“主席，客人已经到了！”

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到门口，边走边用湖南湘潭话喊道：“九哥，九哥，你来哒！”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1986年第3期。

车里走下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听到喊声，也哽咽着叫道：“润之，二十三弟……”随即，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九哥”的人，就是毛泽东亲姨表兄弟王季范。因在湘乡文家众兄弟中，王季范排行第九，毛泽东排行二十三，因此一个叫“九哥”、一个“二十三弟”，小时候两人一起住在唐家坨外婆家，食同桌、寝同床，宛若亲兄弟。

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王季范在那里当老师、当学监，无论生活还是学业都给毛泽东不少照顾。尤其是毛泽东去东山学堂读书和一师时与乱收费的校长张干那场斗争中，他为毛泽东出了大力。两人感情很深。

王季范来到了北京，一向节俭的毛泽东吩咐秘书让食堂预备一顿较为丰盛的晚餐。饭前，他特地把李敏、李讷等孩子叫到客厅，与王季范认识，并极富感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来认识认识，这是从老家来的稀客，是你们的表伯父，也是我的老师！”

然后，他还握着王季范的手，向江青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毛泽东对表兄殷勤之至，旧情难忘。然而，此时他却遇到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

那就是王季范唯一的儿子王德恒。

1927 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就与韶山乃至湘乡的众亲戚们断了联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了，韶山和湘乡的众亲属们才知道毛泽东在延安。于是，王季范决定把自己唯一的爱子王德恒送到延安——毛泽东的身边去。

1937 年深秋，他来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见到阔别多年的同事、原第一师范教师徐特立，要求他帮助把儿子王德恒带去延安。徐特

立当即表示同意。数天以后，在徐老的精心安排下，王德恒终于成行，和其他几位进步青年坐火车抵达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

毛泽东见到王季范的孩子非常高兴，问王德恒路上走了几天，回过湘乡老家没有，唐家坨、韶山的情况晓不晓得，父母身体好不好，日子过不过得去，等等。王德恒一一作答后，毛泽东又说：“你父亲向我推荐了你，这是信任我哩！可是你晓不晓得，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窝窝头，二要住窑洞，三要挑柴背米，四不发饷银，比起长沙来苦得多呢！干革命不容易，你有没有思想准备？”

“苦，我不怕！”王德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来时爹跟我说过，表叔为革命吃了好多苦，他要我来延安跟你学习，为天下人的甜去吃苦！”

“你父亲这些想法很好！”毛泽东高兴地说，“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许多人的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前……”

就这样，王德恒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不久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4年，党中央决定组建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德恒得知消息后，向毛泽东提出参加南下支队的请求。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说：“你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南下可以接受对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我支持的。”

1944年初冬的一天，南下支队一万余人由王震、王首道率领出发。王德恒随大部队离开延安，回到湖南时，在长沙过家门而不入，即奔赴桃源地区工作。不幸的是，他在那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30余岁。

王德恒南下牺牲后，毛泽东没机会告诉表哥，至今王季范也不知晓。

在接风的宴席上，毛泽东终于把这一不幸消息当面报告表兄，说：“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难辞其咎哇……”

王季范突然获知独子已经牺牲，老年丧子的他悲痛自不待言，但深明大义，忍住眼泪说：“说心里话，自从我把德恒送到延安干革命那一天起，就有了牺牲的思想准备。现在，他既然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除了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外，还能有什么呢！”

接着，他竟安慰起负疚的毛泽东：“润之，为了革命，你也是抛家不顾。弟媳开慧命丧黄泉，泽民二十四弟、泽覃二十六弟血染疆场，还有泽建（毛泽东的堂妹）、毛楚雄（毛泽东的侄儿），若说牺牲，革命哪能不流血啊！德恒为天下穷人的幸福作牺牲，他当含笑九泉，家人亦为他感到光荣！”

毛泽东稍觉心安，对表兄说：“九哥你说的极是！德恒是个好伢子，也是你当父亲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

自此，王季范才成为“革命烈属”。

这次他来到北京，党和政府给予他很高礼遇，邀请他以革命烈属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观礼。

王季范到了北京，当年第一师范的老同事徐特立和一师学生周世钊都来毛泽东住处看望他。一次，大家谈话时谈起当年的老校长张干。因为张干当年乱涨学费，毛泽东领导学生发动学潮斗争，张干则要开除毛的学籍，幸亏王季范等教员们保护，毛泽东才得以继续在一师读书。此刻谈及故人，毛泽东获知张干一直在教书，没干过什么坏事，十分感慨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上了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他要爬上去很容易。结果他没有向上爬，没有进入仕途。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

谈到驱张学潮时，毛泽东竟有些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

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师范生交十元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王季范、周世钊一直在长沙，因此对张干的情况比较了解。两人又说起了张干六口之家现在生活很艰难，因为当年要开除毛泽东、现在害怕报复，心境也十分愁苦。毛泽东闻言说：“对张干这个人，生活困难，应该照顾。”

国庆节之后，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嵩（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

王首道收信后，安排湖南省政府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米和人民币50万元（旧币）送到张干家。张干感激不尽，夜不能寐。10月30日半夜，他爬起床，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不久，他收到毛泽东的回信：“10月30日惠书及为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

张干收到回信后激动不已。

1951年秋，他意外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赴北京见面。其间，他与毛泽东的其他师友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台，平生第一次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还幸会了在北京的一些一师校友，接受过毛泽东的两次宴请和三次馈赠。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乏心胸狭隘、小肚鸡肠的“领袖”，他们演绎过多少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壮举”，面对芝麻绿豆小事耿耿于怀，一得势就老账新算。相比之下，毛泽东“得势”了，当主席了，却对

张干以德报怨，这样的佳话正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

当然，毛泽东对于张干等人的关心，不仅仅是对故人的照顾，也是对所有旧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照顾。在此之前，还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

解放后，北平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一些人认为中国画是落后画种，于是取消了中国画系，代之以彩墨系。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画被美院负责人说成是“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结果，他被当作兼职教师，以课时付工资，其余时间被派到陶瓷系画茶壶、茶碗，后来干脆剥夺教授职务，分配到工会看大门、为教职工买戏票，当了杂工每月只给12元生活费。全家人仅靠他一个人少得可怜的工资生活实在艰难。不得已，他经常变卖东西度日。李苦禅苦闷万分，有时与摆地摊、耍大刀的艺人为伍，有时醉倒在街上被人视为“疯子”。一日，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头晕目眩，仗着醉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五张纸长的牢骚信，并且从邮局寄了出去。

等到酒醒后，他变得不安了，醉笔发牢骚，难免言辞口气有不慎和冒犯之处，毛泽东会不会对“信函上访”和冒犯牢骚不满进行打压或报复啊？他变得更加忐忑了，后悔不迭。

几日之后，1950年8月26日，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收到了一封由毛泽东写来的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又过了几天，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朝闻的带领下，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突然来到了大哑巴胡同甲二号李苦禅家中，看望李苦禅。田秘书进门后，就说：“李教授，你的信毛主席收到了。他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这句话让李苦禅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

田家英说：“我来时毛主席说了，你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

接着，李苦禅向田家英倾诉了自己的不公待遇，田家英一一作了记录，临别时说：“你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定会妥善解决。”

没过多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因为人事关系上有矛盾，有关部门将他调往民族美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工资由原来12元提高到62元。54岁的他感激之余，自愿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前去四川江油搞土改。土改结束后，又调回中央美术学院，在国画系任教授，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这后来被人称为“开国领袖与落难画家的佳话”。

这两则佳话皆为后话。

王季范尽管是毛泽东表哥，两人感情深厚，且唯一爱子也为革命牺牲了，但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照旧回湖南老家了。在北京，毛泽东没给他安排任何职务以“分享”儿子牺牲换来的“革命成果”。有意思的是，他回到长沙后，湖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倒是念及他的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和“革命烈属”身份，聘请他出任了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和省文史馆专员之职。后来有网友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历史，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却没改变自己亲属们的人生，他是世界伟人们唯一不徇私、不用亲人的领袖。此话不无道理。

7.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

“到1949年，在毛已经把蒋的国民党人赶出大陆以后，美国政界陷入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争论。杜鲁门及其国务卿艾奇逊被搞得神魂不安。”^①

就在美国人的这种不安中，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很快走向正轨，内外关系也逐渐摆平了。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后，全国只待解放台湾、西藏，解放战争开始步入尾声。征战多年的战将们开始刀枪入库，率部征战多年的林彪去休养了，其他大将有疗伤去了，有的办军校去了，有的转业到地方准备搞行政、经济或外交工作去了。在共和国百废俱兴之际，应该说最辛苦、最需要休息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仍然不分日夜地工作，忙着恢复经济，根治水害，兴办教育，准备建设新中国，带领翻身解放的穷人们奔向富裕之路。

在毛泽东准备大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而奋斗时，9月15日，大洋彼岸的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对与中国毗邻的朝鲜半岛发起了武装干涉。

早在6月25日，朝鲜南北双方爆发内战。27日，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派遣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

^①《特霍斯特谈毛主席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引自1976年9月24日《参考消息》。

峡,阻止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干涉中国内政。7月上旬,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纠集西方国家成立所谓“联合国军”,“联合国军”总部设在东京。参加“联合国军”的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共16个国家的军队,其他国家“给予道义支持”。随后“联合国军”宣布参战,发动侵朝战争。美国入侵朝鲜,意在剑指中国。

北京政府对美国的侵朝行为表示强烈抗议。为应付可能爆发的严重局面,在毛泽东提议下,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集结在津浦、陇海线地区,准备机动。

因为美军动静越来越大,毛泽东认为,美国在朝鲜的持久战的可能在扩大。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毛泽东不得不在会上提出:“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

“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然后,毛泽东以惯有的不怕“纸老虎”的姿态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最后,他豪迈地提出:“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

略。”

毛泽东对美国扩大战争的预言音未落，9月15日，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率美第10军和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仁川登陆。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被迫转入战略后退。果然如毛泽东当初所料，美国入侵朝鲜后，派飞机飞入中朝边境进行轰炸，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这正如后来美国人特霍斯特所说：“在朝鲜战争期间，当麦克阿瑟将军不顾毛和北京的警告，向北推进到与中国接壤的鸭绿江边的时候，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便以一种代价更为高昂的方式爆发出来了。”

然而，这个“更为高昂的方式爆发出来”，却是毛泽东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

面对国家的危情，中国如何办？是退让去躲，还是等美军打进国境来再出手？退？历史上慈禧太后的退，没让中国退出过危机，蒋介石的退，也没让日军的侵略减缓过一分。退，是没有路的。但新中国才建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经济还十分困难，一旦开战，财力物力人力都得转向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较量的战争，要付出巨大牺牲不说，甚至胜负难料，而且一旦失败，蒋介石裹挟着美军卷土重来，新中国就可能夭折。如何应对美军的战争和侵略，成为毛泽东最难决策的事情。

9月16日，李家骥值班。他来接班时，李银桥交待说：“主席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

毛泽东还在办公室内思考朝鲜战争问题。他一会坐在沙发上，一会来回踱步，有时轻轻吸一口烟，有时又深深地吸一口，整个房间内弥漫着烟雾。早就该吃饭了。李家骥第一次去请示，他说“好”；第

二次去请示，他未吭声，只点点头。第三次，李家骥便不问，只是站在过厅，等候机会再“相机而动”，过了一阵，机会来了，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动了一下嘴，好像想吃东西了。李家骥很高兴，马上走进屋子，只等他吩咐搞饭。哪知毛泽东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到办公桌前，拿铅笔沙沙飞快地写起来。

李家骥只好又退了出去。

没过多久，秘书来了。毛泽东拿着刚刚起草的电文说：“马上发出，等候回电。”

李家骥见缝插针，赶紧说：“主席，利用这个间隙吃饭吧。”

“好，吃饭，”毛泽东痛快地回答。

李家骥高兴极了，很快就把早准备好的饭菜简单归拢一下，端了上来。毛泽东可能太饿了，也可能才想起饿，刚端过来，他上来拿筷子就吃。李家骥一边给夹菜，一边劝道：“主席，慢点吃。”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怎么还是你值班？”

李家骥回答说：“主席我这是又上一班了，你已两天两宿未睡觉啦。”

毛泽东一抹嘴说：“唉，没办法，还有事没办完。”

结果，他又放下碗筷，来到办公桌旁，边整理文件边问李家骥：“几点钟了？”

“快8点钟了。”

毛泽东也似乎才发现自然界的變化，自言自语地说：“又过了一天。”

李家骥刚收拾完碗筷，叶子龙拿着一打文件走过来，并告诉他说：“聂代总长要来，你安排一下。”

李家骥埋怨说：“主席两天两宿没睡觉，怎么还安排事？”

“你懂个什么，不安排行吗？”叶子龙反问他。

没多久时间，聂荣臻和另一位同志匆匆来了，进屋便指着地图对毛泽东说：“我们的部队已进入指定阵地。”

毛泽东马上问道：“敌人部署怎么样，要让他们按我们设计的方案行动！”

李家骥见他们讨论作战情况不便多听，放好沏好的茶，就退了出来。

但他还是坐在院内待命。一小时后，江青从北房走过来问道：“主席还在办公吗？”

“正接见聂代总长研究朝鲜作战问题。”

她有点着急地说：“你们怎么不劝呢？”

李家骥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江青同志，我们说话不好使，还是你说说吧？”

江青白了他一眼，停顿一下说：“你叫子龙和王医生来。”

随后，江青、叶子龙和王鹤滨一起，专门研究毛泽东的生活问题，怕这样累坏了他。

聂荣臻走后，三人便进去轮番做工作，希望毛泽东注意休息，不要把身体搞坏了。李家骥也进去收拾烟缸和换茶。毛泽东生气地说：“我还有事，你们去吧。我也不想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呢？是他们逼得我这样，你们要劝就劝他们吧！”

江青见没法说下去，只好退一步说：“我们不是不让你做工作，是怕你累着，那就处理完手头的事，再休息吧。”

“你们走吧，我会安排好的。”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几个人退回值班室，王鹤滨有点不解地问道：“主席今天生谁的气？”

“没生谁的气！主要是太忙太着急了。”李家骥说。

“不对，他怎么说谁逼他，让我们有本事去劝他们？”王鹤滨还是

不解地追问。

李家骥人小却很机灵，且很懂得毛泽东的心思，于是告诉他说：“那是让你劝美国强盗别侵略我们，这样主席就不用忙着考虑打仗的事了。”

“哎呀！我好糊涂！”王鹤滨拍了拍脑袋，猛然醒悟地惊呼。

上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多次进进出出，传送着电文。约10点多钟，毛泽东终于处理完了必办之事，对李家骥说：“好，我睡觉吧。”

他来到院子里想活动一下再睡，见王鹤滨在院内，便打趣地说：“王医生，你还陪我呢？你放心，有你王医生安排，我一定能睡个好觉。”

“主席你太累了！”王鹤滨说。

毛泽东笑笑说：“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能睡好觉吗？”

“主席你说得对。”王鹤滨说，“不过工作已处理完，该睡了吧。”

“好，睡觉去！”

原来毛泽东对于朝鲜战争已经有了决断，一旦美军越过南北朝鲜传统的北纬38°分界线（简称三八线），中国就出兵朝鲜，保国卫家。可他为什么出兵朝鲜的决策如此艰难呢？除了战争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外，党内也有不同意见。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与湖南一师老同学周世钊见面会谈时，周的话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毛泽东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

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中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中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中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

接着,他告诉老同学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这是后话,但从这番谈话中可见决策之艰难。

9月25日,聂荣臻发表声明: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

9月28日,“联合国军”攻占汉城。

9月30日,“联合国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同一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对外发表讲话,再次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个“中国声音”是强大的,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敢于去警告一个西方强国的行径,新中国对美军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可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面对警告仍是老观念,认定弱小的中国不敢出兵与强大的美国对抗,所谓警告不过是打打雷吓唬人而已不会下雨。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进入朝鲜北部,企图快速占领整个朝鲜,入侵中国。为此,他还公开对外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触及了毛泽东的底线,终于促使他下定了最后的战斗决心。

10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毛泽东的出兵决定。

会上,毛泽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与美军

及其走狗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北朝鲜同志。为此，他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中国一出兵就等于宣布与美国开战，那么战争结局会是怎样呢？毛泽东分析说有两种结果：（1）志愿军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2）最不利的情况，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打成相持的僵局，中国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

至于战争如何打，他说：“美国一个军有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 7 公分至 24 公分口径的各种炮 1500 门，而我们一个军（3 个师）只有这样的炮 36 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 1951 年 2 月才有 300 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

没把握全歼敌一个军，那怎么办？他又说：“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 2200 门至 3000 门 7 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 1500 门炮），这样才有把握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毛泽东还是老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去打歼灭战。

这次会议就毛泽东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及作战的策略问题完全达成了一致。

然而，中国“弱兵”与强大的“联合国军”开战，由谁领衔挂帅呢？毛泽东选定了林彪。谁知他却没有胜敌的信心，借故推辞。毛泽东只

好另外选将，紧急召见还在西安的彭德怀。

10月8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宣布：“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且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出征。

眼看着美国带着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横冲直撞，毛泽东没有坐山观虎斗，然后坐以待毙，而是果决地选择了主动出手，抗美援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等国曾经遇到类似的情形。面对德国希特勒的咄咄逼人之势，实行绥靖政策，姑息法西斯的侵略，甚至去向希特勒讨好，不惜牺牲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利益以求苟安或自保。结果，希特勒灭了这些小国后，并没放过英法，相继对两国开战。苟且求安反而导致自己失去准备战争的良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相继因此垮台。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灭了朝鲜，就会打中国，绞杀社会主义。若等他们打到中国东北我们再出兵，无疑是坐而待毙，其结局也是二战中英法的结局。雄才伟略的毛泽东没有退缩，果断地决定发出援兵。事实证明，正是他非凡魄力与英明决断，才使战争了结于朝鲜半岛，没让战火烧过鸭绿江，免去了东北人民再一次生灵涂炭。

若干年之后，就连美国人都称赞说：“毛泽东出兵朝鲜，此举确实是高瞻远瞩！若当初当旁观者，肯定就要当二战中英国的张伯伦、法国的达拉第了。”

8. 送儿子去战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第六位亲人

美国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谈及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时说:“这时,不仅共产党政权手上有其他的军事任务,而且为了节省国家财政开支,为了有更多工人参加生产活动和反对通货膨胀,毛和他的同事用6个月时间全力以赴集中精力首先解决部分军队的复员问题,这支庞大的军队是内战期间形成的。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经历了土改,另外还有一亿农民要在1950年下半年才开始土改。这样,大多数现有干部的精力就要投入这项工作。党的六中全会和国家机关的全部工作都是经济问题。毛在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开幕词和闭幕词中,总共只有一句话谈到外交,肯定了和苏联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的结论是毛泽东“不想卷入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这个说法大概是准确的,否则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决策也不至于如此艰难。

但是,一旦决断去打这场战争了,不管美国人多么自信,毛泽东便全力以赴要去夺取与强敌抗争的胜利。

为此,他甚至决定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去战场。

1950年10月19日,麦克阿瑟率领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当晚,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出国门,主动迎战强敌。10月25日,在朝鲜发动第一次战役,打响了赴朝第一战。毛泽东等人出兵后,美军浑然不知,直到云山之战打响

后,才发现作战另一方已不是朝鲜人民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美国总统杜鲁门大惊失色。在他们的惊慌之中,朝鲜局势立即改观,11月初,志愿军收复了清川江地区。

然而,11月25日,不幸的事情就意外地发生了。

当日上午,美军十几架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大榆洞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木板房作战室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因炸弹炸中掩体房子而壮烈牺牲。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先后生有十个子女,但在长期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多数失踪或下落不明,身边只剩下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四个孩子。毛岸英是长子,八岁随母亲杨开慧坐过牢,后在上海街头流浪,被党组织找到后,1936年送去莫斯科,先后在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获坦克兵中尉军衔,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反攻作战,转战欧洲战场。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他,并赠送手枪留念。1946年,他回国后,被毛泽东送到延安的农民家上“劳动大学”,参加生产劳动。后来,他去解放区搞过土改运动。北平解放时,他带着一个扫雷队进城,负责清除重要地区的地雷隐患。新中国成立后,去北京机器总厂工作,并担任厂党总支副书记。

正在他准备为恢复经济和参与国家建设出力时,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闻讯立即找到父亲,要求上前线去。毛泽东沉吟一下,说:“这次出兵胜负难料,若打败了不知要死多少人,我们不想死人啊!可有什么办法?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逼我们出兵,不去不行呀!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我作出了决定,你是应该第一个去啊!”

美军一步步向北跃进,彭德怀即将离京赴朝。10月18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设宴与他再谈具体援朝作战行动计划。谈话结束后,

毛泽东请彭德怀吃饭时特地破例叫上了儿子坐桌子。席间，毛泽东指着毛岸英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个兵？”

彭德怀万万没料到，很意外，随即脱口而出说：“不行。朝鲜太危险，美国飞机到处轰炸，岸英你还是在后方好，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

“彭叔叔，让我去吧。”毛岸英恳求道。

“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就收下他吧。”毛泽东也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让他当个翻译。同时，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也可以到战争中去锻炼。”

彭德怀看了看这父子俩，还是犹豫地说：“主席，战场上枪弹无情……何况他还刚刚结婚。”

这时毛泽东变得严肃了，异常认真地说：“他不去，谁去？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只喊老百姓让儿子到战场去锻炼，自己的儿子却不去，不能这么做啊！”

接着，他又说道：“要说岸英刚结婚，我们许多战士不也是今日结婚明日上战场啊！”

毛泽东的话意味深长。

毛泽东一生没为个人私事求过人、拉过关系或走过后门，但为了让儿子上朝鲜前线，亲自向彭德怀说情。彭德怀不同意，从没说过小话的他竟然说出“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领袖向下属求情，彭德怀还是犹豫不决，以刚结婚觉得不妥，毛泽东说出“他不去，谁去？”的硬话，“我们许多战士不也是今日结婚明日上战争”否决儿子不能去的理由，态度何其坚决！

其实，彭德怀的顾虑是，毛泽东尚存两个儿子中，小儿子毛岸青身体不好，而朝鲜战场敌我大炮比为 1300：36，岸英上战场难保不会出危险，他一家为国家牺牲了这么多人，万一战场发生什么事情，谁又能让毛泽东再承受这样的创痛呢？在抗战时，八路军李氏兄弟牺牲一个，毛泽东下令把其弟弟调回延安，而现在换了他自己，却不顾及这些了。因此，但凡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送子上战场，军长梁兴初不同意，司令员彭德怀也难同意，后有网友开玩笑说如若把此事去进行全民公决，全国人民都可能反对。而毛泽东采取私下说情的方式送子上战场，为什么呢？为了保家卫国，各地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去朝鲜，危险之地有人民子弟而没有他自己儿子，他心里不安宁啊。从井冈山就一起战斗的彭德怀自然明白他这样的心思，听到这些话语，终于无话可说，点点头表示同意。

就这样，毛岸英成为了一名赴朝参战的名副其实的“志愿军”。

次日上午 7 时，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带着毛岸英和总参作战部及几位苏联人在北京东郊机场登上 L-2 型飞机，飞赴沈阳，转而就赴朝鲜战场了。

25 日，在毛泽东的遥控指挥下，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在云山一带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序幕。毛岸英被父亲派去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除彭德怀外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身世，其他人只知他是司令部一位普通的参谋、翻译，毫无特殊之处。

然而，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和无情。彭德怀最担心的事情居然发生了。11 月 25 日，美军运用高科技手段测出大榆洞发报甚多，便认定是志愿军重要领导机关，立即派飞机轰炸。当时毛岸英等四人正在木板房中。燃烧弹掉落下来。两人先后跳出，木板房便在“轰隆”一声爆炸声中化成灰烬。事后，在另两具遗体中，彭德怀等人依据一块

苏联手表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毛岸英入朝参战只有短短34天，便牺牲在异国他乡。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直到1951年元旦过后，1月2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了一封信。

李家骥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和毛岸英十分熟悉，突然听到这个噩耗，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值班室，内心痛苦极了，非常难过。李银桥还在值班室，由于太难过和过于冲动，他忘了叶子龙的嘱咐，突然哭泣着说：“银桥，叶参谋长对我说岸英牺牲了！”

李银桥“啊”了一声，也感到突然，怔怔地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才缓过神，带着哭腔说：“咋办啊？”

李家骥说了叶子龙的交代，李银桥也说：“这事先不能告诉他。”

当晚，在叶子龙的有意安排下，毛泽东去了在万寿路的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新六所是党中央机关在万寿路建的六栋小楼，五大书记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李银桥、李家骥也跟着从中南海过去，默默地陪伴着还不知情的毛泽东。

几天之后，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烟。叶子龙和江青商量好，专门去向他汇报毛岸英牺牲之事。李银桥事先来到了屋子内，李家骥则不放心地站在门口。

江青和叶子龙进来了。坐下后，江青说：“不要太悲痛。”

“哦。”毛泽东警觉地看着她。

叶子龙马上轻轻地说：“岸英在朝鲜牺牲了。”

毛泽东先一怔，然后紧紧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两人一声不吭。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便说其他的劝慰话，只好不约而同

地低下了头。

这时毛泽东轻轻欠欠身，似乎支撑不起来，目光慢慢移向茶几上的香烟，想去拿烟，颤抖的双手几次都抽不出来。站在旁边的李银桥急忙上前，帮他取出一支烟，并帮着点燃。他慢慢地、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重重地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啊！”

于是，叶子龙和江青继续汇报毛岸英牺牲前后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又点燃一支烟，最后只交代一句：“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思齐。”没有再说其他了。

刘思齐是毛岸英新婚不久的妻子。江青、叶子龙、李银桥等人随即都退了出去，只有毛泽东一人在屋子里，陷入无限悲哀之中。

随后，在周恩来、江青等人劝说下，毛泽东去了河北的石家庄散心。

毛岸英是毛泽东直系亲属中第六位烈士，以前牺牲的有杨开慧、毛泽覃、毛泽民、毛泽建、毛楚雄。他的牺牲使得饱尝亲人生死离别的毛泽东非常悲痛，很久才走出悲伤来。

毛岸英牺牲后，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就地安葬了。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如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等英雄那样由党和国家授予各种“战斗英雄”之类称号，没有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

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痛。1951年3月，毛泽东在与老友周世钊谈话时忍不住说起毛岸英的牺牲：“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

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麼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这就是毛泽东，不是想着为儿子准备房子，也不是处心积虑让他去“接班”，而是想着怎么让他和老百姓的子弟一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吃苦锻炼，去战斗牺牲。

毛泽东牺牲了儿子，战争并没有结束。他克服悲伤，仍然顽强地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力战美国、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和南朝鲜共 17 国部队，敌国比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国家还多了一倍，军力更不可比。然而，从 11 月 24 日开始，“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终于被英勇的志愿军将士们奋力打退，装备坦克、大炮的“联合国军”尽管有飞机掩护，还是被歼 3.6 万多人，被迫丢弃平壤、元山等要地，从陆路、海路仓皇撤退至“三八线”以南。

毛岸英牺牲之事，党中央一直没对外公布。而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壮举却成为这一年度全球最震撼的大事件。12 月 11 日，美国《时代》周刊再次以毛泽东头像为封面，标题是：“RED CHIAN’ S MAO（红色中国的毛泽东）”，下面还有两行英文小字，一行为“New war, old war kind（新战争，老战争狂人）”，另一行是“（war

in Asia) (亚洲的战争)”，而毛泽东头像四周画着数不清的蝗虫。这一次美国人气得把封面上的毛泽东画得比上一年的样子还难看：污面、獠牙，瞪着眼睛。但内文描述选择毛泽东作为封面人物的理由，却不得不沮丧地说：“列宁说：‘通往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那个男人说准了，中国的红色老板毛泽东，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路。四年前他还蹲在荒凉的西北延安的窑洞里。而上周，他却住在北京的宫殿，并肆无忌惮地藐视和谴责联合国。他的军队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遭受到了痛击。欧洲古老的骄傲在他面前颤抖。伍修权，毛泽东在联合国的代理人，一个不知名的将军，正在联合国宣扬毛泽东的自由世界理念，抨击美国在朝鲜所采取的行动。”

毛泽东再次成为西方人害怕的人物，他领导的中国再次在外来干涉下仰起了高昂头颅。

9.“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毛泽东没有放弃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各项工作，各地继续抓经济调整，轰轰烈烈地推进土地改革运动。

有人这样评说毛泽东：“在他之前的旧中国，由于人口多，土地少，而且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穷人饿死。人均寿命男人只有 25 岁，女人 23 岁。是他为穷人分配了土地，解决了穷人的吃饭问题。人均寿命很快就延长到 60 岁。毛泽东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国运。他是穷人的大救星，他是中国的大英雄。”

这句话确实没错。建国之初，毛泽东带给中国农民的感觉，除扬眉吐气翻身之外，最直接的体会就是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天天饿着了。而现在的土改运动又使得千百年来没土没地的农民开始成为土地的主人，自己种田不要交租，自己吃，就可以完全解决没饭吃的难题了。

这一场土地制度的变革运动是历史罕见的深刻的社会革命，比起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也不见得轻松、简单多少。为何这么说？

因为土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中国历次革命是由什么引起的？毛泽东认为，一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过甚，一是国内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压迫过甚。这两种压迫，都是有罪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最终引爆中国革命。而地主之所以能压迫、剥削农民，就是因为他们占据着大多数土地。因此，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地分给农民，才能解放生产力，消除农村的社会不公。而这对地主们来说无疑是割肉破财，内心极不情愿，会有人反抗的。1950年秋，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全面铺开，立即引起农村社会剧烈的变革。

而这个变革冲击着不少“既得利益者”。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来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改开始后，与党联系密切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有的本人在乡村有土地，有的亲友是地主，土改运动不可避免触及他们的利益。于是乎，农村的这一变革立即传导到城市。一时之间告状、叫喊“斗争过火”、“偏差很大”声音不少。在北京的黄炎培、张澜、程潜、陈叔通等政府高官都收到不少来自家乡的告状信后，也纷纷以不同方式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情况。

一次，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针对土改中“减租减息”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副主席陈叔通做了一个长

篇发言，大意是：现南方都正在实行减租减息，平均每亩地租减为一半，地主农业税则按其地契上的田亩数缴纳。此外，尚须按农业税递增加缴累进税，地主就缴的农业税多不经地主之手，而由佃户在其应缴之地租中代为缴付，不敷之数则由地主负担……最近收到家中电报云，今年秋季尚须缴农业税 200 担米……当地催迫甚急，已将家中看门的抓去看押，限本月 20 日缴清。200 担米……约折今人民币 4000 万元（旧币）。为此陈叔通发言中表示，此税必须缴纳……准备将家中收藏的陶器（陶器有图案有文字，非常宝贵，价格很高）数件，呈送中央或地方政府，不要政府的收购费，但请中央电告华东局转知当地政府，允许家中每年两季应缴的农业税直到土改时止都予以豁免，等等。他的发言多多少少代表了部分人的思想和看法。

会后，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把陈叔通等人的发言记录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阅看。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等人也向毛泽东转来不少反映家乡土改情况的信笺。对于他们的不理解，毛泽东没有指责或批评，而是诚恳地给他们写信解释，并把各地介绍土改情况的材料转给他们去看，希望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志士仁人转变立场，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去。

黄炎培是毛泽东多年的诤友。在延安时，他就和毛泽东谈过国家兴亡之道。当时毛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也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指黄炎培提出的‘人亡政息’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的话语和延安的所见所闻，让黄炎培对毛泽东敬佩之极，心悦诚服。1949 年春，他来到北平，在国民大戏院发言时情不自禁举拳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一生耿直，虽是民主人士，却非常敬佩毛泽东，对新中国也饱含了感情。然而，这一次，他对土改也是不理解。

最后，他抑制不住跑到毛泽东住处，坦率说出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与他还是朋友式地商讨，讲述着土改政策和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但对土改运动，黄炎培还是认为“过火”、有“偏差行为”，还是有些想不通。

“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毛泽东接着又说，“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就可以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

然后，他告诉黄炎培说：“有反对意见的人，我的看法是建议他们可以到各省去看看。到那里看了，是则是，非则非，土改到底好不好，就明白了。”

毛泽东还肯定地说：“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黄炎培因为自己也还没想通，便向毛泽东请缨说：“我想回到江南老家去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没有阻拦他，反而鼓励说：“黄任老（对黄炎培的尊称），你的精神我是敬佩的！共产党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诤友，我们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好一些。”

“主席同意我下江南做调查？”黄炎培高兴地说。

“当然同意！”毛泽东说，“黄任老下去调查研究，我当然支持，不过我有几条建议。”

“请主席直言相告。”

毛泽东说：“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此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你七十四高龄了，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骑马观花走一趟，就可以了；三、若身体条

件许可，除了走访亲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贫苦农民。”

但是，黄炎培的决心比毛泽东想象的大。他告诉毛泽东说：“我这次下江南，一不住亲朋好友家，二决不住在地主家。”

“哈哈！”毛泽东笑了，叮嘱说：“我还有一事，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提高认识。”

毛泽东想得这么周全，黄炎培高兴地答应了。

毛泽东为什么同意黄炎培撂下副总理工作去搞土改调查呢？就是希望他亲眼去体会和见证土地改革带给农民的喜悦和农村的变化，让事实教育、说服这位追求真理的诤友。为此，他还专门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以及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写了一封信：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951年1月10日，饶漱石、陈丕显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1月19日，黄炎培抵达苏南地区的无锡。

此时，苏南地区第三批土改工作已进入尾声。当晚，黄炎培听取了陈丕显的土改汇报。陈详细介绍了苏南农民受封建剥削与压迫，诸如“利滚利”、高利贷等盘剥情况，并且还告诉说：“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区更残酷。”接着介绍苏南地主与官方狼狈勾结的“收租体系”，建立所谓的粮赋催征处、催租局、催租站等，派警察、保安团、自卫队向农民催租逼租，贫苦农民逾期交不上，就抓人罚款，被打砸

抢。甚至，他们还私设公堂，置办刑具，打死人是常事。因此土改不仅必要而且很迫切。

他告诉黄炎培：在土改中，苏南地区完全是按党的政策做的，共分四个具体步骤进行：

(1) 宣传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整顿队伍。

(2) 登记土地与评定阶级成分。在调查、整理赋籍的基础上登记土地，出榜公布，让群众补报校正，登记后再出榜公布人均土地数。评定阶级成分，办法是先划出地主阶级，再评工商业家、小土地出租者和富农，最后评农民阶级内部的成分。评议阶级成分时，实行团结农村总人口 95% 左右的原则，先充分酝酿、教育；接着，按自报公议的办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民主评定；农民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的，邀请本人到会参加评定；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对评定仍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县人民法院申诉，请求判决。

(3) 没收、征收土地。土改工作队成立专门小组，对土地登记造册，严防遗漏和贪污。地主的土地，无论出租或雇工经营，一律没收，但对其在解放前经营的工商业（作坊、仓库、晒场等）所需的基地，一律保留。地主的财产，只没收耕畜、农具和多余的粮食、房屋及随房家具，对其在解放前经营的工商业房屋及其在城市中的房屋，一律不动；征收祠堂、寺庙、教堂、学校、慈善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及其他非地主成分或因缺少劳力而出租的土地，均按《苏南土地改革办法》办理。没收时，由农民协会委员会调查、地主自报、群众讨论通过并出榜公布后执行。

(4) 分配和调剂土地。没收、征收土地后，分给没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工作队算出全乡需分土地的每人平均土地数，作为分地补地的大体标准，原则上以乡为单位进行，但依据土地情况，可经乡村农

民大会或农民代表讨论在村与村之间移多补少,进行调剂,按村分配;每户分配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不要差距太大,经群众互尊互让、反复协商后进行解决。工作队要注意做好原耕农户的思想,既反对“租田变自田”,也反对“打乱平分”。土地产权在全县改革完成时确定,但应向农民说明,此种试分除非个别发生错误必须改变外一般不作变动,以稳定群众的生产情绪。

陈丕显介绍的苏南土改四大步骤,也是全国各地土改的基本模式,各地土改程度和方法大体与此差不多。黄炎培听后,发现这与自己在北京看到的毛泽东转来的那些材料差不多。那么,各地有没有“过火行为”甚至打人(地主)行为呢?

恰好这时燕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潘光旦也在苏南考察。黄炎培与他们见面后,一起到苏南各地农村进行巡视考察。

在考察中,潘光旦教授告诉他不少自己遇到的情况,例如,他一次与同行的教授在吴江县严墓区新成乡章奥村与土改农民进行座谈。说起村里在新土改法颁布后一个偷偷卖地的地主时,潘先生故意问农民们说:“这个地主该不该打?”

农民们回答说:“他已经坦白了,承认他卖地是犯法的,今后不敢了,怎么还打他?”

潘先生又问:“如果他不坦白,是不是便该打?”

农民说:“不坦白,也不该打他,可以找政府管他。”

在吴江县同里区的一次诉苦会上,潘先生亲眼目睹一个情况:一位年老的农民诉苦,愈说愈忿恨,忍不住就举起一对颤巍巍的拳头要打地主了。旁边坐着的一名土改干部赶紧过去扶助他说:“老大爷,你已经讲得够吃力了,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吧!”结果,那对举起的拳头还是成了“明日黄花”。

潘先生还告诉黄炎培说:“也是一位年老的农民,在诉苦会上,

一边说得声泪俱下，一边手上的旱烟管，在地主的脑袋上指来划去，但始终没有落下。我亲眼所见，就在台下。”

在考察途中，黄炎培尽管 70 高龄了，且是副总理，仍随考察团的队员们一起住农舍，同农民兄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村很落后，农家条件很差，考察团挤在一间小土房子，只有一张木床。大家把黄老的行李搬到床上，希望他睡床上。他硬是不肯，和大家一起挤地铺，还美其名曰：“有福一起享，有苦一起吃。”甚至还幽默地说：“我一向高喊‘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不会搭铺还怎么算万能？别忘了，我除了叫任之，还叫韧之呢！任之嘛，听之任之以外，就是能担当大任；韧之呢，就是坚韧不屈，不畏苦，不畏劳，我不能徒有虚名噢！”

在苏南，黄炎培听了党委的汇报，看了农民的反应，还去会见了一些开明地主。开明地主们坦然地说：“如果把土地从我们手里转让给王家、张家，我就不同意，凭啥我不能有，王家、张家可以有呢？！共产党的土改与历史上改朝换代不一样，不是我们让出去给王家、张家独霸，而是分给多数农民去耕种，让天下人都有饭吃，这个政策很好，是大好事。我们支持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

经过苏南 40 多天的亲身考察，黄炎培终于从见所闻中得出了与家乡地主们全然不同的结论：土地改革的成果，当然有利于穷苦的农民，能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且有利于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可以解放、发展农业生产，从资源、资金、市场等诸多方面为工业化打下基础，并且国家只有在建立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上，才能改变旧中国落后面貌，也从根本上解决几亿农民的穷困问题。事实说服了黄炎培。他豁然开朗了，由土改的“想不通者”变成了热情的“支持者”。

2 月下旬，他回到了北京，连夜写出《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并呈

送毛泽东。

报告中，他首先肯定说“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已经搞好起来了”；土改之所以办得好，在于“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任。至于有人提出的“和平土改”，“不能说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这样基础太脆弱，靠不住”，“必须发动群众，必须唤起农民自觉，建立群众力量”，故“‘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

毛泽东看到他的报告，满意地笑了。

因为这位倔强得只“服膺真理”的老人终于认同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看到了“耕者有其田”社会的活力和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他也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一起同行。

2月17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附带广东、广西纠正“宽大无边”的两份资料，请他参阅。信中说：“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毛泽东要纠正“宽大无边”却强调“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这是一种工作方法，说明土改并不“左”，并不过火，而是很理性的一项工作。而这时黄炎培已对“过火”的“偏差行为”有了准确的认识，转变了以前思想，完全不需要毛泽东来做思想工作了。随后，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72次政务会议上作《访察苏南土地改革报告》。在发言中，他除认为“苏南土改是办得好的”外，还特别赞扬了苏南土改前的征收、生产救灾和减租等一系列准备工作，说这些工作做得“尤其好”。

黄炎培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固然有说服力，但土改这场运动涉及亿万人，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毛泽东除做黄炎培工作外，还多次与张澜、程潜、李济深等老朋友谈心，送转有关土改的材料给他们阅看，使他们理解、认识土改运动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事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心悦诚服地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针对土改运动中个别叫喊其加重了人民负担的说法，张澜老先生驳斥说：“这种叫喊，其实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这种叫喊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信。”

对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程潜先生经过走访和考察后说：“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决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的考察，广大的新老干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务情绪上，都是能够忍苦耐劳的……假使没有这些干部的艰苦奋斗，我们几个月来的成绩，是不会有这样伟大的”。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伟大土改运动，不仅从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土地还家”，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了不起的革命任务，而且通过这场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还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思想和觉悟水平。黄炎培、李济深、张澜、程潜都是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中华民国的“三朝元老”，可以说本人在乡

村都拥有过不少的土地，其思想的转变，除毛泽东高超的统战艺术外，更是土改运动使得中国农民和农村生产力真正获得了解放的事实教育和说服了这些终生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人们。

这场变革运动不仅涉及黄炎培、李济深、张澜、程潜等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没有例外地波及，也涉及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不是华盛顿，他本人没有庄园，也没有土地，在土改运动中怎么也牵涉到了？土改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划定家庭成分。全国所有人都要划定自己的家庭成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家也要定成分。那么，他该定个什么成分呢？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县韶山是土改进行得比较早的地区。1950年秋，韶山冲也开始划定家庭成分。毛泽东的家庭成分该评为什么，可把负责土改工作的清田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难坏了。

对于自己的出身，其实，毛泽东早在1936年10月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毛寅秋自然不知毛泽东说过的这番话。

湘潭县的土改是根据解放前三年拥有的家产（主要是不动产）划分家庭成分。湘潭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8月9日。韶山迎来解放军是8月15日。其实，早在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就没收了毛泽东一家在韶山冲的全部房屋、家产和田地。韶山解放前三年，即1946年，毛泽东一家被没收的家产仍未归还，因此他即没有家产。有人据此认为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为贫农。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

他家的家产虽然早被反动政府没收，但他父亲健在时置买了 22 亩田地，家中 5 口人，平均每人有土地 4 亩多，韶山冲平均每人只有 9.3 分左右；毛顺生还雇过长工。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评为富农。后者的说法虽然不合乎湘潭县的土改划定家庭成分的规定，但争论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好几位亲人，毛泽东又是国家主席、党中央主席，把他划成富农成分又怎么行呢？毛寅秋左右为难，不好把握。

他终究是个聪明人，左思右想，很快就有了主意：写信去请毛泽东亲自确定。在油灯下，他以清田乡乡长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你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现已进入划成分、分田地的阶段了。你知道，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每人平均 9.3 分左右，不知你老家有几口人在韶山分田？特向你汇报，请指示。次日，乡政府郭秘书看了信笺，感到写的比较含糊，问道：“家庭成分的事，你怎么没提呢？”

毛寅秋回答说：“主席看了信，便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双双一起回了韶山。毛岸英向清田乡农会转达了父亲的意见：（1）要按政策办事，不按人情办事；（2）老家还有财产的话全部分给农民；（3）家庭成分划分为富农，付来 300 元钱作为退押金；（4）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才会相信政府。果如毛寅秋所料，毛泽东明确了自己的家庭成分——富农。

随后，乡农会根据这个意见，把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

毛泽东尊重地方政府，模范执行土改政策的事迹，教育了乡政府同志和家乡人民。“照政策办事”，不但成为韶山干部在土改中的口头禅，也成为他们土改中的自觉行动。

这只是土改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

这场伟大的农村社会变革持续了一年多。至 1952 年底,全国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改成功完成,约三亿无地和少地农民分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以暴风骤雨的气势彻底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历来被视为“人下人”的中国农民,由于获得了土地,从而第一次成为真正有生产资料、有选举和发言权的“人”。随着土改工作顺利结束,各地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调动,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至 1952 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粮食总产量达到 16392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44.8%,超过解放前历史最高年产量 9.3%(即为 1.09 倍);棉花总产量为 130.4 万吨,比 1949 年增长 193.7%(增长 86 万吨),超过解放前历史最高年产量 53.6%(即为 1.54 倍);油料总产量为 419.3 万吨,超过解放前历史最高年产量 63.1%(即为 1.631 倍)。中国农业完全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那些常年耕地却从没吃饱过饭的人们可以不再饿肚子了。

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这几年中,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是在十分险恶、危机重重的国内外环境下(直到 1952 年底,国家投入的经济建设费用才略微超过国防经费)不懈奋斗,在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艰难起步,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事实上,要想在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上短短三年内全面恢复农业生产并全面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几乎是不可能,而正是因为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才实现了这样前无古人的壮举!

毛泽东的成功做法,甚至让败逃在台湾的蒋介石在“失败反思”中也都大获启发。为了在台湾真正站稳脚跟,他认为有必要对台湾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大幅度调整。研究大陆毛泽

东的土改政策后，蒋介石也开始学习和推行大陆“土改+农会”的模式，在台湾乡村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这一仿效，最终也获得不错的成效，大大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

毛泽东领导土改运动所创造的奇迹确实令人惊讶。后来美国学者马克·布来彻称：“中国的土地改革，大概是历史上最彻底也是最成功的对农村的改造。”^①

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都学习他的土改经验，美国人也称赞是“史上最彻底最成功的农村改造”，然而，毛泽东去世若干年后，有人却抛出文章，故意妖魔化毛泽东和党领导的土改运动：“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土改“是破坏生产力的倒退灾难”。土改运动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灾难呢”？笔者认为，如果是站在以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这一边来看待土改运动，土改把其赖以剥削的利器收缴了，斩断了他们“吃白食”的魔爪，对少数人（一些开明地主是欢迎土改的）来说这是一场“浩劫”。如果站在历朝历代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多数农民一边来评价土改运动，这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因为命根子土地的权属不同——“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就是土改运动是“灾难”还是“翻身解放”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村多数人一边，否定剥削，摧毁“人吃人”的制度，且把多数地主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这场大变革实际上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也是解放人的进步。

①《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

南斯拉夫通讯社后来评价说：“毛所作的巨大贡献：他唤醒了沉睡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他使奴隶和受屈辱的人们觉醒；他使人认识到，使普通的中国农民获得自由和尊严是可能的。”^①

10. 一次信访崛起一个跨国企业

新中国的经济恢复是农业与工业、工商业一起同步的，不是瘸腿走路。毛泽东以他惯常的一盘棋思维做事情，城乡并进、各业一齐推进。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统一战线、整风工作等问题。其中，他特别提出了一个“22个月的准备工作”，说：“‘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他及时地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准备去搞“十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之艰难，因此才确定“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时间长度。

城市是工人集中的地区，工人是工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党要依靠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对于城市中的工人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明

^①《南通社说：毛主席唤醒了沉睡百年的中国》，载1976年9月26日《参考消息》。

确地指出并规定了几条政策：(1)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2)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3)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4)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在农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毛泽东把工人的地位也开始去提高。在去年获得的苏联援建项目的基础上，他和党中央准备要去组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

然而，这种起步仍然是在国内外艰难环境下开始的。

解放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时就预料到了。他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他以“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展望了前路，也以此去鼓舞人们去克服、战胜暂时的困难。但一旦经济所有好转，他就要想方设法改善人民生活，在城市工作中也及时地提出了“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政策。

这个政策在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之际要执行到位自然有很大的难度。在这个政策的贯彻中，出现了一个工人与毛泽东“互动”的事件。

1951年9月17日下午三点来钟，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办公室秘书王自勉收到一封来信，信封上面写着“石景山发电厂共产党支部王自勉同志收”，落款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

寄”。王自勉心想，这难道是毛主席寄来的？有些不敢相信，急忙拆开，朝信尾一看，“毛泽东”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映在眼前。啊！真是毛主席写的，他顿时激动起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高兴得直在屋里转，忽然大声喊着：“信！信！毛主席的信！”转身就脚不着地地往厂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跑去。

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王自勉同志：

8月31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

毛泽东

1951年9月12日

王自勉见着厂长，厂长就说：“马上通过广播向全厂职工传达。”

毛泽东来信立即像喜讯一样广播出去，职工们都沸腾起来了，奔走相告。大家欢喜若狂，争先恐后地涌向厂办公室，争相看毛泽东的来信。由于心情激动，王自勉在拆信时不小心撕掉了一角，人群中不知谁发现了这个疏忽，大声建议说：“把它裱上！”

人们一致表示赞成：“对，马上派人把信送到城里去！”

厂长立即派车送王自勉等人到城里去“把它裱上”。裱信工人见是毛泽东的信，二话没说，很快就精心地给裱好了。王自勉问道：“多少手工费？”

“毛主席的信，咋还能收钱？”裱信工人回答，“一个钱也不要。”

王自勉等人回来后，众人又一起围着看信。连家属区的老大娘老大嫂们也赶过来，要亲眼看一看。她们见到毛泽东的信，激动地

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抗美援朝战争还在激烈进行，党和毛主席这样关心咱，真是咱工人的大恩人。”

其他职工也纷纷说：“毛主席都要派人解决咱的问题，那咱一定得努力生产，以实际行动报答他老人家的关怀。”

毛泽东的这封信为什么在石钢职工中引起这么大反响？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石景山钢铁厂创建于1919年，是华北最早的规模较大的钢铁厂，三四十年代被日军侵占，日本投降后才被国民党政府收回，又被官僚参股偷占。1948年12月17日，石景山钢铁厂获得解放。为了保证职工的生活，人民政府先后于1949年1月、10月及1950年1月在不增加工资基金总额的原则下，以原国民党时期工资制度为基础，降低了极少数工资特别高的高级管理人员工资，增加了低工资职工的收入。这种抽高补低的调整，对稳定职工情绪，调动生产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而职工们则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在生产上大干快上，创造了十分显著成绩。1951年4月，石钢二号高炉最高日产铁量达518.9吨，比日本侵华时最高日产量增加近一倍，质量也大有提高，全厂劳动生产率比1950年同期平均提高47.50%。但随着生产发展，旧工资制度的“吃人”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国民党时的工资标准、工资等级都是资本家按自己利益定的，职工工资很低，一线炼钢工人工资更低，全厂工人工资等级达105级，级差小到只有二两小米的钱的分别，计算方法也十分复杂，高中生都看不懂。这样“玄机重重”的工资制度使得工人收入很低，生活艰难。如今解放了，还采取这样“吃人”的工资制，不仅影响职工的生活，也削弱人民政府的威信。

为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使职工收入得到提高，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翁，1950年5月，石钢根据上级指示向职工们宣布调整工

资。但由于种种原因，打雷没下雨，一直没落实下来。1951年开始，全国不少企业陆续实行八级工资制。石钢从4月份开始着手制定了新的调资方案，并于5月22日给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上报了实行八级工资制的报告。

5月25日，北京市劳动局批复：“同意你厂实行八级工资制。”

29日，石钢向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递送了关于拟自5月起实行八级工资制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全厂职工增加工资人数将达到98.26%，工资总额增长18.77%。这个数字突破了上级限定的比例。报告递上去后，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宛如石沉大海。

随后，北京市委又传达一个指示：“基层党员干部和党组织都有责任把自己所在单位的问题和情况向党中央反映，向毛主席汇报。”

为什么市委突然传达这样一个指示呢？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物价飞涨，经济困难，社会不可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前遇到冤情、难事，老百姓擂鼓告状。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发明了“信访”，老百姓有冤情、有困难、有问题可以找政府和党组织告状，也可写信找上级部门要求解决。对此，毛泽东等人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人民信访”。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害怕“信访”，收到告状信、诉苦信就心里发颤，进行打压。毛泽东等人则对人民来信来访满怀热情，诚心诚意为他们解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信访更加重视，对群众来信都是亲自阅看、亲自回复，常常忙得不亦乐乎。为此，中央办公厅不得不设立专门的信访室，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兼室主任，组织好几个人专门协助毛泽东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减轻他信访回复工作量。但他还是照旧看信、回信，尤其是重要问题几乎不让秘书或其他人“代劳”。对此，华北局第三书记兼财经委主任刘澜涛后来回忆说：“田家英同志曾经对我谈过，毛主席看群众来信的数量是惊人的……而毛泽东同

志布置的工作，是必须向他报告结果，决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一拖二拖，最后不了了之，这在他看来是决不能容许的，这是他的伟大风格之一，也是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亲自阅看群众来信，并亲自答复，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发现了工作中的不少问题。老百姓感恩新社会、新生活，由衷喊出“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出自肺腑唱出“救星就是毛主席，救星就是共产党”的歌曲。而毛泽东一直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上。在处理群众来信时，他因为发现不少问题，又感到人民信访工作还有待于加强，便要求各级党组织、人民政府加强人民信访工作，各地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要向上级报告、反映事关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为此，北京市则鼓励全市基层干部和党组织直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信，报告、反映本单位的情况。

在市委这个指示下，石钢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由王自勉给毛泽东写信，全面汇报工厂的情况。

8月31日，王自勉向毛泽东写信，如实地反映了厂里实行八级工资制的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谁知石景山钢铁厂的来信到达中南海后压了好几天。毛泽东在处理群众来信时，居然还看了日期，发现被延缓了好几日，生气地说：“你们把群众来信压在一边，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对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批评得很厉害。

毛泽东历来反对盘剥劳动者，阅看了石景山钢铁厂的来信后说：“国家有困难，但是不能再用资本家那套方法继续盘剥工人，这个状况必须要改变。”于是亲笔函复，其中不仅肯定了关于工资问题的建议，并令有关机关迅速合理地解决。

随后，他亲自派办公厅信访室的戚本禹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协调解决此事。

这便是石景山钢铁厂这封毛泽东信的由来。

经过毛泽东出面协调，重工业部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不久就批准石钢实行八级工资制方案，并同意从5月起实行。按照这个工资制方案，石钢工人的工资总额增长了30.78%，有98.26%职工增加了工资。新工资等级、工资标准、工资分值公布当日，全厂职工情绪高涨，一天之内，厂调资委员会就收到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信50余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彻全厂。许多老工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发自内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家属区也洋溢欢庆的气氛。

当晚，许多工人还高兴得睡不着觉。给一线的工人加工资，这是工人们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因结婚而欠债的工人赵章喜说：“过去愁账愁得睡不着，现在高兴得睡不着，老婆是毛主席给娶来的。”工人董文生全家七口人只有两床被，五年没添置过新衣。加工资了，全家人乐得合不住嘴儿，在灯光下合计着如何买布做新衣。

这次工资调整，一线工人加工资了，但坐办公室的要减少收入。经工会组织干部职工进行讨论后，115人保留了原工资，实际减工资的仅仅三人。由于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减工资的人也服气，心平气和。

9月29日，石景山钢铁厂党、政、工、团负责人联名代表全厂职工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说：“我厂工资问题，圆满地解决了，并于9月27日补发了工资……真是皆大欢喜，喜遍了全厂。”信中，他们表示要在全体职工中开展对新旧工资制度的回忆对比活动，进一步提高职工们的政治觉悟，全面检查修订爱国公约，掀起一个新的“抗美援朝爱国生产竞赛”热潮。

毛泽东收到这信后，十分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群众就是觉悟高啊！人民政府给他们增加了工资，他们就要掀起爱国

生产竞赛，前方作战，我们就不愁没有钢铁了。”

确实如此，工资调整以后，钢厂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豪迈地提出“工厂变战场，机器当武器，前方猛杀敌，后方多生产”的口号。各项生产指标眼瞅着蹭蹭地往上涨。这个起步对于石景山钢铁厂来说，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发轫。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发展成为全国的最大钢铁公司之一，以后组建为著名的首都钢铁集团，业务延伸到国外。当王自勉再次阅读这封毛泽东复信时，仍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好像置身当年火热的“钢铁年代”，忍不住对人说：“首都钢铁集团的起步，就是从毛泽东为工人调工资开始的，一次信访引起生产力革命，居然撬起一个巨型跨国企业，这是新中国一个极大的奇迹。”

早在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一次招待会上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接着他说：“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工业在毛泽东经济建设思路中，是应有之义。石景山钢铁厂工资改革是新中国城市工作起步中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工业建设起步的一个缩影。然而，这个起步不是剥夺工人，不是给他们更沉重的负担，它带给城市和工人们的是收入增加，是能“娶老婆”了，是能“添新衣”了，是欢喜，是干劲更足、希望更大了。伴随着广大农村暴风骤雨式巨变，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也开始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11.“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毛泽东为女战斗英雄题写的

1951年春，经过七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如将全部力量倾注到朝鲜战争，势必长期陷于朝鲜战场泥淖之中，这将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不得不决定在朝鲜的“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以谈判结束战争的决定。6月，美国官员通过联合国秘书长、中立国使节、苏驻美大使、苏驻联合国代表等渠道，多次提出停战谈判要求。停战，也符合渴望和平的中朝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会议主张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和平解决，恢复战前状态。6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志愿军确定“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平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开始。

尽管在以后的谈判中，美国佬以强大实力为筹码，不甘服输，硬是要当“老大”，朝鲜战争开始进入长达两年多时间边打边谈的局面，但在毛泽东指挥下，通过打，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尊严，让“十六国联军”乖乖地低下了头。这样，朝鲜战局逐渐稳定下来。

在中国人民终于战胜可能再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外患的胜利之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三周年华诞。

8月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便着手整顿市容，全市的旅馆业、商业、卫生部门及其他各行各业开始装饰门面，调整柜台，扎设彩门，

安装霓虹灯，准备迎接国庆的到来。党中央决定照例举行国庆庆典，并且邀请全国来自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解放军部队的战斗英雄，各少数民族的模范人物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爱国人士代表，港、澳、侨胞代表和有关人士到北京，届时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

9月20日，即国庆节前十天，长江边上的安徽无为县马西村马四姐突然接到毛泽东发来的第二次请她去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邀请信。

这是许多大人都不可能得到的荣誉，马四姐一个才17岁的小姑娘为什么居然能被毛泽东邀请呢？

原来马四姐年纪虽小，却是赫赫有名的女战斗英雄，且是在百万雄师渡江作战中“一举成名”的。1949年4月20日夜，天穹像一块黑布遮盖着大地，22点整，渡江战役的炮火全面打响。解放军三野第九兵团第27军从无为县渡江。14岁的马四姐参加渡江第一支突击船队，戴着斗笠，负责为解放军战士们摇船，她前后在船上忙碌了整整四天四夜。

渡江战役一个多月后，7月15日出版的皖北区党委机关报《皖北日报》第三版，刊登了该报随军记者南岗、屈健撰写的《女英雄马四姐》一文，第一次报道了马毛姐的英雄事迹：“4月20日晚，是我们开始强渡长江的时候……大家计议着：‘她委实太小了，又是个女孩子，回头打仗会吓坏的。’于是四五个同志走上前来，一面劝说，一面将她死拖活拉地送下了船，她哭着嚷着硬要上去，但终于被战士们阻拦着了……但是她并不失望呵，仍旧坐在江岸上守候着，等到她哥哥的船回来了，第二次载运战士们过江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顾别人的阻止，跑上船去，担任起她的舵手任务。”此后，她连续四昼夜载运战士们渡江，直到完成任务为止。小英雄踊跃支前，并且劝

都劝不住，四天四夜运送渡江部队，这样的事迹很感动人。渡江胜利后，她被授予了“渡江一等功臣”英雄称号。

开国大典前，毛泽东获知渡江作战时有这么一个女英雄且是年龄最小时，亲笔发来请柬，邀请她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但是，马四姐父母担心她年龄小，不放心一人进京，结果，没能去北京。

11月30日，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前，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宋日昌，副主任郑抱真、李云鹤联名发函巢湖专员公署，再次邀请马四姐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兹聘无为牛埠区马家坝渡江一等功臣马四姐为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直接邀请代表，希转请于25日来肥参加会议。”这次马四姐去了。会上，皖北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代表黄辛白详细介绍了她的英雄事迹，说：“闻名全国的皖北女英雄马四姐她今年才15岁，在旧社会里说起来是个不值钱的船家女。解放前蒋匪军抓船运军火，她人小心不小，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几次三番躲过差。而解放后，大军过江前两个月，要船工支援过江，她一听消息马上报名参战……四昼夜不断地工作。由于她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不少危险。”

马四姐去了芜湖，却错过了开国大典。这成为她一直以来非常遗憾的事情。

然而，毛泽东并没忘记这位“小女英雄”，时隔两年后她该长大了，父母也该放心了，于是再次发出请她参加国庆观礼的邀请函。

这次马四姐没有拒绝。17岁的她手捧邀请信，激动得泪流满面地说：“多么想早早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心随着思绪飞往了北京城。

9月26日，马四姐随安徽省代表团进京。

29日晚，金秋的北京星光灿烂。毛泽东在灯火辉煌的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进京参加国庆庆典的各省代表团。宴会上，各代表团

选派一名代表向毛泽东敬酒。马四姐被安徽代表团推荐代表安徽人民敬酒。

大厅内，欢呼声震耳欲聋，人流如潮水般涌向毛泽东。当马四姐靠近毛泽东，向他敬酒时，满杯的酒颤得只剩下半杯。她没来得及向毛泽东报告自己就是他两次邀请来的小客人时，已被激动的人群挤得远离了毛泽东。酒没敬上，也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但她终于见到了日夜想见到的毛主席，还是高兴得心几乎蹦出了胸窝。

但事后，马四姐觉得这次擦臂而过，多少还是有点美中不足。

10月1日，在国庆观礼上，她再次见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并且聆听了他的讲话。

3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与各代表团欢聚，一起观看京剧演出。

进入剧场后，马四姐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座位竟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高兴地直想尖叫。但她还是忍住了，生怕打扰他们，规规矩矩地端坐在自己座位上，甚至还有些紧张，一动都不敢动。开戏前，周恩来指着她，低声告诉毛泽东说：“主席，这就是你两次邀请的小英雄。”

毛泽东闻言，立即像慈爱的爷爷一般，拉住马四姐的手，笑容满面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倏然间，马四姐的脸火辣辣的，话全部哽到喉咙，竟一句也说不出，低着头，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我只知道我家都姓马，在家排行老四，家里人喊我四姐……我没有……正式名字。”

毛泽东一听，侧过身子对身子另一边的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笑着说：“嗨，这么伟大的小英雄，没有名字怎么行？”

他满口浓重的湘腔话刚落音，把在座的中央领导都逗笑了。正在这时，剧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演出开始了……大家转而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了。而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的马四姐却无心看

戏，全身像灌满了蜜似的，觉得自己坐在两位日夜渴望见到的领袖之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她没料到更幸福的事还在后面呢！

当晚演出结束时，毛泽东等人匆匆地离开了。马四姐也随代表团回到了自己住的北京大学招待所。第二天早晨，她一觉醒来，发现窗外阳光明媚，自己的脸上还挂着笑容。她起床后，与大家一起刚吃完饭，突然一辆红色小轿车驶进招待所，走下两位解放军。她正寻思他们来做什么或找什么人时，代表团团长进来了，高兴地告诉说：“马四姐，汽车接你去中南海，快些去吧。”

马四姐立即出门去，被两位解放军带上汽车。车上，他们告诉她说：“毛主席派我们接你到主席家做客。”

“哪个主席？”马四姐问道。

“毛泽东主席。”

哟，到毛主席家做客，马四姐一点儿都没想到！捂住胸脯，激动得不行。

很快，汽车在中南海毛泽东家门口停下来。马四姐一进门，毛泽东带着全家都在等她了。坐下后，毛泽东和蔼而慈祥地上下打量她，见她穿的衣服很旧，立即对警卫员说：“去给她买套新衣服。”

警卫员走了。毛泽东用宽大而温暖的手抚摸着马四姐的头，转身向身后的江青和女儿李敏、李讷介绍说：“这就是渡江战役中那个年龄最小的女英雄。”

江青和李敏、李讷一起围住了她。江青啧啧称赞说：“这么小的女英雄！真不简单！”

李敏、李讷也拉住她的手，表示说：“要向姐姐学习。”

毛泽东笑着对她们说：“这样的女英雄，还没有名字哩。今天我请她到家里来，就是给她起个名字。昨晚看戏回来，我斟酌了一下，

嗯……”

他瞧了瞧马四姐，停了一下，扬起双手笑道：“就叫马——毛——姐吧。马是你家的姓，名字第一字就跟我姓了……”

马毛姐没想到毛泽东日理万机地操劳国家大事，还惦记一个农家女孩没有名字，并且还专门把她请到自己家中！毛泽东的话还没说完，她的眼眶里已塞满了激动的泪水，拼命地点着头。毛泽东又俯身问道：“你识不识字，想不想在北京读书？”

马毛姐说：“我已在安徽的炳辉子弟学校上学了。”

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连声说：“好哟，好哟。”转身从书橱中抽出一本精致的笔记本，然后在扉页上挥笔写下：

毛姐：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毛泽东

1951.10.4

然后，毛泽东进屋去工作了。马毛姐在毛家和李敏李讷等玩了一个上午，吃了中饭才回去。

由于马毛姐还小，不懂得题词的“重要意义”，回到无为老家后，她没有把毛泽东这句鼓励公之于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并不为很多人知道。但毛泽东的题词成为她一生的激励，不久，她转入安徽省工农干部学校学习，在学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后，她去了合肥市车站麻纺厂，在服装鞋帽行业干了一辈子。这是后话。

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有一个女英雄刘四姐，其原型就是马四姐。有趣的是，毛泽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题词后来流传甚广，而

最早却是为她而题写的。毛泽东与这位“农家小英雄”的故事是共和国初期领袖与普通人交往的一件普通事情，也是毛泽东关心小英雄、爱护小英雄的一段佳话。

12. 国庆观礼风波

在有着几千年皇权历史的中华大地，有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处流行，在乱世之中，军阀们甚至纷纷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理想”。上下三千年，帝王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而毛泽东历经五四反帝反封建风暴洗涤，是彻底的反封建、反皇帝的人。在夺取革命胜利后，他不当皇帝，不愿住中南海，也不写自己万岁。然而，中国终究是从皇帝社会过来的，废除帝制也不过区区二三十年，“皇帝臣民”意识在一些人心中要彻底消去，并非一件轻松的事儿。

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一定要让中国人根除“皇帝情结”和臣民思想，完全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不开化的僻远乡村更难。

在 1951 年国庆节，毛泽东又遇到了“皇帝”的事儿。

为此，他不得不请了几人陪同一位“大客人”到家吃饭，化解他的“帝王思想”。这位客人也与国庆观礼大有关系。不过，他既不是女英雄，也不是劳动模范，而是毛泽东的一位穷亲戚——他七舅家的表兄——文梅清。

夏收之后，毛泽东小时玩伴、舅家表兄文润泉、文运昌双双来到

了北京城探亲，看望毛泽东。在晚间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们道：“十七哥怎么没来北京？”

“十七哥”是毛泽东七舅的次子文梅清。毛泽东小时在外婆家时常和他一起玩耍。文润泉直言地说：“这次你又没请他来，他如何好意思来？”

他的话提醒了毛泽东。

毛泽东舅舅文家有表兄五人，其中两人已经谢世，文润泉、文运昌兄弟来北京后，只剩下文梅清一人还从没来过北京。毛泽东决定届时邀请他来北京看看，见见世面，并叙叙旧情。

9月中旬，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毛泽东就致电给在湖南工作的老同学周世钊，请他并托他邀表兄文梅清一起赴京参加国庆。国庆前夕，周世钊偕同文梅清、毛宇居和毛泽东少时好友张有成，一起乘坐火车来到了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办公厅招待所。

文梅清比毛泽东大六岁，一直在湘乡老家务农，不过在大革命时参加过湘潭农民运动，但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躲避敌人迫害和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四处流浪。因长期在山沟里生活，他思想不那么开化，甚至远落后于这个时代。来到北京后，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啊呀，北京好大哟！”“啊呀，北京好大哟！”

这一次，他作为毛泽东的客人参加国庆观礼，心情格外激动，与此同时，一种莫名的高傲情绪也随之在心底油然而生，有时还忍不住对毛宇居、张有成说：“石伢子有出息啦！当主席和古代的皇帝差不多啦！”自以“古代”的皇亲国戚相比。

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上午9时，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派车将周世钊和文梅清等人一起接到了天安门，安排他们坐在在广场左侧第一观礼台，作为嘉宾参加国庆观礼。

庆祝活动开始后，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挂满

大红灯笼的天安门城楼上，汇集在广场上的数十万群众，激动地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谁知这时候，和周世钊、毛宇居等人坐在一起的文梅清忿然起身，找到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说：“我要回招待所去，请你们马上派车送我。”

工作人员不知他为何突然要回招待所去，忙问原因，文梅清气呼呼地说：“你们不要问原因，我要回招待所去！我就要回招待所去！”

周世钊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好几次拉扯他的衣服，想让他坐下，他还是我行我素地执意要回去。无奈，周世钊只好依了他，对办公厅工作人员说：“同志，他坚持要回去，就请你们派个车子送一下吧！”

工作人员只好临时叫上一辆吉普车，把气呼呼的文梅清送回了招待所。

周世钊、毛宇居等人参加完国庆观礼活动后，兴致勃勃地回到了招待所，见着文梅清笑着说：“你今天是怎么啦？观礼大会才开始，你就要返回招待所！今年的观礼大会开得很热闹哩！有很多好看的东西，你没看到，实在太可惜啊！”

这下文梅清终于倒豆子，开始一吐为快了：“润之明明请我们三人来北京参加观礼活动，他们把我们安排在坪里的矮台上，我们三人是不是应该安排在城楼上？我一到那里，心里就不舒服，心里就有气。后来我想你是个校长（指周世钊），也是一个官，和我一样坐在那坪里的矮台上，我也就算了，也就没啥意见了。最气人的是到了开大会的时候，润之从里面出来，坪里那些开会的人，都举手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心里一憋气，火就上来了。你知道的，我是润之的表兄，十七哥啊！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把我晾在一边，至少也要喊千岁吧，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这下众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起来了。毛宇居说：“原来你是见润之的怪啊！”

“是呀，你说是不是起码要喊我千岁才行？这些人太不懂礼节了。”文梅清说，“我能不生气吗？一生气，就坐不住，所以要回招待所，不在那个矮台子上坐了，瞧不起人嘛。”

周世钊、毛宇居等人笑完之后，向他解释现在是新社会，皇帝早就废除了，不讲旧社会那一套，人人平等……观礼坐下台上台下完全是有关部门按照嘉宾身份确定的。可他们怎么说怎么劝，在没什么文化且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前，也解释不清。文梅清还是满脑子旧思想，坚持自己是国舅，待遇没跟上来。这个颇有点搞笑的事情反映了此时相当部分人的思想水平。

但周世钊、毛宇居是见过世面，懂得新政府的人，见做不通文梅清的工作，只好写信托人带给中南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表兄对毛泽东“大生意见”的事情。

毛泽东接到信后，觉得表兄的思想有些糊涂，并且认为若让他带着这种思想回老家去则不利处理与当地群众和政府的关系，便决定邀约周世钊、文梅清、毛宇居等人一起到中南海来，当面对他进行教育。

几天之后，周世钊等人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众人坐定后，毛泽东笑着说：“这次我请你们来北京。你们到了火车站，我没有去接，好多事情都是由工作人员安排，要请你们多包涵！”

“你事情多，忙。有人接待我们，就已经很不错啦！”毛宇居老先生说。

毛宇居虽当年带头保护过毛家祖坟，也是毛泽东的亲戚，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给封他官，只是隔一段时间请他到北京来做做客，走走亲戚叙叙旧，没给他安排过什么官职。毛宇居对此也很坦

然，一没啥意见，二没啥要求。

这时周世钊告诉毛泽东说：“梅清老兄原来有点意见，生了气。我们不知如何做他的工作，所以给你写信。不过第二日，他气就消下来了，我们给他解释，现在也没意见了。”

“那十七哥你就要感谢惇元（周世钊字）兄对你的帮助。”毛泽东说，“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工作没做好。你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社会不太了解，我没先向你讲清楚。”

文梅清不过是急脾气，旧脑子而已，现在思想通了，急忙接上话说：“润之，你快莫这样讲了。这不能怪你，主要是我思想落后，对新社会不了解。我用老思想、老眼光来看你们的新社会，这是我的问题，你莫见怪！”

“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喊你千岁也未尝不可。”毛泽东笑着说，“不过，现在我们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封建社会那一套早就废除了。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大众的，人民当家做主。因此，不论是谁，种田、做工、当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当然，你就不是千岁了！”

“韶山有一些人有意见，说你当了这么大的官，一不拨款，二不给帮忙，三不带人出来当干部！”文梅清实话实说，“我们劝他们嘛，还这样说。”

“我这个当主席的，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搞特权，人民就会唾弃我。韶山这么多人，我帮了这个，那个没帮，那个有意见。帮了湘潭的，湘乡人有意见，浏阳人有意见。”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呢，我还带头破坏了党内的制度！”

“嗯。”文梅清说。

毛泽东又说：“就拿这次国庆活动来说吧，哪些人上天安门城楼，哪些人不上；上城楼的人，哪些人在第一排，哪些人在第二排；哪

些人在左边,哪些人在右边,都要经过筹备办公室研究决定。请什么人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也是要经过他们开会讨论决定。来参加观礼的,都是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各少数民族中的模范人物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爱国人士中的代表,港、澳、侨胞中的代表和有关人士。我请你们来参加国庆观礼,也是经过筹备办公室会议通过的,你们就算有关人士。把你们安排在左边第一看台,这是工作人员对你们的关照。这样做,我看没违反原则。因为你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点照顾我看是可以的。这就叫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要是把你们安排在二、三、四、五看台,我看也是可以的。既然安排第一排了,我看十七哥就要感谢工作人员的关照才对!”

文梅清心中的疙瘩完全解开了,不住点头说:“对,对,润之你讲得对!我确实有点不谙事理,有些糊涂了。”

晚上,毛泽东留文梅清等人一起吃饭。饭前,他把孩子和工作人员喊拢过来,向他们一一介绍说:“这是我的字居大哥、我的十七哥,我小时候的好友张有成!”

孩子们礼貌地称呼了长辈。然后,一起入席聚餐。

一席谈话,有情有义有原则。毛泽东成功地化解了表兄的“国舅”思想。为了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新中国与旧社会不一样,国庆节后,毛泽东还派毛字居、文梅清和张有成去了天津参观。在天津,他们看到过去外国领事馆等洋建筑被人民政府收了回来,文梅清高兴地说:“润之他们干的真好。大清皇帝怕洋人,共产党不怕他们,人民大众的国家就是不一样啊!”

毛泽东一生反对皇权,反对封建,这件事情只是他这种反皇权、帝王思想的一个小插曲。而在他去世后,个别人硬要把他与帝王思想进行“联系”,说他满脑子帝王思想,等等。洞察这一段历史的人们

则说：“毛泽东自有他的局限和错误。但他的局限和错误，却偏偏扯不上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乃至他前后位高类似帝王的人，他是最少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的国家领导人，是最彻底地铲除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包括其经济、政治、思想影响的领导人，是扫荡与消灭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的第一功臣，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最杰出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事实上，在中国虽然称“皇帝”的人没有了，而民间的帝王情结却一直没断根，毛泽东却完全杜绝了这样的称谓，他本人和亲属除农民文梅清在开国之初以“国舅”自居过一次外，再也没一人自称或被人称为“皇姑”“国舅”过。

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不是传说中的“皇帝”。

13. 毛泽东的选择：“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要人没有私心、摒弃贪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与毛泽东“本人不腐”和“坚决反腐”分不开，也与他“开国第一斩”抓惩治腐败有关系。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阿克顿定律被广泛引用，确实说得很对。在取得政权之初，新中国的执政者手中获取极大权力，同样面临腐败的危险。而毛泽东早就于1949年3月发出了警告：革命胜利后，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并且在七届二中全会大声呼喊：“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

事。”进城后，一些干部果真没有抵住诱惑，当了权力和私欲的俘虏。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连发四次脾气，对党内刚萌生的腐败一声大棒喝。但随着经济恢复工作步步稳健推进，各级干部在各岗位领导作用显现，权力获得运用，腐败现象还是不可避免发生，且伴随着抗美援朝等工作的推进进一步暴露出来。

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后，1951年10月，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平达到结束战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个响亮口号：“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声势浩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随即在全国城乡展开。然而，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暴露出大量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数字之大、情节之恶劣，令人震惊。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给党中央发来一份报告，其中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特别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旧币）。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又是抗美援朝的大后方。这些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对腐败行为万分警觉的毛泽东马上重视起来，在高岗的报告上批示：“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会犯大的错误。”

这不是毛泽东骇人听闻，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确实已到了不可小觑地步。

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会上，有人揭发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利用手中职权的贪污事实。河北省委、省政府认为事情重大，立即成立以省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调查处理刘、张案件委员会，进行调查。

很快，调查委员会查实举报的刘、张贪污情况属实，且案情十分

重大。为了达到个人挥霍、享受的目的，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手中职权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总计达到171.6272亿元。数字如此之大，震惊了河北省委。

11月29日、12月2日，有关部门报请华北局批准，先后将张子善和刘青山逮捕。

29日，一份标有四个“A”字的特急电报，由华北局传达到党中央。毛泽东办公看到这份电报时已是11月30日凌晨。电文标题为“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拟将刘张逮捕法办”。“刘”即前任天津地委书记、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刘青山，“张”即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的张子善。电文中说：二人“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旧币）”，“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毛泽东看到电报后十分生气，当即决定以党中央名义转发华北局报告。他在上面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罕见地在批示中用上了严厉警示性词语：“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须当作一场大斗争”；且多次用“必须”、“须”等词语强调必要性。

当日，他又亲自给华东局、福建省委发出电报，并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电文中几个“一样的”连用,毛泽东明确要求各中央局等领导机关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惩腐斗争当作“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来对待和落实,将贪腐分子视同反革命分子,其实就是认识到贪腐于人民利益和新生政权的危害是颠覆性、生死存亡的,也体现出他治贪惩腐的巨大决心。为此,电文要求各中央局等机关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同时又号召腐败分子坦白和检举,还对腐败分子提出了处理办法,要求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还罕见地提出“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这是方法论的指导也是工作上的布置。

次日,毛泽东拟就长达 7000 多字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党中央决定将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和各个部门推广、铺开。其中毛泽东告诉大家说:“1952 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 1953 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 20 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较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为此,党中央决定去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安置处理转业人员,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而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因此,决定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其各委党组为单

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于1952年内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

毛泽东把“三反”运动作为后年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来抓了。这既是扫除党内蛀虫、污垢的及时雨，又是高瞻远瞩的未雨绸缪之举。

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第一次廉政风暴就此于1951年12月1日展开。

此时河北省党代会还在进行之中。12月4日，河北省委根据代表们的建议，经过研究，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曾经坐过敌人大牢的两位“老革命”清除出党外，处置可谓十分严厉。

毛泽东等人不只是高喊几声“打打打”，声色俱厉地警告一下，就悄悄罢手收场，把刘青山、张子善案就此匆匆了事，而是决心以此为契机，将“三反”斗争更加深入推进，扩展到各个部门，继续“深挖贪污”，于是对刘青山、张子善案继续在河北进行追查。

12月8日，毛泽东再次以党中央名义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在报告批示上，他写道：“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这个指示下发后，远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战员也行动起来，在战地开展“三反”运动。某王牌军军长平时多抽了公家几包香烟，

硬在党委会上作好几次检查，剖析自己，才算过关。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极大地提高了前线部队的战斗力。

随着“三反”运动的进一步展开，越来越多被揭露出来的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现象表明，干部们最容易在与私人工商业的公务交往中滋生腐败，且多为牺牲国家利益的钱权交易，在大中城市更为严重。针对这种现象，12月11日，毛泽东再次以党中央名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在批语中，他对“三反”运动的重点进行了明示：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

尽管要求把“三反”运动当做“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特别是要在大城市发动，但毛泽东还是提出了内外有别原则。在批语末尾，他特地补充写上：“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

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这个空前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内外有别，但不是去照顾党内干部，给犯错误的党内同志一条宽松的“逃生之路”，他是照顾党外人士。这个内外有别是照顾党外，对党内则从严。这是治党的智慧，也是反腐的智慧。

毛泽东的诸如批示下发后，党中央的反腐决心立即传达到全国和各个部门。这时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罪行已通过报纸、广播公之于众。众人努力生产，奋发工作，以汗水建设新国家，创造社会财富，而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少数人却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腐挥霍，如若任由发展下去，势必回到过去“人吃人”的旧社会，形成新的贫富分化。各地群众尤其天津地区的群众对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行径无不痛恨。改组后的天津地委组织八个县镇党员积极分子开会讨论对刘、张两人的处理意见，无人不主张枪毙。杨柳青镇的农民代表说：“这两个人的罪行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对刘、张处理意见，大意为：两人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然而，到底该如何惩处刘青山和张子善呢？此时国家对罪犯处理尚还没明确的法律条文，鉴于两人是党的高级干部，只好仍采取延安以来的老办法——走群众路线——让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评议。12月下旬，华北局接到河北省委对刘、张“处以死刑”的意见后，要求他们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各部门以及群众的量刑意见。

天津地委在家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刑”。随后，全地区 552 名党员干部进行讨论，其中，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的人，为 535 名，同意处死缓的，为 8 人，同意判无期徒刑的，为 3 人，同意判有期徒刑的，为 6 人；同意判处张子善死刑的人，为 536 名，同意处死缓的，为 7 人，同意判无期徒刑的，为 3 人，同意判有期徒刑的，为 6 人。综合各方面和多数人的意见，华北局进行研究之后，于 12 月 20 日向党中央提出处理刘、张的意见：

中央：

(1)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剥削河工、民工费用，勾结私商贪污自肥，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

(2)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3)河北省事先对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罪行未能发觉，发觉后，又未及早坚决地予以处理，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应受到党的指责。

以上意见，妥否？望中央指示。

华北局

12 月 20 日 23 时

华北局批评了河北省委，但同意其对刘、张“处以死刑”意见，且增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之语。对此，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后来解释说：“之所以加‘或缓期二年执行’，是为中央决策时留下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中南海。对刘青山和张子善是杀还是留，是马上处决还是缓期两年执行，到底如何处理，只待毛泽东等人最后决定。当周恩来把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他阅看之后，许久默默不语。

周恩来见状，忍不住问道：“主席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极不情愿地缓缓说出了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道：“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坚定起来了，回答说：“不准。”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历来的态度是治病救人，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这次却要判两人死刑，且态度明确，不准讲情，是他变铁石心肠了，成“暴君”了？否也。这完全是反腐败的需要。许多干部有职权了，不少人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放纵私欲，出现惊人的腐败现象，若不重拳打击和处理，就难制止这股贪腐歪风，一旦放开手，腐败就会形成决堤之势，一则要从严治党，一则不为他们霸占群众利益，一则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所以毛泽东要对两名贪腐分子严惩不贷。

但刘青山、张子善终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战争年代，刘青山在敌人屠刀下逃得一命继续革命，张子善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而没有动摇和屈服，两人都对革命有过较大功绩。因此，少数干部对其量刑认识还不一致。为此，毛泽东专门召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研究死刑意见，走群众路线。

会上，毛泽东指出说：“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要严重地注意此事。我认为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

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对于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处理，他态度坚决地说：“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能正党纪国法，我们就要当李自成。”

最后，他反问众人说：“我们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呢？”

这个答案自然不言自明。会上大家达成了一致的决议，即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对中、小贪污者，进行教育；但对像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功劳有多大，都不饶恕，必须严惩。

这样判处刘、张死刑的意见在党中央决定下来了。

随后，毛泽东又请党外民主人士讨论此事，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毛泽东作出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对罪犯的宣判和处决程序，如同当年瑞金和延安审判腐败分子左祥云、肖玉壁一样，先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然后执行枪决。

刘、张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后，河北省特别是一些当年和两人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干部们十分惋惜，有的说：“他们是战争年代的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说：“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则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30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太可惜了，应该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些意见集中反映到了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那里。他曾当过冀中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老领导”，也不忍

心看着两人年纪轻轻就被处决，找到自己“老领导”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很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但黄敬还是坚持要他去找找毛泽东为两人说情。薄一波只好说：“如果一定要反映，那我就陪你去向主席说说。”

黄敬不敢去，但坚持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

随后，薄一波去找毛泽东，转达黄敬等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沉思了一阵，耐心地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我们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 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薄一波终于明白了毛泽东枪毙刘张的良苦用心：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也不是为了惩腐而惩腐，而是防止干部队伍腐化，为着挽救更多数犯同样错误的干部，严惩刘、张实际上是党中央用铁的反腐行动向广大干部敲响廉洁警钟，同时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去做李自成，决不能去搞“当官发财”的老一套。之后，薄一波又把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转告给黄敬。黄敬也没话说了。

黄敬不再说情了，但华北局还是有些人找过来，要替刘、张求情“留一条命”。毛泽东的态度硬朗起来了，对工作人员下令说：“凡是刘青山、张子善来讲情的人，一律不见！”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进一步推动全国各行各业“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各地先后挖出来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数量着实惊人，据不完全统计，到 1951 年年底，全国共查出贪污 1000 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犯 10 万余人，总金额达 6 万亿元之巨，甚至还有老

红军出身的高级干部也成了贪污犯。东北有位方志敏时期的老红军干部也被群众挖了出来，吓得畏罪自杀。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不法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毒”也暴露出来，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决定在“三反”同时进行反对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五反”斗争，且先在大中城市开展。

1952年1月26日，正是农历除夕，党中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在这份毛泽东亲自发出的“五反”指示中，他是这样部署的：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腐败案件出现激增的势头，毛泽东开动“五反”“三反”双轮一起开火。在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又一场新的反腐斗争拉开序幕。

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河北省“三反”“五反”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河北省会保定对两人执行枪决，并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

2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扩大政务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批示。根据华北局的要求，刘秀峰等人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组成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刘、张案件。与此同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党中央名义给河北省委发来电报，要求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妥善安排好刘、张二犯的后事。河北省委、省政府研究后制定了四项具体措施，即：(1)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2)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3)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4)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在公审大会之前，2月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和河北省委秘书长李子光来到看守所与刘青山、张子善进行最后谈话。他们向两人传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张子善沉默一会儿，表态说：“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

他从内心里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是多么深重。

当晚，刘青山和张子善最后一起吃饭。饭桌上，刘青山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

张子善说：“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一条血的教训。”

刘青山说：“拿我作个典型吧，处理我算了，在历史上也有用。”

两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给世人。面对自己的罪行，还敢于承担，还表示“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仍可谓是“好汉本色”，遗憾的是一切都太迟了。

2月10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解放军指战员，还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省政府专门还邀请了曾遭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灾民代表、民工代表。参加大会的人数站满了体育场，达到2.18万之多。

公审大会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立即执行枪决，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

同是革命功臣和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被中国共产党自己用正义之枪处决了。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的艰难决策之一。在此前一日晚上，他专门为党中央起草了对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的指示，其中提出对部分人免于刑事处罚，改为行政处分，即：（1）对“情节不严重”的中小贪污犯一般免于刑事处罚，由其工作机关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2）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则可以免于行政处分；（3）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的，则不以贪污论。这样处理的话，查获的约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受到行政处分。对此，毛泽东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说：这是“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

为什么要这么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等人的目的就是团结和教育多数人去准备和参加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去年年底全国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贪污犯达十万余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全部进行重处，还将牵涉到其家属，必然造

成打击面过大，而抓大老虎并进行严肃处理，对多数犯错人员进行教育，才能使之不重犯。这才是惩腐的目的。毛泽东不是就惩腐而惩腐，而是万变不离其宗，出发点是教育多数人，团结他们去参加火热的生产和建设工作。

毛泽东搞“三反”、“五反”，并非是要搞阶级斗争，而是紧紧围绕和服务经济建设大局而布设的一盘棋，是清理经济建设的环境，反腐是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没有丢失根本。

刘青山、张子善处决了，毛泽东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他是不主张杀人的，对敌人不主张无辜地去杀，对自己阵营的人更是不主张杀，而在党的历史上他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杀人只有四次，只杀了五人，其中一个杀人犯黄克功，其余四人则是大贪腐分子左祥云、肖玉璧和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下令杀人，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而这次为了刹住党内外兴起的腐败之风，他和党中央杀刘青山和张子善下了很大决心。当晚，他阅看华北局第三书记、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委刘澜涛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三反”斗争报告时，在上面写下了如此批语：“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再次表达了坚决反腐到底的决心。

晚 11 点多，工作一天的他走出房子，在夜色中和卫士们一起散步，放松、休息。突然，他转身问卫士李家骥道：“今天你干什么了？”

“开‘三反’会议。”李家骥告诉说。

毛泽东一听，立即兴趣盎然地和李家骥等人一起讨论起来了，问他们：“你们抓没抓着老虎？”

“我们警卫处没发现大老虎。小老虎有，100 元的抓了一个。”一名战士说。

“是哪一个？”

“原警卫班的××。”李家骥说。

“噢，他是不是你的老乡？”

“是。”李家骥说。

“你对‘三反分子’恨不恨？”

“怎么不恨。”李家骥说，“这些人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损公肥私，私心当头。这是小马批判那个人时说的话。我看他说的真深刻。”

“对，他揭露得很好。”毛泽东肯定地说，“马克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穷人，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再穷，也没选择为自己劳动，而是选择了为全人类劳动。恩格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富人，因为他和马克思一样，也没有选择为自己劳动，也选择了为全人类劳动，而且把自己的家财连同超众的才华一起奉献给了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全人类，是多么高尚。”

“他们都是无私的人，‘三反分子’私心重，不具备大公无私品性。”李家骥说，“据说公安部一位处长，还是个老干部，已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毛泽东问道：“你们警卫处有没有一般的老虎？”

“可能有，我把握不好怎样才算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一名卫士说，“例如，我们一位领导用700多元给他亲属做丧，同志们都很气愤；还有一位处长吃一顿饭花100元，等于一个战士一年的津贴费。我们能不恨吗？像这样的人不知是什么样的老虎？”

“对他们必须严格要求，严肃批评和处理。”毛泽东生气地说，“前几天有人对我讲机要处有个干部私自给自己盖小楼，这样的人与刘宗敏有什么两样？必须枪毙几个，不然不足以平民愤。”

他说罢，开始转身往回走。边走，他边继续说：“你们今后定个制度，每三个月如开一次‘三反’大会，你看好不好？要时时刻刻提醒那

些爱动用公家钱物的人不要再犯错误。”

“主席说得对，我们就应该经常开展这种活动，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李家骥说。

“李家骥，你知道吗，金钱关也不那么好过哩。如果让你管钱管物，你敢不敢动？”毛泽东问。

李家骥老实地回答说：“我不敢动。不管钱和物，不接触这些东西，就不会犯这方面的错误。工作上难免犯错误的。”

“对，那是工作中的错误，和经济问题是两回事。”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说，“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像‘三反’中暴露的那种人。进城前，我说过不要被糖弹击中，可就是有人不听。这句话要继续讲下去，要时时处处提醒人们不要再犯‘三反’中这些人的错误。”

这个晚上的对话，让李家骥等人记了一辈子。

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刘青山、张子善公审、枪决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在二版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

两人被处决的消息传出后，大快人心。社会各界赞叹不已。一些年轻人在讨论中激动地说：“过去我们看不清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回可见到事实了。”老人们则感慨万千地说：“过去有人认为贪污是人类的本性，现在从这件事中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真是大公无私，说贪污是人性，我看完全是贪污分子们自我狡辩的鬼话。”

这场“三反”“五反”运动声势浩大，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揪出不少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让他们现出了原形，得到了警告和处理。这场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在运动之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目睹出现各种腐败现象，困惑不解，疑虑重重。通过这个运动，通过枪决刘青山张子善，他们个个豁然开朗。一位解放军炊事班长说：“过去看到个别干部贪污浪费行为，我还以为是党的政策变了，现在发现，不

是党的政策变了，而是我们队伍里少数人思想变了。”

“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睹过国民党种种腐败的国民党上将陶峙岳由衷地感叹说，“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

这场运动及时地刹住了党内开始滋生的腐败之风。

早在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黄炎培时两人有一场精彩的传世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跳不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他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指一个政权的“兴亡周期性”。在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和民国的军阀统治都是一样，周期性地发生着兴亡变化，周而复始，朝朝如此，没人躲得了，因此称之为“周期律”——即周期性的兴亡变幻定律。对于黄炎培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则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接着，他又指出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新路”就是坚持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进行反腐败斗争，将权力置于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的阳光之下，去避免这个“周期律”。事实上，这确实有效的。建国之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这样一场发动群众来检举揭发，让人民来进行监督权力的反腐败运动，正是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党和政府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由于铁腕反腐，毛泽东和他的政府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确实走出了黄炎培所言的“周期律”。“兴亡周期律”走到在毛泽东等人前面，所谓不变的“定律”终于成了“废旧过时的老黄历”。

这股清新的廉洁政风是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劲吹起来、浩荡

起来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在党内一些重要场合讲过刘、张“非杀不可”的道理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这次杀刘青山张子善，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也树立了党和国家机关的清廉作风，在执政后没有腐败烂掉。若干年后，网友们评论说：“他（指毛泽东）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犯了罪的功臣，对高级干部管了十几年。”此话多少有些道理。而这样的清廉之风、廉洁的干部正是国家建设和民族崛起所必需的。1976年，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前总理惠特拉姆由衷地赞扬毛泽东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尊敬，国内实现了她几世纪来未有过的稳定，她的人民得益于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洁最有效的政府。”^①而这个实现中国崛起的“中国从未有过的最廉洁最有效的政府”，就是在开国第一斩——毛泽东等人杀了“革命功臣”、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之后建立起来的。

^①《惠特拉姆说毛主席同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密切联系在一起》，载1976年9月11日《参考消息》。

14.毛泽东从中南海“突然出走”

毛泽东对于“三反”“五反”运动抓得很紧，但完全是以他惯有的全局思维进行的，没丢失主次，也没因为重视运动而迷失头脑放松经济工作。1952年2月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春耕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指出：“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15日，他为党中央起草“五反”运动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第一句话又指出说：“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并对“只有偷税漏税问题”、“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的，采取“只退不罚”政策，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

在和平时期，经济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毛泽东紧紧抓住生产这根弦不放松，体现出杰出的执政智慧。

对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他不是只抓贪污犯打贪腐分子

而不及其余，而是要求大家讲究方法。22日，在给华北军区的指示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说：“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他强调要打大老虎，不能松劲，但也强调要（1）调查研究，（2）不准逼供信，（3）要辨别真假。这几条方针就是为了保证运动在正确轨道上进行，不出差错。

毛泽东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不是如某些“政坛领袖”不准人家贪腐而自己大肆贪污，蒋介石在40年代也“打过虎”，结果“打虎高手”蒋经国在上海一把撞上姨夫孔祥熙的儿子、表兄孔令侃时就下手不成了，轰轰烈烈的“打虎”就变成了“打苍蝇”，无果而终。这次毛泽东打了“大老虎”，放了“小苍蝇”。进入3月份，不少地方和部门的“三反”工作开始进入收尾阶段。

这场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后，他迫切想知道人民群众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另外，久居中南海的围墙之中，他像鱼儿思念水，想和群众在一起了。

3月9日中午12时，在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见着李家骥从前院走过来，立即走过去对他说：“你快备车，我到郊外散步。不通知他们（保卫工作负责人），我们去就可以。”

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中央办公厅对他的外出有严格的规定，没有有关警卫部门的批准，他是不能随便出中南海的。李家骥在调车的同时，立即暗中向卫士长李银桥作了汇报。

按照规定，李银桥又马上向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可是，仓促之间，毛泽东要到什么地方去，谁都不知道。就在众人忙成一团的时候，毛泽东等人已经上车，发车开出了中南海。

司机按照毛泽东在车上临时指示的方向，沿着北长街、鼓楼、北池子方向疾走。当汽车驶出德胜门，快到泥土公路的时候，司机发现这里结冰的道路才刚刚开化，为了安全起见，只好慢慢地开着。这一慢不要紧，后面保卫部门的车子很快就追了上来。

因为是临时接到通知，他们弄得很被动，好不容易才急急赶了过来。

然而，毛泽东见他们撵上来了，还不喜欢，不高兴地对李家骥说：“真是没办法，怎么就甩不掉他们呢？”

尽管如此，汽车继续拼命往前开，按照“大司机”毛泽东的指示，甩掉“尾巴”，一路而去。当毛泽东喊“停车”时，李家骥等人才发现已到了郊区十四区马甸村。

这是毛泽东一年前视察过的地方。

李家骥赶紧扶着他下车。毛泽东才下车，左右一看，发现保卫的车又跟上来了，很不高兴地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车？”

“是警卫处的车。”李家骥老实地回答。

“我不是不让你通知他们，怎么偏让他们知道呢？”毛泽东说。

李家骥十分紧张，一时回答不上来。这时李银桥坐车追上来了，赶紧下车，解释说：“主席，这是我们的责任。”

后边的车和人陆续上来了。毛泽东不便再说什么。因为就他的行动范围和是否向上级汇报这些问题，警卫处过去曾和他多次交涉过，警卫员们也和他“理论过”无数次，而毛泽东总是“理亏”，警卫部门占着“理”。尽管不说什么了，毛泽东还是不高兴，甩甩手，独自快步朝一家农舍走去。

农舍的老大娘见外面来了不少人，立即从屋里走出来，请这些干部样子的人进屋。毛泽东走在最前边，像去自己家一样迈着轻快的步子。进了屋后，里面的老大爷才认出是毛泽东，激动地拉着他的

左手说：“毛主席，请快坐。”

落座后，毛泽东和老大爷攀谈起来。他看着老大爷亲切地问道：“老人家，你们生活怎么样？”

“托你的福，我们生活很好。”老大爷有点拘谨地回答。

“今年生产安排得怎么样了？”毛泽东又问道。

“都准备好了。看来今年能比往年好。”老大娘回答道。没等她说完，老大爷便拉了一下她的胳膊，带着责怪的口气说：“你懂啥！”

旁边的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以说，她也可以说。”

但老大娘还是退了下来，开始给毛泽东等倒水喝。毛泽东让她把水放在一边，客气地说：“谢谢你，我不渴，就是想和你们唠唠。”

接着，他问起了全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农业政策等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大爷说：“去年收成还可以，基本够吃。”

毛泽东问道：“你们对区政府干部有什么意见？”

老大爷回答说：“他们经常下来。对这些干部没什么意见，他们下乡来，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还参加生产劳动。”

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毛泽东觉得从这里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了，便向他们告辞说：“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情况。”

两位老人含着热泪，把毛泽东送到院子外，连声说：“请毛主席下次再来啊。”

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了。接着，他轻车熟路，非常熟悉地来到了另一个院子，边走边说：“这是小吴家。”

主人还真在家。一位年轻的农民社员见毛泽东等人来了，赶紧出来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热情地说：“您好啊，主席，谢谢您老人家在百忙中看我们。”

“我们是朋友呀！你吴文阳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嘛！”毛泽东风趣地说。

吴文阳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开：“谢谢您老人家对我们农民的关怀，我们一定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

一个国家主席，一个年轻的农民，两人像久别的老友手握着手不放，站立着，亲热地说着话。跟上来的工作人员无不被他们这种亲热场面所吸引、所感动。说了一阵子话，吴文阳请毛泽东进屋。进了里屋，吴文阳要请他坐炕上。女主人则一定请他坐炕头。吴文阳立即转脸对媳妇说：“快给主席倒水。”

“不用，我不渴，还是领我去看看你的菜园子吧。”

吴文阳便领着毛泽东来到他家屋后的菜园子。看着绿油油的菜园子，毛泽东高兴地要下腰，边拨弄着青菜边问道：“小吴，你种这么多菜都是往哪卖，多少钱一斤呀？”

吴文阳也俯下身子，拔着菜边几根小草，告诉说：“今年的菜统一卖到市场。菜价还不错，比去年高。估计今年收入能比去年好。”接着，他忍不住报告毛泽东说：“去年我们这里搞的不错，除了自己食用，还有剩余。”

“好，好，这就好，我们应该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问完生产和生活情况，他把话题一转：“小吴，你们这里搞没搞‘三反’运动？”

“我们已经开过会了，让群众提意见，揭发干部的‘三反’问题。”

“你们提没提？敢不敢提？”毛泽东问道。

“据群众反映，区里干部下来有吃吃喝喝问题，影响不好。”吴文阳不假思索地回答。

“对，对这些不为农民群众办事，还给增加困难和麻烦的干部，就应该提意见。给区里提，给市里提。”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接着问道，“你们这里的干部听群众意见是让人收集，还是到下面来当面听？”

“是区里来人，我们提，他们记。”吴文阳说。

毛泽东对小吴的坦率回答非常满意，站起身子，拍拍他的肩膀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还要到一个地方，以后再看你。”

吴文阳也像对老朋友似的说：“主席，你太忙，以后你不要到我这里，还是我到你那里去吧。”

“好，我住在中南海，你去后对门卫说是我的朋友，他们就会让你进去。”毛泽东也真诚地说。

毛泽东要走了，吴文阳才想起来留饭，赶紧说：“毛主席吃完饭再走吧！”

毛泽东说：“谢谢你，下次来，我一定在你家吃饭。”

毛泽东离开马甸村，驱车来到十四区政府所在地。区政府的干部们正在开会。突然，屋外驶来好几辆小轿车，接着有社员兴奋地喊道：“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

这一突然情况让正在开会的干部们慌了手脚，急忙一起奔了过去，和毛泽东等人又是握手又是问好，然后把他们引进了会议室。

在会议室，毛泽东听取了区里的情况汇报。

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和警卫们才返回中南海。

这次他突然“闯”出来，在外面视察了三个多小时，非常满意。但在中南海下车后，他又想起了“保卫”之事，对李家骥说：“我说话，你们就是不听，不让你通知你偏通知，而且一去就这么多车，这么多人，影响多不好。我这个人就是不自由！我这个主席谁也管不了啊！”

李家骥见他只是“感慨”语气，没有生气的责备，于是壮着胆子回答说：“不汇报，不行啊。这是给我们定的纪律。保卫你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时候毛泽东认真地看着他，问他说：“这样我就安全了？你们净搞神秘化。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井冈山时期，我出去，也没这么多

人！就差你们没给我净街开道了，兴师动众，你说这是不是也要反一反‘浪费’！”

“主席在秋收暴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北京和到全国各地视察，一直都是伴随着生命危险的，阶级敌人一直想谋害的。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看到革命领袖为人民创大业，是多么艰难。”李家骥接着说，“阶级仇恨是凶残的。阶级利益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是难以调和的，所以你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毛泽东听他人小鬼大地讲起了大道理，忍不住笑着说：“既然要斗争，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胜利，一种是失败。列宁同志就说过：‘失败不属于工人阶级。’我也讲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力量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革命都胜利了，我还怕什么呢！”

“革命领袖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列宁在1918年就挨过敌人的黑枪，虽然没死也是被打伤了。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李家骥反驳。

“这些都是你们领导说的吧。”毛泽东只好说，“我不怨你，都是你们领导让你这么办的。”

李家骥见他没再批评的意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毛泽东为什么要独自出走呢？其实就是想见见群众，与老百姓们说说话，聊聊天。他在中南海不是天天也可以见到很多的人吗？说说话聊天有的是人呀！确实如此。但他要见的、希望见到的，不是高级干部，也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更不是资本家，而是人民，是群众，是中国最普通的劳苦大众，是田间地头的老百姓、掏粪拉车的车夫。他离不开他们，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好久不见他们心里就难受。可受制于中南海的警卫制度，他居然选择“突然出走”方式去见“水”，去田间地头！这又是多么有意思的举动啊！

伟人也有天真的一面。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谈起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时说：“他总是带着令人惊讶的纯真，像儿童般

的天真，而又桀骜不驯。”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毛泽东的天真是博大的天真，是闪着理性之光的天真，是心系劳苦大众的情怀的不自觉显现，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思想的无意识反映，是希望天下劳苦大众尽快迈向幸福之路的政治理想最朴实的行为外现。

人民，是毛泽东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怀。

15.毛泽东为育英小学儿童节题词：“好好学习”

很多年，在中国各地的大小学校都流行一句这样的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以说，这是史上师生们用得最多、说得最多的“励志警句”和“年度热词”。仔细体味，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确实很有水平，意境深远。能说出这样妙语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它承载着他少年儿童的关怀，也是他对孩子们殷切的期望。这句话正式公开流传出去，不是最初的版本，而是好几个版本后的一个“民间加强版”。

少年儿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孩子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每年4月4日定为儿童节，毛泽东热情支持它。1942年4月4日，他特地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春节——1946年春节，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师生到杨家岭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欣喜地接见孩子们，并

亲切问他们说：“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呀？”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当八路军，打蒋介石！打胡宗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对！准备打敌人好嘛，可是那个时候蒋介石胡宗南大概早就被你们的父母打倒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建设新中国。”

在旁的周恩来怕学生未听懂，便插话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盖工厂，造机器，办学校……”

这与其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革命胜利寄予了极大的信心，不如说他们对孩子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经过短短三年，这些孩子们还在学校继续读书，他们所言就成为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政务院决定采用国际通行的每年6月1日为儿童节。1950年6月1日是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毛泽东欣然挥毫题词：“庆祝儿童节”，随即发表在当日《人民日报》上。“庆祝”二字，恰当地表达了他对于这个节日的喜悦之情。

步入1952年初夏，新中国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就要来临了。新中国，新儿童，新希望。全国各地各级组织和单位非常重视，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学校和孩子们表示节日的祝贺。

这时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正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

育英学校是一所新学校，始建于1948年冬，原在河北建屏县下东峪村，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很近。学校刚建立时，直属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名为供给部小学。1949年3月，随中央机关迁入北平后，安置在海淀区万寿路，由中央办公厅直属。六一儿童节前夕，校长韩作黎交给了李讷一个任务：请毛泽东为育英学校写一个题词。

星期六下午，李讷带着这个任务乘坐中央机关接送学生的大轿车回到了中南海家里。她知道父亲工作很忙，平时不轻易去打扰，在毛泽东睡觉或休息时也不大声说话。但她也是一名好学生，校长交

给了任务，觉得很光荣，决心一定要完成。

可是，毛泽东一直很忙，李讷很久都没见着他。

到了星期日下午，眼看就要去学校了，李讷任务还没完成，于是在父亲办公室门外转来转去，犹豫不决，进去吧，又怕影响毛泽东办公，不进去吧，又完不成任务。这么迟迟疑疑，转了好久，实在忍不住了，便轻轻推开门，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办公桌上堆放着许多文件，还有办公用的红格纸和白宣纸。他抬头一看，发现李讷站在旁边，亲切地问道：“你来有什么事情吗？”

李讷把韩校长请他题词的事说了。

“好！”毛泽东马上答应了。

接着，他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 16 开的白宣纸，站起身，拿起毛笔，点上墨汁，挥毫在纸上右边写了四个字：“好好学习”。写完后，他看了看，似乎觉得字有些小，不太满意，又在纸左边用浓墨大笔写下“好好学习”，这几个字显得遒劲有力。李讷看着写好了的题词，高兴地跳起来：“这回可完成了任务。”

然后，她用纸把题词裹好，坐中央机关送学生的大轿车，小心翼翼地带到了学校。

来到学校下车后，她没有去宿舍，而是直接奔韩作黎校长办公室。校长在里面，她敲门进去后，把题词拿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校长。韩作黎看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兴奋地笑了，夸奖李讷说：“任务完成得不错，要表扬。”

六一儿童节的前夕，李讷所在的中国少年儿童队中队，以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为内容，开了主题队会。小队员们十分高兴，纷纷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做新中国的好儿童。

为了让毛泽东题词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奋发向上，韩作黎又

决定把这几个字复制在学校挂起来。于是，学校请人把字复制在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上，白底红字，悬挂在学校礼堂大门口平台上。教学区的走廊也挂着“好好学习”大红条幅。随后，学校在办公楼的墙壁上也挂上了镶有“好好学习”字样的镜框。不久，韩校长还意犹未尽，又把毛泽东的题词镌刻在校门迎面的高大影壁上。每当曙光初照校园时，学生们走进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好好学习”四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它也像甘泉雨露一样，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鼓励他们去好好学习，准备报效祖国。

育英小学把“好好学习”张贴出去后，其他一些学校知道后，觉得很好，也复制过去，在学校挂起来，于是“好好学习”“热”起来。

可是，很快一些人发现似乎总觉得少了一边，要是再添上半句话就更好了。于是他们开始在寻找。毛泽东对少年儿童寄予无限希望，时刻关心他们的成长，不止一次为孩子们题词。1940年4月，他曾为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1949年9月25日，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好好学习”；1951年国庆节，他为马毛姐题词将它们结合起来（遗憾的是，马毛姐回去后没公开这个题词，几乎没几人知道）。“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两幅题词联成一体，简明易懂、琅琅上口，而意义高远，堪称一对绝妙的题词。一些人找到“天天向上”后，便把它们合起来。结果，众人赞叹非常好。

这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流传出去了。两句话深受少年儿童们的喜爱。几十年来，它一直为中小学励志口号悬挂，没条件的农村学校则把它书写在墙壁上。这八个字，成为新中国亿万孩子努力奋进的座右铭，激励着他们努力学习，茁壮成长。

但是，谁也不知道它的流传，其中还有时为小学生的李讷的一份功劳哩！

本章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毛泽东文集》(第五至第八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4. 《毛泽东传》,罗斯·特里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5.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
6.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李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7. 《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武原主编,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8. 《毛泽东一家人》,赵志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9. 《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10. 《跟随毛泽东纪事》,武象廷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1. 《毛泽东的足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12. 《毛泽东与青年》，冯文彬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3. 《毛泽东与中国农业》，郭书田主编，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14.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15. 《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李家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16. 《领袖泪》，权延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
17. 《生活中的毛泽东》，于俊道主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18. 《毛泽东与首都人民在一起》，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19. 《毛泽东在安徽》，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20. 《毛岸英》，杨大群著，沈阳出版社 2001 年版。
21. 《聂荣臻》，本书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22. 《黄炎培》，尚丁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3. 《黄炎培年谱》，许汉三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24. 《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张素华著，载《炎黄春秋》2010 年第 7 期。
25. 《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经过》，董少东著，载 2011 年 5 月 17 日《北京日报》。

治国录

毛泽东与 1949 年后的中国

第二章 完善与起步

毛泽东思想解决了贫穷的中国遇到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这正是奇迹之所在。这一学说对中国群众——别忘了他们是人类的四分之一——有特殊的影响。

——突尼斯《行动报》

1. 治国从治水开始

毛泽东等人革命的理想，不是为个人打江山，也不是为少数人坐江山，而是要实现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们孜孜追求的国富民强的夙愿。

在近代两三百年中，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发端于欧洲的世界近代史，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节点作为时间标志。在这个时间体系里，中国是一个落后者，在西方世界眼中是一个轻轻一推就会倒下的“泥足巨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过是一个刚刚从百余年受压迫、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中走出的国家，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这是 1949 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国内境况。

有人说：“中国比西洋落后，从毛泽东开始，中国开始追赶世界。”这句话确实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他有力的大手拨动了中国前进的车轮，启动了这个有着辉煌文明历史的民族追赶世界的脚步。

这个起步是随着朝鲜战争、土地改革运动步入尾声而启动的，并且是从毛泽东治水开始的。

中国一直是一个频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建国之初，华北、华中等

地漫发大水，造成河北、安徽和华南等地不少人无家可归。1950年初，毛泽东发出“根治淮河”的号召，7月至9月，他连续五周每个星期发出一封电报，对水利部、苏皖豫三省的治淮工作进行部署，结果，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修成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被毛泽东和新中国人民套上了缰绳。1949年夏，荆江——长江流经湖北枝城到湖南北部城陵矶一段险情频发，无数的生命和财产被洪水无情吞没。毛泽东在下令救灾的同时就下定了治理荆江乃至长江的决心。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国庆期间，毛泽东专门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汇报。但是，对于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却有顾虑。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说，荆江分洪区等于在洞庭湖上顶了一盆水，万一溃口就要水淹湖南，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等于自己淹自己。最后，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后，各方面才达成肯定的一致意见。1952年分洪工程建设竣工。又一条猖獗千百年的水龙，被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缚住了。

各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村生产关系得到极大解放，但时不时的大水灾往往又使得农民们一年劳作的收获归于零，尤其是“黄河三年两决口”，水患严重，害得两岸人民难得安宁。不治理水患，还是不能保证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进入1952年，全国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毛泽东要求加快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编制。9月，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从现在起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准备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

为了迎接这个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对全面建设的宏伟规划进行酝酿、筹划，10月最后的几天，毛泽东利用党中央给的休假时间，

乘坐一辆专列，离开了久居的北京城。

毛泽东开始了第一次南下，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

专列在华北原野上奔驰，到达徐州车站时才缓缓停下来。毛泽东下车，伸了伸手，活动了一下坐久的腰身，然后走出车站，在门口登上等候在此汽车，就带着一些干部前去察看黄河故道。

黄河万里长，横贯九省，是中国第二条大河。由于泥沙含量大，黄河下游河床逐年淤积抬高，成为“地上悬河”。几千年来，下游屡屡决口改道，泛滥成灾，波及北至天津、南到江淮 25 万平方公里土地，严重威胁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毛泽东此行考察黄河，就是想治理黄河水患。

众人先来到了云龙山。毛泽东登上山岗，极目远处。陪同的地方领导向前方指了指。毛泽东顺着他们的手势，眯起双眼，用力探望，脸色渐渐微笑开来：“哦，那就是黄河故道。”

离开徐州后，毛泽东等人溯河而上，到徐州、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对黄河进行实地考察。

10月30日一大早，毛泽东的专车停靠在兰坝支线上。当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天空变得特别晴朗。6点30分，毛泽东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等人下车了，向着西北方的农田走去。

他们走到黄河铁桥南岸。毛泽东驻足朝四面远眺，发现邙山脚下有一排排窑洞，立即兴奋起来，用手指点着窑洞，深情地说：“我们去家乡看一看吗？”

他说的“家乡”是指陕北窑洞，此刻的意思是去那些窑洞看看老乡们。随即，他就迈开步子，和随行的几人一起朝着相距一二里之遙的村庄走去。一会儿，众人就来到了村边。在村边打谷场，毛泽东遇上一位早起的中年农民，亲切地与他说起了话，问道：“今年收成

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负担怎么样？”

那位农民兴奋地回答说：“今年年成还好，只有豆子收的薄。”当即抓了一把豆子给毛泽东看，还告诉说：“我们的生活比过去一年好一年，负担也不重。”

毛泽东闻言笑了，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正谈着，聚来了一些村民，有老的有少的，大家望着毛泽东笑。一个孩子笑着指着毛泽东说：“我家里还有他的相片哩。”

毛泽东听见了，也笑着向他们打招呼。

谈完话，毛泽东等人向东走去，来到了一个农民家里。这是一户贫农，大门朝西，院子很干净，靠东边墙垛着新收的柴禾，有三间坐北朝南的草房，老两口过日子。早晨老头儿进城买东西去了，老大娘正在院里忙着收拾玉米。毛泽东停足后，用手摸着粗粗的粮囤，便开始和老大娘交谈起来，亲切地问道：“今年收成怎么样呀？”

“还可以。”老大娘回答。

接着她又补充说：“这里土质不好，盐碱地多，有的庄稼收成不好。”

“够吃吗？”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能吃得饱呀！”老大娘回答。

毛泽东点了点头。老大娘带着众人一起进了屋子，顺手取下馍馍篮子，还指着床上的被褥，请毛泽东来看。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是来看看你的。”

这时老大娘可能认出眼前的人是毛泽东，赶忙端来烧的开水，双手捧着水碗，送到毛泽东面前，请他喝水。卫士李家骥见状，急忙送上自己随身用暖瓶带来的饮用水。

此时全国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斗争激烈复杂，社会治安不好，时常有坏分子搞破坏。毛泽东出巡前，周恩

来反复叮嘱过保卫人员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然而，出了北京城后，一路上，毛泽东对安全问题却并不在意。这反倒弄得警卫人员很紧张，生怕发生什么不测。此刻李家骥送水，谁知毛泽东当即就用大手推开了他的水杯，深情地接过老大娘的开水，然后喝了起来。

众人看到这一动人情景，深感人民领袖与群众心连心，也都很高兴。老大娘见毛泽东喝了自己送上的开水，高兴地笑了，突然高声地问道：“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呀？”

解放后，由于学习苏联，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名字在全国妇孺皆知。然而，老大娘冒昧的问话却把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逗乐了，也把众人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汪东兴格格地笑个不休，罗瑞卿也不禁笑着说：“哈，这老太太还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呢！”

毛泽东也由衷地笑了，大声地告诉老大娘说：“他没有来，人家在苏联的莫斯科呢！”

毛泽东和老婆婆又谈了一些家常话，才辞别走出来。正当这时，院里的另一位主人——老大爷背着褡子由城里赶回来，跨进了门，看见毛泽东向外走，惊喜地交叉着两手，连忙说：“再在我这儿歇一歇。”

毛泽东含笑说：“不坐了。”

老两口和聚集在门外的人恋恋不舍地把毛泽东等人送到村边，望着他们走了很远才回去。而跟随毛泽东的众人也好久好久都还谈论着老大娘询问毛泽东“斯大林来了没有”的趣事。

这是非常亲切和愉快的难忘一幕。若干年后，随行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回忆此事仍然深情地说：“我看到这个情景也很开心，同时也被毛主席轻车简从、深入群众的好作风所感动。这种好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所有干部认真学习！”

早餐后，停靠路边的专车开始向东坝头方向徐徐前进。毛泽东

和随行人员谈话，了解河南农民、农村的情况和变化，询问治理黄河的进展情况，问大家对治本有什么打算，还谈起了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事情。他看着大家说：“这个大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了，还能灌溉平原的几千万亩农田，发电100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火车在晨风中疾驰。毛泽东等人一路上都在谈论着河南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如何搞，下一步建设如何拉开。11点10分，专列到达东坝头。众人下火车后，换乘汽车向黄河边疾驰而去。不久，雄伟的大堤就堵住了去路。

毛泽东下车后，健步向堤上走去。

这里的堤段比较宽阔，堤面上堆了许多备用的土方。防汛人员正在检修堤坝，民工们三三两两在抬土、打夯。有几个技术人员手持一根三米长的钢棍，正向堤面深部刺下去。毛泽东见着有些不解，问随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王化云立即招呼一位工程师模样的技术人员过来：“你给毛主席汇报一下，这是在干什么。”

技术人员见是毛泽东，却有些紧张，边模仿打洞的动作边报告说：“这是在探鼠洞。鼠洞是黄汛期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鼠洞多了，洪水一来，灌进鼠洞，堤面就会软化下塌，导致决堤……”

小小的鼠洞看来却不是件小事，毛泽东更加详细地询问：“怎么个检查法呢？”

技术人员又就近招呼一个正在探洞的工人过来，接过钢棍给毛泽东做示范，边做边说：“我们用双手将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如果遇到鼠洞，就有空空的感觉，这样来回地刺……”

“知道有鼠洞，又怎么办呢？”毛泽东兴趣不减。

“有鼠洞我们就将钢棍刺入的洞搞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

灌进去，让它填满。这样来不及逃走的老鼠就会被浇固在洞里，水泥一干，也就加固了堤坝。”

“好，我来试试。”毛泽东说着，饶有兴趣地从他手中接过钢棍，把袖口一卷就试了起来。看来这个活并不费力，不到两分钟，他就在堤坝上打了一个洞，有一米多深。然后，他提拉了几下，说：“可以，这个办法简便易行。”

接着，他又表扬了技术人员几句话。技术人员满脸泛红，说话也自然多了：“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还来我们这里取经呢。”

毛泽东也笑了。

他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张望，用手指了一下，问王化云：“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西坝头。”

来这里之前，毛泽东看过不少关于黄河的历史资料，他问道：“清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是在哪决口的？”

“就在这东坝头。”王化云肯定地说，接着又告诉说：“这里叫铜瓦厢。”

毛泽东细细地察看了石坝和大堤，问王化云道：“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

“全河修堤 1800 公里，修坝近 5000 道。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这些埽坝大多数是秸料做的，很不坚固，现在都改成了石坝。黄河就再没决口泛滥，今后再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王化云说。

“黄河是否还会决口呢？”毛泽东关切地问。

王化云说：“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黄河涨上天’怎么样？”

在火车上的时候，王化云向毛泽东报告过一首形容黄河水的陕

县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走万锦滩。”此刻他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记住了它，立即告诉说：“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说话间，众人一起来到了杨庄险工地段，再从坝上下来，便走进了杨庄村。毛泽东看了村子里老乡打谷场上晒着的花生和垛着的谷子、豆子，随后还在村小学教室窗子外面，“偷偷”听了一会儿年轻教员给孩子讲世界和平大会的情形。离开时，他满意地说：“老师讲得还不错。”

他们没有惊动当地的群众，“微服私访”了一阵子，就返回去了。

众人回到火车上后，专列又开回兰封车站，向着开封方向行驶而去。在奔驰的列车上，毛泽东继续询问、了解黄河的情况。王化云等人特地报告了勘察队行走万里、勘察黄河源头的情况，并且说：“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他们还勘察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情况。”

毛泽东笑着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毛泽东一面和众人畅谈着黄河，一面不忘透过窗子看一看外面大平原上的深秋景色。在聊天式的谈话时，很快，开封城高耸入云的雄伟铁塔渐渐映入了眼帘。专列进入开封车站停下了，毛泽东等人下车换乘汽车，驰往柳园口堤坝，继续考察黄河。

开封城北门外是与城墙齐高的沙丘，这是历史上黄河淹没过这个古老城市的陈旧痕迹。汽车在沙路上行走，过了护城堤，便远远看见由西向东北蜿蜒千里的大堤。不多时，汽车就开到大堤跟前，由堤脚爬到了堤顶。毛泽东从汽车中走出来，漫步在两行柳林夹着的堤

面上，大步地踏着如茵的绿草，向西走着。

突然，他弯腰拔了一根草问道：“这是什么草？”

随行一位干部回答说：“这叫葛芭草，群众在堤上种这种草来护堤。群众说它的好处是‘堤上种上葛芭草，不怕雨冲浪来扫’。”

而熟悉农家生活的毛泽东的思绪却想得更远了，笑着说：“喂牲口也是好东西。”

他驻足站在大堤上，远眺了四周。大堤北边的黄河在地面上奔流着，而大堤南边的村庄树木、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高大的杨树梢还比大堤还低，他不禁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河面比开封城里高不高？”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回答说：“这叫柳园口，斜对岸是陈桥，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地方，现在这是渡口。”

“这里水面比开封城地面高三四公尺，发洪水时更高。”王化云接着说。

“这就是悬河啊。”毛泽东感叹。说完，他下了大堤向河边走去，沿黄河边再折向东方，接着弯腰抓了一把泥沙细细地看，又问：“这是什么地方来的。”

王化云说：“都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冲刷下来的。”

“有多少？”

“据陕县水文站测验，年平均一年就通过该地到下游 12.8 亿吨，由于大量泥沙的淤淀，成了黄河改道泛滥的根源。”

他们边谈着话继续向东走，见着一只很大的摆渡船停在那里，毛泽东与众人登上了木船。他又问船工道：“这船如何使用，需要多少人驾驶？”

有船工回答说：“横渡过河用，使用艄锚和橹，二三十个人驾驶着才行。”

“能否装机器？”

“能。”

毛泽东看了一下就下了船，看到船工们正在旁边修理船，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工人们都笑着——回答了他的“问题”。

毛泽东等人考察柳园口堤坝后，回到开封城，一起参观了城内北宋时建筑的铁塔，又转到龙亭瞭望开封古城。回到住地时，西方已露出暮色。虽然从早晨到此刻已经活动了十一二个小时，可毛泽东仍然精神饱满，笑着说：“这还该怎么办？”

众人一齐笑着回答说：“该请主席休息休息了。”

毛泽东于是回专列了。

第二日早晨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他就已坐到专车客厅里了。河南、平原两个省委和其他部门负责人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王化云等人闻讯他要走了，赶紧来到车上。吴芝圃代表大家说：“请主席对工作再做一些指示。”

毛泽东吩咐他们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治好黄河。”众人回答。

一会儿，专列发出了开车的讯号，毛泽东亲切地向众人招手。大家也高举着手，向毛泽东致敬，眼睛望着西方，一直到看不见专列才回去。

治理黄河是为人民造福的一件大事。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一简短的嘱咐表达了治理好黄河的愿望，也发出了战天斗地的伟大号召。随后，这个口号成为沿黄两岸人民的精神力量，鼓励他们艰苦奋斗，去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局面。消灭千年水患也成为两岸人民迈向新生活的起步。

毛泽东离开开封之后，又去了郑州、新乡等地，最后经安阳回到北京。11月1日，在返回途中，毛泽东执意要在岳飞故乡汤阴站下

车,去看岳庙。在岳庙,他对《岳忠武王故里》碑产生浓厚兴趣,仔细观赏后,小声念起碑文:“宋岳飞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一字一句读完碑文。

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告诉他说:“据我们所查,岳家后代没有一个当过汉奸的。”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岳飞是个大好人,岳家又没有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这时,共和国百业待兴,毛泽东视察黄河之行,拉开了治黄工程的序幕。治国先治水,毛泽东以治水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步工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大智慧。治黄治水才能解决水害,解决水害也是搞好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难题的举措。几个月后,步入了1953年,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转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毛泽东在再次南巡时又召集王化云等人,当面交代说:“历代王朝都治黄河,但都没有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接着说:黄河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连年征战、乱砍乱伐造成的一条害河。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河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放纵奔腾,搞不清会在哪里闯乱子,使多少万人马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让它出乱子,不然,我睡不着觉。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治理黄河。在他的指示下,周恩来随后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之一。不久,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而国内有关部门已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历史四个月,对黄河现场进行大查勘,最后决定以修筑三门峡坝为基础,综合解决黄河的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治理黄河的伟大工程成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个主要部分,在中国追赶世界的步伐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治水传统与华夏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历代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治理千年的水害、缚住水龙,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重要策略,也是新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有能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决心的行动。实际上,淮河、荆江和三门峡等几大水利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建设和工程的第一步,后来有人说:“毛泽东治国是从治水开始的。”此话也不无道理。

2.“死缓”,毛泽东的一个政策创新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国家建设是和社会改造相伴而行的。改造和建设是各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人的思想和作风等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的庞大工程。毛泽东没有顾此失彼,没有遗漏一个方面。而在毛泽东领导的这种改造中,美国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建立自我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①

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是建设性的——即通过建立自我意识来实

^①《毛泽东》,斯图尔特·施拉姆著,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现——凡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是只发号召、造声势、喝令人家去做，自己再来听汇报，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干部们自己带头，以自我的行动起模范作用，从而带动全社会的转变。

因此，这样的转变是最有效的，改造社会往往能够立竿见影。其中，担负治安责任的警察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毛泽东治警，抓住了两名公安局长作为典型。

新中国成立初，残匪和敌特疯狂进行暗杀、破坏，人民政府被迫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对土匪的清剿也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旧中国土匪横行，蒋介石统治几十年不仅没使得土匪根绝，而且弄得遍地是匪。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躲藏的土匪不时冲出来捣乱，结合土改运动，人民政府展开镇压反革命和清匪反霸斗争。清除这些为非作歹、打家劫舍的“社会残渣”和破坏分子的工作，各地主要是由当地人民政府依靠公安局进行。

清除社会隐患和不安定因素，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在领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在该捕该杀问题上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认为光提出杀人不能太多，要控制杀人数量，还是不够，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在制定具体政策界限中，他准确地抓住一个关键点：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1951年春，他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提出说：“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对于这样的处置，他又认为事关重大，建议公安部将这个问题

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去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他把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同意这一设想。这样，在党中央内部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作出了决定。5月8日，毛泽东代党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其中，指出：“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并且规定判处“死缓”的比例——在应杀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并且强调“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中央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并形成《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经过毛泽东逐字逐句修改、批准发出的。

这样，毛泽东关于设立“死缓”刑名问题确定下来，这一刑名一直被中国法律所沿用。

“死缓”是毛泽东的一个政策创新，是为了少杀人，不杀人。当年白崇禧在广西剿匪时，就是靠大开杀戒，使出铁腕才镇住那些土匪。毛泽东不杀人，少杀人，能有成效吗？事实却恰恰证明：他的不杀、少杀政策，更是成功解决土匪和敌特的好办法，用之来改造社会更有

成效。结果，经过几年卓有成效的工作，旧中国千年不绝的土匪祸害被中国共产党人荡涤殆尽，反革命分子也基本铲除，于是各地进入了复查阶段。

正在这个时候，1953年1月30日，毛泽东却罕见地发怒了。当日，他看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呈送的《关于湖南省益阳专区桃江县在镇反复查中刑讯逼供，辗转株连，造成假案的严重事件》给政法分党组并中央的报告时大为生气，当即批示：

刘、周、邓阅，送交罗瑞卿同志：

像湖南桃江县公安局长高富江、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这一类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可能还有一些，以前也有湖南邵阳某区乱杀多人，平原内黄公安局长违法乱纪等重大事件发生。请你考虑收集一些生动例证，加上一篇导言，印成一本小册子，发给各省县公安厅长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使他们具有作为一个公安局长的起码常识，以免再有这样毫无常识的人当公安局长。

毛泽东

1月30日

毛泽东不仅把这份报告转批刘少奇、周恩来和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阅，还要求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处理，并变成一个小册子教育警察。

桃江县公安局局长高富江和通渭县公安局局长苏朋，执法犯法的“例证”，一下子成了全国各地公安局局长接受“一次教育”的典型“教材”。毛泽东的批示虽然只在一定范围内传达，但“根本不像样子

的公安局长”批语还是不胫而走。

一时之间，“苏朋事件”成为甘肃天水专署下辖的通渭县这个陇上小城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

苏朋，山西省沁县人，当过国民党沁县警察局警长，193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他随军西进，出任甘肃省甘谷县磐安區区长；1950年12月调任通渭县公安局局长，次年兼任县人民检察署署长。

1951年2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通渭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谁知在这次运动中，县公安局局长兼人民检察署署长苏朋拿出当初在伪警察局那一套，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通渭县在不足一年时间内，接连发生四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终于引起了上级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

1952年8月，西北检察署、甘肃省公安厅和天水地区检察分署、天水地区公安处共同组成检查组，对四案进行调查核实，结果震惊地发现“中立军”案完全属于假案，14人都是错捕；“吊伐同盟委员会”案，只有魏登泰一人是案犯，其余14人均系错捕；“捍国军”案，一人有犯罪事实，3人有重大嫌疑，1人因刑致死待查，其余22人系错捕；“西北工作指挥部”案中不含省公安厅批捕者，另18人均系错捕。

这些错案，全是苏朋不执行党的政策，采取旧警察局那一套，大搞刑讯逼供，违法乱纪造成的。在审理案件时，苏朋采取诱供和指明问供等不当手法，派侦察员到邻县取证，也是让证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写出材料，令其签名盖章；在审讯时，他又指使审讯人员“笔下灵活”，把不承认的供述写成承认，强行盖上指印；结案时，由于审讯材料破绽百出，他下令审讯人员代替受审者重新编写“反省书”，不惜

亲自进行修改。办案中，他还欺上瞒下，甚至造出两套卷宗，一套是应付上级的公开卷宗，一套是自己留用的秘密卷宗。对于提供情报者，符合自己意图的，便喜形于色，称之为“好干部”、“英雄有为”、“模范人物”；反之，则怒目而视，大骂“无用”、“草包”、“同情敌人”。

当检查组有人对他的作法提出批评或规劝时，他振振有词：“贼口硬如铁，我们就是要这样搞！”

但是，新中国已不是旧中国，旧警察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检查组核实情况之后，决定立即纠正苏朋的错误，为错抓的人员进行平反。

11月下旬，万人群众大会在通渭县城体育场召开。会上，甘肃省公安厅和天水地区检察分署、天水地区公安处工作组宣布68名错捕者无罪释放，给他们发放冤狱费，为死者家属发放抚恤费。并且，通渭县人民政府县长马文杰和苏朋在大会上当着几万人的面作出深刻的检讨，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赔情道歉。

此事发生后，也引起了中央西北局的重视。西北局检察署将“苏朋事件”整理成文，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953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将苏朋及湖南省桃阳县公安局局长高富江等违法乱纪的典型材料报告中央政法分党组并党中央。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雷霆，还亲笔作出批示，罕见地写上了“根本不像样子”、“毫无常识”等严词厉语，并且还公安部要求编书，作为反面教材去教育公安局局长们。

事后，毛泽东对这两件事还感慨万分，对卫士李银桥谈起高富江和苏朋案时说：“银桥，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

“我不知道啊！”李银桥老实地回答。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毛泽东说，“春秋时期，山东有两个诸侯国齐国和鲁国。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鲁国的国王当时是鲁庄

公，他当国王当到第十年的时候，齐国发兵来打鲁国，鲁庄公准备发兵抵抗。有个知识分子叫曹刿的去见鲁庄公，问他打仗会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鲁庄公回答说我对鬼神很敬重，鬼神必然会庇佑我，曹刿说，鬼神的事很难说清楚。鲁庄公又说我平时有什么东西总爱分给大家，曹刿说那是小恩小惠，没有什么了不起。鲁庄公又说我对于所有的案件虽然不可能每件都办得十分好，但总是尽量弄清楚，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曹刿说凭这一点你肯定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肯定会打胜仗。结果弱小的鲁国果真打败了强大的齐国。银桥，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李银桥点了点头。

毛泽东说：“那两个公安局长确实不像话啊！这样的人一多，我们就会渐渐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啊！”

这时苏朋还在当着公安局局长呢。毛泽东发雷霆、斥之将“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后，3月30日，甘肃省检察署决定将苏朋依法逮捕。4月6日，党组织开除其党籍。4月30日，省检察署向省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3日，甘肃省人民法院判处苏朋有期徒刑两年。

毛泽东的批示和对“苏朋事件”的严正处理，在通渭县公安局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通渭县的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热泪盈眶，向着毛泽东画像鞠躬致敬。

在毛泽东批示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公安部党组十分重视，立即开会进行讨论，决定向全国公安机关传达毛主席指示，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检查和斗争，坚决克服错误。与此同时，公安部着手收集例证，编印小册子。经过10个月的收集查证，共收集16个生动案例，加写一篇导言，于11月1日正式印发全国。小册子就名为《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通知指出

编印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是为了教育全国公安干部,提高思想、政策和业务水平。小册子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关于乱捕乱押、刑讯逼供、夸大化、制造假案的案例;第二部分,是关于反对违法乱纪、国民党旧警察作风和管制工作上的强迫命令、乱管错管方面的案例。小册子的卷首刊载了毛泽东的批语,并有公安部撰写的导言。毛泽东批语中提到三个县公安局局长的案例,即《湖南桃江县“保产党”案》、《甘肃省通渭县“袁俊山特务”案》和《前平原省内黄县公安局副局长刘俊德等蜕化堕落敌我不分》均收入小册子内。

这个小册子发到县公安局局长一级。为了切实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好教育工作,公安部决定以这个小册子为基本教材,由公安部、大行政区公安局和省公安厅负责,在普遍培训县公安局局长时列为基本课程之一,普遍教育一次。

小册子印发后,引起了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干警的高度重视。在国民党时期,警察之坏可谓是臭名昭著,他们有一个绰号:“警匪一家”。这是新中国最早的铁腕治警,在毛泽东亲自发动下,对刑讯逼供等国民党军警的做法进行了彻底否定。各级公安机关学习小册子,经过认真的检查,进一步揭发出许多类似的错误,通过深入的学习和教育,全体公安人员,从上到下,都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大大提高了公安人员的思想、政策、业务素质,改进了工作质量。

事实上,社会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改变,只有确立了新的社会思想观念,才能真正地改变旧人,塑造新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人的思想改造。这次从严治警就是改造公安机关作风,塑造新人的一场社会性变革。莫里斯·迈斯纳评论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改造说:“共产党说‘思想改造’是一种‘教育方法’,是通过连续的批

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思想转变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重要而有特色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这种方法首先不是被看做一种惩罚形式——虽然有时被用于惩罚的目的或最后导致惩罚的结局,但是主要是作为一种产生‘正确思想’的‘教育’工具,这种正确思想随后会带来正确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① 确实是如此。经过两年的奋斗,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出现了新面貌,警民关系进一步密切,涌现一大批模范人民警察和模范治安保卫员,全国治安形势空前好转。1956年,全年发案率只有万分之二点八,是历年最低的,全国人民欢呼中国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3.大年初一南下调研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既创造了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承受着百余年山河破碎、丧权辱国的巨大痛楚。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有着如此强烈的复兴意志。追赶世界,把国家建的更加富强,毛泽东等人认为中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

作为一个后发追赶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发展的困境典型地反映出人类现代化的困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运动出现以后所拉

^①《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开的巨大“历史鸿沟”，更深刻地包含着两个重要的逻辑——一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不会像圣火一样自然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递，相反，早期现代化国家的进步还往往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并会对后来的追赶者进行阻止和围剿。二是后发型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途，起步是很低的，受困于底子薄，积贫积弱的穷境地。因此，只有通过时间的加速度实现跨越性发展，才能追赶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毛泽东和新中国的领袖们决定用改天换地的双手，拨快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北京时间”。

然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面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现代化更为严峻的挑战。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完全是一副贫穷落后的烂摊子。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7%，重工业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全国80%的人是文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许多地方仍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毛泽东曾经感叹说：“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就是共和国贫寒的“家底”。而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还没远去，西方国家就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封锁者宣称，“共产党政府只有‘鞭炮的胜利’，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

毛泽东等人面临内外的严酷的环境，表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代化运动的两个巨大“历史鸿沟”，新中国一个都不少，困难很多。

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等不靠，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去奋起直追。

早在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方针，表示一旦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国

家就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设想。在他和战友们真抓实干下，虽然朝鲜战争还在断断续续，国内各项工作却突飞猛进，不到一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1952年12月1日，毛泽东以党中央名义发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作着各项的准备时，再次告诉人们说：“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并且指出：“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他以工作决定的形式把“准备国家的大规模建设”的计划公之于众。“国家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的目标使得各地干部群众充满了憧憬。

一年之计在于春。毛泽东不是坐等未来的人。

1953年2月14日，是农历大年正月初一。新年伊始，毛泽东像劳作惯了的农夫一样坐不住了，初一晚上就带着身边的人员乘坐专列南下，开始了新年的工作。

他这次南下出行，是为即将拉开序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再一次进行调研工作。

次日，华北的天气一派晴朗，春意融融。河北省古城邢台到处张灯结彩，洋溢着春节的欢乐气氛。上午9时许，邢台地、市、县三级干部正在六合居饭庄联合举行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火车站电话通知地委书记李吉平：“有紧急任务，和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马上去车站。”有什么紧急任务呢？李吉平来不及细想，对其他干部简短作了一下交代，便和张玉美乘上一辆前来迎接的美式吉普车，急急赶去车站。

两人一下车，就被站长迎进了候车室。李吉平问道：“有啥事情？”

“具体内容不清楚，上级只让通知你们来车站等候。”站长说，“是通过铁路专线来的通知。”

张玉美突然想起昨晚县里曾组织科长以上干部进行夜间护路，防止坏分子搞破坏，猜想是否与这件事有关呢？可转而一想，组织护路是常有的事，再说大年初二能有啥要紧事儿？可听说是铁路专线下来的通知又觉得必有什么急事大事。正在她纳闷时，忽然一列浅绿色火车由北往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就走下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省委副书记马国瑞。

马国瑞和李吉平握手后，就问道：“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张玉美告诉说：“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在旁边的罗瑞卿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他要找张玉美做什么呢？

张玉美登上火车，被带到了接待室。马国瑞让她坐下，还给倒了一杯水，然后说：“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告诉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作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张玉美一听自己给毛主席汇报工作，顿时惊喜万分，可仔细一想，给毛主席汇报，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事先没一点准备，自己文化水平也不高，立即脱口而出说：“我能汇报好吗？‘三反’‘五反’运动刚结束，我来时很仓促，身上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火车？”

“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你买。”罗瑞卿笑着说，“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就如实讲什么好了。”

张玉美赶紧问他：“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啥内容吗？”

“这个问题不大好说。这是主席新年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要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一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情况，主席一向非常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

随后，他又告诉张玉美说：“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到前边会议室等吧。”

于是，众人一起走进车厢的会议室。

所谓的“会议室”，不过是一个车厢，工作人员在里面挂了一些古画装饰，右侧摆着拼成丁字形的长桌，铺着白布，两侧放着整齐的沙发坐椅。会议室既朴素大方，又清洁雅致。罗瑞卿介绍张玉美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说：“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张玉美抓住这个空隙正要思考全县工作，忽听到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罗瑞卿轻轻地说：“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随即，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众人立刻站起来。毛泽东出现在门口，张玉美当即快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右手，激动得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罗瑞卿连忙介绍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紧紧握住张玉美的手，拉着她走到桌子东侧，用手指着身边的沙发椅，示意她挨着他坐下。

罗瑞卿、马国瑞和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张玉美凝视着毛泽东，打量着他。罗瑞卿见她“出神”了，便说道：“玉美，这就是主席。”

张玉美顺口答道：“见过。”

这下轮到毛泽东惊奇了，问张玉美道：“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

“见过你的像片。”

她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在座的人全逗乐了，笑了起来。

毛泽东见她有些紧张，便拉起家常来了，问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张玉美一一做了回答。当毛泽东听说她只上过八个月夜校，现在认识不少的字，并且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的，便递上一支钢笔说：“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张玉美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把笔和本子一块儿送过去。毛泽东看了后，又默默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然后，他抬起头，对随行的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接着，他转过身，问坐在右侧的张玉美道：“家里几口人？”

“35万。”张玉美回答。

虽然张玉美紧张得还是有点“乱说”，毛泽东还是高兴地点点头，明白她的“35万”是什么意思，笑着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经过一阵子的交谈，张玉美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毛泽东这次为何点名要河北省一名县委书记汇报农村工作呢？原来，早在2月2日，他看到《内部参考》一篇《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文章，引起了重视，不仅要求中办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并专门给新华总社写了一封信，要求“请将此稿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根据那篇文章提供的情况，毛泽东便问起了张玉美的工作，开始了调查：“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镇反中全县抓捕了 171 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 81 名。”张玉美告诉说，“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毛泽东继续问道。

张玉美是从基层上来的实干型干部，干工作是好手，属于工作泼辣型的女干部，刚才还紧张，现在一谈起工作便头头是道了，立即回答说：“县里‘三反’‘五反’按照中央通知进行部署，去年 10 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 158 名贪污分子，‘五反’因县里工商业很少，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问她：“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在土改之后，毛泽东把农村发展方向定为“走互助合作”之路。在他提议下，中央委员陈伯达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并于 1951 年 12 月 15 日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专门要求他们“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但他又指出“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大家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随着恢复经济的任务即将完成，毛泽东开始思考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时代命题。在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党中央把重心放在工业建设上，但为了不削弱农村工作，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家计委副主席邓子恢为部长，专门负责。而毛泽东认为农村走合作化道路是向社会主义转化的重要途经，因此对农村互助合作情况十分重视。

而此刻他询问互助合作的情况正合张玉美的心意。她当即爽快

地回答说：“沾（方言‘行’之意）。”

谁知她又觉着这样回答似乎不妥，马上又解释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的时间。”

毛泽东宽慰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张玉美先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全县的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泽东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他说话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何载做记录。张玉美也往自己本子上记，有时记不下来，就划个记号。毛泽东接着又问她：“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张玉美告诉说。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拍着她的肩膀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然后，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时间为好。”

接着，他点燃一支香烟，侧过脸对着张玉美说：“继续谈吧。”

张玉美又说起了近两年邢台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1951年，河北省第二次党代会上提出，各县可试办一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初，县委学习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我们互助合作时间早，基础牢，因此决定采取梅花布点的方法，适当加快办社的步伐。按照山区、丘陵、平原三大区域，选择水

门、东川口、前炉子等七个搞得较好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于12月中旬赴饶阳县五公村，参观了耿长锁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回来后，经过一个多月宣传发动，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先后建立起来。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七个社秋麦两季普遍增产。这样一来吸引了全县农民。群众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场上粮食堆成山。”

毛泽东点点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到秋后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张玉美又汇报说，“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比如尹贾乡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泽东听后当即把手一扬，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在场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张玉美继续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入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泽东一听十分惊讶，问道：“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我县互助合作有十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一个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合作化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张玉美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说到东

川口时，她说：“这是 70 户的小村，区里原计划以王志琪互助组为主，先成立一个 20 来户的小社。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几乎全部报名。党支部只好采取‘关门’措施，结果两次‘关门’也没有关住。后来又开展了一次‘倒宣传’，还是没有动摇群众入社的决心。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 年，也就是建社的当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 27 万斤，比上年增产 12%。群众高兴地说，要不是农业社，咋能增产这么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无比兴奋地说：“是啊，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啊！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接着，他又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泽东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随后，张玉美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并且举例说：“水门村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村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

毛泽东听后指出：“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张玉美说。

毛泽东关心地问：“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的群众认识还是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

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许入社。”

这时毛泽东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他的总结是那么及时、到位，并且是一针见血，甚至还带着深刻的哲理，完全是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清，总结得高。

张玉美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毛泽东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

接着，他又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开的。”张玉美答道。

毛泽东立即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张玉美继续说道：“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村出现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有的生活困难却卖了孩子，有的户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部书记和十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毛泽东转过身问她道：“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对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毛泽东又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接着又问道：“还有什么问题？”

张玉美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列车一直在风驰电掣般地前进，谈话之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泽东站起来说：“不讲了，吃饭去。”

张玉美便跟随他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了餐厅。餐桌摆着葡萄酒和四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毛泽东先斟酒，和张玉美碰了杯，接着让她吃饭，还不断往她碗里夹菜，并且关切地说：“你每样菜都尝尝。”

他如同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爱，张玉美感到既亲切又温暖。

饭后，众人又回到了会议室。毛泽东一边走着，一边给张玉美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上“艺术课”，算是饭后休息。约过了十几分钟，众人便入座，继续听张玉美汇报。

这次毛泽东换了一个话题，问张玉美：“合作化搞起来了，你们县里的妇女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如同少年儿童工作一样，毛泽东对妇女工作也一直很重视。他的这个话题是有的放矢的。去年12月30日，他阅看全国妇联党组送来的报告，其中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提了不少的意见，主要如下：

(1) 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由妇女单独组织的互助组。这不应提倡，也不应强令拆散，应通过解决男女同劳同酬同等民主权利后，逐步进到男女共同组织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2) 在生产运动中，各地涌现出不少妇女劳模，但多不容易巩

固。除对劳模加强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使劳模专业化,发挥特长,减少兼职,少参加一般性会议与活动,并注意多培养集体模范。

(3)妇女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得不到同劳同酬,没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最合理办法是,不论男女,工作做到什么程度,就得到什么报酬,还要建立民主生活制度,批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点。

(4)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矛盾也应加以解决。

(5)用农村组织起来后劳动力有剩余的论调来限制妇女参加农业生产,降低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应通过投入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果园和其他副业等来解决。

毛泽东认为这些意见很正确,特地把妇联党组的报告转发全国,并要求各地进行落实。这次他见到女干部张玉美,特地对农村妇女状况进行调研,具体了解妇女工作。

“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张玉美告诉毛泽东说,“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

接着,她又滔滔不绝地说:“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脚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人,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毛泽东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这是基础。”

接着,他问道:“《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

了没有？”

“《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也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三年有三位女劳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荣幸见到你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接着，她又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妇女在农村中的地位变化。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随后，他又问张玉美：“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张玉美便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六个方面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满意地说：“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

张玉美能说会道，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

下午一谈又是好几个小时。当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后，工作人员进来说：“请主席吃饭。”

张玉美又和毛泽东等人一起共进了晚餐。放下碗筷时，毛泽东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她。

晚饭后，列车将到达郑州站。毛泽东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

我看。”

张玉美说：“主席忙累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毛泽东略微思考了一下，抬起头，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在旁边的杨尚昆告诉说：“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中央最近要将合作化决议草案作为正式文件下达，具体可以按这个文件办。”

接着，毛泽东又用商量口气问张玉美：“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张玉美连北京都没去过，心想要是跟着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是件美事啊！可认真一考虑，又觉得不合适，于是回答说：“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还到外地视察，咋能给你添麻烦呢。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级干部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

随后，他拿出一个烟盒、一个茶叶筒和一支钢笔，问道：“这几件东西怎么样？”意思是送给她。张玉美连声说：“好，好。”可没好意思伸手去接。

说话间，火车进入了郑州站，毛泽东再次问张玉美道：“玉美，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张玉美回答说：“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毛泽东便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她，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她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张玉美恋恋不舍地离开毛泽东和专列，随后在郑州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回了邢台县。

以后，张玉美先后5次见过毛泽东，而第一次与他随车同行500里，单独汇报一整天的情景让她最难以忘怀。1993年，当年35岁的基层干部张玉美进入古稀之年。她与毛泽东随车500里谈话之行过去了整整40年，毛泽东去世17年了。她回忆往事，还是情不自禁，在家里写下了一首动情的打油诗：“领袖邀我同车行，一片爱心慈母情；亲切教诲永不忘，终生奋斗干革命。”

这是后话。

2月15日，党中央就正式下发《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通知认为，1951年12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3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予以发表。

4.“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英雄，叫做巨人安泰，是大地母亲的儿子。他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就拥有无穷的力量，谁也打不过他，所向无敌。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也像安泰与大地一样心连心，并且无坚不摧。现在要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打仗，打的是人民战争，搞建设，也是组织人民共同奋斗。他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小人物”，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人民于他，也是当做救星，当做幸福路的引路人，无比拥护、爱戴。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郑州站后，继续南下，直到湖北武汉，然后，

毛泽东等人住进了中南局机关大院的平房里。

湖北省委负责人李先念、王任重等人闻讯赶来，向他拜年。毛泽东却和他们谈起了工作设想，说要在武汉的长江上架设大桥，要解决工业建设所需的南粮北煤的运输问题，甚至还说我们能不能在长江修建一座大坝，把江水给拦住……他的这些构想，太宏伟了。以前谁都不敢去想。此刻他一提出来，就让湖北省委的同志们大受鼓舞，喜形于色，纷纷表示要去为之努力奋斗。

原来毛泽东思之长远，对长江早就有了规划。

因为还是春节，窗外不是爆竹声响起，毛泽东一再对警卫部门说：“到民间去看看。”

随行的杨尚昆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商量后，表示同意他外出看看，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戴上口罩。毛泽东不愿戴口罩出门。杨尚昆坚持说：“现在正在搞镇反运动，总理反复叮嘱我们要注意你的安全，行踪要严格保密，夜间要宿在船上或专列上，出门要戴口罩。”

没办法，他只好表示同意。

初四日，毛泽东戴上了大口罩，在湖北省委同志和警卫班战士簇拥下，前去游览武汉的龟山、蛇山，“深入”了民间。因为是春节，这里游人非常多，携家带口的，十分热闹。参观黄鹤楼时，李银桥、李家骥、赵鹤桐、张仙朋等卫士跟着毛泽东一起。张仙朋高兴地说：“主席，看样子今天是庙会，人真是多！”

毛泽东笑笑说：“怕什么，是好人就不要怕。若有坏人，我们就给他个突然袭击。”说罢，不顾众人的大笑，继续向前走。

毛泽东带着一行人走着走着，遇到一家子，大人带着孩子出来春游。小孩子的眼睛非常尖。他见一位个子高大的人戴着口罩觉得很奇怪，一双大眼睛朝着毛泽东忽闪忽闪，结果，隔着口罩居然把毛

泽东给认出来了，尖着嗓子喊起来：“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下子不得了！四周的群众哄然大乱，潮水一般涌过来，并且相互告诉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猝不及防之间，毛泽东的前后左右变成了人的海洋。

警卫班的卫士和当地警卫人员“呼啦”一下围住了他。随行的罗瑞卿、李先念、杨尚昆、王任重、杨奇清、武竞天等人也慌了手脚，立刻向毛泽东靠拢，在卫士围成的圈外又围成第二圈，保护着毛泽东的安全。此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保护毛泽东安全离开这里。可是谈何容易。他的四周已经是万头攒动，人挤人，挤成了团。

卫士们和罗瑞卿等人前呼后拥着毛泽东，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山下挤。人太多了，到处是兴奋的人们，大家都想见一见毛泽东。众人随着人潮的涌动而摇晃着，怎么摇怎么歪也摔不倒。他们就这么簇拥着毛泽东，人挤人地朝山下一点一点移动。

卫士们不知挤出多少汗，头都挤晕了，卫士赵鹤桐随身带着的两个铁壳暖水瓶也被挤扁了。好在战士们平时训练有素，高喊着，连拥带挤，好不容易才分开一个缝，簇拥着毛泽东快速地走着。经过好一阵子的“拼搏”，他们终于到达了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了一只船。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随手摘去口罩，回转身子，笑着向群众招手。顿时，老百姓见果真是毛泽东，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巨大声音直冲九霄，震耳欲聋。不少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这时罗瑞卿和杨奇清却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向毛泽东作检查说：“我们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怪他们，还笑呢，只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这次历险其实真的太可怕了。这么多人，这么拥挤，万一发生踩踏，就要酿成大事故了。好在一切都很平安。

2月19日是正月初六。上午8时，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武汉市委书记、代市长王任重说：“主席要见一位街长，请你找一个！”

“街长？大过年的，主席找他做什么？”王任重觉得很奇怪。

面对王任重的疑问，秘书告诉他说：“主席希望谈谈街道工作。”

原来毛泽东想对城市街道工作做一些调查。街道是城市的细胞。街长是街道的一把手，比芝麻官还小，而他们却是对街道工作、城市工作最了解的人。王任重随即找了汉口交易街街长陈光中，带着他便急急赶去毛泽东住地。

陈光中上汽车后，听说是毛泽东要见他，还要听他汇报工作，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过了很久，才喃喃地说：“大过年，还能见到毛主席，梦寐以求的愿望要实现了！”兴奋得热泪盈眶。

可是，他冷静一想，见着毛泽东说些什么，从何说起呢？心咚咚跳个不停，转而又感到很紧张。王任重发觉他着急的样子，笑着告诉说：“你不要紧张，主席问什么，如实讲什么就可以了。”

汽车很快就驶进了中南局机关大院，在一间普通的平房门口缓缓停下来。毛泽东就住在这里。当陈光中被带进房间时，毛泽东见状，立即站起身，向这位小小街长走过来，微笑着说：“你是哪条街的呀？”握住了他的手。

“主席，我是交易街的。”陈光中挺了挺胸，立正身体，恭恭敬敬地回答。

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买卖街。”接着，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光中。”

“耳东陈，光明的光，中国的中，是不是？这个名字不错呀！”毛泽

东高兴地招呼说，“坐下来，今天我找你谈谈街道工作情况。”

这时，他才松开握住的陈光中的手，指着旁边沙发，请他坐下来。陈光中见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说话随和，刚才紧张又激动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然后开始汇报街里如何反霸，如何进行民主改革。他平时说话就很快，这次汇报也是说得很快，并且满口都是武汉腔，毛泽东便笑着说：“你这个湖北佬讲慢点嘛。”

陈光中这才发现自己讲得太快了，可能毛泽东听不太懂，笑了笑，于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往下说，告诉毛泽东街政府是如何发动群众的，是如何开展禁烟禁毒运动的，是如何教育群众是，是如何提高群众觉悟，培养骨干分子的，是如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和建立街政府委员会的，如何开展群众扫盲工作的，等等。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不时向他点头，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

当陈光中谈到街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调解、治安、优抚、卫生、妇女等委员会的任务和分工时，毛泽东问道：“你为群众办了哪些公共利益的事情？”

“修了马路，安装了水管、路灯，建了公共厕所，办了夜校，解决了部分人员就业。”陈光中回答。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笑着点头说：“当干部就要多想一想群众，为他们办事情！”

接着，他又问道：“群众拥护你吗？”

陈光中立即悟出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如实地说：“我在市、区委的领导下，为广大群众服务，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又问：“你那个街有多大？”

“全街 3042 户，11121 人。”陈光中说罢，把交易街的地域范围作了介绍。

毛泽东笑着说：“啊！这就是你的小天下呀。”然后转换话题：“你有没有官僚主义？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陈光中告诉说：“我们都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到街道工作的，随时都在注意检查自己，防止发生官僚主义，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街道干部中还未发现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毛泽东听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领袖和街长坐在一起，在春节的喜气中热烈地畅谈着，没有高深的大道理，急呼是家常话，又关乎干部、民生和党的政策。说着说着，毛泽东望着陈光中，亲切地问道：“你谈了这么多，到底街道工作任务是什么呀？”

他给街长出了一道考试题。陈光中想了想，回答说：“从我们全部工作来看，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对！你很明确。”毛泽东又问道，“你看街道应当设什么样的机构好？”

陈光中见他认真的眼神和征询意见的神情，便毫无保留地说了自己的想法：“街政府既不出布告，不颁发命令，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主要是宣传市、区政策和规定，落实上级布置的工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是区里的派出机关，只能是办事处的形式。”

毛泽东赞成地点点头，又问：“你是哪个党派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陈光中告诉他自己是青年团员。

毛泽东高兴地说：“啊！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陈光中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你是基层领导，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

陈光中点了点头。毛泽东又叮嘱他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不要脱离群众，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关心群众生活。”

谈到此，时间不早了。毛泽东说：“你的工作情况，我已了解了，就谈到这里。今天我请你吃饭。”

吃饭的时候，他招呼陈光中坐在他的身边。四菜一汤，因为过年，每人还有一小杯葡萄酒，众人共饮之后，就开始吃饭。毛泽东喜欢吃辣椒，问陈光中道：“爱吃不爱吃？”

陈光中点点头说：“可以。”

毛泽东给他夹了一些。谁知陈光中虽是湖北人，却并不能吃辣椒。很快，毛泽东发现他辣得脸发红，汗直淌，急忙对身边的服务人员说：“拿毛巾给街长擦擦汗。”

陈光中擦着汗，还是辣得张着嘴，结果自己都觉得好笑。毛泽东看着，也笑了。

吃完饭后，回到会客室，毛泽东叫陈光中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又和他谈开了。两人没什么主题，一会儿谈到百货公司的袜子不大众化，一会儿说到某某学校的房子中不中，西不西，一会儿说道一些人穿西装戴瓜皮帽式。谈到民间风俗时，毛泽东突然问陈光中道：“武汉市是土葬还是火葬？”

陈光中回答说：“现在大部分是火葬，也有少数土葬的。”

毛泽东说：“火葬好，移风易俗。”

两人天南地北地谈着，不是发出爽朗的笑声。

谈话结束时，陈光中起身告辞。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再次伸出温暖的手和他握手，并吩咐工作人员说：“街长要回去了，用汽车送街长回去。”

然后，他亲自送陈光中出门，看着他上车，微笑着挥手致意。陈光中看着他慈祥可亲的面容，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向领袖挥手告

别了。

事后，武汉市民获悉陈光中被毛泽东接见的消息，纷纷说：“盘古开天地以来，都没有过像毛主席这样的大官和小小的街长见面、谈话、吃饭的事情，更谈不上分手还送出门去的！翻烂古书，也找不到一人啊！”

确实如此。至今为止，世界上都还没有一位国家元首级的领袖与一位近乎刘邦亭长这样的小官儿——街长如此亲密接触过。

3月2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乘东海舰队“洛阳号”军舰由长江顺流而下，经过安徽安庆，22日，抵达南京，住进了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

在这里，毛泽东先听取了华东局和江苏省委负责人陈毅、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人的汇报。毛泽东对刚刚成立的江苏省的工作表示满意。

下午，毛泽东前去游览凭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陵墓。谁知在他瞻仰孙中山祭堂时，被正在草坪上读书的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发现了。他一激灵：“这不是毛主席吗？”确认是相片上见过的毛泽东后，他没有迟疑，立即飞一般地朝学校猛跑，连书包都忘了拿。

他这么飞跑，去做什么？要把自己见到毛泽东的消息告诉同学们，让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悦。结果，整个校园都轰动了！全校师生坚决要求去看望毛泽东。学校领导没有阻拦，反而热情支持。于是，学校出动好几辆大卡车，满满载着师生员工，顺着陵园路朝中山陵疾驶而去。

毛泽东视察南京的消息已不胫而走，许多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纷纷跑去，聚集在他定然要去的中山陵8号原孙科公馆等候。当毛泽东等人的车队驶到中山陵8号时，忽然，“呼啦啦”，公馆门口

出现大片人群，气氛异常热烈，人人都很激动，群情高昂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怎么办？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急忙报告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等人。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了过来，沉吟片刻对他们说：“我来！”说罢，便大步朝外走去。

来到门口，他朝人群大声地“喊话”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为了爱护主席的健康，请大家散去。”

可是，激动的人群哪里听他的喊话，不肯散去，人人都希望见着毛泽东。经历过黄鹤楼一幕的罗瑞卿知道毛泽东不露面是不行，便与南京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副局长洪沛霖简单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主席已经答应会见大家了！为了主席的安全，也为了让大家能清楚地见到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指挥和安排下，激动的人们很听话地很快排成了长长的两列，并且坐在了草坪上。

这时，毛泽东从里面走了出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等陪同下，他来到群众中，满面笑容地向他们频频招手。

“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

毛泽东披着军呢大衣，立即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着向群众致意，并且用那特有的湖南腔有力地呼着：“人民万岁！祖国万岁！”

人们不自觉地站起来了。他立即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一时间，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当人们含着激动的泪花，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争着和他握手时，毛泽东也很激动，和他们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问候着，笑着，迟迟不愿意离开。

后面的人群也往前面拥挤，争着来握手、说话。在毛泽东身边的罗瑞卿担心出现在武汉那样走不了情形，立即劝道：“主席，可以回去了。”谁知毛泽东白了他们一眼，没有一丝儿走的意思。

过了很久，毛泽东还是和群众一起握手，交谈。卫士李银桥不得不走过去，轻轻地说：“主席，天色不早了！这些学生、市民也得回校归家了，不然他们摸黑路，就不好了。”

李银桥这一招终于把住了毛泽东的弱处。他心中装的是群众，不怕累着自己，却怕群众回家摸黑，这才同意回去了，向大家招着手，渐渐往回走。

毛泽东从中山陵回到住处后，还似乎沉浸在刚才和群众在一起的欢乐中，喃喃自语地说：“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这次外出巡视，他在武汉和南京两次和群众“亲密接触”，盛况空前，虽然增加了警卫的难度，事后他还是意犹未尽地对李银桥等身边的人员说：“以后我每年都要下去几次，不能忘了本，不能丢弃了我们的衣食父母。”

此话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出自他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毛泽东与群众的感情，是希腊英雄安泰与大地母亲一样的感情，是鱼与水一般的感情。他喜欢这种鱼入大海的感觉，只有和人民在一起，他才快乐、高兴，流连忘返。他是发自内心渴望与群众在一起，主动和人民群众接近、融合，是他一种不自觉的反应。而在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这种领袖与群众融合的鱼水之情往往使得领袖与人民的感情更加深厚，又凝聚成一股更为强大的同心同德奋斗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可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比安泰更为巨大的力量。

5. 倡导绿化和“低碳生活”的第一人

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经济时往往忘记保护环境，甚至背道而行，结果是经济发展了，环境却破坏了。当全球环境问题成患，为人污垢，甚至闹成世界病的时候，人们回顾毛泽东当年的一些做法，不由得惊讶地发现，他的智慧远超一般人，比一般人看远几十年。1953年，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倡导了环境保护，并且居然是新中国倡导绿化和“低碳生活”的第一人。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953年2月，毛泽东来到南京时，江苏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江苏省是年前由苏北区、苏南区和南京市合并而成的。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省、地、市、县负责同志，并在大会上讲了话，鼓励大家在新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好局。

第二天，会议照常举行。毛泽东一行在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江渭清陪同下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参观。

在紫金山，毛泽东登高望远，远处群山苍翠，中山陵的法国梧桐树和雪松、宝塔松一排排，整齐挺拔，可俯瞰南京城却是一片灰色，颇应了南京“石城”之称。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对江渭清说：“中山陵的树是国民党种的，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南京城都绿化起来呢？”

他的这个想法让随行的人觉得很新颖。是啊，国民党在中山陵种了树，是为了纪念死人，象征死人不朽；若共产党把南京城绿化起

来，让活着的人们生活在绿色之中，岂不让人更加舒畅、愉悦？江渭清在南京工作多年，正为自己没想到这个问题而遗憾时，毛泽东转过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渭清啊，这件事你要负责抓，书记挂帅嘛！”

毛泽东现场交任务。江渭清心中一震，立即大声表态说：“主席，请您过几年再来看吧！”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他的嘱托。

毛泽东笑了：“好，这就算我们的君子协定。”

回到南京城内后，江渭清立即把毛泽东和他“签订”的君子协议向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汇报。

“是呀，我们咋就没想到呢！”谭震林感叹，又遗憾地说，“其实，我应该早就想到啊！”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接着，他就告诉江渭清说：“我们湖南人都有在自家屋子周围种树的习惯，主席把每个地方都当成了自己的家！”

“其实我们苏南也有种树的传统。”江渭清也还是很遗憾地说。

“你知道么，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注重绿化造林！”

接着，谭震林说起了战斗岁月的往事。那是1928年夏的事情。当时毛泽东住在永新县塘边村，村后有一片荒山，山上没长一棵树，光秃秃的。一天晚上，他来到村党支部委员徐邦勋的家里，和他说了希望把荒山全部造上林的想法。老徐回答：“好，马上开会研究。”第二日，毛泽东带着警卫员亲自上山勘查，根据阳光、土质等情况作了植树规划，划好了种树的范围，确定了种些什么树，晚上参加干部、群众会议，和大家一起研究植树造林的具体办法。

第二年春，他虽然率部离开井冈山，去了赣南，但塘边的村民仍按当初的规划，冰雪尚未开化，就开始了植树造林。毛泽东住过的房东周香姬老大娘家务事多，实在忙不开，但想起穷人无山无田的痛

苦和毛的叮嘱，巴不得豁出老命去干。每天早起晚睡，背着孙儿参加劳动，一直干到造林结束。

“秃山绿化造林后，树木长得绿葱葱。谁知后来白军张辉瓒带兵打过来，放一把大火把山林都烧掉，树苗全毁了。”谭震林说：“但是，这次主席亲自组织塘边村造林，给了井冈山的同志十分深刻印象。我几十年还记得清清楚楚啊！”

江渭清听罢，也很感动，再次表态说：“我们一定要完成好绿化南京城的任务。”

随后，江苏省委找了一些专家共同研究，决定以法国梧桐为基本品种，带上雪松和宝塔松，三年育苗，三年绿化，让南京城区凡是能植树的马路、通道两旁统统美化起来，以后绿化区域逐步扩大到郊区，种白杨、垂柳、刺槐等品种。由于正是春季，各个部门很快就行动起来，在南京城区新辟一些干道，先种上了雪松、宝塔松，接着又种上了一些生长缓慢的矮小品种，如龙柏树、冬青树。这些树木成活后，极大地点缀和美化了南京城市风貌。

以后，南京城坚持不懈地进行绿化，干了好几年，确实有成效，南京城内外绿荫成行成片，到处郁郁葱葱，绿色成荫，赏心悦目。

除绿化城市外，毛泽东还重视荒山绿化造林。

一天，毛泽东又和江渭清谈起了徐州的云龙山，说：“渭清啊，你说这石头山也能不能搞绿化造林呢！”

江渭清想了想，回答说，“世上无难事，石山绿化，一可以搞人工植被来解决；二可以在石头上打眼，再向洞眼石缝中填土，播柏树种和植小柏树苗，我看总是有办法的。”

毛泽东说：“那好嘛，就按你说的办吧。”

随后，他还叮嘱江渭清说：“这么大的一座山，荒秃秃的多可惜，我问过专家，种一棵树就可以含吸住一吨水，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保

持生态平衡，又能美化环境产生经济效益，岂不一举多得。”

后来，徐州市委对云龙山的山况作了调查，山石是大片石灰岩构造，不适应马尾松生长，只能种柏树。因为柏树能抗旱。有了科学性，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很快便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号召，彻底改变了全山光秃秃的不毛面貌。几年后，云龙山柏树满山，青翠一片，后来当地群众又在山脚下挖了一片人工湖，水波粼粼，湖光山色，大大美化了这座古城。

毛泽东对于绿化一直抓得很紧。这一年年底，毛泽东去杭州。一次，众人一起吃饭。席间，罗瑞卿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王芳，我建议你把‘芳’字上的草字头去掉。这个名字容易搞混，许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女同志呢。”

“这可不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筷子说，“王芳，你是山东人，你们山东的绿化怎么样？”

“刚刚起步。”王芳回答。

“山东还有许多荒山秃岭没有绿化起来，你的头上刚长了一点草，就想把它除掉，这怎么能行！什么时候山东消灭了荒山秃岭，绿化过了关，你再把‘芳’字草头去掉。”

毛泽东巧借王芳的名字表达了对山东省绿化荒山的重视。

又一次，他来到南京时，江渭清随他一起去栖霞区的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毛泽东与农民谈得非常高兴。当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过话题问：“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搞法？”

江渭清回答说：“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作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产快慢不同，搞长短接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又问道：“这里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

主？”

江渭清告诉说，“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听了很开心地说：“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这些绿化工作对于改变江苏城乡面貌和保护环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时批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山荒地，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把消灭荒山作为发展农业十七条中的第九条，并且第一次提出要在农村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绿化——即“四旁绿化”。次年3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向青年们发出“绿化祖国”号召，再次提出“四旁绿化”：“要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这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

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并且是一项很有见地的工程。他的这个思想看得是何远，想得何其长。当时光步入21世纪时，不少农民在自家种上各种花卉，进行室内美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而几十年前毛泽东的“四旁绿化”，则是新农村建设最早的家庭美化思想——在“四旁”美化居住环境，创造舒适悦目的生活氛围。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把“绿化”专门作为党委工作的一条：“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在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君子协议之下，南京和江苏其他各地的绿化造林几年下来非常有成效，尤其南京城的绿化做得很好，他们的

做法又被其他城市学去。全国城乡形成绿化高潮，大中小城镇都种上了绿油油的树木，城市面貌变化巨大。

60年代，全国评选绿化先进城市，南京已名列榜首。一次，在全国各大区及省、市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江渭清提出说：“前不久全国绿化先进评比，南京第一，广州第二，北京第三，这样评似有不妥。我建议总理向主席汇报，是否应让北京市当第一，因为是首都城市，要考虑在全国的影响……”

周恩来哈哈笑起来了，转过头，对在座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说，“渭清同志的这个建议是为顾全大局啊，我首先表示同意。那么你们广州的那个第二名，是不是应该让给江苏南京呢？”

“总理，应该的应该的，我完全赞成！”陶铸连声答道。

尽管随后北京得了第一名，但南京的城市绿化还是蜚声海内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金日成派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至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城仍然郁郁葱葱，当年毛泽东倡导绿化造林的树荫让后人乘凉。尽管一些人把这归功于南京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但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这是毛泽东发起的，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蒋介石把南京作为首都几十年，都没谈过绿化一个字。毛泽东却把石头城改造成了“绿城”，不能不让人感叹他深邃的思想。

毛泽东是党内植树造林最先的倡导和力行者，从井冈山时就开始植树造林，住进中南海后，不准在自家门口摆花盆，但组织警卫人员种过树。他住一地，绿化一地，到了外地，也不忘推行城市绿化、郊区绿化和荒山造林，促成和带动了全中国绿化造林的热潮。当21世纪环境保护和“低碳生活”风靡全球时，有人说：“如果评选新中国的环境保护（绿化造林）、倡导‘低碳生活’的老祖宗，还应该是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这些都是后话。

有趣的是,毛泽东在共和国开始经济大建设时候就有意倡导绿化造林,事实上开启了新中国环境保护的第一步,无意之中使得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同了步”。

这次外出巡视,毛泽东要到民间,要和普通人在一起,爱与群众打成一片,警卫部门却要求他出行保密,外出戴口罩,在外要有卫士随行保卫,毛泽东不愿意,其实这不是警卫人员人为地制造紧张,的确有风险。在南京时,他按照警卫部门的要求仍住在军舰上。本来,他打算去上海。谁知因为考察江苏各地在南京多待了两天,结果,就在这两天内,远在台湾的国民党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上海。

很明显,有暗藏的特务向台湾方面通风报了信。毛泽东的行程安排是最高机密,谁能获得这样的机密呢?^① 尽管不知,毛泽东立即决定改变路线,不去上海。

2月26日,专列返回北京,毛泽东结束了这次南下之行。

6. 打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战斗

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后,召开中央会议,考虑过渡时期的总

^①这一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确定此次轰炸与上海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等“隐藏的内奸”有关,定性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1982年8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次年,扬帆平反。

路线问题。突然从中原地区传来一个惊人消息：河南南阳突降“黑霜”，灾民惊慌失措，发生抢劫，当地大乱。

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天爷咋降落“黑霜”？灾民为何如此之乱？

降“黑霜”引发乱，除灾情反常外，还与当地的土改有关。

1952年12月底，河南南阳地区胜利结束了土改运动，贫苦农民分房，分了地，还分了耕畜和农具。祖祖辈辈盼望“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终于一朝实现了，众人欢欣鼓舞。1953年还没开春，生产热情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季节还没暖和，老乡们纷纷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运肥料，犁田播种。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田野到处一派生机盎然，庄稼像一张绿色地毯，镶嵌在中原大地上。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4月11日凌晨，老天爷突然降下一场“黑霜”，覆盖在大地上，严严实实。太阳出来后，“黑霜”融化，长势很好的小麦苗、豌豆苗、扁豆苗、棉花苗全都低下了头，苗儿先软下来，随后就萎死。全区700万亩麦苗受灾，其中，南阳、方城两县的麦苗冻死80%以上；南阳溧河区麦苗冻死93%以上；唐河、泌阳、新野、邓县、镇平五县麦苗冻死70%以上；内乡、南召、西峡、桐柏、淅川五县麦苗冻死60%以上。整个南阳地区受灾面涉及500万人之多。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黑霜”是如何形成，又如何降临的，一时无人可知。

但面对这样一场天降横祸，众人的反应却大不一样。刚翻身拿到土地的农民们顿然一时不知所措，不少妇女盘腿压脚坐在地头上，放声大哭，当家男人也满脸愁云，嘴里噙着早烟袋，在麦地边不停来回走动……那些不甘被分地的地主分子趁机跑了出来，暗中造谣说：“穷小子分了富人的地，麦苗长得怪好，老天爷下场黑霜把它冻死，这就是惩罚！这就是穷人的命。命里八合米，走遍天下都不满

升。”而一些隐藏的土匪(南阳地区解放前土匪众多)则纷纷出动,开始打、砸、抢。青台区古杜乡民兵的枪支被让人抢走,人被打伤。溧河区陈官营乡民兵中队长家里被投毒,一家七口中毒,一人致死。新野县城郊区的麦苗、谷苗被人夜晚割倒。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人抢购粮食,市场出现不稳。天灾、人祸混杂在一起,部分群众不明真相,不安了,在一些坏分子的煽动下,跟随着他们聚众闹事,包围仓库和区公所,胁迫当地政府售粮。至4月17日止,全区发生抢购、请愿、阻止运粮、殴打干部、包围仓库等事件30多起。

南阳地区人心不稳,社会动荡,面临着严重考验!

救灾如救火。在“黑霜”出现的第二天,南阳地委就发出《关于保麦、备荒的紧急措施》通知,号召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战胜灾荒。同时,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县,视察麦田受灾情况,并把灾情上报省委和党中央。

毛泽东最受不得老百姓有疾苦。在延安时期,贺子珍坚持要离开去莫斯科,他极力挽留又留不住时,对贺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解放后,他也还是如此。1950年,他在中南海获知淮北发水灾有人被淹死、被蛇咬死,忍不住流了泪,随后发出“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

然而,中国是一个灾害大国,自古以来天灾人祸不断绝。人民的灾难和哭声是毛泽东最脆弱的地方,也是让他最揪心的。得知南阳遭霜灾后,他十分难过,忍不住对身边的李银桥说:“500万人受灾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不知又有多少家挨饿!”说罢,他断然把手一挥:

“现在解放了，我们不能让诸葛亮的后人饿肚子！”

南阳是三国时“智多星”诸葛亮躬耕过的地方，刘备三顾茅庐就在此。毛泽东虽然没去过，对这里的历史却很熟悉，也有感情。1948年11月解放军占领南阳时，他欣喜万分，亲自写下《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向新华社投稿。现在诸葛亮住过的卧龙山遭灾了，“小诸葛亮”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慌了。他获悉灾情后，没有迟疑，当即召集周恩来和内务部负责人开会。

这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阳的灾情和救灾办法，及时发出了“战胜河南省霜灾，保证经济建设”的号召。就救灾工作，毛泽东决定全国支援，不让历史上“一受灾就死一大批人”的悲剧重演，并亲自向全国发出紧急指示：

(1)告诉河南人民不要担心害怕，不要作逃荒的打算，不要采用变卖牲口、农具等破产度荒的拙笨办法，也不要单纯依赖政府救济，坐吃山空。

(2)各级人民政府要领导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抢救麦苗。要领导人民群众生产自救，共渡难关。

(3)全国支援河南，创造大灾之下没年省的一个人间奇迹。

他指令一下，政务院和内务部立即行动起来，马上向东北、北京、天津、内蒙古、绥远、河北、山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下达支援、运输河南灾区粮食的任务。随即，一场紧张有序的运粮行动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展开。

在各地紧急动员，准备向南阳运粮的时候，毛泽东向灾区派来了中央慰问团。4月30日，以内务部社会司司长纪刚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到邓县白牛街。他见着当地干部，就告诉说：“毛主席叫我把党中央的关怀带给你们！”

这下慌乱的干部先吃下了定心丸：“有毛主席的关怀，灾民肯定

不要去逃荒求生了！”

急滩、穰东、王集三个区的乡村干部和灾民闻讯毛主席派人来了，纷纷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纪刚跳上临时搭起的台子，现场作救灾报告，大声地说：“毛主席一听到河南省遭受霜灾的消息，就立即派我们来看望你们。除死无大灾啊！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南阳人民表示亲切的关怀。”

毛主席都出面了，还有什么事情可怕的！陷入绝望灾民立时就有了主心骨，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台下先是一齐放声哭了起来，继而一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于是，哭声变成了阵阵“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吼声！

纪刚大声地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河南 4000 万人民：有灾必救，灾到哪里，救到哪里，达到有灾无荒。”

激动的人们静下来了。纪刚继续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支援河南的号召，我们要创造一个大灾之下没有年眚的人间奇迹。周总理已经向各省下达了支援河南灾区粮食的任务。各省都在夜以继日地向河南调运粮食。为此，我向你们保证，灾区的粮食供应不成问题。过几日，大批粮食就会运到你们南阳。”

会场爆发出阵阵掌声，欢喜的灾民没有了眼泪，人人都振臂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最后，纪刚号召大家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单纯地依赖政府救济，坐吃山空。你们一定要按照河南省委和南阳地委关于救灾度荒的有关规定，积极行动起来浇麦保苗，麦子保一亩算一亩。要搞好春耕生产，种足红薯，种足蔬菜。同时，在政府帮助下，多找门路，搞好副业生产。”

大会散后，老乡们一回家，便拎着锄头，拿着水瓢，跑去浇麦保苗，进行生产自救去了。

毛泽东派来了中央慰问团的消息，很快传遍南阳各个灾区。500

万灾民抹去了脸上的泪花，心里不再恐慌了。那些准备外出逃荒的人们也打消了念头，放下行囊说：“逃荒管啥用？毛主席说过，只有生产自救才是出路！”纷纷决心生产自救，以生产战胜霜灾。

南阳开始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灾民们自救的同时，共和国各个地方正谱写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壮丽行进曲，紧急向南阳调粮运粮。绥远省交通不便，粮食存放地分散，大批粮食要运过黄河和沙漠，才能运到铁路沿线装火车。接到党中央下达的支援任务后，省粮食局局长带领300多名干部跋涉沙漠，远度黄河，前往各存粮地点检查、督促，协助各地群众把粮食进行集中、运载。为保证及时将粮食运到河南，他们提出了“全月任务半月完成”的口号。结果，全省大干14天，胜利完成运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灾区。

同样是僻远的广西省，紧急调集一批稻谷后，由于省内碾米机械不足，需在武汉加工成大米后运往河南。湖北省委负责人闻讯，着急地说：“河南灾民没饭吃了，要赶快抢运大米，一刻不能迟缓啊！”当即，他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抓紧快运，湖北力争提前十天全部完成调粮任务；二是帮助广西，将他们运到武汉的稻谷就地全部调换成大米，再运去河南。

不仅仅绥远、广西、湖北行动起来了，其他各省也都行动起来了。各运粮大队分水路和公路，从许昌、武汉、襄樊等地向着灾区浩浩荡荡而来，汽车、船只、火车日夜源源不断。有的省还组织了万人运粮队，冒着绵绵春雨，浩浩荡荡地开向南阳，滚滚车辆运粮忙，长长的队伍宛如当年解放区人民支援淮海战争一般壮观。

为保证及时将粮食运回灾区，南阳地委、专署不等不靠，也组织了1000只木船、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马车、几百辆人力车到南阳各车站、码头接运。很快，2605万斤救灾粮由各地运到灾区，堆积如山。望着一座座粮山，南阳500万灾民再也不担心了，许多人激动得

流下了热泪。镇平县大榆树区柳泉铺乡农民喜不自禁地聚集在粮山周围。

“有灾了就赶紧调来粮，干部们也马上下乡来领导生产度荒，从上到下，只恐怕老百姓饿着了。”灾民李玉珍说，“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真比亲老子还重啊！”

“共产党真是说到办到，不放空炮！”

“人民政府真真白白为的是农民呀！”

众人议论，更多是喜悦。

自然，欢喜的不只是柳泉铺乡的农民，萧庄村也是如此。在欢欣之余，该村全体农民情不自禁地集体开了一次会，决定给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

亲爱的毛主席：

自从霜灾发生后，你的心时时刻刻地在关怀着我们，派慰问团来慰问，又调来很多粮食，你真比我们的亲老子还亲。亲爱的毛主席，请你莫要挂念。在你的领导下，我们是饿不着的，我们这个村今年种了 300 多亩麦，以前外人只哄灾情严重，我们也不知道严重成啥样，现在我们实际检查，有 110 亩减收四成，其余还有八成收，我们的心才平下来。今年的秋苗我们种得很好，比如种包谷来说，往年是串埂子点的，今年采取了密植，还上了底粪，将来还要施追肥。全村还买了三头大牛，积 1300 多车粪，保证秋季增产三成。

我们全村一共 40 户，有六户缺粮，已在政府贷了 200 多斤粮食。有两家贫困户，政府救济了 170 斤谷子，生产困难都得到解决。我们决定不光依靠政府救济，因为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大建设，各方面需要钱多，所以我们除了搞好

农业生产以外，还要搞好副业生产。现在全村已绑了600把扫帚，价值21万元（旧币）；打石头100多车，运到彭营合作社卖，可值300多万元（旧币）；另外，还在积极采集代食品，仅干菜就积了300多斤。大家生产自救劲头很大。再加上现在豌豆角也吃得了，我们保证今后不要政府救济一粒粮食，在你的英明领导下，灾荒是一定可以度过去的。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祝你身体健康，我们向你敬礼！

镇平大榆树区萧庄村全体群众启

5月13日

这封信情真意切，代表了南阳人民的心情。解放前，河南几乎每年都要遭灾，每次遇到天灾，官府无人过问，老百姓没办法，就携儿带女四处逃荒，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四处没有穷人的活路，流离失所去逃荒也救不了命，结果还是家破人亡。可是，这一次，南阳遭了罕见的大灾，毛泽东亲自发出号令，组织十几个省打响救灾大战，真正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因为有了全国人民的支援，有了源源不断运来的粮食，南阳灾民不仅不要外出逃荒，相反鼓起了生存下去的信心，大灾不仅没有吓住他们，反而激起了他们抗灾的决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使得灾难转化成了战胜灾害的巨力。干部群众奋起生产自救，减轻霜灾造成的损失。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渡过难关。

战胜了灾荒后，正如萧庄村村民所说，他们除了搞好农业生产以外，还发展副业生产，积极支援国家的大建设。

有人说治国就是治民。毛泽东认为，治国绝不是治民，而应该是安民。治国，要先安邦，安邦就要先安民，安民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太平、内心安定。为此，百姓有难，政府就不要不管，而是要伸出援

手,进行帮助。

7.跳出了战争的“死神舞池”

伴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朝鲜战争逐渐步入了尾声,新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较好的经济建设的内外环境。

拿破仑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杰。毛泽东跳下了朝鲜战争的泥坑,几年与死神共舞,却战胜了死神。美国纠合十六七家人马组成的“联合国军”与中朝人民军队较量的结果,却是“弱小”的毛泽东等人跳出来了,落入泥坑的反是“强大”的美国人和那一堆“联合国军”。

对于这场战争,参加“联合国军”之一的土耳其人后来这样说:“在我们遥远的历史上,我们同中国人的关系是密切的,随后破裂了。与中国的唯一交往是1950年朝鲜战争时发生的。在那里我们陷于与中国交战状态。这是曼德列斯政权最大错误之一”确实如此,这是个所有“联合国军”的错误。这一错误使得满怀希望前来参战的美国“联合国军”毫无所得,在朝鲜就像抱住一只烫手山芋,打又打不赢,不打又不甘心,在矛盾中挣扎,在痛苦中折磨。

1951年11月27日,“联合国军”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随后,双方还是边打边谈。但是,1952年10月8日,停战谈判终于由于美方原因戛然而止。双方继续在三八线附近打打停停。中国谈判代表团无意和他们耍嘴皮、打口水仗,多数人干脆回国,参加祖国火热的建设去了。

这样的战争让美国损失惨重。1952年12月至1953年7月的战斗中，“联合国军”与中朝两军对阵，而单单美军就伤亡约14万人，其中阵亡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志愿军是伤亡数字是18万余人。然而，“联合国军”被志愿军击毁击伤的武器装备中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志愿军损失坦克9辆、飞机231架、各种炮4371门、各种枪87559支（挺）。但是他们缴获“联合国军”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及大量物资和装备。这样巨大的损耗对比，美国自然是更大的输家。但是，战争贩子们却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政要们伤不到一根毫毛，还营造了发财良机，却不得不去顾忌民意，顾忌战争最大受害者——美国人民。

因为人民对他们也有一把致命杀手锏。

那就是选举。

如若政客们一意孤行，就可能在获取权力的选举中失去选票，眼看着垂涎欲滴的权杖被他人抱走。就是那些抱着权杖的当权者，若丝毫不顾民意，也可能在下次选举中权杖被魔法般夺走。因此，权力贪欲越强的政客们，则越是害怕选举——这个无形的杀威棒。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大大小小的政要们又被这个无形之手左右、折磨。为获取总统、副总统宝座，美国国内那些硬汉、强汉、战争狂人们不得不绞尽脑汁，任由选举这只无形之手拨弄、把玩着。“政军双栖强人”艾森豪威尔为了竞选美国总统，不得不顺应多数人要求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强烈愿望，向选民信誓旦旦地许诺：如果当选，他打算亲自前去朝鲜，设法结束这场给民众带来伤害的战争。结束战争的诺言果真使得他获得大量选票，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

当选后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去履诺，12月初秘密前往朝鲜。回

国后，他对外承认：朝鲜战争对于美国“是最剧烈与最痛苦的”，“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他又认不了这个输，打着障眼法说：“没有什么简易办法迅速而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国会大厦正式宣誓就职总统。在演说中，他不得不亮开嗓子再次说起要和平的话：“我们寻求的和平，不只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只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只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表面上，他好像是“要和平的和事佬”。

谁知才过十天，他就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2月2日，他在发表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中立化”，即企图动用蒋介石在台湾的武装来威胁中国大陆，并且还公开说：“我们确实没有责任去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作战的国家。”次日，他与出兵朝鲜的各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的“种种细节问题”。他扩大战争的办法还真不少，包括轰炸中国本土，甚至使用原子弹等等组合拳。

然而，这一套对中朝人民来说并不新鲜，对毛泽东等人来说更威胁、恐吓不住。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艾森豪威尔的硬，撞上了毛泽东的更硬，战争老虎遇上了不怕虎的武松。

艾森豪威尔要继续打，并且还要扩大战争去打，美国人民却反

对,那些渴望下一轮选票的政客们立即附和民意,反对新总统的“大战争”。甚至,许多人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去寻求与中国妥协,以求毛泽东等人实现停战。有人言辞激烈地指责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扩大战争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实力,更多民众指责他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美国主要盟友英国也表示,不同意使用蒋介石的武装去扩大朝鲜战争。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讲,忽然大声呼喊说:“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

艾森豪威尔要打,并不得人心。而在直接较量的朝鲜战场,局势对他来说更是大为不妙。1月29日结束的“丁字山”战斗,毛泽东和志愿军当场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双方伤亡比例是1:9。而其中美国偏偏就是这个可怕的“九”,中国是“一”。也就是说,在这场战斗中,志愿军一人换九个美国兵。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范弗里特哀叹说:“共军阵地十分坚固。没办法可想。”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惶惶不安地说:“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

美军在朝鲜尽作赔本买卖。

2月10日,在朝鲜指挥作战22个月之久的范弗里特垂头丧气地“被退役”,灰溜溜地回了华盛顿。除了如同当年与毛泽东作战的蒋介石一样,他只学会对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一个简短称呼“共军”外,就是累累败绩。接替他的是美国陆军部主管作战和行政的副参谋长泰勒中将。泰勒信心百倍来到朝鲜,也没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等待他的,是更惨痛的失败。仅三四月间,志愿军胜利出击100余次,歼敌三万人以上,其中,一次歼敌1000到2000多人的战斗就达四次之多,一月两次。被俘的美军王牌第7师士兵悲哀地说:“金化前线的秋天是可怕的,老秃山前线的春天也是可怕的!”

更叫艾森豪威尔头痛的,是中朝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作了充分的抗登陆准备,美军就是利用海军优势再演仁川登陆的如意算盘,

也难实现。

艾森豪威尔的困境，毛泽东洞察若火。他在远离战场的北京告诉人们说，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要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扩大战争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到吓倒了自己。特别是他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妙计明显行不通了。艾森豪威尔恶人面孔既已板起，却又不得不要就此转弯，想着法子来使自己下台了。

果然，没过多久，金日成、彭德怀收到美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的信件，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美国方面主动发出了恢复谈判的试探信号。在毛泽东等人的导演下，金日成、彭德怀没有立即答复他，先把它晾了一个月。

结束战争，有利于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为什么不答应？因为他分析，联合国大会决定2月24日复会，在联大复会前的前两天，美国方面发来这样一个信件，是否诚心诚意，尚有待事实证明。由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如果我们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于是，他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一个月过去了，艾森豪威尔再不敢也没玩出什么新花样。金日成和彭德怀便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谈判。克拉克马上响应，表示愿意恢复谈判和交换病伤战俘。

六个月僵持的局面终于打破了。

艾森豪威尔被迫放弃了上台后扩大战争的道路，令其代表团回到了谈判桌前。

而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了新的命令：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任命李达为志愿军参谋长，许世友为第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为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勇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轮换前方将领解方、王近山、韩先楚、郑维山回国。干部轮换是准备应付美军在谈判中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

美国方面要和谈，而中国和谈代表团多数人已回国了。周恩来下达指示：凡是原在开城工作的同志，不管现在干什么一律返回。4月初，中方谈判代表团工作班子基本配齐，杜平任党委副书记，主管战俘工作。李克农尚未到达，党委书记暂缺。另外，谈判正式代表也做了调整，由于国钰、柴成文代替边章五和解方。中方代表团这才恢复以前编制，设有秘书处；参谋处、遣俘处；还有新闻处、管理处、通信处、机要处等。

4月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在开城召开。

经过五天严肃的谈判，到11日，双方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计划在4月第三周开始病伤战俘的交换活动。僵持的局面终于打开了突破口。

这次病伤战俘交换活动到5月3日结束。我方共遣返美方病伤战俘684人，美方遣返我方病伤被俘人员6670人。这次“小交换”活动成为恢复板门店谈判的先导。

病伤战俘交换成功后，美国便表示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可急坏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4月9日，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要求停止恢复停战谈判。艾森豪威尔在回信中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拒绝在体面的基础上先行停战，然后用和平方式解决遗留问题，就很难言之成理了。”战争狂人终于不敢再“狂”下去了。

4月19日，谈判双方在联络组会议同意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时间定于4月26日。

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给中方谈判代表团发去指示：为准备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有如下三个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考虑，为

此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是送到中立国去，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接收和看管。

(2) 这批战俘在中立国管理下的时间上有无限制。

(3) 这批战俘经过有关方面解释后，仍未得到解决的，应如何安排。

以上三种情况，他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几个亚洲的中立国去，在规定时间内（譬如半年或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第二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移到经双方协议的地点，交给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四个中立国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半年或三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两个方案的不同点，在于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中立国看管，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看管这一条。毛泽东告诉他们说：在两个方案中，我们倾向于第二方案，因为较第一方案简便易行，且易为中立国接受；但为在谈判桌上有进退余地，在谈判恢复后先提出第一方案，估计对方接受的可能性较小，在弄清对方全部意图后，可准备第二方案与之妥协。

对于敌方老狐狸，毛泽东也授予了一个欲擒故纵的锦囊之计。那么，这些狐狸们会上套吗？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根据毛泽东的锦囊策略，会议一开始，中朝代表团就先打出第一方案。不出所料，

美国首席代表哈里逊当即表态拒绝协商，反对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往中立国，并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此时，毛泽东把智勇双全的李克农从国内派往开城，继续担任中方代表团党委书记。

经过近两个星期唇枪舌剑，李克农和杜平认为打出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报请毛泽东“出牌”。毛泽东同意了。5月7日，在谈判会议上，李克农提出了第二方案。

正像毛泽东当初预料那样，美国方面没有断然拒绝，哈里逊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询问。这说明美国有可能接受我第二方案。但他误认为我方谈判立场有所改变，于13日提出一个长达26个段落的冗长的“反建议”，无理要求将3.5万名朝鲜籍战俘于停战日在南部朝鲜“就地释放”，只将非朝鲜籍战俘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和“解释”。此方案多数建议不符合关于由中立国看管未遣返战俘基本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才是停战谈判得以恢复的基础。当哈里逊刚读完这份包藏祸心的冗长“反建议”后，李克农等人马上站起来，将其一一驳回。

哈里逊顽固地坚持了三天，但理屈心虚，只好宣布休会四天。以后，他又要求延长休会五天。5月25日复会后，美国方面终于被迫撤回了他们的“反建议”，并要求谈判转入秘密行政会议。

这日大会，南朝鲜谈判代表崔德新没有出席。这为李承晚后来破坏停战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谈判恢复后，哈里逊不再像以前那样蛮不讲理，老实了许多，加上国际和战场形势均对我方有利，6月8日，双方就第四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且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

根据协议，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 60 日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且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 90 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 90 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级政治会议在 30 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 120 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这个协定比较合情合理。

至此，阻碍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停战的曙光冉冉升起。

第四项议程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即进入校正军事分界线的技术工作。在此前几日，为了在对敌谈判时把握有力证据，杜平与李克农商量，派参谋吴克昌去志愿军司令部，请他给前方的指挥员邓华、杨得志组织得力人员作校正军事分界线地图工作。吴克昌临行前，李克农再三交代：“务求准确无误！”

吴克昌走后，两人仍放心不下，联名邓华、杨得志发去一电，提出四个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细节问题，请他们加以研究，并要求他们提出书面意见，交由吴克昌一并带回，以供代表团与敌方谈判时参考。

谈判桌上，双方心照不宣，但心里都有一个大体的停战日期，即在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这一天举行签字，结束战争。鉴于此，李克农电请彭德怀早日来朝。

谁也没料到，就在彭德怀来朝途中，李承晚竟跳了出来，制造严

重的破坏事件。6月18日凌晨，他下令打开战俘营大门，将2.7万名朝籍被俘人员“就地释放”，又由警察强迫扣留。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次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言人对媒体宣称说：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宣读英国致李承晚政府的抗议照会：“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艾森豪威尔眼看要坏事，也慌了手脚，通过美国国务院发给李承晚一份急电：“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李承晚破坏谈判的消息传出时，彭德怀已到达平壤。他在大使馆给代表团打电话，告诉李克农说：他已向毛主席建议，推迟停战签字，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

6月21日，毛泽东回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与此同时，中朝代表团决定，暂缓停战签字时间的谈判，以观对方的动作。

事发第二天，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克拉克，要求他立即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朝中被俘人员，并且强硬地质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美国佬真是头痛，极力洗刷自己的罪责。在复信中，克拉克承认李承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事件”，并一再保证：联合国军总部以及有关政府当努力获得李承晚集团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毛泽东冷静观察和分析这一事件以及各方反应，认为美国方面急于停战，而李承晚却不甘心就此罢休，野心勃勃梦想当统一朝鲜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因此一再叫嚷“要单独干下去”，“进军鸭绿江”，有必要给他一些警告，于是打电话对彭德怀说：“看来很有必要在军事上给他吃点清醒剂。”

随后，彭德怀从平壤赶到志愿军总部，同邓华、杨得志等人研究给李承晚吃一副“清醒剂”。经过商量，几人决定在5月份开始的夏季战役第一、二次进攻作战的基础上发起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会议上，彭德怀对几位强将们说：“要捏紧拳头，狠敲李承晚军一家伙，把它彻底打痛。”

金城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战役。战役发起后，各部队一举突破敌防御正面，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之远，随即又粉碎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亲飞前线组织的十个师1000多次反扑，总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

这一重击不但给李承晚以严重打击，而且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终于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7月24日，双方最后一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这次校正表明：自1951年11月27日双方第一次通过军事分界线以来，我方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无情的事实证明，朝鲜战争再拖下去，只能为“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集团带来更为不利和不光彩的结局。谈判桌上，哈里逊不得不耷拉着头，向中朝方做出以下保证：

(1)“我们已从大韩民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必要的保证，它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火的实现。”

(2)“对大韩民国军队违反停战协定的任何侵略性行为，联合国

军司令部将不予支持。”

(3)“在共产党方面针对大韩民国的侵略,采取必要的防御性行动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继续遵守停战条款。”

(4)“根据停战条款,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保证韩国负责监督遣返战俘的中立国代表和共产党代表以及红十字会代表的安全。”

(5)“不再允许扣留战俘。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尽力找回已被韩国卫兵‘释放’的2.7万名战俘。”

美国人一硬,李承晚又受了惩罚,终于夹起了尾巴。

7月27日,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中朝谈判代表团和志愿军将领都来到了会场。上午10时整,朝鲜南门将军和哈里逊在两张长桌上早已放好的18份用朝、中、英三种文字书写好的停战协定文本签字。在十分钟时间里,他们互相没说一句话,也没看对方一眼,各自签完字便扬长而去。

签字仪式结束后,18份文本于当天分别送双方司令官签字。朝鲜一方在平壤于当日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金日成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一方由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板门店签字仪式结束后,金日成和彭德怀下达的停火命令随即播发。

当晚,志愿军代表团在开城举行庆祝晚会。

晚上7时,彭德怀和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员崔庸健走进了会场。会场里顿时沸腾起来,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彭德怀显得异常兴奋,摘下军帽挥动着,向欢呼的人们致意。他即席发表了讲话,激奋地大声说:“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确实,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企图霸占朝鲜全境的野心遭到破产而告结束。对于这一胜利,人们欢欣鼓舞。在北京的毛泽东松了一口气。协定签署当晚,他走出屋门,深深吸口气,然后唱

了一嗓子京剧。

对于这场战争，他后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豪迈地总结说：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 800 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 50 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 1953 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 21 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

毛泽东的话诙谐有趣，生动地道了战争的胜负转变和美国人的狼狈。

8. 在制定宪法的日子里

时光匆匆地进入了 1954 年。此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了，土地改革完成了，经济工作也大有成效。

毛泽东和中国“开始引起人们的更大的注意”，^①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经过三年的奋斗和努力，各地工农业生产有了新发展，人民政府掌握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特别是国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各行各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内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

这为全国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经过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讨论，党中央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方针，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12月，中央宣传部拟订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经毛泽东修改后，党中央批准，总路线的表述更为完整和全面了，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个总路线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时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发出了新的号令。

在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毛泽东是两手抓，开始了

^①《土耳其〈共和国报〉文章〈跟着毛泽东〉》，载1976年9月19日《参考消息》。

国家政权建设工作。12月2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去浙江省杭州。

这次他说是去休养，但去时带了两箱子书，其实是带了一个秀才班子，要在那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政权建设中，毛泽东把法治放到了第一步。毛泽东到达杭州后，住在刘庄招待所。与他一起的，除宪法起草小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十几名“秀才”外，还有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和摄影记者侯波等人。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并党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汇报自己的情况，告之说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总的工作计划如下：

(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工作计画后，也对其他工作做了交代：“为了在2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他列出的文件有：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2) 1918 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3) 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4) 1913 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 年曹锟宪法（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1946 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5) 法国 1946 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他列出这些文件还附上出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去学习，对宪法有个清晰了解，一则在高层先进行“普法”，二则以使他们讨论宪法草案时能有的放矢。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新年来临之际，毛泽东没有去准备过年，而是带着几个笔杆子躲在杭州，潜心看书学习，研究古今中外宪法，以制定共和国宪法，可谓颇具匠心。

在紧张的起草宪法工作之余，毛泽东时常带着工作人员到杭州和附近乡村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当地工农业生产情况。他非常关心浙江农副业生产，一日，提出到出产龙井茶的龙井村去看看。警卫人员心想：龙井村一带居民集中，主席去的地方，还是群众少一些为好。为了保密和安全，他们连忙作了布置。

毛泽东说走就走。他一到龙井村，下了车就像往常样，直接往农民家里走去。谁知家家户户都是门窗紧闭，不见人影。毛泽东纳闷了，问身边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怎么了，群众都下地干活去啦？”

汪东兴不敢撒谎，只得照实说：“今天群众都到乡里开会去了。”

原来，由于警卫部门的紧急布置，当地茶农都被“请”去开大会了。毛泽东马上就察觉其中的奥妙，不高兴地说：“不看喽，不看喽，我们回去。”

警卫干部们觉得工作没做好，可拿不出更好的补救办法，又尴尬又紧张。没走几步，身后传来了几声鸡鸣，毛泽东见警卫人员一直很尴尬，于是用缓和的口吻，风趣地对其他随行人员说：“群众不在，大公鸡欢迎我们呢！”

他这次龙井村考察农副产品之行，由于没有见到群众，没有成功。

在建国后，毛泽东除对粮食生产很重视外，对于事关群众生活的农副产品，也十分关切。1953年10月16日，他专门就重要土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给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正副主任陈云和邓小平写信，提出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问题，指出说：“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要求他们邀集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专为此事座谈一次，定出近期和远期的购销计划，并具体指出要对“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籽，茶籽，棉籽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等类”重点关注——抓好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

除嘱咐其他人去抓去办外，毛泽东自己不忘调查研究。龙井村碰壁后，他回到驻地，便找其他工作人员作一些调查。

此时刘庄招待所正好刚招进一批服务员。他们是从浙江各地来的，知道社会上很多新鲜事，便成了毛泽东社会调查的对象。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了解了不少关于诸如菜篮子、猪圈子等工农业生产的情况。在谈家常式的交谈中，他对服务员们的个人情况也有一些了解。

女服务员孙丘珍的父亲原是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呆在家中，一家四口人，全靠她每月28元工资维持生活。毛泽东得知她一家情况，关切地问道：“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得了家吗？”

“不能。”孙丘珍回答说，“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毛泽东说：“那我也来接济你一点吧。”

孙丘珍一听，这怎么行，连忙推辞说：“怎么好用你老人家的钱呢？”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毛泽东说着，略带骄傲的口气笑着告诉说，“这些稿费，是我自己挣的钱。”

随后，毛泽东交代身边的罗秘书：“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里非常困难。”

事后，罗秘书从他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转交给孙丘珍。捧着500元钱，孙丘珍激动得热泪盈眶。

2月3日就是农历春节。春节前，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赠送毛泽东24箱苹果，远程送到了杭州。

对于国内外友人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他不是自己收下，要交公的。并且，他一般见不到实物。卫士长收到礼品后，只给他一份白纸黑字的礼品单，实物由中央办公厅负责礼品的部门直接交公。这次金日成的苹果送到杭州后，毛泽东照样没看到实物，可苹果不可能长期保存。于是，卫士长李银桥请示他：“这些苹果不宜保存，咋处理为好？”

毛泽东说：“把它们转赠给警卫部队，过年了，就让战士吃吧。”

他没有留下自己吃，却想到了战士们。李银桥遵令带着几名工

作人员把24箱苹果一起送到随行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战士们得悉毛泽东送来了苹果，十分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谁知一拿上手心里，准备往口中送时顿然傻了眼：这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个个整齐匀称，可上面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且怎么也擦不掉。

这些字是苹果园的园丁早早写在苹果上，用阳光长期晒出来的，是用特殊效果制成的。“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战士们束手无策了。怎么办？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苹果怎能保存很久呢？烂掉了，更不好！”又有人说。

大家都左右为难了。李银桥也没办法处置，只好回去，再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皱着眉头，摇了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活不到，那就吃掉。”

这话说得李银桥忍不住哈哈大笑。

随后，按照毛泽东的交代，24箱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一中队战士们痛痛快快地吃掉了。

农历1954年春节很快就到来了。驻守刘庄的一中队战士集体前去给毛泽东拜年。见面时，毛泽东还记得苹果的事情呢，笑着问道：“你们把我‘万岁’的苹果吃掉了，味道怎么样？”

这一问说得馋嘴的战士们个个怪不好意思的。

这时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哪个人能活一万岁？吃掉了‘万岁’，你们过了一个好年，你们看，多好啊！”

这是在杭州期间的另一个小插曲。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2月中旬，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拿出了初稿。毛泽东对此进行了精心修改。

2月17日，他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张一平把初稿送去北

京，给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并要求刘少奇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他交代刘少奇说：“于2月20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20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18）日动身，20日可到北京。”

随后，毛泽东又送去二稿、三稿。

2月28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三读稿。与此同时，党中央决定由董必武等人组成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两位法律专家为法律顾问，聘请语言专家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三读稿进行进一步研究和修改。

3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四读稿。

至此，宪法起草工作差不多了，毛泽东紧张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3月2日，他与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张耀祠等人一起去爬五云山，放松一下心情。同行还有随行在杭州的工作人员。

路上，毛泽东边走边与摄影师侯波聊天，问她道：“你最近看什么书？”

“看《红楼梦》。”侯波说。

此时正兴起“红楼梦热”，谁要是不知《红楼梦》那就一定“落伍”了。侯波以前没看过，借了一部带在身边看。毛泽东问道：“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侯波回答说。

“要好好看，看三遍、五遍！”毛泽东说。

“看三遍？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哎，要仔细看喽！那样的家庭，那些人，你们可没看到过……”

毛泽东给她开始讲解了：“《红楼梦》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读懂它，就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了……”说着说着，他说起了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讲起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块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说他们中途发生了矛盾，闹不团结，但经过互相帮助，战胜了妖精鬼怪，到了西天，取回了经，成了佛。最后，他总结似的说：“我们革命不怕有不同意见，只要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目的就一定能达到。”

侯波哪知这些“深刻道理”？只是“嗯、嗯”地答应着，心想这些旧小说还有这么些大道理，怪新鲜的。很快，众人来到了山腰一个亭子里。毛泽东驻足饶有兴趣地看着亭子上的对联。

这时波向山下一望，哟，一处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大多是由几根木架围上泥糊的竹篱笆，再盖上厚厚的稻草就成了，冬暖夏凉。但一着火就无法扑灭，只能把值钱的东西抢出来，房子则任它烧去。她惊叫着：“唉呀，着火了！”

毛泽东回过身来，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人家火烧屋子了，毛泽东却叫好。随行的谭震林若有所思。罗瑞卿、柯庆施和谭启龙等人看了看他，都默不作声。年轻的侯波不解，忍不住说：“咦，着火还好，怎么说这样的话？”

“不烧了，他就老住茅草房。”毛泽东回答说。

“那烧了，他住哪里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侯波还是不解。

毛泽东没回答她的问题，好像没听见她的话，只是望着火烟沉思，好一会，才自言自语地说：“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侯波一惊：呀！他还念《红楼梦》上的诗句。

毛泽东说道：“唉，还是烧了好。烧了三年盖瓦房，不烧十年住草

房。我看朝鲜就可以坏事变好事。”

原来，他的思维比任何人都跑得远。毛泽东读书极多，思想极其活跃，有时说话带有很强的哲理性。而他考虑问题，也常是一般凡夫俗子所料不及。此刻他由烧掉一间茅草房联想到烧了旧的有新的，想到了朝鲜的战后重建。其实，他领着众人起草的新宪法，何尝不是这样？——新宪法正是打破国民党旧宪法而另起炉灶，此法的制定就是为下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瓦房。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随着政权建设的推进，中国将彻底改变旧中国的社会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才是他叫好的原因，是一位哲人跳跃式的思维。

起草工作完成了，3月17日，毛泽东和起草小组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他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进行研究和讨论。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以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和武装部队的领导机关组织各方面人士8000人进行讨论，先后提出了5900余条修改意见。6月11日，宪法草案修正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参加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讨论通过。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重要讲话。其中，他对这部宪法的评价是：“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500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宪法草案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讨论宪法草案。一时间，一场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当天，

在南京,《新华日报》多售出8万多份;福州,300多个扩音器分别以福州话、闽南话向全市50万人播送草案内容;四川,宣传员向群众作了约15万次宣传,听众达1800万人……

制定宪法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举措。蒋介石从建立政权到1946年,历时19年才起草、制定宪法。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四年,就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趣的是,蒋介石本人没有参与起草工作,只是让手下一大帮笔杆子闭门造车。毛泽东却自始至终领导和参加了宪法起草工作。他只带着十几个人,在短短几个月就完稿,也不像一些国家弄上几百人甚至几千号人马,拨出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资金去“起草”。毛泽东等人制定的宪法可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便宜的宪法”,花费最少。但他以千百万人讨论的形式破除了十几人制定的界限,以人民参与的形式来进行完善,集思广益,以达到至美。这是宪法制定史上最科学的方式,也是毛泽东的发明。

对于这部宪法的制定,毛泽东本人功莫大焉。他不仅提出了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了很多的修改。在修改和讨论中,出现许多要求对毛泽东地位和威望在条文中作出肯定的事情,对此毛泽东作了拒绝。

首先是“监督”和“下台”问题,宪法草稿中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罢免权的第三十二条修正稿本没有罢免国家主席的内容。毛泽东在审阅时,在油印稿上方添上“国家主席的罢免”批语,要求进行补充。宪法通过时,根据他的意见增加了相应内容,第二十八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等条款。这就赋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监督权和罢免权。毛泽东没有为自己永不下台安设机关。蒋介石在1946年宪法中没有罢免一条。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在宪法中规定可以罢免国家最高领袖的人。

在宪法上本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这在1923年曹锟宪法和蒋介石1946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这一款也被毛泽东大笔一挥，删除了。

在讨论中，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发言说：“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上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

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

这就是毛泽东的思想。

另外，新宪法类似的重大修改，还有许多地方。比如，曹锟和蒋介石在宪法中都为总统写上了“不受刑事上之诉究”条款，为自己任何作为（包括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不受处分的法外特权”，而新中国宪法中，毛泽东等人把这些“保命”“保财”条款全给废除了，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副主席，都没有这些超级特权。

这部宪法的制定由各地人民和群众进行讨论、修改、补充，成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各地参与讨论的人们特别踊跃。这时，我国发生特大洪灾，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并且大家提出了许多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将讨论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到中南海。

但是，这些意见还是避免不了出现要求在宪法中类似“为领袖请命”的现象。8月4日，华南分局给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广东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6日，毛泽东在审阅电报时，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拒绝了这桩事，又出现新的事儿。基于毛泽东在宪法制定中的巨大贡献，在宪法定稿的全民讨论中，有人提议把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

这还是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毛泽东不应民之请用自己名字命名宪法，其实也是打破前例的。

1804年，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制定法国民法法典时，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过了三年就应民之请改称为《拿破仑法典》，冠之以拿破仑的大名。1821年，他在圣赫勒拿岛临死前说：“我一生40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其骄傲的事情冠之以自己的名字，流传至今。而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却没有仿效，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民讨论宪法草案持续两个多月的讨论，参加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总共征集了118万条意见。为了及早整理好这些意见，工作小组几乎天天“开夜车”，最后，意见归整编纂成了16本册子，宪法起草委员会认真考虑后，又对草案做了一些重要修改。

新中国首部宪法即将诞生，将于9月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部宪法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人治历史画上了句号，而毛泽东拒绝以其名字命名该宪法和添加罢免权，废除豁免权，更佐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法治中国的决心。

9.“毛主席要搞公有，要我们把厂子给多数人，给人民，
我们舍得”

毛泽东制定宪法，决不是走走形式，蒙蒙国人或者骗骗外国人。他说：“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也就是说，新宪法确定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国家要由多数人掌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以此来团结全国人民，集合所有的人去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去实现国家的富裕和强大。

这时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推进，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全面铺开，全国农村通过互助组、合作社急速地往集体农业方向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开始公私合营，走集体道路，各行各业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快步朝着公有化、集体化的方向前进。全国吹响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号角。

毛泽东不仅关心农业合作化工作，也关心和重视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4月22日下午3时许，几辆黑色小轿车驶出了河北唐山火车站站台。毛泽东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唐山市委副书记刘汉生等人陪同下，迎着初春的艳阳，直奔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启新水泥厂而去。

启新水泥厂是河北一座很有历史的老工厂，是 1889 年大清洋务派唐廷枢等人筹资 6 万两白银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家生产水泥的工厂。岁月悠悠，启新饱经风雨，由当年两座土窑换成了 8 台新式旋窑，年产量增至 30 万吨，“马牌”水泥饮誉四方。它在水泥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他工商业中也有相当影响。作为华北的一个大厂，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造中如何走，也备受人们的关注。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视察，看看那里的情况。

启新水泥厂座落唐山市中心的乔屯街。毛泽东等人的车队穿行在繁华的闹市中，随即鱼贯驶入了厂区。汽车一停住，车门打开，毛泽东就走了出来。

早在厂门口等候的厂党委书记、军代表赵光立即快步迎了过去。

“这位是启新厂的党委书记、军代表赵光。”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

“你们总经理呢？”毛泽东握过赵光的手后，立即问道。

他为何问总经理？因为启新水泥厂总经理叫周叔弢，是北方民族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解放后拥护党的领导，并且与毛泽东是老熟人。毛泽东对他很熟悉，对他经营的工厂也很关切，故有此问。

“周叔弢总经理在天津。”

赵光的回答使毛泽东略有些失望，又问道：“副经理呢？”

“副经理似南笙，厂长汪公勤，副厂长陈达有、姜育后，都在办公室。”

“我要见见他们！”毛泽东说。

这些人都是资方代表。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唐山市委对这次视察已作精心部署，只安排军代表赵光一人作陪，其他厂党委成员分别到各重点部位负责“保卫工作”。毛泽东却不管这些，现在“要见

见他们”，令赵光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拿不准主意，赶紧请示市委书记刘汉生。经商议，他们决定由刘汉生亲往办公室，把姒南笙请过来，赵光陪同毛泽东先去车间。

在赵光的引导下，毛泽东一行人向着生产车间走去。

“这是什么？”毛泽东指着路旁一大堆花生、核桃大小的深灰色块状物，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是水泥生产的半成品，叫熟料。把熟料加入适量的石膏，磨成粉就是水泥。”赵光回答。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众人先参观原料车间三号、四号、五号磨。三台都是生料磨，是1921年安装的丹麦产球磨机，它们的大小、产量略有不同，内装钢球、钢锻分别为24吨至46吨，靠磨机旋转，以使得钢球、钢锻连续撞击石灰石块来砸成粉状。进入车间后，噪音很大，众人说话，很难听清。大家只好从磨机旁看看，就出来了。

此刻副总经理姒南笙风风火火赶来了。赵光赶紧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我厂副总经理姒南笙。”

毛泽东立即伸出右手，姒南笙一惊，赶忙躬着身，轻轻握过毛泽东的手，然后连退三小步，边退边说：“荣幸！荣幸！荣幸！”

毛泽东没有他这样的客套。随即，一行人来到了烧成车间八号水泥窑。这是回转窑，靠1600摄氏度的高温将原料车间生产的“生料”煅烧为“熟料”。这是水泥生产的一个关键工序。毛泽东不顾飞扬的黑色灰尘，领着大家从八号窑尾，扶着铁栏杆，从宽不足1米，高3米，斜度达50度的铁梯爬上去。谁知他们刚爬十几步，一股高达60—70度的热浪突然从北向南压了过来。许多人额头沁出了汗珠。滕代远见此情景，急了，生气地说：“赵光！你怎么搞的！温度那么高，主席会受热感冒的，得绕过去！”

“没法绕，只能原路回去。”赵光告诉说。

毛泽东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先是不解地问道：“工人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解放前两班倒，一天干12小时，现在改为三班倒，一天干8小时。”赵光回答。

“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我们从这儿走一走有什么关系？你前面走！”毛泽东断然地说。

毛泽东发话了，滕代远便不做声了。赵光领着大家继续朝前走去。滕代远还是怕出问题，快速跑到他跟前，轻声地说：“赵光，你赶快走，离开大窑之前别站脚，主席问你，什么也别说了。”

好在这悄悄话毛泽东没听见。他带着众人，沿着缓缓转动且不断散发灼热的大窑旁边，不紧不慢地边走边看。而赵光越走越快，不一会就走出窑门口了，可回头望去，毛泽东远远地在后面，不紧不慢，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这急得他暗地直跺脚，然而毫无办法。谁知当毛泽东走到窑头时，居然还停下来了，与看火工闲谈起来。

这是一位50开外的老工人，满头是灰尘。毛泽东和蔼地问他：“你是当班的师傅吗？”

“是……是。”答话人很紧张。

“师傅贵姓？”

“免贵，姓杨。”

“哦！外面的杨柳刚刚吐绿，你可是饱经风霜啰！”毛泽东风趣地说。

他这么一说，大家大笑起来，周围的气氛立即活跃了，领袖与工人的距离也一下子缩短了很多。毛泽东继续问旁边的一位青年工人：“你们几个人看这条窑？”

“一个正火，两个副火。”

“这里温度那么高，受得了吗？”

“习惯了，没啥！”

毛泽东问：“干几年啦？”

“三年。”

“技术怎么样？”

“比老师傅还差得很远。”

“要好好向老师傅学，向书本学，边干边学。”毛泽东嘱咐他。

说完，毛泽东慢步走近窑门脸，透过碗口大的紫色玻璃窗口，朝大窑里望去。窑膛里烈火熊熊，一颗颗闪着亮光的灰块在窑里欢快地滚动。他幽默地说：“这些核桃、花生（指灰块）全部烧熟了！”

在混浊的空气中，他与普通工人在扬尘中一起谈笑风生，身上的黑灰尘也多起来了。在场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又为他的健康担心。滕代远急了，亲自上前催促说：“走，走。”又向赵光说：“快带着走。”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还是依然故我，在黑灰尘中走着，看着。

当一行人走出八号窑时，落满灰尘的地上增添了一行行足迹。赵光立即走向前，向毛泽东汇报说：“启新的水泥窑一共八台，刚才看的是最大的一台，都是回转窑，构造是一样的。按照生产流程，下面是制成车间，同原料车间一样，也是球磨机。水泥的生产过程就这样，没什么新东西了。”

毛泽东点点头，高兴地告诉说：“你和你们副经理，跟我到车上谈谈。”

赵光、姒南笙上车，跟着去了唐山火车站。然后，两人被工作人员引进了停靠在车站的专列，上了一节车厢。刚落座，服务员便递上了热毛巾、热茶。擦过脸，赵光思索着如何向毛泽东汇报。资方代表姒南笙则很拘谨，也等待着。

一会儿，随行人员过来说：“主席请赵光和副经理。”

赵光、姒南笙立即起身，随他走进了另一节车厢，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见他们进来，立即从沙发上站起，再次同两人握过手，微笑着向旁边的沙发一指说：“请坐！”

赵光环顾四周，没有其他人，知道是毛泽东单独接见他们，本已平静下来的心又紧张起来，刚刚构思的汇报词一下子一句也记不起来。沉默了片刻，毛泽东拿出香烟，递给他们，然后自己点上烟，连声说：“吸吧！吸吧！”

然后，他望着赵光问道：“你是哪里人？”

“河北丰润县。”

“年纪多大了？”

“36岁。”

“什么时候参加工作？”

“1940年。”

“哪年到工厂？”

“1949年3月。”

“读过几年书？”

“两年私塾，两冬夜校。”

“工作起来有困难么？”

“在农村干工作时，文化低点问题不大，进城以后就感到有困难了。”

“文化低，确实有困难。但经过努力，文化是可以提高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没有上过学，后来经过努力学习，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毛泽东顿了顿，告诉他说，“我们那里有个张保金，从前给人家放牛、当雇工，没有读过书，后来跟着我。他就很有眼光，学习很用功，到人民大学读书，还考第一名呢！”

这名张保金，就是在香山站岗时让工人叮叮当当影响睡眠而挨毛泽东罚站的警卫战士。然而，他离开警卫团多年，毛泽东还记得他，且以他的事迹鼓舞他人。

赵光也向毛泽东汇报说：“我现在正上业余文化学校。”

“到业校学文化是个办法，但主要的还是要坚持在工作中自学。”毛泽东像对小孩子一般教导，“既要学文化，又要学技术，学管理。要向工人学，向一切内行的人学，全都学懂不可能，但一点不懂也不行！”

赵、姒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话。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桔子。毛泽东拿起一个递给赵光面前，赵光赶忙站起，双手接着。毛泽东又从盘里挑出一个大的递给姒南笙，姒躬着身，双手接过，好一会才坐到沙发上。

“你们吃！吃嘛！”毛泽东边说边拿起一个桔子，自己剥开皮，尝了一片。接着，他面向姒南笙，轻声地问道：“你是水泥厂的副总经理？”

“是！”

“在哪个学校毕业？”

“上海交通大学。”

“学什么专业？”

“机电。”

“学机电的，怎么到水泥厂呢？”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道。

“水泥厂有不少机电设备，鄙人对水泥也比较感兴趣。”

“你们公司现在资产多少？”

“大约 3100 个亿（旧币）。”

“搞合营舍得舍不得？”毛泽东问道。

这七八个字，虽然他说得既轻又快，但姒南笙却感到字字重比

千斤。为什么？他本人在启新拥有 1039 万股股票，大小是个资本家。这些股份是他奋斗十几年的家产，一下子要拿出来合营，如何舍得？因此，他踌躇一会儿，没有回答。

毛泽东没要他一定回答，更没呵斥他，随后转而把话题说到别的方面，避开了这个人家不愿谈及的敏感话题……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站起身来，又一次握过赵、姒两人的手。赵光忙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的话亲切有力，充满了无限的期望。赵光暗下决心，坚定地说：“一定照办！”

而姒南笙呢，则向毛泽东深鞠了一躬。随即，两人下了火车。

当他们回到启新厂时，毛泽东视察的喜讯已不胫而走。赵光决心以工作实绩回答毛泽东的期望，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这次在专列上谈话的内容。接着，党委会组织技术员、老工人分别进行座谈。经过反复调查、推敲，最后众人以党委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为年产 100 万吨水泥而奋斗》的报告。

姒南笙呢？也告诉人说：“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还握了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是我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启新要尽一切力量把工作搞好，不然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国人民！”

第二天，他急急赶去设立在天津的董事会，见着总经理周叔弢，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的启新之行和谈话的内容。

听了毛泽东视察启新的汇报，特别毛泽东“合营舍得舍不得”的问话，周叔弢思潮翻滚，激动不已。早就 1949 年 9 月，他就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聆听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震撼世界的声音。次年，他当选天津副市长。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单独接见，鼓励他为中国作出贡献，临别时送

到门外，并派自己的座车送回寓所。去年9月，他到北京参加政协第4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报告后，他很激动，再次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会后，又主动找到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表态说：“我们早就提出过变启新为公私合营。因为启新变公私合营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一是劳资关系比较正常；二是工资比较合理；三是启新股票国家银行已占17%，再加上‘五反’退补款，国家不用拿钱就能合营；四是干部问题，经过教育，把现有的干部都使用起来，问题就解决了。”

大概是李维汉把此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所以这次他从南方回北京，特地在唐山停车，去了启新水泥厂，希望他为全国的工商业公私合营带一个头。

想到此，周叔弢对姒南笙郑重地表示说：“毛主席问我们‘合营舍得舍不得？’问得很好！现在舍不得也得舍得！”

顿了顿，他又对姒南笙说：“人不过饮食起居，少数人骄奢淫逸是不行的。毛主席要搞公有，要我们把厂子还给多数人，给人民，我们舍得；送给某个私人，我们就舍不得。搞集体，我们舍得，舍得啊！”

两天后，周叔弢风尘仆仆地从天津来到了唐山。

在启新党委书记办公室，他找到赵光，很动情地说：“毛主席来厂视察，是我们公司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已经开了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决议：申请合营。希望赵代表多予帮助。”

这次毛泽东虽没见到周叔弢，但他和毛泽东一样有远见、有公心。身为生意人，周叔弢在商却不爱钱，胸怀天下公心，因此才获得毛泽东的赞赏。而毛泽东呢，如果说他当政后也和一些“大户”、“大资本家”交往过的话，绝不是从他们手里“刮油水”来为自己谋私利，也不是借此给对方以种种好处。他与他们交往，是为了引导他们一起前进，一起投身为多数人服务的事业中去。这多少有些像战争年

代他动员傅连璋把医院献给中央苏区。他是动员工商业者一起为国家、为多数人的利益，把私产献给国家，献给多数人，以实现社会的共有，让多数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这些“大户”和“大资本家”与毛泽东交往的结果，得不到一项工程、一块地皮，也得不到税收优惠，更别谈损公肥私，而是和毛泽东一起迈向了“一无所有”但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金光大道，最终皆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成为真正的“一代英豪”。

除了周叔弢外，天津的盐碱大王李烛尘，上海的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林爽、火柴大王刘鸿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北京同仁堂乐松生等一大批实业家，都是这样的人。并且，他们都是毛泽东党外的好朋友。

6月16日，根据“国家的需要，改造的可能，资本家的自愿”三个条件，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了启新水泥厂的合营申请。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公私双方先后进行四次协商，达成了合营协议。9月3日，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杨思久和周叔弢分别代表公私双方在协议上正式签字。

启新水泥厂实现公私合营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后，立即在全国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持观望态度的资本家受到极大鼓舞，不再吝惜自己的家当，由衷地说：“我们把企业还给人民，让它为多数人服务，这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全国公私合营的进度明显加快。雇工500人以上的工厂，1952年共174户，1953年只合营10户，1954年则猛增到86户。毛泽东等人原准备用15年时间完成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就提前完成。

这是毛泽东和一大批弃小家为大家的实业家一起倡导并引领的中国一场伟大的工业化变革，它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工业体系

的建成。

10. 留有余地, 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团结起来

新的社会在快速地建立。而人却还是原来那些人, 其中不少还是蒋介石时期的旧军人、旧官僚。对于这些人怎么处理, 怎么对待, 是一个新政权或者治国者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事情。

毛泽东一生嫉恶如仇, 爱憎分明, 他会如何对待他们呢? 是杀掉, 一棍子打死, 斩草除根; 还是关押起来, 不给出路? 其实, 毛泽东嫉恶如仇的性格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便是: “不为已甚。”这表现在对敌斗争中, 讲究有理, 有利, 有节。

有理, 有利, 有节六个字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频繁地多次出现过。有理就是有道理、合规律、情理; 有利, 就是实践中获取最佳效果; 有节, 就是有节制, 见好就收, 不过分, 要节制; 其中, 本质是有理, 目的是有利, 关键是有节, 凡无节之动, 极端之举, 必不会有理、有利, 毛泽东自己也要求部下们不做。可以说, 这种“不为已甚”的品质, 几乎贯穿毛泽东的整个人生, 表现在行事风格上, 是凡事留余地, 从不做过分的事情, 就是对敌斗争也是如此, 留有充分的余地。

且不说解放后毛泽东不对挖祖坟的湖南军阀何键的亲属和蒋介石的祖坟进行报复, 一不鞭尸, 二不抓人, 反而派人保护蒋坟; 就是在处理内战中宣布的战俘、罪犯们, 事后也一律“给予出路”。1951年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对“犯死罪”的敌对分子采取“死刑缓期执

行”。后来，“死缓”作为一刑名写入新中国的法律，开创了古今中外法典的先例。毛泽东说：“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对敌对过的人，都留有余地，对当年扛枪与解放军对仗过的国民党军，不仅仅是不杀，反而进行救助，给以谋生的工作，尽力把他们接纳到新社会中来。

1952年6月16日，滞留在大陆被解放的一些原国民党军官，因为生活困难，串联起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就业，分配工作。信中，他们报告说一些国民党下级军官陷于失业，要求参加解放军，或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拒绝，走投无路，因此要求国家予以收容和改造，不使流浪社会。对于这些原来的敌人，多数胜利者会斩草除根。尤其此时新中国还在对外进行朝鲜战争，逃在台湾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叫嚣“反攻大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些旧军人就可能是“潜在的危险”，“高明的人”往往会“防微杜渐”，把他们进行禁锢、关押。然而，毛泽东却没采取这样“高明”的措施。6月25日，他看到这封信后，当即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

总理：

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

毛泽东

6月25日

毛泽东要求在失业救济会议讨论处理此事，对陷入困难的旧军官伸出了援助之手，体现出“团结一切人”、“不搞打击报复”的博大胸怀。也许正是这封信，引起了他对旧军官群体的注意。1954年在

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对他们更加关注了。

初秋的一日，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来到义生里街道，专程来看望原国民党上将鹿钟麟将军。在座谈中，他告诉说：“党中央毛主席想请您做点事。”

毛泽东要请自己去“做点事”，这让鹿钟麟大吃一惊。

因为他当年是赫赫有名的“反共分子”，还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反动将领”，与共产党有血海深仇啊。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鹿钟麟曾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24年，他追随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率部进入北京城，控制全城并囚禁总统曹锟，带兵将末代皇帝溥仪及皇室嫔妃驱逐出紫禁城。但他有功也有过。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5000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进行反帝请愿，遭到军警开枪，死47人、伤200多人。鲁迅先生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指挥军队镇压学生的刽子手，就是鹿钟麟。

抗战时期，他收编地方武装，向八路军进行挑衅，制造摩擦。1938年10月5日，朱德、彭德怀在延安特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说：“连接冀南来电，自鹿钟麟到南宫后，曾数次发生友军攻击我军事情……现为自卫起见，已集结一部兵力以备万一，请酌量报蒋，请令停止。”27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共同致前方朱瑞、徐向前等人电报，提出“向鹿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计划的情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但鹿钟麟并不以为然。

当他获知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扫荡”时，当夜转移。中共方面的冀南公署主任杨秀峰率领公署转移到巨鹿。他又发布公告，说杨秀峰逃走，不知去向，撤销杨公署主任之职。在八路军袭击下，日

军退出南宫，老军阀张荫梧部抢先入城，大肆抢掠，“比日本人更凶”。蒋介石委任鹿为冀察战区司令。他与张荫梧以省府和民政厅的名义，到处委派县长，致使冀南行政公署20几个县出现一县两个、三个县政府的局面，索款要粮，演出“双县长”、“三县长”的“双包案”、“三包案”。他在河北造成抗日阵营发生严重事态。

抗战胜利后，鹿钟麟虽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宣抚使，但由于是杂牌军，终于被排挤出局。他只好回了天津，搬到义生里寓居。这才结束了他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生涯。

1949年天津解放时，解放军清理国民党残留官兵时，认为鹿钟麟是国民党大官，把他带到军管会。但军管会主任黄克诚获悉后，认为他这些年洗手不再与我们为敌，可以算是民主人士，并派车将他送回家。

不久，鹿钟麟的老部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受毛泽东之托，来天津看望他。为表达对中共领导人尊重，感谢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关心的谢忱，鹿钟麟将自己在抗战中杀过日寇的一柄战刀，托南汉宸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等人当政，坐天下了，不仅没追究自己当年搞摩擦的罪责，反而待之以宾，这使鹿钟麟很受感动。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此时他虽已年届古稀，自愿以普通公民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担任了义生里的街道代表。

街道是城市就小的单位，工作繁琐而细致，昔日的上将屈就这一工作后，却不辞劳苦奔波。他入户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呼吁做好防火防盗工作；他为办学四处奔走；他抗美援朝时期，他不但自己带头捐献，还发动市民捐献，当选为第十区捐献推动委员会委员。有一次，他在上香港大楼楼梯时，不慎把脚扭伤，但仍坚持工作。他经常对人说：“我为人人团结紧，人人为我共前进。”

鹿钟麟的工作热情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然而，他虽然对街道工作兢兢业业，但终究是抗战时有名的“摩擦大王”，党内不少人对他还是有反对意见。毛泽东对城市工作十分重视，对街道工作也是倍加关切，获悉鹿钟麟如此热心街道工作，很是赞赏，对天津市委的干部说：“人家历尽政治沧桑，过了一辈子戎马生涯，现在却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自愿出来协助政府开展街道居民工作。他拥护新政权，生活在群众中，热心从事爱国卫生运动，积极促进里巷睦邻工作，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力。我要见他。”

于是，便有了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拜访鹿钟麟之事。

那毛泽东到底要请他做点什么事呢？可不是小事。统战部长告诉他：“党中央准备邀请您参加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行！”鹿钟麟当即表态说，“再给我一匹马两支枪，我照样像当年那样冲锋！”

不久，毛泽东正式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鹿钟麟获知这个消息时，万分激动，对来人地说：“毛主席不计前嫌，共产党真是伟大啊！”

随后，他应邀赴京参加颁发任命书大会。会后，毛泽东接见和宴请他。席间，鹿钟麟代表义生里街全体居民转达了对人民领袖的问候。毛泽东却赞赏地回答说：“你统街邻如御大军，成了办街道工作的专家！也请代表我向义生里街全体居民同志们问好。”

接着，他又对鹿先生说：“开全国政协会议时，要请你向大家介绍经验，让大家向你学习。”

这次毛泽东的接见给鹿钟麟巨大的鼓励，更坚定了他做好街道工作的决心。回到义生里街后，他向全体居民讲述被领袖接见的经过，转达了毛泽东对大家的问候。义生里的居民欣喜若狂，敲起了欢

乐的锣鼓，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

鹿钟麟历经好几个朝代，览尽世态风雨，看遍世道炎凉，在新中国却被自己曾经敌对的政权奉为了上宾。若干年后，有人还不解，在网络上发出“毛泽东喜欢鲁迅而保鹿钟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感慨。

其实，毛泽东启用鹿钟麟，正是“不为己甚”品质的体现。鹿钟麟能自觉投入新的社会和建设_工作，完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而毛泽东对于他的热情更进一步进行推动，亲自请他“做点事”，亲自召见他，与其说是对鹿钟麟个人的关心和鼓励，倒不如说是对那些旧军官的关心和鼓励，并且以鹿钟麟为榜样就他们如何迎接新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同时，毛泽东也为各级党政机关如何做好旧军官的工作做出了示范。

毛泽东接见鹿钟麟后，北京的《团结报》发表《鹿钟麟同志在街道工作中》专题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引下，残留大陆的上百万国民党旧军官纷纷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地实现了身份的转换，成为了新中国建设大军中的一份子。

毛泽东“不为己甚”的品质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出威力，成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明证。而他的大度在敌对斗争中仍然在继续。

这些年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且不断派飞机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1955年1月18日，为了惩罚他，毛泽东下令解放军一举攻克蒋占据的距离福建大陈岛仅15公里的一江山岛。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立即慌张了，决定率领大陈岛守军撤离，并带走岛上1.4万居民。2月2日，海军司令部就海岸炮兵使用部署给中央军委发来请示电报。毛泽东不同意其中对撤退蒋军进行开炮轰击的安排，并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指示在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不要向港口一带射击：

彭德怀同志：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

2月2日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大陈岛撤退没有采取“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策略，反而否决了军中提出的炮击建议，不贪“小便宜”，除了珍惜军民生命外，也是“有节”的体现。事实上，此时福建沿海的对峙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蒋介石一直与美军勾结，去年以来美军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在飞机掩护下在舟山群岛一带游弋，毛泽东曾对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不先向美军开炮但“如大陈岛蒋军趁机对我守岛部队攻击，则应予以坚决回击”的建议签字同意。现在，他却放弃“这么好的教训蒋介石的机会”，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毛泽东做事不过分的处世态度堪称典范。

3月中旬，蒋军从马祖等岛屿撤走，毛泽东再次写信给彭德怀，指示“不要攻击”：

彭德怀同志：

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泽东

3月14日

毛泽东对互为敌对的同胞还是采取“不打”的政策，主动放弃“夺取战利品”的机会。后来有人评说：“毛泽东的宽宏大量是蒋介石在晚年多次希望国共开启和谈的思想基础。”此话不是没有道理。

做事不过分，留余地，是毛泽东大度胸襟的体现。以德服人，是他为政治国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区别古今中外领袖们的过人之处。有人说毛泽东是中国人中最精通国学的，不管这话准确不准确，而他“不为己甚”、宽宏大度的品德，倒确实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道德的精髓之一。正是他做事不过分、留有余地的做法，让这个千年帝国的封建割据永远离开，让千年来的民族矛盾彻底化解；也正是他的这些品德给整个中国人带来了自信，让整个中国人团结一心，同心协力朝着建设富强国家的目标努力。

11. 一个划时代“动作”

2008年4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毛泽东是终点还是起点》说：“透过历史功过局限和政治是非的迷雾，人们豁然发现，毛泽东作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震撼世界的英雄代表，其实仍然耸立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为正在努力奋斗的新一代中华儿女提供着巨大的激励、启迪和力量。”能够站立在时代的制高点，为中国人民指引国富民强的发展道路，是毛泽东最杰出的地方。

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由人民来当家作主，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向追求的目标，也是毛泽东站在时代制高点的“一个划时代动作”。

1954年9月15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少数民族的代表，其中女代表147人，少数民族代表178人，在到会的1141位代表的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这是一次人民的盛会，将由1000多名人民代表全国人民通过宪法，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

在此之前，只有《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1949年因解放战争还未结束，经济也在恢复，新中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1952年底，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1953年新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三项任务：（1）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2）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3）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

3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施行了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选举法》施行之后，全中国各地首次搞起了民主普选。民主普选，就是让老百姓自己选举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去选举国家领导人，以此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1953年夏，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崇德和另两位同事一起被借调到内务部，后被派往山东省泰安县城关乡搞普选试点。谁知在城关乡，有关选举的太多从未听过的新名词让那些祖祖辈辈只知道种地的农民一头雾水。

“啥叫普选？”

“啥叫选民资格？”

“人代会是干吗的？”

为了动员大家，许崇德和同事找来青年团员组成宣传队，挨家

挨户地宣讲：“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神圣的权利。”

很快，宣传见了成效。选民登记那天，登记点一早就排起了长队，连大半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的老大娘，也穿上最漂亮的衣裳赶来登记。然而，旧社会很多妇女都没有自己名字，只有“王家大妹”、“李家大嫂”这样的称呼。许崇德和搭档们在登记选民时，现场给她们起名字——“你叫王亚美，你叫李素珍……”登记选民，额外获得了自己从没有过的名字。

酝酿候选人、张榜公示之后，就到了选举的大日子。

开选民大会那天，乡亲们紧挨着站在一起。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这样就把乡人大代表选出来了。

被选上的村民乐得合不拢嘴。

对于饱受压迫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次选举的意义不同寻常。城关乡的农民正是亿万普通选民的缩影。此时全中国有6亿人口，举行普选的基层选举单位21.5万个，涵盖5.7亿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但是，这次选举受到老天爷的“阻拦”。夏秋之际，南方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个别灾区的第三项任务当年没能完成，只好推迟到1954年。新年一到，各地继续进行普选工作。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9月初，各地选举出来的代表开始进京赴会。

这些代表大多数是“泥腿子”，他们的进京之行，并不容易。山西平顺县只有25岁的农民代表申纪兰是骑着毛驴，才走出大山，再转乘汽车，到了太原再登火车，奔赴北京。

第一次到北京开会，像申纪兰这样的代表“紧张得不敢讲话”。

他们没有文化，连选票上“毛泽东”三个字都不认识，但他们肩负着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完成父老乡亲们的嘱咐：“要把那个圈儿画圆，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

这几乎是所有来自最基层的那些劳动代表的思想。

大概是8月华南分局那封提议授予最高荣誉勋章提案电报的缘故，当民主盛会来临的时候，毛泽东却选择了“退”，甚至不打算在开幕式上讲话。水利部部长张治中获知消息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说：“这次人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你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经过考虑，毛泽东才决定在开幕式上致词。

9月15日下午，像申纪兰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走进了以前想都不可能想的中南海怀仁堂，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总代表数为1126人，报到的代表为1211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报到的15人，报到但因病因事临时缺席的70人，实到代表1141人，符合法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读了开幕词。他宣布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他在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

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最后,他一种格言警句式的话语结束了开幕词: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毛泽东的开幕词篇充满激情与自信,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政治宣言,表达了中华民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极大地激励千百万群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奋勇前进。

毛泽东的讲话,激动人心,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每一句话都让代表们觉得大受鼓舞。开幕式大会结束时,山东代表郝建秀的手都鼓

掌拍肿了。她把手给贵州的布依族女代表蒙素芬说：“你看看我的手，鼓掌鼓得又红又肿。”

“好多人都说手肿了。”蒙素芬回答说。

此时各族人民代表都对毛泽东有一种深切的热爱之情，难用一般语言表达，有好多代表与他手后，一天都不洗手。会议期间，大家一有机会就想去和他握手。会议工作人员反复给做工作：“不要都去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太累了。”

各个代表团也都一再强调：“尽量少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太累了。”

但是，多数代表只要见着毛泽东，还是冲上去，围过去握手。而蒙素芬却没去抢着和毛泽东握手。团长表扬说：“蒙素芬最听话了。”

谁知她说：“我个子小，也抢不到啊！”

原来她不去和毛泽东握手，不是不想，而是去了人太拥挤，她抢也抢不着，只能作罢。

在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会后发给大家进行讨论、修改，多次进行审议讨论。9月20日，大会表决宪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会议代表1197人，投票1197张，同意票1197张。获得全票通过。宪法除对国家性质、国家主席、副主席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进行规定外，还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大会期间，申纪兰每天晚上都要抽一会儿空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练习画圆圈。她练画圆圈干嘛？她要代表西沟村村民们选择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的名字下画一个最圆的圈。

对申纪兰来说，这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真是不容易。除只字不识外，她还是唯一骑毛驴上京的代表。但她对宪法有一个重大贡献，

就是参与了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内容和“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条文记入了宪法的过程。1951年，她当选合作社副社长，就对此事为妇女们说话了，在合作社中说：“妇女工分太低，每天上地只能挣三四分工分，大家都不愿意上地了。”

有人说：“你们的技术又不高。”

申纪兰回答说：“你们不能这样看待问题，不公平，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

但男人们就是不同意，她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去找党支部书记反映。党支部书记说：“那我们就来一场下地实际干活比赛吧！”

结果，申纪兰带着妇女在这头干，男人们在那头干，干完了，妇女们的技术也不低，没落到男人后边。这下，男人们说话了：“呀，这个可得给人家合理的记上工了。”

申纪兰领导妇女，追求平等解放，使得西沟的妇女自己挣到了同工同酬的待遇，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合作社。全国妇联闻讯，跑去西沟驻扎了一年进行考察，《人民日报》总编也去那儿驻过。而这次制定宪法，毛泽东等人把“男女平等”的条文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内容一起写入了宪法，还特地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申纪兰和许多妇女希求的事情以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这对于刚从半封建社会迈出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性的举措。有人后来说：“毛泽东一句话，中国妇女就有了选举权，就可以自由恋爱，一步实现了男女平等。欧美很多国家的妇女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有平等的选举权。中国妇女今天扬眉吐气，全因毛泽东。”

值得一提的是，与男女平等一起写入宪法的，还有“各民族一律平等”条文。布依族女代表蒙素芬含着热泪说：“大会表决宪法获得

全票通过，宪法草案中各民族一律平等，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等条文，使我特别振奋。过去布依族女人是没地位的，女人吃饭不能坐桌上，只能在厨房吃；男人说话女人不能插话；如果老公爹坐在一楼，媳妇就不能上楼等等。我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父亲去世早，家里没劳动力，我是老大，要干男人的活，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就像男孩子。解放后，我出来工作，在农会当干部，我们村只有我一个女干部。我母亲和我奶奶都支持我。虽然家里的活没人干，但他们仍很支持我。因为在我们那里，红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老百姓相信共产党，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

这些话语都是出自肺腑的。他们对于宪法内容的赞同，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切身感受。

另外，“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条文也被写进了宪法之中。这是“劳动者平等”的条文。但是，它进入宪法不是富人的发明，也不是他人的恩赐，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劳动人民通过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而获取的。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各民族穷人和各界劳动者的民主大会。此时三大改造运动全面开始，中国在经济层面上跳步进入社会主义。相应地，在政治法律层面上，中国将社会主义写入新中国宪法，并且完善了国家政体中的民主、平等等内容。

当大会进行选举时，申纪兰和其他工人、农民、教师代表一起选举国家领导人。她终于画好了神圣的那个圆圈，把毛泽东选举为国家主席。9月27日，在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人大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当选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次日下午，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3时50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开创性的。

后来，有人说：“毛泽东灵魂中的上帝是工农大众，是无产阶级，为他们生，为他们死。最神圣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农的政权，穷人的政权。”这次大会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国家的这个政权性质。

建国后，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倡导民主，但不是西方国家的富人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即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当家做主，这是工农政权的民主，是穷人当政的民主，是各民族劳动者的大民主。这次1000多名代表以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议会”。一些旧中国过来的老法律人士忍不住说：“从没见过哪个西方国家的议会，会给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保留代表名额。与中国不同，西方的国家议会只给富人和贵族保留名额，设置参议院，参议员是世袭的贵族或富人。在这样的议会里，你只能听到富人的声音，永远也听不到穷人的声音。而新中国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却是劳动者的大会，是各个阶层代表最基层、最多数的代表的大会。”

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也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这就是农民代表李顺达所说的：“劳动人民都能管理国家大事。”这样的大会，难怪那些劳动者代表不会把手掌鼓肿，不会晚上练画圆圈也要把毛泽东选上国家主席啊！

人民的领袖，自然获得人民的拥戴。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得到全面确立，真真切切地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富人压制劳动者的旧社会体制，并且实现了男女平等，开创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

新阶段。

这完全是超越时代的治国模式。

12. 投桃报李：为中缅友谊奠基

有人说“毛泽东好战”，是“战争狂”。确实，毛泽东不畏强暴，也不惧战争，敢于与强敌斗争，大国小国都一样不惧怕，然而，事实上，他的战，是为了和。他是地地道道的和平世界的倡导者。他是与人为善、与邻为善的人，但不允许强人们骑在中国人头上。

1953年3月，日本三艘渔轮侵入中国渔区，公安部队立即把他们连人带渔轮“抓”了起来，押回国内。随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理。3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呈他的报告上批示：“三艘渔轮，可一起放还，只没收其渔（鱼）类。俟将来东京日本水产公司渔轮再来侵渔时，再决定没收其渔轮不迟。”毛泽东虽决定放人，但再来入侵就“没收”。一个“没收”，他的口气完全是处理不合法财产，强硬态度可见一斑。

而对友好邻邦，毛泽东一贯友好相处。

1954年11月30日，缅甸总理吴努冒着严寒，首次访问新中国。

中国和缅甸山水相连，是人民相亲的友好邻邦。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在中国境内称怒江）流经两国，有“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之说，两国人民亲昵地互称“胞波”（即同胞兄弟）。

在历史上，两国人民都受外国压迫。缅甸是于1948年宣布脱离

宗主国英国独立的。1949年12月6日,缅甸看到中国大局已定,外长在仰光公开对媒体说,会在圣诞节前承认新中国。此时中国另一邻国印度也准备于12月承认新中国。缅甸特地请求印度先等一下,于12月16日照会北京,表示决定承认新中国,成为中国邻邦中非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这时毛泽东还在苏联访问,指示复电询问缅甸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要求他们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并且说:“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接到北京的复电后,缅甸表示,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已撤消对蒋介石政权大使馆的承认,其在缅财产、资金均属于新中国。随后,经过一番谈判磋商,中缅两国于1950年6月8日建交。

缅甸积极承认新中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曾任缅甸总统的貌貌回忆缅甸的举动时说:“当缅甸政府决定首先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时,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此时缅甸仍是英联邦一员,虽宣称中立,建交后与敌对中国的美国等国家关系密切。因此,中方也认为缅甸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忠实的仆人”。建交之初,双国关系比较冷漠,交往乏善可陈。但朝鲜战争爆发时,联合国投票要将中国定为“侵略者”,缅甸公开反对,最后投以反对票,并在对华禁运投票中弃权,且向中方解释与美国经济合作协定,只是为发展经济,绝无与美国结盟封锁反制中国之意。缅甸的友好,也获得了毛泽东的好感。

此时国民党军李弥部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干着破坏、袭扰、贩毒、劫掠的勾当。为了尊重缅甸的领土主权完整,毛泽东一再指示云南边境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过界搜剿。这一英明决定赢得了缅甸政府的信任。1953年,缅甸终于停止接受美国援助。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中国也立即释出友好的善意,对于缅甸

顾虑的领土争端和所谓的“侵略威胁”，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对于缅共问题，也明确表示“不输出革命”。于是，1954年，双方关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为了加强同缅甸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增进友情，6月，周恩来总理首次应邀访问缅甸，同缅甸总理吴努进行会谈，发表联合公报，倡导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声明强调：“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侵略和干涉的恐惧，将为安全感和信任感所代替。”周恩来的访问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年底，吴努总理应周恩来邀请访华。12月1日，他抵达北京时，受到中国政府隆重、热烈和高规格的礼遇欢迎。

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颐年堂会见吴努一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以及我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会见。缅甸常年气温高，天气炎热，毛泽东怕吴努寒冷，见面就说：“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礼貌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泉源。”

“谢谢。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毛泽东谦虚地说。

然后，两人开始交谈起来。毛泽东针对一些周边国家受美等国造谣挑拨，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问吴努：“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打过仗。”吴努不明白毛泽东这个问话的用意，但告诉了他过去的历史。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略一沉思，又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这种坦荡的胸怀使吴努很感动。他也敞开心扉，坦诚地说：“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接话说：我们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所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今日看到你来访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点头，也颇为动情地说：“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你们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的友好，我代表缅甸人民向主席致谢。”

“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那里。”毛泽东摆了摆手，“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接着，他还告诉吴努说：“我们曾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对毛泽东重视中缅友好情谊表示感谢：“我们也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友谊，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

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接受过两年援助，后来我们停止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对我们来说，中国的友谊比美援要重要。”

两人越谈越亲近，越谈越推心置腹，从两国关系谈到华侨国籍，从政治避难谈到中缅边界问题，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到不久将要举行的亚非会议，无拘无束。最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吴努表示赞同。

毛泽东继续说道：国家不应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此，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臂，加重语气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接着，他以商议的口气对吴努说：“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五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五年，再进行五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

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友好合作更发展。”

毛泽东不仅没有那些大国“家长”的傲慢、蛮横,反而批评这种态度,而且拿出了真诚、平等的姿态要搞合作、要解决问题,这让吴努很受感动。他也打开了话匣子说:“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我们会被误会为英国、美国的走狗。现在我们见面了,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我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以他惯有的友善和真诚赢得吴努的信任和敬仰。作为中国的近邻,一个比中国弱小得多的国家,吴努相信了毛泽东和新中国对缅甸人民是善意的、友好的,也决心继续推进两国的友谊。

11日,毛泽东与吴努又进行了一次谈话。

期间,吴努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广州、武汉、北京、沈阳、鞍山、长春、大连、南京、上海、杭州等十大城市,认真参观了中国的工农业、著名大学、佛教寺庙,游览长城、中山陵,广泛地同我国各界人士进行了接触,还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就共同关心和彼此有利的事项交换了意见。

之后,中缅两国发表了总理会谈公报。

吴努结束中国的行程,回到仰光后,缅甸文学宫出版了《中国纪实》一书,该书图文并茂,汇集了包括吴努总理在内七名代表团主要成员的文章和访华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公开发表的讲话全文。

次年1月2日,毛泽东又亲自给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阁下发电,祝贺缅甸联邦国庆,说:“值此缅甸联邦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缅甸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并祝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

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两国的关系不仅破冰，而且进一步加深，变得越来越友好了。

在国家关系中，恃强凌弱似乎是通行的法则，强国欺压弱国的事数不胜数。这时在中缅比较上，缅甸无论是国土还是国力、军力都远远不如中国，毛泽东等人若是想把他们“吃”了，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他没当忽必烈，也没去做清皇帝，而是与缅甸和谐相处，这自然不是“战争狂”，也毫无“好战”之处。新中国不仅是对缅甸友好，对其他邻国尼泊尔、泰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也完全把他们当做兄弟来处，平等互助。毛泽东对于弱小民族的态度也赢得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尊敬。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缅甸《镜报》以《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主席》为题发表悼念文章，其中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卓越的世界领袖……毛主席在政治上是全面而纯熟的。毛主席在国际事务中也有许多卓越的功绩。毕生毫不利己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虽然逝世了，但是他的业绩将永垂青史，万古流芳！”^①其亲切、尊敬的口气，宛如对于自家兄长的情感。而世界上又有几位领袖，能像毛泽东这样获得邻国如此由衷的崇高评价呢？

这是后话。毛泽东采取与邻友好的策略，不仅为国内建设营造了和平的边疆环境，也加强了与周边兄弟国家的合作，有利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发展。

^①《缅甸〈镜报〉文章〈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主席〉》，载1976年9月24日《参考消息》。

13.“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5年仲夏，各地一派农忙时节，毛泽东也坐不住了，决定外出视察，并在杭州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方兴未艾的农业合作化问题。

专列从北京出发后，一路上从北向南，时走时停。毛泽东有时停车细察，有时下车访问。到达杭州后，他住进了当地的刘庄招待所。

但是，毛泽东没有休息，决定立即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汇报。会前，他把随行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喊过来，交给他们一个新任务，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你们帮助我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7月下旬，华东、中南地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会议开始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沈同便带着几个战士出发，去杭州郊区余杭一带进行访问，调查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他们顶着烈日，走进了一个村庄。因为正是农忙时节，青壮劳力都下了大田。结果，他们只遇到一个农民在家做木工，准备盖房子，人家也忙着呢。沈同便对战士们说：“我们还是到田头去吧。”

几人走到田间地头，老乡们正在田间忙着整理稻谷。很快，他们发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依着树干，仰天躺在那里，急忙走过去，却发现他两手抱头，眼里满含泪水，呆呆地望着天空。沈同立即向前去，问道：“你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

他看了看沈同，摇摇头，又闭上眼睛，而眼泪却滴到了胸前。沈

同这才看见他腹部鼓胀，颈部粗肿，行动困难。他分明是病倒了啊！沈同急忙问道：“你得了什么病？”

他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摇头，流泪。

“我们是特意来这里搞调查访问的，你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们。”沈同说。

他不说话，还是不停地叹气，过了老大半天，见沈同还不走，才讷讷说：“都是我的命不好，有福不能享，谁也怪不得，没得好说的。”说罢又是唉声叹气，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

为了弄清情况，沈同等人只好坐在他身边，等待着他说下去到底是咋回事儿。他见沈同等人很诚恳，终于一手抹掉眼眶里的泪水，勉强挺了一挺身子说：“我家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靠打工养活父母，还要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实行土改，分到了田地，再也不受压迫，也没剥削，不愁吃不愁穿，过上了好生活，真是千恩万谢共产党、毛主席！”忽然，他兴奋的情绪又低沉下来，有气无力地哀叹说：“可惜好日子不长，你们看，我害了大肚子病！”

“什么大肚子病？”沈同问道。

“大肚子病，就是虫子叮了，肚子肿大得病了！”病人说，“没有治了啊！”

所谓大肚子病，原来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是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血吸虫在人畜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后，在水中孵化为毛蚴，再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逸至水中。人畜只要接触有尾蚴的水，虫子就趁机侵入体内，导致人畜发病死亡。这个病在我国流行由来已久，晋隋以来就有记载。据说神医华佗对这小虫也很无奈，无法对付它。解放前，有的专家学者对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作过一些调查，而国民党政府不管百姓死活，没采取任

何防治措施。1940年,江西一些县血吸虫病死了上万人,省政府装模作样开了一次会,拨了万把块钱,就草草了事,继续任其发展,死人越来越多。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政府在毛泽东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传达后,做了大量的工作。江西省于1952年6月成立血吸虫病防治所,有180个专职人员。但是血吸虫病这个难以攻克的顽疾,在新中国并没有根绝,各地时有人得上这种怪病。

“得了这个怪病后,我就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本打算一死了之,可仔细一想,解放了,分了田,说话也挺起了腰杆,好日子才开头,这么白白地死了,对不起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究竟还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病人继续沉痛地说,“唉,我这个没用的人,不能报恩,还要白吃家里的饭,等着也治不好病,不如早些死了好呀!”

他边诉说边流泪,大男人被怪病折磨得泣不成声。

沈同等人知道他是位老实憨厚的农民,听着他的悲惨身世,很同情他的遭遇,纷纷劝他道:“不要难过,先把病治好,好日子还在后边哩!”

“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他失望又难过地说,“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我们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

沈同说:“现在解放了,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要大搞建设。你们的病也会有办法治好。”

“这个病流行千百年了,从来就没办法治好!”他迷惘不解地说,“再说我们这一带遭了地方病,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知道呢?!”

“‘三座大山’哪一座不是千百年来就压在人民头上?还不都被毛主席领导人民推倒了!共产党、毛主席就是给人民解除苦难的。你

们这里有危害人民的地方病，毛主席一定会领导大家消灭它，为民除害。他会把你们的病治好的！”沈同肯定地说。

病人听着，忽然抬起头来，怔怔看着眼前几个人，过了很久才充满激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是实情！要是毛主席知道我们这里还有人受地方病的害，肯定会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我这一辈子就佩服毛主席！”说完，他露出了难得的憨厚的笑容。

沈同几人带着他破涕为笑的面容，回去了。

见到毛泽东后，他们把自己在乡间看到的情形进行了汇报，尤其讲述了这位大肚子病农民的情况。

听到这个情况后，他久久陷于了沉思之中，没有说话。

这不是他无动于衷，而是人民的疾苦，是他最大的心痛，老百姓的疾苦正是他所最挂牵的事情。事实上，他也抓过这件事情。

中国是一个瘟疫肆虐的大国，结核病、血吸虫病、疟疾、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克山病、伤寒等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很多，而在旧中国，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和措施。毛泽东本人在中央苏区时就得过疟疾，他的警卫员戴天福也是因为疟疾而牺牲在长征路上。一般老百姓对这些瘟疫更无办法。

建国后，毛泽东为此着急难眠过，甚至厚着脸皮求过人家。

查阅《毛泽东文集》共6册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2册，毛泽东几乎没向“老大哥”斯大林要求过什么东西，然而在几千份的电文却有过仅有绝无的一次。

他开口向斯大林要什么东西？不是打仗急用的炮弹，也不是自己和高级干部们享受用的时尚物件，还不是国家建设的急需机械、资金，而是为张家口和北京人民防治鼠疫而急需的医疗队和药品。并且，这一次，他是亲自发电报求人，还是“狮子大张口”。

此事发生在1949年10月间，华北地区突然爆发罕见的鼠疫，死

亡不少人。刚刚进入中南海的毛泽东着急了，无奈之际只好亲自给斯大林发电报求援：

菲里波夫同志：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 60 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 4 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 400 万人份，血清 10 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 30 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28 日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在电报中，毛泽东开口要东西，数量巨大，要“生菌疫苗 400 万人份”和“血清 10 万人份”，而且十分紧迫，要求人家“空运”。可见何其急切。毛泽东向人家要东西，极其罕见，还如此不惜“厚着脸皮”，更是破天荒了。

当斯大林答应后，他欣喜若狂，只隔一日，10 月 30 日就给斯大林发去第二封感谢电报：“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他受人之恩，没视为理所当然，马上表示感谢。这与以前狮子大张口“要东西”而毫无君子之风的做法，完全宛如两人。两相比较，毛泽东对老百姓的疾苦，又是何其关切和心急。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工作得到迅速提升，毛泽东亲自为卫生部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1年9月初，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就全国防疫工作给党中央写来报告，提出防疫工作的重要性，说不少省县以下党、政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的人重视不够，以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而实际上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饿死的，且其中大多可以预防。9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亲自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口气十分严厉地说：“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然后，他极其严肃指出：“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毛泽东的态度使得这一指示立即得到贯彻，各级干部重视对防疫工作有了足够重视。

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场打起了细菌战。为了应对侵略者意欲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发动细菌战，毛泽东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3月，政务院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具体领导反细菌战，开展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各级防疫委员会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将卫生与爱国一起联系起来，是毛泽东等人创造的医疗卫生工作

的一大特色，也是把卫生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高位置。于是，全国党政军民学，上迄耄耋老人，下至中小學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这一气势磅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法、英、意、苏等国科学家为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争事实专门设立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派代表来中国调查后作出的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以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

毛泽东的“卫生战争”一开始就卓有成效。

而血吸虫病的危害，大概是去年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江苏太湖疗养。他的孙女沈瑜是无锡血防所首批创业者之一，了解病区百姓的疾苦，专门给沈老讲述了第一个血防试点大渲村的情况。沈老听后大有感慨，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血吸虫病流行猖獗的严重情况。

信笺送达中南海后，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种信，吾相信历史上肯定出现过多次，但任谁都束手无策，因为没有什么有效办法。”但毛泽东却不这么想，对此事极为关注。9月27日，他亲自复信沈老，指出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将信转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处理。

随后，卫生部门开始对血吸虫病进行调研，并开始采取防治措施。但是，旧中国的烂脓疮并不是一下子就可马上医治好或者完全消除。由于人口众多，像血吸虫病这样的传染病、地方病繁多，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要战胜它们，把烂疮割掉，仍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然而，这次身边工作人员发现的情况，又让毛泽东心里不安了。

他一生不会哭，只有看到人民受苦时才会哭，人民的疾苦是他

最心痛的事情。此刻听罢沈同的汇报，他过了很久，才抬起头，若有所思地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一些地方病危害人民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他们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他悲壮的语气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

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个千年妖魔了，接着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我们要和天斗争了！”

说干就干。在会议期间，他在农业合作化议题之外亲自对血吸虫病展开进一步调研，先后同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几个省书记进行座谈。陈毅、谭震林、曾希圣和杨尚奎等人参加。

谈起血吸虫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立即深有感慨地说：“1949年我们三野部队在渡江作战和水上练兵中大批感染血吸虫病，就开始了防治工作。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儿童得了这病影响发育，甚至是侏儒。妇女得了这病大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影响劳动，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力，死亡率很高，造成许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不少寡妇村、无人村就是血吸虫病造成的。”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接话说：“我们江西省丰城县梗头村，100年前有1000多户人家，到1945年只剩下2人，死于血吸虫病的占90%。江西省疫区以余江县较为严重。余江县兰田坂有块‘十亩丘’，解放前人们称这块田为‘棺材田’，钉螺密布，一下田耕种人就染血吸虫病死亡。兰田坂流传着一首民谣‘十亩丘、棺材田，头年人种田，二年人肥田’。有的老人亲眼看到先后有5户人家耕种‘十亩丘’丧生。”

“我们贵池县的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120户，现在只剩下曹金雨一户4口，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啼

嘘地说,“在一些农村,血吸虫病比妖魔还可怕,又没任何的办法。”

“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谭震林说,“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血吸虫急性感染爆发,仅有 5257 人的新民乡就有 4019 人急性感染,死亡 1335 人,死绝 45 户,留下孤儿 91 人,一时间高邮城内木材行的棺材告罄,运河西堤绵延 18 华里堆放了数以千计的棺材,一些村庄棺材排成排都找不到人抬。”

经过座谈,众人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已成为我国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病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危及到全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到了非下决心处理它的时候。

经过初步的调查,毛泽东了解到血吸虫病在我国十分流行,遍及南方苏、浙、湘、鄂、皖、赣、川、滇、粤、桂、闽、沪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 370 多个县、市、区。患病人数约 1000 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一亿人以上。人染上这种病,危害极为严重,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

这更加坚定了他与千年病魔——血吸虫病打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的决心。

11 月,党中央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准备印发全国以促进合作化运动的全面展开。然而,在会上,毛泽东却突然说起了“题外话”,再次提出消灭血吸虫病的问题。他指出说,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 多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动员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他向大家发出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会议还在继续。11 月 16 日,中央办公厅突然紧急电话通知卫生

部，说毛泽东在杭州开会，令副部长、党组书记徐运北即去汇报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其紧急的程度不亚于令徐运北去赶赴一场已打响了战争，宛如毛泽东当年急调许世友去攻济战场、杨成武出兵绥远。次日早晨，徐运北赶去北京西郊机场，搭乘中央办公厅送文件的飞机飞赴杭州。

到达杭州后，毛泽东正在与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

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就急不可耐地与徐运北见面。

毛泽东和柯庆施、谭震林、曾希圣等省委书记一起坐在饭桌前，一边吃饭，一边听徐运北汇报。在交谈前，毛泽东首先说：“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他们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

徐运北汇报了危害人民群众的几种疾病，说：“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

毛泽东立即插话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又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徐运北说。

毛泽东当即指示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

接着，他又说：“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很艰巨。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他指出了经过前一段时间调研找到的一些方法。在他的话后，在座的省市委书记们纷纷谈起各地群众的要求，都赞成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徐运北也大受鼓舞，告诉说：“卫生部已有一个15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计划。”

但有的省委书记等不及了，提议说：“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

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

毛泽东看着徐运北，说：“要考虑广大人民的要求。”

经过众人一阵议论，后来决定把目标改为七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在热烈的讨论中，众人认为防治血吸虫病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还关系农业、水利、宣传、教育等部门，并且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也要参加，要打“合伙战”、“联合作战”。

“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毛泽东集思广益说，“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然后，他点将说：“由柯庆施负责。”

中午的会议很热烈。下午，毛泽东和省委书记继续开会，研究合作化问题了。

晚饭时，毛泽东又把徐运北叫过来了。大家仍是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

谈论差不多了，毛泽东拍板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就叫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

他像当年作战一样亲自部署这场“血吸虫病歼灭战”。

最后，他亲切地喊着徐运北的名字说：“徐运北，你明天就离开这里，去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

这种语气，这种期待，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若干年后，徐运北都记忆犹新，想起都动情，感慨毛泽东的嘱托何其殷切，充满了多么深厚的热望。

第二天上午，徐运北就前去浙江嘉兴县，主要了解重点乡的病人和钉螺分布情况，几日之后，再转赴上海。在疫区，他耳闻目睹病人的痛苦，进一步认识到血吸虫病的危害，并且由衷地对浙江省卫生厅陪同人员说：“这次到了基层一看，我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是多么正确！”

而毛泽东从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都对他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也使得他更加信心百倍，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

11月22日至25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由柯庆施主持。到会的有血吸虫病重点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血防工作干部和部分专家、教授等。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大家检讨了自己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对群众关心不够，对血防工作认识不足的保守思想，决心进一步提高认识，搞好血防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了血吸虫病的分布情况，确定全国有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等12个省、市区243个县市（后陆续发现为378县市）流行血吸虫病，患者约1000万人，约一亿人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防治任务十分艰巨。会议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方针，具体步骤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最后，副组长魏文伯作了会议总结。

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也成立了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12月，领导小组属下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的成果，专家

们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指出:“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在他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也从上海开出,前往江西,随后停在江西向塘。在这里,他接见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刘俊秀及鄱阳县委副书记刘海峰等人。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询问了鄱阳湖的血吸虫病的情况,进行具体的“战前部署”。

此时全国农业合作化大大潮迭起,毛泽东在回京的路上又在天津召集北方省委书记进一步研究,形成了《农业十七条》。1956年1月,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商议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著名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接着,党中央在北京邀请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科技文教等方面的专家和各界人士1000多人进行座谈讨论,对纲要草案修改。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无论是《农业十七条》还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等,作为重要内容写入其中。在十七条中规定:“(十二)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二十八)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票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白喉、肺结核、麻疯、沙眼、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也应当积极防治。积极培养医药卫生人员,包括中医在内。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在党中央两

个发展农村和农业的文件，都把消灭血吸虫病放在“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首位。

1月25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会上，他在讲话中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第二日，党中央向全国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立即成为全党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动员令。

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心不仅使得患病群众看到了希望，也使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大为振奋。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专门写信给毛泽东，说土埋灭螺容易复出，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钉螺采用火焚的办法，永绝后患。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当即给徐运北写信：

送中央卫生部

徐运北同志：

原定今年3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毛泽东

3月3日

毛泽东不仅希望徐运北邀秉志参加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对这次会议也非常关切，亲自查询准备情况，可见他对全国血防工作是倾注了多大的心血。隔一日后，他再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

尚昆同志：

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3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有无准备？

毛泽东

3月5日

当日，徐运北向毛泽东送来了召开第二次血防会议准备情况的书面情况。隔一日，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报告，再次批示：

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毛泽东

3月7日

在末尾，他又补充写上：“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

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在短短几日内，毛泽东连续批示一个部委会议，一嘱再嘱，这样的情形是不多见的，只在战争年代指挥作战才有过。而他对会议安排之细致，也如当年指挥作战一般，交代又交代，生怕遗漏，面面俱到。为什么此事如此让他劳神牵挂？他内心对危害人民的严重疾病防治是多么急切，亲自指挥，大事小事面面俱到，就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病痛就是他自己的病痛，爱之切，分量重，才想得多，想得细。

3月24日至28日，全国第二次血防会议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流行血吸虫病的12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部分地、县代表，血防工作人员、科技人员、中央有关单位的同志。会议检查了第一次会议后的工作，总结交流经验，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提出防治血吸虫病必须采取综合措施，要求各地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季节，因地制宜进行“歼灭行动”。

会后，12个省、市以及属下的地、县相继成立血防领导机关，一场规模宏大的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共青团、妇联一起行动，全民动员，各种报刊、广播和农村墙报、广播、喇叭等宣传工具也开动起来，广为宣传。而干部和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开始进乡入村，边治疗，边预防，边研究，治标结合治本，一起行动。深受血吸虫病之害的乡村农民听说毛主席派人来治血吸虫病，要为民除害了，人人拍手称快，兴奋异常，积极响应，个个争先。

在防治血吸虫病医疗小组的科学指导下，各地防治工作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14. 新中国沿海建设和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很深邃,有人说:“很少有人考虑问题能有他那样全面,那样长远。他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设想是那么深思熟虑,又是如此长远,可以说看远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确实令人惊讶。”

这话没错儿。

毛泽东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考虑不仅长远,而且是全方位。在他的思想中,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全面的、立体的,决不是某一行业、某一产业的畸形发展,而是大经济、大生产、大贸易,国民经济各方面整体式推进。为此,他不仅重视事关人民生存的吃饭的农业,还重视事关穿衣和社会建设的工业,并且对基础建设也十分重视。在毛泽东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沿海地区的开放最早拉开序幕,而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就是我国沿海建设和开放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倡导开放的人。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一直有。1936年,他在延安第一次接受西方人采访时就对斯诺说:我们不仅团结友好国家进行互助互利的友好往来,而且“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①1944年他在接受美国记者福尔曼采访时,清楚地表明了我党对待外资的态度:“在相互同意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1984年第2期,第136页。

的原则下，我们允许并欢迎美国在我们的统治内部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我们所能做得出的我们都要做，但是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做。我们欢迎外国人以及外国资本来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①

这些都是战争年代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改变了没有呢？十几年如一日，他还是如此。1949年12月他在莫斯科访问时就曾致电周恩来并中央询问出入贸易情况，说务请统筹苏、波、德、捷、匈及英、法、荷、印、缅、越、罗、澳、加、日、美等国1950年的进出口种类和数量。其中包括大国小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使得新中国与西方的开放没有顺利展开。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合作。并进一步陈述说：“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他倡议中美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②10月他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时再次强调了这两个“两要”原则。

在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主要靠自己，但也强调要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并且他一有机会就会呼吁，努力巧引外力，比如第一次出访苏联就签订了巨大的外援合同。在国内的工作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1984年第2期，第134—135页。

②《西方学者谈毛泽东》，郑忠超主编，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中,他也积极养鱼先蓄水,为对外开放创造条件。他沿海建设和开放思想在建国后第一次视察上海时表现更为直接。

1955年11月初,毛泽东来到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进行实地视察。

5日,天气晴朗,金风送爽。上海港的领航船——“港申号”轮船挂满了五色彩旗,静静地停靠在黄浦码头。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早早来到了“港申号”轮船,仔细检查安全情况后,站在码头上船舷边,迎着清爽的晨风,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候着毛泽东等人的到来。

10时42分,几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进码头,在“港申号”轮旁平稳停下。毛泽东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二书记陈丕显等人陪同下,来视察上海港了。

当毛泽东从小汽车上走下来时,韩克辛快步迎上前,握住他的手问候道:“毛主席好!”毛泽东点点头。

韩克辛扶着他,通过舷梯,登上了“港申号”轮船。船员们早已列队,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兴奋地鼓着掌。毛泽东满面笑容,挥手致意,在韩克辛的引导下,走进了轮船的休息室。

这时轮船拉响了汽笛,徐徐离开码头,向上游驶去。毛泽东随即就从休息室走了出来。江面风平浪静,一群群白鸥临水飞翔。他信步登上了驾驶台甲板,站立在栏杆边,举目四望。韩克辛开始向他介绍上海港的历史,告诉说远在宋代,上海青龙镇就有“江南第一贸易港”之称,但从鸦片战争开始便沦为洋人的海港,被外国势力控制100多年,没主权,连关税收支权都被夺去。国民党几个官僚在港内控制一点码头、仓库和堆场,规模极小。整个港口的吞吐量不大。

毛泽东听着,语重心长地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操纵,发展不

快，现在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港口，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港口。”

柯庆施对韩克辛说：“你给毛主席讲讲解放后的情况。”

韩克辛说：“解放后，港口没收了官僚资本，赶走了外国资本，收回了港口主权，固定了码头工人的工作，建立了港务局领导机构，统一港口的行政管理和生产，并且对私营航运业和私营码头仓库业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还对装卸工作进行了技术改革，逐步使用机械代替人力装卸。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港口年完成吞吐量增至1100多万吨，全港85个码头泊位，年均每天完成吞吐量3.5万吨。如今通过上海港进出口的商品不断增加，与68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

毛泽东很高兴，露出欣慰的神色说：“68个了啊！”

“是的，吞吐量为94.3万吨。”韩克辛颇为骄傲地说，“工人们说新旧港口对比，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海港面貌日日新。”

毛泽东叮嘱他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大港口管理好，使它有个比较快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港申号”轮船继续平稳驶着。毛泽东不时询问看到的码头和停泊江面上的轮船情况。驶到高阳路码头时，韩克辛主动告诉说：“这里原来是英商的公和祥码头。”

毛泽东问道：“这个码头情况怎样？”

“解放前上海港外商的码头仓库，有英商的太古洋行、公和祥码头公司和美商的总统轮船公司，一共经营九个码头和仓库，占了全港的大多半。”韩克辛指着对面原公和祥码头说，“它是属于英商怡和洋行的，当年靠走私贩运、堆存、转运鸦片起家，以后又靠经营军火装卸、储存发财。他们仗着洋商在华特权，勾结地方官僚，抢夺民产，侵占公地，霸占码头和仓库，操纵港口码头仓库业务，横行霸道。他们还占据港内深水地段，又以资本雄厚的外商轮船公司做后盾，

随意制定费率，垄断港口码头仓库业务，比黑社会还坏。1949年初，他们看我们就要渡江，特权就要没了，赶紧抽逃资金逃跑，上海解放时他们码头仓库业剩下一些搬不走的老建筑和旧设备。”

毛泽东关切地问道：“对这些外国人的码头仓库，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是通过转让的办法接收过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问道：“怎样转让的？”

韩克辛便详细地汇报转让过程，告诉说：“解放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我们，支持老蒋，轰炸上海，封锁上海出海口。1950年底，美国冻结我在美财产，我们相应宣布征用美国在华财产，上海港征用了美商上海码头堆栈公司，对其余的外商码头、仓库则继续由外国资本家或代理人经营，业务由我们港务管理局统一管理，统一调度，这样取消了他们牟取暴利的特权，统一费率收费。这些外商没了特权，就搞不下去了，主动要求把资产转让给我们，条件是他们的欠债由我们还，设备无偿转让给我们。我们同意了。到1954年，外商大部分码头仓库移给港务局统一经营管理，变成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财产。”

“这么转让，对我们来说，是吃亏还是有利？”毛泽东又问道。

韩克辛回答说：“当然是有利啦。”

毛泽东高兴了，说：“转让这个办法好。”

此时正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毛泽东很关心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情况，问起了上海港私营码头仓库和轮船公司改造的情况和做法。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水上单独分为一个口，恰好是由韩克辛主持。他告诉毛泽东说：“水上口分为三个部分：私营海船、私营长江船、私营码头仓库和驳船。上海私营航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较早。1953年4月，北洋航线的中兴轮船公司、海鹰轮船公司就

成立了公私联营中兴海运公司。第二年，大陆、华胜等五家小的私营轮船公司合营。与此同时，上海地区的长江私营航业也实行了合营。”

毛泽东问道：“对私方人员怎样安排的？”

“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私方人员作了适当安排，例如北洋航线 27 名私方人员，安排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2 人，副总经理 2 人，正副科长 8 人，其余 14 人分别按专长在科室担负业务工作。”

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私营码头仓库业和私营驳船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毛泽东特别询问了上海有名的实业家刘鸿生的家庭和企业情况。韩克辛说：“刘先生是位了不起的爱国企业家。他除创办了中华码头公司，还开办了中华煤气公司、上海章华毛麻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不少的企业。建国后，他历任上海市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还在民建和工商联任职。现在他年事已高，不大过问码头公司的具体业务。他的儿子刘念智先生担任中华码头公司经理，也是最早向市政府和港务局提出要求合营申请的，现在是公私合营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嘱咐说：“这些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处理时一定要讲政策，要注意掌握好政策。”

“港申号”轮船还在乘风破浪往前航行。滔滔的黄浦江上，大小船舶穿梭进出，两岸码头的巍巍塔吊，上上下下十分忙碌。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要见见群众的，于是信步走到驾驶台后面的甲板上。这里设有信号旗杆，信号员升降不同形状和色彩的旗帜向附近船舶和码头发各种信号，以保证航行安全。信号员崔汝功正在旗绳旁值班。毛泽东径直向他走去，远远就招呼说：“同志，你好！”走进后和他握手。

24岁的小崔握住毛泽东的大手，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小崔一一回答。毛泽东关心地问道：“你读过书吗？一般的报纸、书刊能看懂吗？”

“读过几年小学，对一般报纸和通俗书刊能看懂，但要进一步学习，就有困难。”小崔回答。

毛泽东见他读过书很高兴，鼓励说：“那不错嘛！还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多为人民服务。”

这时海风渐渐大起来了，江面上浮起灰白色的浪花，船有些颠簸。在随行的柯庆施、陈丕显等人劝说下，毛泽东回到了驾驶台。他站在舵工陈绿庭身旁，随手拿起望远镜瞭望前方。

快到中午时分，轮船到达了江南造船厂附近，然后调头返航。毛泽东在休息室里问韩辛克道：“你过去在哪里工作？”

“在山东渤海，搞地方工作。”

在场的柯庆施对韩辛克说：“你写给主席看么。”

于是，韩辛克用笔写下“我叫韩克辛，进上海前在渤海三地委，担任过书记”的字样，毛泽东看了，关心地问道：“你从农村转到城市，工作有困难吗？”

韩辛克坦诚地回答说：“困难不少，港口工作面广，也比较复杂，而且还涉外，有好些问题不懂。”

“不懂就学嘛，学会了就不困难了。”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我们就是从不懂到懂，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从农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大的转变，要努力学习。”

这些话语重心长。“努力学习”的教导，激励着韩辛克这样工农出身的干部积极学习、掌握以前不知不懂的管理和港口知识，鼓舞着他们成为新的港务专家，驾驭现代港务管理工作。

12时50分，“港申号”轮船驶回外虹桥码头。毛泽东走下舷梯，站在码头上，回过头，频频向列队欢送的船员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视察上海港，主要是搞调研，对上海港口建设没有系统的指示，但此行对上海港建设却是莫大鼓舞。随即，上海市委对港口发展制定了新的发展策略，韩辛克等人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视察开启了上海港发展的新航程。”

毛泽东视察上海等地，目的比这还大得多，是为启动国家工业化航船摸底，搞调查。回到北京后，从12月开始，他和刘少奇专门做这件事情，先后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委的工作汇报，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的汇报时，毛泽东结合在上海等地考察的思考，提出：“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即要以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全国经济和建设的大发展。

这是一个极大胆的思路，然而，当即就有人质疑，并且顾虑重重地说：“沿海地区是美蒋空袭的重点，我们不加限制去发展，万一打仗，会有不有危险？”

毛泽东说：“我们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他巧妙地用一句反问回答了个别人的疑虑。

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要以沿海地区作为经济建设的突破口，并以上海建设为重中之重。他告诉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针对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他颇带豪气地指出说：“你好像原子弹已经在3000公尺上空了。不要说3000公尺上

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他的话语有些幽默，却让人们有了信心。在座的人忍不住开玩笑说：“美国人要和我们打原子弹，恐怕也要琢磨十一二年呢！”

毛泽东马上接过话头说：“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该办好沿海的工业，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也完全合算。”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有胆识的，是超前的，也是十分急迫的。这是我党最早的沿海开放思想，是在面临敌人空袭危险下的“强行开放”思想。由于没有高空制空权，美蒋高空飞机时不时窜入大陆进行空袭，投掷一番炸弹，在这样的危险区域搞建设，毛泽东的开放决心何其之大，完全是“强行开放”。“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的话语，是何等悲壮！尽管如此，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停止脚步。

在上海视察和与 34 个部委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完整的沿海建设和开放的思想：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 70% 在沿海，只有 30% 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他自己和后人归纳为“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思想，其实就是沿海工业建设和开放的思想，只不过此时不叫“沿海开放”而已。毛泽东是新中国沿海发展和开放事业

的第一人，他的决心令人震惊。有趣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是思路与后来深圳、珠海、厦门等沿海地区以小商品、小电器等等轻工业产品起步腾飞的事实完全吻合。毛泽东的杰出和沿海建设和开放的思想可谓是一绝。

对于毛泽东“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思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后在《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一文中由衷地说：“对指导上海工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关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思想，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①

确实如此。与邓小平等人后来以深圳等南方城市先起步的沿海发展思想不同的是，毛泽东沿海发展的思想是以上海作为重点的。

1956年5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来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在上海市委负责人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传达。

7月，根据毛泽东“上海要发展”的思想，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经过研究，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上海全市各部门、各地区围绕工业生产这个中心，进一步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以及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在工业布局的调整中，相继进行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蕴藻浜、安亭等工业区的建设。对此，按照陈丕显后来的话说是“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建设”。以后，上海贯彻这一方针从没有间断过，在经济调整中，经过三次工业大改组，依靠上海科技力量向“高、精、尖”发展，到1965年

^①《缅怀毛泽东》（下），《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时,上海已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陈丕显说:“到‘文革’前,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当时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香港、台湾等地。”^①

毛泽东沿海建设和开放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而他大胆发展沿海地区的开放策略,不仅坚持了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二年,而且从此以后都没有被战争或者空袭毁坏,至今仍然是全国新兴科技和尖端工业云集的地区群。

15. 两位农民劳动模范与毛泽东

在毛泽东考虑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1956年来到了。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社论说:“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间才过去了半年,今天,1956年的元旦,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被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由此,我国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也将被提早完成。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①《缅怀毛泽东》(下),第16页。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互相配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 766.4 亿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在这个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4.7%，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3%，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达到的速度。”

这样的消息是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它也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搞经济建设并不是西方人士原来预言“不出三年，中国就会因为饥饿变为荒芜”的差水平，飞跃的速度、可喜的成绩甚至超过了那些老牌“治国能手”。

1 月 30 日，在轰轰烈烈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界代表，带着各地建设的喜讯，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

这个报喜，是由衷的。

过去一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最值得说一说的是农业合作化的成绩。7 月 31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了限制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小脚女人”思想。10 月上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着重讨论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问题。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经过三个冬春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会后，这个决议成为农业合作化的集结号，运动迅猛发展，出现整乡、整区、整县实现合作化的高潮，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乡村飞速朝着社会主义集体化奔进。

年末，为保证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和快速发展，毛泽东带着秘书

田家英以及田的秘书逢先知三人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以指导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94万字、176篇文章。毛泽东为其中104篇文章写了按语。

身为国家主席,毛泽东带着秘书们当起了出书的编辑,这在世界史上都少有。更为有趣的是,近百万字的三大卷,三人竟在短短两个多月内神速完成。定稿后,毛泽东把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1月出版。出版时,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当田家英把拟好的消息稿送来时,他竟然笑了,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原来,全国合作化运动全面铺开,快速行进,以至于不需要这本书去“促进”了。接着,他意犹未尽地对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为什么?因为农业合作化胜利来得如此快,这样顺利,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这么难的事情,经过二三次会议,作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就顺利解决,且比当初苏联的合作化运动搞得好得多——各地在合作化运动中增了产,生产出现了喜人形势,并没有像苏联那样搞强迫。中国农村正摆脱小农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宽广道路奔进。这正如元旦社论所言“这是一件大喜事。这是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怎不让毛泽东为之高兴、叫好呢?!

在广大农村大步奔向集体化的时候,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许多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来自各地生产第一线的普通群众,他们是工厂的操作工、农村的生产能手、商店的劳动模范,大多是“草根”出身,是基层的先进工作者。而在农民代表中,李墨林、龙冬花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他们不仅是来自最基层的

合作社，而且是翻身后新一代农民的代表。

李墨林是来自北京四季青合作社的劳动模范。

四季青在北京西郊，以一年四季能生产新鲜蔬菜而闻名遐迩。而“四季青”这个名字却与一位穷苦人出身的打工仔李墨林分不开。

李墨林不是北京当地人，老家是河北白洋淀大杨村的，12岁开始给地主做小活，后从白洋淀跑到天津，当过童工、装卸工，过着典型的“干得比驴还多，活得比狗还贱”的打工仔生活，再以后逃荒、要饭辗转到北京，碰上无儿无女的山东大汉刘佩然。两人相依为命。刘大哥便传授他一手莳弄温室蔬菜的本事。刘大哥死后，他接替给园头当了菜把式，并在西郊落了户。

李墨林身怀能四季种出青菜的绝技，本是最要受到重视的人才，谁知反而却因此成为富人们愚弄的对象。他先后给几个地主扛长活，靠着手艺勉强能糊口，但还是被他们瞧不起。资本家王云清听说他的“四季青”绝活，便跑过来“揽”他，答应说：“你干好了，我给你四亩好园地。”这美丽的承诺骗得憨厚的李墨林给他像驴子一样拉了一年又一年的“磨”，直到土改前还没见到那四亩地的影子。在土改中，他才分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菜地。

有了地，成家立业了，李墨林凭着一双手、一把锹，把地种出了花。可没钱，还是建不起温室，一身绝活还是觉得没有使出来。家家搞单干，力量小，那些没劳力的人家不得不撂荒，碰上天灾人祸，甚至卖掉土地和青苗。穷苦农民分了地，还是难以维持下去。正在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组织起来搞互助组、合作社的号召，李墨林觉得这是双赢的好办法，于是联络七户农民九个劳动力，率先在西郊羊坊店成立互助组，自筹资金一下子就建起了108间温室。

1952年春，正当李墨林等人沉浸在丰收喜悦中时，由于城市规划，他们需要搬家。一年搬家三年穷。社员们想不通，西冉村乡第三

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李满常听说后，主动拨出一片最好的土地，说：“欢迎李墨林的互助组到北高庄重建温室社。”

区政府也通知说发给一笔搬迁费。李墨林等人做梦也没想到还会给什么搬迁费。“共产党办事公道啊！”李墨林这位从不流泪的铁汉子平生第一次泣不成声，“毛主席呀，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呀！”

什么难题都解决了，李墨林和十户社员痛痛快快地把家搬到了北高庄。李满常社的乡亲们起早拉晚帮他们建起两排瓦房。李墨林等人用搬迁费建起了比过去标准更高、数量更多的144间温室，然后，在温室里种出了青菜、黄花、红果、绿瓜，组建了京郊第一个“温室社”——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当外面是数九寒天时，他们一年四季有青菜、瓜果吃。这吸引了方圆十几里的农民前来参观。而李墨林等人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买上了城里人都稀罕的时髦的自行车。

李墨林等人过上了好日子，像这个时期所有翻身穷人一样，忍不住去饮水思源：这幸福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打心底里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那么如何感谢呢？1954年春节前一天傍晚，大家在温室社下摘完瓜菜，看着一堆堆、一筐筐丰收的果实，人人喜上眉梢。几个人在马灯下聊天，说起了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讲起了刚建社的“头三脚”艰难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李文志大声地说：“共产党、毛主席把咱解放了，过上了好日子，咱得谢谢救命恩人呀！”

“是啊！知恩不报，是忘恩负义，这咋行！”老贫农魏福庆说，“眼下快过年了，咱应该送点黄瓜、西红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尝尝鲜儿！”

“好，好，好主意！”李墨林很赞成。

几人说干就干，当即提上马灯，把刚摘下的黄瓜、西红柿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精心选出20条顶花带刺、笔管条直的嫩黄瓜；又选出

12个一样大小、又光又圆的西红柿，再由李墨林老伴李翠华用新白布连夜赶做了一条小棉被，然后，小心翼翼把菜包起来。为了防止碰掉顶花，众人又用秫秸一条隔一条并排码好，西红柿也用白纸包起来，装进了小筐箩里。

第二天一大早，李墨林骑上时髦的自行车，带着全体社员的心愿，穿大街、过小巷，直奔中南海西门。

到了门口，他把情况一说，工作人员便带着他进了中南海，来到了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收下了蔬菜，并且给他打了收条。李墨林了却了一桩最大心愿，顿时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工作人员问他：“你有什么要求吗？”

他连声说：“没有，没有。”

其实，他是带着心愿的，就是想见一见毛主席！可自己送点鲜瓜就要见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哪好意思说呀！

而幸亏他没有说。毛泽东此时已去杭州，在起草宪法呢，他就是提出来要见，也见不着。于是，他多少有点遗憾，但还是很高兴地踏着自行车回生产合作社了。

第三天上午，社员们正在温室里干活，突然有人在外边喊起来：“毛主席来信啦！毛主席来信啦！”十几个社员当即扔了手中的活儿，“呼啦”一下子围了过来。信是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是这样写的：

李墨林温室生产合作社：

你们送给毛主席的礼物——自己生产的黄瓜和西红柿，都收到了。谢谢大家的盛意。你们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提高生产上获得显著成绩，这给首都农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希望你们更加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经营方法，巩固与扩大合作社的组织，为生产更多更好的蔬菜，

供应首都人民的需要而努力。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

这封来信虽不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是中央办公厅写的，但大家认定这就是“毛主席的来信”。信中“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的话语，像阳光一般照亮了李墨林和温室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道路，滋润着每个穷苦人出身的社员的心田。合作社的“领头羊”李墨林备受鼓舞，大声地说：“咱们再加一把劲，好好给单干户做个样子！咱多种菜，种好菜，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好啊！一定给毛主席争光！”大家一齐回答。

随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专门找到李墨林进行谈话，并且说：“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们的发展，希望你们能把北方变成南方，把冬天变成夏天。”

“为落实‘生产更多更好的蔬菜，供应首都人民的需要’的号召，”李墨林表态说，“我们宁肯一天三顿啃咸菜疙瘩，也好把温室蔬菜搞好。”

为此，李墨林决定献出全部积蓄来搞合作化，带领大家一起致富。他又是捎信，又是登门，请那些还在单干或给富农家管园子的一些有名的菜把式入社。他们携家带口搬来了，没吃的、没住的，就吃住在李家。最多人时，李家三间小屋整整住了20口人。他们一起切磋技艺，取长补短，用经验和智慧培育能战胜风雪和严寒的新鲜蔬菜。

市长彭真也很关心他们温室生产的发展。一次，他拍着李墨林的肩膀说：“苏联有个米丘林，中国有个李墨林，你眼睛不要光盯着

四季青，你要看到全北京，全中国。”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李墨林带领一批菜把式，吃住在温室，先后成功栽培了北方几乎所有的蔬菜，还在温室里种出了木本蔬菜——香椿芽，后来上了国宴。

按照“巩固与扩大合作社的组织”的要求，1954年5月，李墨林社与西冉村乡第三农业生产合作社、东冉村乡第四、第五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在扩社过程中还吸收了附近一些单干户，最后合作社达到社员64户、320亩土地、温室616间。1955年，他们又与远大、金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达到社员784户。大合并之后，合作社叫什么名字呢？经社员大会集体讨论通过，最后定名为“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何谓“四季青”？即一年四季都能生产蔬菜，四季常青。

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李墨林的种菜技术得到推广。在李墨林的带领下，社员们将传统的防风墙改为火墙，再改成火管供暖炉，由地上改在地下，逐步提高热能利用率，降低了消耗，还增加了蔬菜种植品种。不久，他们又将挑水浇灌改为暗渠涵灌，减少了温室门开关次数，提高温控能力又提高了产量。这些土发明，土创造，投资小，见效快，解决了生产中一个又一个难题。1956年春，四季青合作社扩大到2000多户，温室发展到1080余间，成为首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穷乡亲们走集体化道路，短短的时间内，生活就比以前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此期间，李墨林进步更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还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他和其他代表一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中南海参加“两会”。

在大会开幕式上，李墨林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泽东。

不过，是远距离的。

当毛泽东等人走向主席台时，李墨林一望见他，就变得泪眼矇眬了，热烈地鼓着掌，哽咽着说：“我旧社会一个臭扛活的，新社会不就是种了点菜嘛，这是咱农民的本分呀。今天，我竟能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做梦也想不到啊！”

是啊，古今中外，这样的大会只有有钱人、大官僚才能参加，是名副其实的“权贵盛宴”，哪轮得上普通劳动者们呢？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会”却把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操作工、掏粪工请进了中国最高权力的殿堂。

这是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谁知李墨林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突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请全国劳动模范李墨林和河北省著名农业劳动模范王玉坤代表五亿农民登台向毛泽东报喜！”

这天大的荣誉，惊得李墨林一时不知所措。他机械挪动脚步，惶惶地走进各界报喜的队伍。在无数的水银灯下，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和各界代表穿过会场，走上主席台。他走到毛泽东面前，把印有金色“囍”字的红色报喜信双手献上。毛泽东接过大红信封，紧紧握住他的大手，亲切地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李墨林处在极度兴奋中，只是“我——我——”答应着，千言万语怎么也说不出。在旁边的周恩来立即介绍说：“他是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

毛泽东马上说道：“你是李墨林。”

听到毛泽东居然喊出了自己的名字，李墨林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脱口而出：“是，我是李墨林。我代表全国农民向您报喜！”

毛泽东也笑了，对着他点了点头，连声说：“好，好！”

这时一股暖流涌遍李墨林的全身。他激动得面红耳赤。毛泽东

叮嘱说：“你一定把社办得更好！”

虽然李墨林以前没见过毛泽东，而毛泽东却完全了解他。这让李墨林万分惊喜。他几乎是满脸堆笑，和其他代表走下主席台，回到自己座位上，然后，继续在聆听毛泽东等人的报告。

然而，觉得比李墨林还幸运的，则是来自安徽省贵池县的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

和李墨林不一样的是，她是第二次来北京开会，且是多次见到毛泽东。

她和李墨林一样，也是“苦藤上的瓜”，当童养媳出身，在旧社会吃够了苦头。解放后，她翻了身，因为肯吃苦，劳动卖力，很快成为当地的妇女典型，结果，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了党，她更加积极了，带领大伙儿走互助合作道路。

1952年初春时节，老天日日下大雨，长江岸边的贵池县乌沙大圩积涝成灾，险情不断。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龙冬花十天十夜不下火线，带领群众抢险。在最危急的关头，她带头跳进滔滔洪水，领着乡亲们用身体堵住决口，保住了江堤，也保住了12万人的生命财产和数十万亩耕地。随后，她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53年，她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

1954年春，长江沿岸圩区再次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圩堤被冲塌，不少村民登上屋顶，等待救援。她不顾家人，也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咆哮的洪水中撑着小船，冒着滔天大浪，抢救被洪水围困的乡亲。结果，她一个弱女子先后救出22人，并且还抢运出一批粮食，被乡亲们敬佩地称作“不要命”的“龙恩人”。而她却回答说：“我是党员，应该这样去做。”

龙冬花一心为公，英勇无畏，无疑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杰出典型，自然也获得了党和人民的认可。4月，她被组织上安排以全国

妇女积极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长身份参加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并在怀仁堂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

然而，见是见到了，龙冬花是坐在座位上，不是“近距离”，因此有不少遗憾。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与会妇女代表，并合影留念。龙冬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合影的时候，她在第三排，因为规定不准随便走动，无法接近毛泽东。合影结束时，毛泽东等人离场要走了。在后排的她心里一急，就发狠地向外挤，可由于过于激动和慌乱，“哗啦”，不小心摔倒地上。其他代表都笑她：“干嘛这么急？”

龙冬花爬起来，红着脸回答说：“我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合作化的喜讯呢！”

可因为她一摔跤，不知情的毛泽东等人已经走远了。摔了一跤，还没和毛主席说上话，龙冬花十分遗憾。合影后，她虽然好几次见到毛泽东，不是因为观礼检阅相距太远，就是因参加接见人数太多，她根本无法靠近毛泽东，当面汇报之事一直未能如愿。

这一次她来到北京参加大会，开幕式、讨论、听报告……虽然多次见到了毛泽东，但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当面汇报的打算还是一直没能如愿。而龙冬花就是龙冬花，有着洪水中撑船救乡亲那样的韧劲，悄悄地等候着，时刻准备抓住面见毛泽东的机会。

结果，这个机会还真的来临了。

会议有一个议程：毛泽东接见大会代表并照相合影。一次，大会主席团发通知了，叫大家做好准备，照相时不要发慌。谁知在接见时，龙冬花险些又出问题。当她跟着代表们挤到毛泽东身边时，与刘少奇握过手后，就已经激动得不行了，觉得脚踏着云彩在飘，身不由己地顺着队伍往下跑。这时周恩来发现了一路跑着的她，立即喊道：“哎！姑娘，你是哪里人？”

龙冬花急忙回答说：“我是安徽省贵池县幸福农业社社长，叫龙冬花。”

周恩来这么一问，顿时提醒了她：还没和毛主席握手啊！于是立即返身，又挤进人群，使劲地朝毛泽东那里挤过去，然后一把抓住他老人家的手，使劲地握着。

然而，当她握住毛泽东的手时，激动得已说不出话了，只是两眼目不转睛地仰望着他那微笑慈祥的面容。随即，她就被其他人挤开，随人流涌了出来。这下她醒过来了，也后悔了：见到毛主席那会儿，自己怎么那么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可她还是很幸运的。

晚上全国政协在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代表们。龙冬花幸运地被主席团批准向毛泽东敬酒。参加宴会的代表 1000 多人，各行各业都派代表去敬酒，而农民代表只有龙冬花和与李墨林一起向毛泽东报过喜的王玉坤两个人，一男一女，代表全国几亿农民。

当代表们走进怀仁堂就座时，宴厅内圆型大餐桌已摆好了酒菜。整个宴会厅内热闹非凡。不久，在热烈掌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走过来了，在靠北边的巨幅绿花屏风前就座。龙冬花与毛泽东只隔几张桌子。可是，宴会还没开始，她就急不可耐地来到毛泽东桌边，向他敬酒。因为心情过于急切，本应从右边敬酒，她却跑到了左边。周恩来看到了她，仅见过一面却立即认出来了，向毛泽东介绍说：“这就是安徽的女社长龙冬花同志。”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查看代表名单，听着周恩来介绍，立即放下代表名单，紧紧握着龙冬花的手，微笑着连连点头，说：“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就在这时，在场的一名摄影记者“咔嚓”按下了快门，拍下了毛泽东接受龙冬花敬酒的那一瞬间。龙冬花满满的一杯酒喝下去，又

已是激动得泪水往外涌流：自己这个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目不识丁的童养媳，今天竟然和毛主席一起喝酒了，多么光荣啊！在她激动不已时，毛泽东问道：“姑娘，你那儿合作社有多大啦？”

龙冬花一阵慌乱，急忙回答说：“有1000户了。”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疑惑地追问了一句：“不会那么快吧？”

龙冬花第一次与毛泽东喝酒后，宴会很快就开始了。可是，一会儿，她忍不住又跑过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

这次宴会，龙冬花可以说是终生难忘。她不仅与毛泽东见了面，说了话，而且还敬了酒，握了手。当晚，她和毛泽东光敬酒两次，握手却达四次之多，比上面规定的最多次数还多了一次，握了又去，去了又握，回来了又去。

直到宴会结束后，她才从狂喜的神话世界跌回到现实，狂跳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可猛然一惊：“糟糕！刚才向毛主席汇报说错了话呀，入社户数只有500户，自己却说1000户了。这还得了！”回到宾馆后，她后悔得暗暗哭泣，但又不敢声张。

返回贵池县后，她还是把此事向县长实事求是地作了汇报，并要求组织上批评自己。谁知县长笑哈哈地安慰她说：“你说得没错！现在你那里入社户数已猛增到2000多户了！”县长高兴地告诉她，“你说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龙冬花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可是，令她想不到的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会后不久，《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的照片突然刊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二十几岁的女农民龙冬花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这张照片又被制作成年画，在全国各地流传，从此和照片、年画一起，龙冬花那段波澜壮阔的传

奇也流传。但是，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新农民，龙冬花没有骄傲，也没有退步，相反，更加“拼搏”了。在合作社的集体劳动中，身为女子的她常常挑起200多斤重担子，累得哇哇吐血。在合作社积肥时，一次，她只身一人被困芦苇荡一天一夜，回来时，她却带回了一船肥料。这样的女英雄，也多次到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每次，她都能见到毛泽东，与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有趣的是，在龙冬花握四次手的那次宴会上，李墨林也跑去向毛泽东敬酒了。不过，他不是作为全国农民代表而是作为北京代表去的。毛泽东也和他说了话，问道：“识不识字？”

他羞愧地低下了头。

恰巧彭真就在毛泽东身边，看见了这一幕。宴会结束后，他便把李墨林叫到休息室，语重心长地鼓励他说：“李墨林，一定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啊！”

毛泽东在农业纲要中就提出了农民要识字的问题。而李墨林对此认识不清，认为握锄头的泥腿子识字有什么用？然而，此刻毛泽东关切的问话和彭真的鼓励，激起了他赶快识字、多识字的决心。会议一结束，回到四季青后，他没有回家，风风火火找到海淀区文化补习小组组长段绪华，急切地说：“我要求参加识字补习班。”

段绪华故意逗他说：“怎么，头不疼了？工作也不忙了？我看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这回李墨林完全是认了真，急得脸红脖子粗，发誓赌咒似地说：“毛主席让咱学文化，就是晚上不睡觉，头疼，我也要学认字。咱农民没文化不行！”

40多岁的人学文化，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李墨林下了决心，也拿出了韧劲，中午学、晚上学，甚至睡觉前也念叨，“恶补”文化课。谁知他一觉醒过来，昨日学会的字又忘得差不多了，这急得他两眼

发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学会了许多字，认识了工作中的常用字。当他第一次会写“毛主席万岁”时，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便讲，若碰上个识字的，非拉住人家写给他看，念给他听，直到得到了肯定或赞扬才罢休。

确实有了文化，他的温室技术大大提高了。为了实现“北方变成南方，冬天变成夏天”目标，四季青合作社专门拨出十几亩地给李墨林等人繁育良种。他们繁育出来了种子，选出其中最好的寄给全国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们，并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前来四季青学习温室技术的人员和农业院校实习生。不久，李墨林合作社又派出最优秀的技术员到全国各地帮人家建温室，传授种菜经验。他本人也去过河北、新疆、内蒙、黑龙江等地，还和刘俊江一起应蒙古人民共和国邀请到乌兰巴托进行蔬菜技术援助。有了成绩，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李墨林都被毛泽东邀请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并见到毛泽东本人。

李墨林、龙冬花是全国亿万农民中普通一员，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谱写了新中国农民的风采。在像他们这样一大批新式农民带动下，勤奋劳动、无私、上进、为多数人奋斗成为毛泽东时代新乡村农民的写照。由此，更多的新农民又成为新一代农民的带头人。

在“两会”之后，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像海啸一样，奔腾而来，席卷整个中华大地，几个月时间，农业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毛泽东等人建国初期预计要用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提前了11年，仅用7年时间就实现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合作化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广大农村进

入了社会主义。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是西方哲人黑格尔对“中华帝国”近乎残酷的评价，然而，词语在某种程度上却表达了旧中国没有进步的一种客观真实。有“民族魂”之称的鲁迅先生也曾慨叹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说：“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然而，自从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改变中国“一再重复”“君主覆灭”，就开始推进中国的进步，区区几年时间内，工业农业和其他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时间的流逝，每刻钟都与这个建设突飞猛进、社会飞跃式嬗变的中国有关了。哲人黑格尔的话语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抛弃、否定了。

然而，这一切变化的发动机在哪里？英籍华裔作家韩素英由衷地说：“新中国并不是靠少数优秀人物、靠发指令、靠无情地强迫中国群众作出巨大牺牲来建设的。而是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一切主张、倡议都是以中国人民的意志、热情、创造性才能为依据的。由于有了毛，中国革命成为一个广泛的提高觉悟的运动，并且它在继续深入，它可以改变中国的土地，而且人在新结构中也改变了。”

斯言恰如其实。

对于中国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壮举，后来委内瑞拉一家报纸是这么评述的：“他（指毛泽东）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剥削者的又一位永垂不朽的导师载入史册。他的理论和政治著作是无法估价的革命的遗产。他领导革命把亿万人引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仅此一件事就使毛泽东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制定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思想，他领导和监督了这一重大进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纠正其错误作出了

贡献。这是全世界被剥削者和自由人类的后代将永远怀念的一个功绩！”^①

16.“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

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4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处理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十大关系，以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会议期间，毛泽东决定去广东进行调查研究，就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经验。为此，他交代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次我们坐飞机去。”

以往他外出，都是坐专列，这次却要坐飞机去。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大吃一惊。

为什么？一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要坐飞机；二也是最关键的，此时飞机安全性不高，坐飞机无百分之百的安全保证；三还可能有特务搞破坏。去年4月，周恩来去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结果台湾特务在机上安放

^①《委内瑞拉〈破裂报〉载文章说：毛主席著作是无法估价的革命遗产》，载1976年10月6日《参考消息》。

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换乘另一架飞机才逃过一劫。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刘亚楼特地赶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是坐苏联驻中国顾问团在北京那架飞机吧！是由苏联人驾驶。”

“我们有人民空军，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毛泽东反问他，然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就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

万隆会议的教训就在眼前。毛泽东出行，为何不坐火车偏要坐飞机，且还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呢？为支持中国航空业发展，当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顾危险，试坐中国人自己试飞的飞机。这次，毛泽东也拿出了同样的气概，要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中国年轻空军的发展。

刘亚楼见毛泽东没有改变主意的余地，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变成了一种决心：外国人能飞，中国人也一定能飞。回去后，他立即召来了担负空军专机任务的独立第3团团长胡萍。

在办公室，他十分郑重地说对胡萍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稍停片刻，他继续说：“毛主席要乘坐我们空军的飞机，这个任务准备交给你去完成。你看怎么样，有把握没有？”

胡萍先是一惊，感到事情太突然，脱口而出：“坐火车不是更安全吗？”

“毛主席坚决要坐我们空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刘亚楼说，“这个任务只有你们承担了，所以今天请你来商量这件大事。”

胡萍是山东人，是空军王牌飞行员。他14岁时就参加革命，政治上可靠，他大哥、二哥当年都是地下党，本人十几岁就为地下党送情报，后为躲避汉奸和日军追捕才不得不离家。因为努力工作，17

岁他入党，担任区委书记。他参军后，在战斗中成长为团级干部。1949年毛泽东下令组建人民空军时，干部奇缺，中央军委下令从陆军抽调一批优秀营、团干部到空军。胡萍被选中，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52年5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并担任空军独立第3团团团长，专门承担为中央党、政、军高级领导人驾机飞行任务。他多次为周恩来等人驾驶过专机，并运送过越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是空军中拥有过硬驾机本领的一流飞行员。现在伟大的领袖要坐自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胡萍既兴奋又激动，坚决地回答说：“既然毛主席一定要坐我们的飞机，我们一定能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刘亚楼很高兴地说：“任务光荣，担子重大，但只要你们在思想上处处想到主席的安全，全心全意做好准备工作，一定能够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胡萍回答说：“我们一定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一定要保证安全！”刘亚楼下了死命令，“不能出丝毫的差错。”

胡萍回到部队后，向团党委作了汇报。党委决定挑选该团最好的苏制里-2机型为毛泽东专机。这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名乘客。主机编号为8025号，胡萍为机长。另派一架里-2为副机，机长为时念堂。副机搭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

4月30日，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到机场了解、检查了准备情况。

5月3日，晴朗天空很少云彩，正适合飞行。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来到西郊机场，检查飞机的性能，试飞了一次。一切良好。他交代机组人员说：“在桌里放上扑克和象棋，毛主席他们来了消遣一下。”

随即，刘亚楼也赶来了。他召见胡萍等机组人员，正式下达了飞

行任务：“今天是毛主席坐飞机，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主席不同意坐外国的飞机，要坐我们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祝你们圆满完成任务。”

随后，他到机舱进行检查，发现桌子抽屉内放着扑克和象棋，立即皱起了眉头，不高兴地说：“主席不喜欢，这些东西，把它收起来。”

毛泽东确实与别的领袖不一样，不喜欢打牌下棋，也不喜欢喝酒，凡是玩、赌那一套，都无兴趣，相反对爱读书，且很赞赏读书的人。在外出的路途中，书是他的必备之物，从不带扑克、麻将之类，他身边的人大多也如此。何廷一赶紧将扑克和象棋哗啦收起来。

刘亚楼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胡萍呀，千万谨慎小心，沉着冷静，不要太紧张。”

胡萍默默地点头，轻声地回答：“我记住了，请司令员放心。”

7点30分，毛泽东的汽车准时到达了机场。车门开处，毛泽东走下了小车，他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黑布鞋。胡萍立即从列队的机组中跑步迎上去，向毛泽东敬礼。

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了胡萍。胡萍大声报告说：“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

毛泽东点了点头，但没有急于登机，而是走到列队站立着的机组人员面前，与他们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机组人员一一做了回答。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

“主席，登机吧！”罗瑞卿催促说。

在刘亚楼、罗瑞卿的陪同下，毛泽东登上了专机。他看了看机内，就坐下来了。

首先，副机滑翔着升空了，接着主机也滑翔升空。在高空中，两架飞机一前一后向着南方飞去。

天气很好，能见度非常好。胡萍让飞机保持在 2700 米高度飞行。机舱虽有自动驾驶仪，他怕自动它工作不理想，和副驾驶员陈锦忠轮流进行人工操纵。领航员向刘亚楼报告了飞行情况。刘亚楼随他来到驾驶舱，问胡萍：“怎么样？”

“一切良好！”胡萍说。

刘亚楼便放心地回到客舱了。

从北京到广州 2000 公里，里—2 飞机时速仅 220 公里左右，最大航程也不长，因此中途还得落地加油。飞机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中午时分，到达长江南的武汉南湖机场降落加油。

毛泽东等人在武汉吃中饭。飞机加油后，下午 2 时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华南的山区上空。过了湖南长沙后，飞机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机舱内没有氧气，也没增压设备，爬不到云上边，上下晃动、颠簸十分厉害。刘亚楼好几次到驾驶舱查看，但没办法。而毛泽东虽然已经 60 多岁的人，却没有一点不适应，长时间的飞行也毫无倦意，没睡觉也没休息，有时通过机舱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而沉思，考虑着国家大事，大多时间伏案阅读着带着的一本线装书《资治通鉴》，有时也和同行的人员谈论着工作。

飞机飞行了好几个小时，飞抵广州上空。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 120 米，水平能见度仅 5 公里，飞行员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前面的副机驾驶员时念堂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地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的本事更高，曾在云高 100 米、能见度仅仅 2 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降落过。到达白云机场时，他根据仪表，使得飞机对正了跑道，进行盲降，平平稳稳地落地。

毛泽东虽然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但毫无疲态，在刘亚楼的陪同下走下飞机。前期乘火车到达广州的江青与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都来了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并

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啊！当天就到了广州。”

然后，他又与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先不要走，合影留念。”

于是，他和刘亚楼、罗瑞卿、江青、黄永胜等人与空军官兵们在飞机旁边一起合影。

17.为了游长江，毛泽东生气了

来到广东后，毛泽东一行人住在离省委机关不远的一个小岛上。

在这里，毛泽东准备听取各省市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全面了解各地的经济和其他工作情况。为此，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汇报工作安排通知，要求中南几省先汇报，之后是华东几个省市，再是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的问题分为：(1)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3)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农、林、水；(5)财政和金融；(6)干部(即教育工作)；(7)统一战线安排问题；(8)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9)失业安排问题；(10)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11)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他要求汇报时除第一书记应来外，还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要写书面汇报，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

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

他要求手下汇报,不是走过场,而要听真实情况,要查实际问题,要发现问题去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他要求各省市区汇报,一内容广泛,涉及各行各业、政治、经济、财政等各方面;二不要鲜花,“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三可以带助手,为什么?要汇报就要真实、客观,要全面。

毛泽东外出巡视,不是冬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到北方避暑,而是哪里工作需要就去哪里。这次在广州,天气很闷热,就连海风也是热乎乎的。而此时还没空调,跟随他一起的警卫一中队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也降不下酷热。这样的天气下,毛泽东坚持日日听汇报,与各地负责人进行座谈。

大概是受不了这样的闷热天气,一天工作之余,毛泽东望着珠江,忽然转脸对卫士长李银桥说:“银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李银桥是去年由副卫士长升任卫士长的。本来卫士长不参加值班,毛泽东认为他虽不爱说话,也不善言词,但纪律观念强,工作认真,不搞小聪明,心眼好,因此很喜欢他。他不值班了,毛泽东却对他说:“你升官了,可老不见面也不好吧?我和你惯了,你一礼拜值一两个班,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你。”这些年,李银桥跟随毛泽东,亲如父子,于是一改卫士长不值班惯例每星期值一两个班,基本上还是跟毛泽东生活在一起。

此刻毛泽东要去游长江,他很惊讶,脱口而出:“啊?游长江!”
“是呀,怕吗?”毛泽东说。

毛泽东会游泳,李银桥是知道的。1954年夏就“迎风斗浪”游过

一次。当时是党中央统一安排去河北北戴河办公。毛泽东住在北戴河浴场一号平房。一天，他突然说：“银桥，你去看看，能不能游泳？我想游泳。”

李银桥跑出去一看，就回来说：“主席，正刮着风，海浪很大，不能游，浪太大了。”

“我看看去。”

说着，毛泽东就扔下手头的工作，往外走。

结果，他径直来到了海滨室，脱下衣服，换上泳装，便向大海冲去。这吓得李银桥和警卫战士们迅速跟着他，也匆匆忙忙向大海冲去。

海上无风三尺浪。这是个大风天，咆哮的海浪一下子就把毛泽东掀到浪峰上，接着又把他跌入波谷。十几个警卫人员和卫士还有河北省公安厅的警卫人员都吓坏了，紧紧游过去，围在他的四周。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先是侧泳，轻松自如地划水，随后来个仰泳，两腿一蜷，两手不紧不慢地划着，逍遥自在。结果，他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

这时隐藏的太阳也出来了，他坐在藤椅里晒太阳，兴奋地对身边的人说：“好吧，你们说浪大。我们下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为纪念这次难忘的畅游大海，他还写了诗词《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毛泽东游了大海，江青等人也跟着去学游泳，中央机关不少人也跟着学习游泳，许多人成为了水中高手，毛泽东高兴地说：“游泳，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锻炼意志。”

这是一年前的事情，现在毛泽东要去游长江，李银桥却比上次还担心。因为长江不是海边，激流、漩涡很多，卷进去就要命，更何况毛泽东已是63岁的人了！李银桥没办法阻止，立即去报告随行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泽东要游长江的想法把罗瑞卿、汪东兴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都吓坏了。

“汹涌的长江可是一般人游得了的！”众人纷纷说，“海比江大，但江比海险。无论流速还是水情的复杂，长江都比北戴河海水浴场危险。出点事，怎么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李银桥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他听说大家都反对游长江，坚持说：“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不游游它，我毛泽东对不起中华民族！”

结果，罗瑞卿亲自来做毛泽东的劝阻工作：“主席，我不同意你去游长江。因为我是你的大警卫员，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你去游长江，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毛泽东说：“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

“那不行，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这个大警卫员的任务。”

罗瑞卿自称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且要负责任。毛泽东当即生气地说：“什么大警卫员？你去警卫国民党好了，不要禁我游长江。”

“主席，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游长江这么大的事要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烦躁起来了，大声说：“你们无非是怕我死在你们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被淹死？”

罗瑞卿见他发了火，连忙解释说：“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神圣使命，不允许我有半点差错。所以，我不同意你冒这个风险，哪怕一点风险也不能有。”

“怎么会一点风险也没有？坐在屋子里，屋子还有可能塌下来呢！”毛泽东反问他。

这话符合辩证法。罗瑞卿没办法，只好退了出来。

他和汪东兴和王任重商量后，还是觉得太冒险，又一起去劝说毛泽东。毛泽东见他们都阻止游长江，生气地说：“无非你们怕我死在长江，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淹死呢？你们不喜欢游泳，老为难人家，你们什么时候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还是坚持要去游长江，王任重说：“主要是怕有风险。”

毛泽东便转头对汪东兴说：“你要一中队的韩队长去武汉考察，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谁知一中队队长韩庆余也是站在罗瑞卿等人一边反对毛泽东游长江。但毛泽东说了要去实地考察，为了证实长江不能游泳，他还是去了武汉。

几日之后，他从武汉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长江不能游。那里水深水急，漩涡太多太大，听说还有江猪。”

毛泽东一听，脸上显得很失望，但一直凝神望着韩庆余，接着又问道：“你，你下水了吗？”

韩庆余回答说：“没有下水。不敢下去！”

其实，他下水了，此刻为了说服毛泽东，谎称自己“不敢下去”。因为如果说自己下水了，肯定没说服力——毛泽东会反问：你看看，游长江有那么危险么？你为啥没有被淹着，你能游，我为啥不能游？但韩庆余说自己“没有下水”，毛泽东便有了相反的想法，立即问道：“你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

韩庆余还想说什么，毛泽东立即打断他的话，生气地说：“你别说了！”转过身吩咐李银桥：“把孙勇叫过来。”

孙勇是副卫士长，会游泳，1948年过黄河时毛泽东就曾开玩笑说要他游过黄河去。孙勇听说毛泽东叫他，马上赶过来。毛泽东交代他说：“你再去武汉，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这一次，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不敢怠慢了，亲自交代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你同孙勇一块去。”

于是，他们带了三个会水的战士，到达了汉口，与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一道，在长江大桥墩上下水，试游了近万米。虽然水深浪急，漩涡众多，但没有发现“江猪”。几人经过商量，认为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游泳水平，是可以游的。

回到广州后，孙勇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们试游了近万米，没有问题，可以去游。”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然后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不能游长江？孙勇不是游了吗？！”

这下在场的罗瑞卿、汪东兴等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没有再吱声了。毛泽东生气地说：“这个老韩呀，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长江，不叫老韩去，叫他离开这里！”

不过，这是气话而已。韩庆余并没有“离开这里”。但毛泽东执意要游长江的决心，震撼了所有的随行人员。

谁能理解这位旷世伟人的思想呢？如果用曲高和寡来形容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恐怕不为过。但不管理解不理解，交代过的就要照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5月中旬，汪东兴开始正式安排毛泽东游长江的诸准备事项。

于是，张耀祠先去汉口打前站。到达湖北后，他同湖北省公安厅

一起落实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各项工作，选择好了上下码头、大小船只、和陪同游泳的选手（实际上是游泳高手，关键时刻对毛泽东进行施救），并部署了届时的警卫工作。

5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的工作结束了。

在罗瑞卿等人陪同下，毛泽东由广州再次乘坐胡萍等人驾驶的里—2飞机到达长沙，先游了他青少年时“中流击水”过的湘江。

5月31日，他们乘飞机来到了武汉，在王家墩机场着陆。

飞机到达武汉上空，开始下降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驾驶舱，胡萍向他欠了欠身，告诉他：“下面就是正在施工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大桥的桥墩耸立在江面上，在桥上施工的工人和车辆设备都很清晰，场面十分壮观。毛泽东喜悦地说：“啊！好看，好看！”领航员张振民为让他看得更清楚，请他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为他指出武汉的一些重要目标。

一会儿，毛泽东又把视线转回驾驶舱内，询问一些飞机设置的用途，胡萍一一做了回答。飞机即将着陆，毛泽东见机组人员都在集中精力操纵飞机，便起身离开了驾驶舱。

下飞机后，毛泽东就去游长江。

在路上，他对身边的人说：“快要到长江边了，这次你们不要再说有什么江猪了。事实胜于雄辩嘛！”

罗瑞卿说：“这是一件大事，主席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游长江，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出发。”口气似乎没松下来。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你们经常跟我在一起，还不知道我的身体？”毛泽东说，“这次你们看着，我给你们游出点花样来！”

两个人似乎还在赌气。

汽车来到长江岸边后，警卫人员跟着毛泽东登上了渡船。他站在船头，像一座难以撼动的山，十分伟岸，给人一种壮心不已的气

概。从不主动要照相的他，突然对身边的摄影师说：“拍两张照片吧！”

“咔哒！”摄影师拍了照片。

随着几声悠长的汽笛声，渡船开动，前去张耀祠等人勘定的下水的地方。渡船在武昌新亚码头靠岸，毛泽东稳步走上准备好的小木船。这时几位青年率先跃入水中。毛泽东走近扶梯，双手抓住梯子，顺着扶梯下水，先让江水浸了一下身子，然后在水中突然挥臂，向前游去了。

张耀祠立即尾随在其身后，跳下水。李银桥、孙勇、王任重、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护士长吴旭君、一中队十几个游泳高手，还有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同志，先后跳下了江中，按照事先规定好的位置，在毛泽东周围形成中、前、左、后、右的不规则图形，跟随着他一起向前游去。

这个阵势就好像一条大鱼带着十几条小鱼，在水中游动。

为了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汪东兴等人还安排了三条小木船，排成三角形，紧紧跟在“鱼群”后面，准备随时担负救护任务。罗瑞卿、汪东兴则站在船上，负责照管江中游泳人员的安全。罗瑞卿交代战士说：“万一主席身体不适，或出现其他不测，立即上船。”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也进行了部署，无论堤岸、各要道、龟蛇两山，还是对岸都有安全工作人员，且个个都是“浪里白条”，关键时刻可以纵身下水救人。

其实，这些安排都是多余的。

在江水中，毛泽东挥动着手臂，击起层层浪花，自由自在地向前游着。他时而潜入水中，时而露出水面，时而侧泳，时而仰泳，顺水漂着走，怡然自得，舒心悦快。其他跟随着他的人也有说有笑地游玩着，十分愉快。整个江面上很热闹。

不过，风稍大了一点，水太冷，游了快一个小时。张耀祠凉得难受，于是上船休息。李银桥便对毛泽东说：“主席，休息一会再游吧！”

毛泽东笑着说：“还早呢！起码要游两小时！”又说：“我不要休息，水里也是休息。”

孙勇问道：“主席，今天的水温这么低，你不觉得冷吗？”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温度再高，也是冷啊！”毛泽东边游着边说，“这里水上是夏天，水下是冬天，很好锻炼身体嘛！”

警卫一中队副中队长陈长江对毛泽东说：“主席，现在浪大了！”

毛泽东说：“浪大了用鼻子吹！”

这个有趣的话让大家“嘿嘿”直笑起来了。

这时堤岸上聚集着一群观看江中游泳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在游泳，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天气这么冷，风这么大，居然还有人游泳哩！”

“嗨，是掉什么东西了吧！你们看还有三艘船，肯定是打捞啥东西！”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说：“可能是游泳队在训练出国比赛吧！”

还有人讲：“解放军游泳锻炼，可能海军为了准备解放台湾吧！”

谁也不会想到江中游泳的会是年过花甲的毛泽东。不仅他们不知道，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机关多数人也不知道。

毛泽东一直游到漳口东边朱家河入长江的义口，才上船。汪东兴看了一下手表，说：“刚好两小时零五分钟。”转过头对张耀祠说：“比你多游了一个小时。”

张耀祠脸红了：“主席比我强嘛。”

毛泽东靠近船，一手抓住扶梯，轻微地喘着气，一边上船一边转过头，看了看游过的路线说：“我们游得不近嘛！”

李银桥急忙给他披上了衣服，免得着了凉。

随后，毛泽东坐在船上的藤椅上，拿着香烟，久久没有点上，笑着，一副很怡然的神情，就像一位从战火中归来的英雄。

游泳结束后，毛泽东去了武汉驻地，召集已到达的部分省委书记开会，继续听取他们对于各项工作的汇报。

18.“陈伯华是出名的娇滴滴，这次哪来的 这么大勇气和胆量？”

毛泽东来到了武汉，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然而，当晚竟然发生令人惊讶的事件，把他在武汉的消息传播到了大街小巷，几乎妇孺皆知。

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便是武汉歌舞剧团的著名演员陈伯华。

1956年5月31日下午，武汉歌舞剧团团长通知陈伯华说：“晚上8点在小礼堂为首长演出，你演压轴戏《断桥》。”

陈伯华是武汉歌舞剧团的名演员，是全团的台柱子。她见团里安排自己来演压轴戏，当然很高兴，兴冲冲地问道：“是哪位首长？”

“毛主席和在武汉开会的中央和省市负责人，专门观看我们武汉文艺工作者演出。”团长强调说，“这次演出只能成功，不能出错。”

陈伯华听说是毛主席要来看戏，十分激动，高兴地说：“我这次一定要演好！”

晚上8时许，她正在后台准备演出，突然听到礼堂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足足响了好几分钟。接着，一个宽厚的湘音压倒了渐渐停

歇的掌声：“好！好！同志们好！艺术家好！”

听到这独特的声音，她知道是毛泽东向大家问好。

“他称我们是艺术家！”这让陈伯华欣喜若狂，“我们在旧社会是‘下九流’，被称为戏子，毛主席却称我们为艺术家！”她的双眼顿时就湿润了。

她已是37岁的中年人了，泪水不自觉地流出来，这不是矫情，而完全是情不自禁，发自肺腑和心灵的。为什么？因为她经历过过去“戏子”的屈辱、艰辛……是有感而发啊！

陈伯华出生于湖北一个小康之家，从小就爱上了戏剧，三四岁时着迷似地哼呀唱呀，舞呀跳呀，八岁时胆子大的她瞒着母亲，拿着去学校的五个铜板学费跑到汉剧训幼女学社报考女艺徒。母亲知道后，气得举着扫帚追打，伤心责怪说：“你什么事不能做，想当戏子！天下事情九千九，唯有戏子最丢丑，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然而，倔强的她还是没听母亲的话，进了女科班。功夫不负有心人。15岁时，她就开始名噪武汉。但是，果如母亲所言，“戏子”不是好当的。女演员的成名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许多比她早成名的姐妹，不是被富豪强霸为妾，便是被地痞流氓看中破相、暗害，最后沉沦风尘。陈伯华成名后，汉口的黄色小报伪造“富贵人看牡丹花”（她艺名小牡丹）的风流艳闻，闹得满城风雨。随即，就有富人看上了她，要她当小老婆，对她威胁、利诱、迫害，写恐吓信，扬言要用硝镪水毁容，用刀砍断她的手脚。一天晚上，她刚卸妆回家，一群流氓气势汹汹地闯进家，为首的是武汉军统特务头子施博。他喝得酩酊大醉，掏枪往桌上一拍，“今日个我是娘也要，儿也要。”

陈伯华母女吓得浑身抖索，抱作一团。好在他醉倒床上就打上了呼噜。母女俩逃到乡下，躲到施博因军统内讧被人打死，才敢返回汉口。

还有一次，她在舞台上演着戏，突然，一个流氓用荷叶包大粪向她掷来。在旧社会演戏谋生，陈伯华可谓是受尽了侮辱。而现在，旧社会的“戏子”却被毛泽东称为“艺术家”，新旧对比，岂不让坎坷经历的陈伯华止不住泪流满面？

她小心翼翼擦干脸上的泪水，一边补妆，一边责怪领导不该让自己唱压台戏。因为她焦急地等着早一分钟上场，去看看台下的毛泽东——她渴望见到的伟大领袖。

因为毛泽东是湖南人，团里特地安排了一出湖南地方戏——花鼓戏《打鸟》。可是演员上台后，由于太紧张，唱得也不够纯正，甚至有些唱句荒腔走板。团里几个领导在后台急得直搓手，可毛泽东却不时发出朗朗笑声，还向演员报以热烈的掌声。看到毛泽东带头开怀大笑，领导们没有埋怨唱花鼓戏的演员，时不时地为其他人打气：“不要慌，万一出差错也没事儿，赶紧补救就是。”

陈伯华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她并不是怕这次唱不好，而是怕出现1952年毛泽东在台下看自己演出时那样的情景：一出场就发痴，呆呆站着，一句台词也不记得的场面。

那是她上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的事情。她知道毛泽东要来看演出时，一个劲缠着前一场演戏的常香玉说：“香玉妹妹，你发扬发扬阶级友爱，一定要看准毛主席坐在第几排第几号座位，我一出场就可以看到他老人家。”她一遍又一遍唠叨，豫剧演员常香玉只好一遍又一遍点头：“好，好，好，帮你看就是！”常香玉唱完戏，一下台马上告诉说：“毛主席坐第五排第三个座号。”

很快轮到陈伯华上台了。她的心怦怦乱跳。雨点般的锣鼓声响起来，伴着鼓点，她一步一步走上台，心里默默数着排座，“一排、两排，三排”，其实，台下前四排都空着，还没等她数座号，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双脚立即像被粘住了一样在舞台上动弹不得，张嘴就要

喊：“毛主席万岁！”突然，强烈的灯光射在她身上，流金溢彩的戏剧服装猛然使她清醒：我在演出，是为首长、为毛主席演出啊！她张着嘴开唱，谁知因为太激动嗓子居然出不了声。这时锣鼓点子早已停息，按理，锣鼓一停，她就该念《宇宙锋》中一段诗白：“杜鹃枝头栖，血泪暗悲泣……”可她呆呆站着，两眼盯着台下的毛泽东。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好几分钟后，她才醒悟过来，一开口却把第二场戏的开场白念了出来：“况郎虽未死，何日得重逢……”第一句刚念完，后台的人大吃一惊。结果，这出戏最后是怎么唱完的，陈伯华自己也不知道，只记得回到后台，一不取头饰，二不卸妆，就趴在化妆台上伤心痛哭。

回到招待所后，她还哭了整整一晚。

第二天，带队的领导召集大家开会，座谈昨晚演出感想。陈伯华第一个发言，第一句话便是：“我该死，我把戏唱错了……”话没说完，又放声哭起来。

大家看着她双眼已哭成两个大红桃子，也不知说什么好。就在她哭得不可开交时，周恩来不知怎么知道了，亲自打来电话，并交代带队的干部说：“叫陈伯华同志不要再哭了，这是热爱领袖嘛！”听到总理的话，她才破涕为笑，同时又感到奇怪：“总理日理万机，怎么知道我的苦衷啊？”

尽管她觉得自己唱砸了，而出乎预料的是，她演出的《宇宙锋》当晚却震撼了观摩的艺术界。第二场演出就被安排到中南海怀仁堂去演了。演出结束时，戏剧界的泰斗梅兰芳先生几乎是冲上台去，喜形于色地祝贺她：“你唱得太好啦！”观看演出的中央领导也走上台，对她出神入化的表演艺术大加赞赏。

结果，在这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陈伯华主演的《宇宙锋》荣获了一等奖。

当时的事情一波三折，让陈伯华既后悔又欣喜。事隔三年多时间，毛泽东又在台下观看自己演出，她思绪万千，心想：这次再不能出错了。在她上场前，团里的领导一再嘱咐她说：“你唱压台戏，就看你的了。”

当锣鼓响起后，陈伯华作了一次深呼吸，然后，沉稳地步入舞台。可是她一上去，第一眼就看见毛泽东坐在第一排藤椅上，右边坐着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王任重坐在第二排毛泽东的身后，欠着身子靠近他，好像向他介绍什么，毛泽东嘴角闪着微笑，不住地点头。她的心一下子踏实了。精神一放松，表演得洒脱大方，拿出了最好的水平。

在表演中，她忍不住看看毛泽东，只见他全神贯注地看着，高兴时还与李达交谈几句。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她感情的洪水又翻腾起来。这洪水不断地撞击她感情的闸门，她顾不得做最后一个亮相，由于太激动，突然一个箭步从舞台上跳下去，一把冲到毛泽东身边，边蹦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台下看戏的多是省市机关的干部，被她突然一跳一喊，都惊呆了。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人声鼎沸时，后台那群和陈伯华一样早已按捺不住的演员们也“哗”的一下，跟着从帷幕后冲出来，纷纷纵身跳下舞台，蜂拥而至，将毛泽东围个了水泄不通。

几乎是一瞬间，整个场面顿时完全变了。

突然，台下那些干部观众也像演员们一样，纷纷站起来，并向毛泽东围过来。人人喜形于色，激动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而此刻陈伯华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恨泪水不该模糊了视线，却不知说些什么好。毛泽东不停地点头，不断地说：“同志们好，好，好！”

众人一齐高呼着：“毛主席万岁！”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阵又一阵，惊动了剧院四周的住户。此时已是晚10点多钟了，楼房上的每扇窗户都探出了头，有人披着衣服站在阳台上，探身向下张望，接着，他们也跟着剧院的人们一起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闻讯，松开了陈伯华等人的手，走到礼堂门口的台阶上，站在那里，微笑着向阳台上、窗户里的人们不住点头，挥手致意。

整个剧院内外都沸腾起来了。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却慌起来了，罗瑞卿一再催促毛泽东说：“走吧，走吧！再不走，又要堵住了！”边催边和战士们推着他往前走。

毛泽东不舍地离开小礼堂，边走边向大家挥手。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精彩的演出的最后高潮竟是在演出之后！而引爆高潮的是演压轴戏的弱女子陈伯华！武汉歌舞剧团的同事们喜形于色。事后，不少同事十分惊诧地议论说：“陈伯华是出名的‘娇滴滴’，平常走路都像在舞台上走一字步，这次哪来的这么大勇气和胆量。”

陈伯华自己也吃了一大惊：当时自己的胆量真是太大了啊！然而，这完全是出自肺腑的无比激动，是出自灵魂深处对领袖的热爱，才失控了。

若干年之后，陈伯华已是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且为“汉剧大师”，表演更加完美、臻真，堪称“真正的美唱，功力必至”。然而，她回忆那次剧场“惊奇一跳”，还是十分动情地对人们说：“这胆量是来自对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但这热爱并非朴素单纯的报恩思想。旧社会，我当过任人欺侮、宰割的戏子，也当过十几年国民党军官太太，过了一段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可那时，我个人虽很富有，

我的祖国却极度腐败、贫穷，我们国家如同一个任人宰割、受尽欺辱的戏子，任何国家都敢践踏我国、侵犯我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使我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解放前，我被迫息影舞台14年，直至1951年才重返舞台。是新中国焕发了我的艺术新生，我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毛主席。不过，在以前那种特定的环境，我见到毛主席总爱犯傻做错事，也许这是当代人不可理解的。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与毛主席会见的幸福时刻，总是泪花迷离……”^①

这份感情何其淳朴、真挚！其实当时的陈伯华已是37岁了，不再是小年轻，这一疯狂举动完全出自最真挚、最质朴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追星情结”，也不是突然头脑发热，而是她亲身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后从内心赞同“人民当家做主”，甘愿把艺术奉献给人民一代宗师的心有所悟，是杰出艺术家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新中国深刻热爱，不忘本，不忘恩的体现。她出自于对人民领袖的敬仰和崇拜之情，才做出这样看似不可理解的“疯狂举动”。

而这种“疯狂”，正是“人民心”，是大师与领袖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共鸣共振”。

①《关不住的感情闸门》，陈伯华著，引自《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19. 疯狂的并不仅仅是陈伯华一个人，武汉三镇“全疯了”

然而，疯狂的并不仅仅是“娇滴滴”的陈伯华一个人。6月2日，整个武汉三镇的干部群众都“疯”了。

这次的“疯”，源自于毛泽东第三次畅游长江。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继续听取谭震林等人的工作汇报。武汉有“火盆”之称，还是十分炎热。在工作之余，6月2日下午，趁着开会间隙，毛泽东决定又去游长江。他对副卫士长孙勇交代说：“这次我们乘船到长江大桥上游江中下水，穿过大桥中间的桥洞往下游。”

孙勇答应说：“好，中间桥洞水流急，我们掌握方向防止撞上桥墩。”

毛泽东说：“你把游泳队形指挥好。”

随后，这支游泳队伍就出发了。

下水后，在长江的激浪中，毛泽东像一只水中雄狮，一会仰泳，一会侧游，一会快，一会慢，自由地奋进。快游到大桥时，孙勇高喊：“请大家注意！大家保持队形！”

毛泽东领头挥臂一划，很快，众人跟着他顺利游过去了。

出了大桥洞，他边游边对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游泳，可以锻炼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

哲人气质的他从游泳联想到国际大事，谈到了“纸老虎”的真理，他的思绪更远了……

这次众人原本计划游到有山码头，因东北风较大，不好游，只好在得家棚处时，约游了30里，就上船了，返回住地。

毛泽东两次畅游长江的消息很快传遍武汉三镇，引起武汉的干部群众兴奋不已。而他们不少人就是游泳高手，因为生活在“火盆”，夏天炎热时常到长江游泳，此刻不禁也跃跃欲试。就在他们莫名期待的时候，毛泽东第三次畅游长江了。

6月3日下午两点，毛泽东带着一群人乘车来到武昌造船厂码头，然后改乘轮船，直接向长江大桥下游驶去。

“毛主席要第三次游长江了！”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武汉的人们欢欣鼓舞，纷纷奔走相告，兴奋地跑向江边。

3点半，毛泽东等人开始下水了。

这时长江两岸已经汇聚了好几万争相观看的群众。江岸边，“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一下水，许多会游泳的人们也激起了莫大的兴致。有的说：“跟毛主席游泳去！”把衣裤一脱，纵身跃入长江。几个人一带头，众人谁都控制不住了，几乎是短短几分钟时间，整个长江江面上已是人山人海，人们像一群水鱼似的，从四面八方跟随着毛泽东，奋力往大桥方向游去。而毛泽东在最前头，兴奋地划游着，像鱼群中一只领头的大鱼。于是乎，波浪翻滚的长江水面上，几万条“小鱼”跟着“大鱼”朝着同一个方向游去。

这样的场面何其壮观，也何其宏伟！

这是中外历史从没有过的盛大场面，好几万人在江中同时游泳，堪创吉尼斯纪录。然而，滔滔历史长河，流逝几千年，世界上却从没一个领袖像毛泽东这样在民族的母亲河与万民一起游泳过，英明的罗马王恺撒没有过，狂傲的“欧洲之父”查理大帝没有过，无畏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没有过，“民主之父”华盛顿也没有过。在中国，唐宗宋武、元太祖、清康乾等一切“英君明主”都没有过，那些窃国大

盗诸如袁世凯之类“领袖”更是没有过。而此刻，无意中创写历史的毛泽东和数万民众一起畅游，却是其乐融融。

毛泽东为何和群众一起游泳如此畅快？

除了对群众鱼和水的深情外，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希望还所有人和他本人一样，通过游泳之类体育锻炼，来拥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体魄。人们在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同时拥有一副副强健的身体，不再是让人嘲笑的“东亚病夫”。

其实，这项工作，他早就作过。

早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业待兴，他从全民健康的角度出发就多次发出号召、指示，要求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民众的身体健康。1952 年 6 月 10 日，他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 12 个字否定了体育是社会精英和权贵们自我娱乐的贵族运动，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必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属性，也由此确定了新中国体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但是，发展体育，进行体育活动，要有设施，要运动工具，要投入，要花钱，几年来各地群众性体育运动虽有一些发展，而规模不够，参加人数不多。毛泽东认为锻炼体魄，不一定非要花大钱不可，比如游泳就可以“不花钱”、“不要工具”，且全民可以开展。于是，他自己带头游泳，以带动全民体育的发展。

毛泽东的苦心获得了群众的响应。现在，他在水中畅游着。江面上、江岸上热闹极了，所有的人都兴奋得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口号，以水中的毛泽东为中心，汇聚而去。岸边的人，水中的人，再次“全疯”了。毛泽东看到欢呼的场面，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也高呼“人民万岁”。

这样的壮观的场面和景象持续很长时间。

在江水中，太多的人游向毛泽东，而岸上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继

续跃入水中。谁也没什么特殊的目的，也来不及细想，只是向着毛泽东挥臂劈浪，靠近而来。“大鱼”四周的“小鱼”越来越多，还有不少的“小鱼”游过来……

谁都是那么兴奋、那么激动。然而，有一个人却很清醒。那就是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万一群众在水中把毛泽东围住怎么办？看着这样的场面，他在船只上着急得直跺脚：“这该如何办好，这该如何办好！”他着急，其他警卫人员也着急了。

可是，毛泽东没有感觉，带着王任重、孙勇等人奋力往前游着，后面的人继续在追赶着。毛泽东笑着对身边左右的“游泳高手”们说：“看，他们赶上来了！”好像还要等一等他们呢。

“不能等了，他们围上来可不好办了！”王任重也警觉起来。

毛泽东似乎不怕“不好办”，继续游着，并且还开始了仰游。

过了一会儿，孙勇见四周而来的“小鱼”越来越多，职业的敏感也使他有了警觉，开始着急，但是如何劝说毛泽东呢？若说怕群众围住就劝他上岸，喜欢和“小鱼”在一起的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还会批评他。他于是靠向毛泽东，希望他快速地往下游去，抢在“小鱼”们的前面，并喊着说：“主席快游吧！”

“好啊！”毛泽东挥臂划水，往前游去。

“快些啊！”孙勇又招呼众人说，“到时候群众围过来，万一他们在水中出点什么意思，就不好啦！”

毛泽东往前游了几下，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对身边的王任重、孙勇说：“我们上岸吧。水流这么急，要是有的群众不太会水，这么一赶，遇上漩涡咋办！”

原来孙勇的那句话提醒了正在畅游的他。

就这样，毛泽东很快就结束了游泳。

可他上岸时，两岸码头站满了观看的群众。汪东兴怕他被群众

“包围”，立即带着他在警卫战士们的护卫下，坐着船只往下游而去，直到找到一个人少的小码头才停住。毛泽东上岸后，乘汽车返回了住地。

因为怕“不太会水”的群众出点啥意外，“遇上漩涡”，毛泽东这一次只游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比上两次时间都短暂，不过却是他最高兴的一次。

因为他当了“水中的大鱼儿”，和群众在一起了。

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在武汉轰动一时。随后，在武汉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游泳热潮。人们纷纷到大江大河里游泳，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几年后，1960年4月20日，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田径运动竞赛和大力开展游泳活动的联合通知》。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不花钱”、“不要工具”的游泳成为了一项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20.毛泽东被禁坐飞机的前奏：空中历险

为了鼓励年轻的空军快速发展，毛泽东不惜自己冒险去坐飞机。后来，有人认为这是作秀，是杞人忧天。其实，这是不了解当时飞机的性能和状况。此时坐飞机，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各种危险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的。

并且，毛泽东头回坐飞机，就遇到过空中惊险的一幕。

1956年6月4日，毛泽东从武汉坐飞机回北京，赶去接见外宾。

当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从北京给汉口王家墩机场打来电

话,通知在此等候起飞独3团的胡萍等人:“北京天气已经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前飞抵西郊机场。”

北京天气虽然好转,但傍晚时仍可能发生雷雨,因此空军司令部又要求他们务必在下午5点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这时王家墩机场有三架里—2运输机,除跟随毛泽东的那两架飞机外,副参谋长何廷一还从北京带来了一架,届时他本人坐第一架,探路与观察天气;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汪东兴等人坐第二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坐第三架。三机的飞行间隔为15分钟,仍由时念堂飞副机,胡萍飞主机,另一驾驶员张瑞霭驾驶伊尔—14飞机开道。

12时许,“来了,毛主席来了!”有人喊道。几辆小汽车停下,毛泽东一行人到达了机场。他大步登上舷梯,在门口停顿了片刻,才走到机舱,在小方桌下首的座椅前坐下,然后从容点起一支香烟,吸了起来,顺手拿过一册线装书。

随即,三家飞机先后开始滑向跑道,很快昂首飞入云霄。

胡萍驾驶里—2起飞后,操纵着飞机向着北方飞去。一路都是平原,气流干扰不大,加之有关部门已经禁空让道,飞机升至2000米后,一直保持平飞。领航员向罗瑞卿报告:“飞行一切正常。”

罗瑞卿点点头,交代说:“路还很长,要注意观察云层的情况。”

飞机呼呼地飞着,一路无事。谁知到达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何廷一坐着的那一架伊尔—14飞机意外遇到雷雨云——张瑞霭只见北面、西面乌云滚滚,电光闪闪,急风骤雨就要来临,担心地说:“飞机闯进去,可能被雷击毁,也可能被它掀翻。”

何廷一问:“云层有多大?”

“据观察,雷雨云层厚达1.5万至2万米。苏制里—2型飞机时速太慢,升高极限只有4000米,无法从云顶飞越,也无法从云下飞

行。”

这下何廷一的头大了，说：“赶紧通知后面的飞机。”

然而，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的无线电完全失灵。何廷一对着话筒拼命喊叫，喊哑了嗓子也不见回声。就这样，他们与后面的飞机失去联系，飞机探路和观察天气的“开道作用”完全丧失。

随即，毛泽东等人乘坐的第二架飞机飞临雷雨云区边缘。胡萍正为与前面的飞机失去联系而万分焦急。飞机离雷鸣电闪的云层越来越近，机组发现正前方有雷雨云出现，云层自下而上，连成一片，时有闪电出现，副驾驶员说：“天气恶劣，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胡萍果断地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危险的雷雨云区。”

于是，机组临时改变航线，向正东的沧州机场飞行，准备由沧州转向正北，经天津以西的杨村机场，再飞往北京西郊机场。但气流干扰还是十分强烈。飞机剧烈地颠簸。李银桥担心毛泽东受不了，询问说：“主席，躺下休息一下吧。要不，吃点水果，或许好受一些。”

谁知毛泽东并不在意上下颠簸，反而风趣地说：“没得关系，你没有体会到小孩子坐摇篮的味道吧？”

这话刚一出口，把周围的人全逗乐了。

大家忘记了飞机颠簸，也不觉得怎么难受了。

胡萍驾驶着里—2 飞机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飞行，完全打乱了原定的飞行计划。本来对付这种雷雨云层，领航员和驾驶员都有经验，可以应付过去。但雷电干扰让胡萍等人很担忧。因为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已经失灵，他们不仅与领路的飞机失去了联系，而且与地面指挥台也呼叫不通。这架里—2 飞机只有无线电波设备，没有超短波设备，他把平时使用的 40 瓦功率电台换上备用的 150 瓦大功率电台，仍然无法与指挥台联络上。

但是，胡萍等人都是空军精选出来的全天候飞行员，是同行的佼佼者。他们熟练而又沉稳地操纵着飞机，几乎是擦着云边飞行。

飞机改变航线后，由于燃料有限，不能绕道太远。他们精准地计算着飞行距离，力求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飞行，大胆而又谨慎地向着目的地飞去。

里—2 飞机由于短波通讯受干扰很大，前后 20 多分钟与地面失去联系。在西郊机场等候的刘亚楼十分紧张，多次责令塔台指挥员蔡演威不停地向飞机呼叫：“搞清飞机的位置和状况。”

蔡演威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电送话器几乎把嗓子喊哑了，还是没有回音。刘亚楼急得不行，对着蔡演威吼道：“再联络不通，老子毙了你。”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仍无任何音讯。刘亚楼急得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水。正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张瑞霭驾驶的第一架飞机穿云而出，安全地降落了。

张瑞霭降落后，就准备随机组坐汽车回住所。刘亚楼远远地便扯着嗓门，高声喊道：“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张瑞霭赶紧去塔台。刘亚楼详细询问怎么回事。张瑞霭说：“飞到河北衡水地区，西北方向过来一片雷雨云，堵在航线。我们只好绕道东行，兜大圈子，因此到达机场比预计的时间要迟。”

“按照两机相距时间，毛主席他们坐的飞机，应在 15 分钟以后降落。现在飞机尚无踪影，怎么还联系不上？”刘亚楼还是着急地说。

“雷电干扰太大，我们和他们也断了联系。”

刘亚楼也没辙了。蔡演威还在对着无线话筒进行呼叫，而对方还是保持着可怕的沉默。刘亚楼几乎快情绪失控了：“毛主席他们要是出了事，我们空军就是千古罪人，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啊！”对着

蔡演威继续喊道：“一定要联络上！”

此时毛泽东的专机仍在云层边缘飞着。老天爷下起了大雨，气流像只无形的巨手拨弄着飞机。毛泽东等人已不像“坐摇篮”，而是变成了“荡秋千”。卫士们都觉得难受，可毛泽东依然神色自若，谈笑风生。

罗瑞卿和汪东兴坐不住了，脸色很紧张。毛泽东却笑着安慰他们说：“要相信我们的空军同志们，不会有事的。”

刘亚楼在塔台里焦急不安，机场的气氛如同窒息一般。20 分钟后，就在人们几乎绝望了的时候，突然，有人喊道：“东南方向隐约传来马达声。”

当大家抬眼望去的时候，“是飞机！是毛主席乘坐的飞机！”不知是谁惊喜地喊了起来。

这架姗姗来迟的飞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焦躁的视线中，越来越大。

“毛泽东的飞机终于飞过来了！”有人欢呼起来。

刘亚楼的脸色也变轻松了：“嘿，我说啦！”

毛泽东乘坐的里—2 飞机刚着地，刘亚楼就已从塔台火急火燎飞似的奔向停机坪。跑到机前，没等毛泽东走出来，就站在机舱门前，亮起嗓门迫不及待地冲着里面大喊：“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一直在为飞机的安全担心啊！”说完，擦拭着满头大汗，长长舒出一口气：“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裤腰里啦。”

毛泽东出来了，笑着说：“怕什么呀！飞机在雷雨云边上飞行，在气流翻滚冲击下颠簸了几下。”

罗瑞卿说：“主席还念着英文，把我们也急坏了！”

“我读了两页英文，改看线装书了。”毛泽东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说。

接着，他来到驾驶舱，对机组人员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腾云驾雾，暴风云中见成长！”与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

刘亚楼对胡萍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刚才我真担心啊！”

“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细心地观察了天气现象，认为是局部的，可以绕过去，这样心里就有数了。”胡萍回答。

刘亚楼笑了，大声地说：“好好总结经验，以后主席还要坐飞机。”然后，陪着毛泽东等人下飞机。

毛泽东这次空中遇险，让其他人无不感到害怕。但他却像没事一样，十分悠闲地读书，大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处险不惊。尽管坐飞机有危险，并且经历了这次历险，他并没有就此不坐飞机了，继续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飞往全国各地，为年轻的空军将士们加油鼓劲。

随着空军装备的不断改进，其后独3团的飞机改为苏制伊尔—14型飞机，毛泽东坐得多的飞机编号为“4202”。这种飞机无论在载客、时速、最大升限及安全性能等方面都明显超过里—2。据统计，毛泽东在1956年乘坐飞机6架次，1957年26架次，1958年32架次。三年总计64架次，飞行约150余小时，航程四万余公里。所到之处有：广州、长沙、武汉、郑州、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徐州、济南、青岛、西安、成都、昆明、沈阳、长春、南宁、合肥、山海关等地。

因为这次空中历险，为党中央禁止他坐飞机埋下了伏笔。后来，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严格控制他乘坐飞机，据说专门做出过一个决定：毛泽东外出不准坐飞机，改乘火车专列。从1958年以后，他外出还是乘坐火车。火车继续成为他到全国各地巡视、搞调查研究的主要交通工具。

毛泽东失去了乘坐飞机的权利，然而，人民空军将士们却不能忘怀他对年轻的人民空军的鼓舞和支持。在中国航空史上，前有孙

中山夫人宋庆龄（新中国担任国家副主席）不惧危险以身登上航空先驱者试飞机的壮举，后有毛泽东不惧危险以身乘坐第一批空军将士驾驶飞机的举措。弱小的中国航空正是在像宋庆龄、毛泽东这样无私无畏的支持下才一步步迈向航空强国之路。

领袖们的大智大勇，始终是中国航空梦想最终变成为现实的强大发动机和推动力。

21. 毛泽东的惊人思想：要与台湾和平谈判

实现国家工业化，毛泽东等人不等不靠，也不是期望哪个强国会像菩萨一样出手施舍，而是决定自己动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党中央决定于1956年秋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和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这是在七大召开11年后的一次全国性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十分重视。从南方回到北京后，从8月份，他就开始把精力转向大会的准备工作，亲自参与大会各种报告的拟定和修改，对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形势进行把脉，对大政方针进行定调。

在国内外政治决策中，事关国家利益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台湾问题，也是毛泽东这次需要考虑和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台湾问题，就是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1949年，内战失败后，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残余逃往台湾，维持着小朝廷，造成台湾和大陆割裂和隔海对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1950年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肃清境内国民党残余。然而，他没有绝对化地只用军事手段，不给穷途末路的蒋介石等残兵败将以出路，1950年初在进行军事准备时，便准备派人去与蒋介石进行接触，探索和筹划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谁来担任这个特殊任务呢？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选择了张治中。张治中是国民党重要高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同时，他和中共方面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过多次谈判。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的张治中发出《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说“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即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他再次致电张，让来北京具体商谈。张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亲自致电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为张北上布置沿途护卫任务。

毛泽东亲自为某一个人安排警卫，这是极其少见的，可见他对张此行的重视。

5月，海南岛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部署解放台湾的战斗，并成立以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准备对台作战。6月上旬，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并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由此，美国远东情报处发出哀叹：“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队涣散，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参与其中，国

际局势立即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国共双方军事战略部署。张治中与台湾当局的和平谈判还没开始就不得不终止。9月29日,毛泽东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救了蒋介石一命,使得孤悬大陆之外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得以持续下去。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此时,西藏已和平解放,全国只剩下台湾没有解放。毛泽东又把军事战略重点转向了解放台湾的统一中国大业。10月,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他要求大家:“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

过了几个月后,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

8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宣言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各地掀起“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高潮。随即,中央军委制定“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并且向华东军区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

9月25日,毛泽东签署了周恩来送交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并以党中央名义发出。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主持议定的，其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事实上，周恩来是主张以战争形式一次性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危急，美国扩大对台问题干涉。11月2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接着，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美军第七舰队在我东南沿海集结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庞大舰队，妄图干涉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美国的干涉，加剧了解放台湾的难度。

但是，这并没有吓住毛泽东等人。

1955年1月18日，毛泽东果断推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2月25日，解放军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岛。尔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部队挥师入闽，与福建部队会合，准备联手攻打金门、台湾。但事实上，毛泽东对台湾一直是战和两手准备的。当兵锋直指金门、台湾的时候，他没有下令“疾进”，没有去“秋风扫落叶”，相反却再次考虑“和平手段”。3月7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透露出“和”的信息，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发出“和”的信号后，毛泽东没有就此就打住。

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临行前，他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

阐明了中国对台方针，即“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并强调“只有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完全统一，才有可能”。

周恩来再次向外传达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所谓“和平解放”，自然是通过和谈手段，达到“解放”——即国家统一的目的。

5月13日，在毛泽东的谋划下，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湾作出了重大政策调整，引起了全世界强烈反响。

在人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再次就和平解放台湾表达出中共方面的立场。5月26日，在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时，在谈话中，他重申说：“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因为蒋介石的靠山是美国，他必须仰仗美国人的鼻息，毛泽东还提出可以去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

但是，刚刚挨打的蒋介石还痛着呢，对大陆方面的“示好”，没有作出回应。

而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等人的“一厢情愿”。

进入1956年后，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的“和”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1月25日，他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

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在会上，他还公开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与党中央决定去与蒋介石“讲和”的思想已得到许多人的热烈响应。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就是其中之一。他主动向毛泽东请缨，要求去香港，找一些旧关系、老熟人，去做蒋介石等人的工作，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达成中华民族统一。

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亦官亦士，但属于“无党派人士”，早期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等交往密切；同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也有来往。20年代，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前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还为毛泽东等人筹措过两万大洋路费。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他去香港，还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有个夫人生活在香港。毛泽东等人认真研究了章士钊的要求，认为他去香港完全可行。

为此，党中央专门给蒋介石本人写了一封信，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信中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国共和平完成统一大业的几项办法：（1）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在结尾还特地告诉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回故乡看看。

章士钊带着这封信前到了香港。他首先会见了在港负责国民党

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向他详谈了中共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托他把信件转交给蒋介石。许孝炎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

但蒋介石看了好几遍，久久沉默无语，没作任何表示。

许孝炎等了几日，只好回香港了。

此时毛泽东等人还在推动蒋介石往和谈方向走，以自己的诚意表达国共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愿望。

2月初，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代表党中央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社论。社论表明中共方面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后，充满激情地发出了呼吁：

台湾的同胞们！祖国已经向你们发出了热情的召唤，要求你们为台湾的和平解放、为使台湾归还祖国而努力。祖国十分关怀你们目前的痛苦处境，并且正在为使你们早日得到解放而努力。祖国在等待着你们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参加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们！祖国已经向你们敞开了宽大的胸怀，欢迎你们通过和平途径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在你们面前，通向祖国的条条大路都是打开着的，你们再也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和怀疑了。

让我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为台湾的和平解放，为完成祖国的统一事业和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吧！

这一日正是中国人传统的农历小年。每逢佳节倍思亲，社论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游子的召唤。

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

5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6月28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进一步具体阐释了毛泽东的对台思想，提出说：“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这一系列的举措，尽管蒋介石没有反应，但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一浪接着一浪。《南洋商报》的记者曹聚仁，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陈毅也交往甚密，至今与海峡两岸不少重要人物有书信交往。他看到这些信息后，立即给在北京的老师邵力子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他想与中共高层接触为国共和谈进行牵线架桥之意。邵力子立即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交代说：“迅速安排曹聚仁先生进京面谈。”

7月16日中午，周恩来和时任副总理陈毅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刚到北京的曹聚仁。下午，他们与曹聚仁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划船荡舟。曹聚仁问周恩来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

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陈毅向他表达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和平谈判统一祖国的诚意和思想，之后他又两次接见曹聚仁。

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带着这些信息，曹聚仁回到了南洋。8月14日，他以周恩来谈话内容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南洋商报》上，再次向海外传递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又一次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地震”。

正在这样大力倡导“和为贵”的氛围中，党的八大即将召开。台湾问题自然是会议的应有之义。为了提出、审阅、修改大会的各项报告，毛泽东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吃不睡，完全是战争年代那副“拼命三郎”的做法。

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8月21日晚，他在对政治报告进行修改时，再次对台湾问题提出了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和平统一”方针：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

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了台湾问题的和平谈判方式，避免在统一国家时使用武力。毛泽东是“国家统一主义者”，不容许国家分裂。对于台湾，他一直提出要解放，但事实上又一直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用战斗解决，一方面准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以达到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巨人的大智慧。

很快，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来临了。9月15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

此时党中央部署的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制改造全部完成，与之相对应，基本建立起了由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破天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实现了多数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公有制。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告：“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又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毛泽东作了开幕词后没有再作大报告。这次会议，有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参加。毛泽东与他们进行了会谈。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他把“民族团结”作为我们党的经验进行了论述，说：“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

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团结”经验，大概也是他希望与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国共和谈的思想基础之一吧。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的“二五”计划的建议报告，27日圆满结束。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但是，国家统一仍是毛泽东最牵挂的事情。

9月30日，他在会见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时指出，对于国民党，“我们要同他恢复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10月1日，他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

这时曹聚仁也回到了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人先与他进行会谈。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会见时间，专门在居仁堂接见曹聚仁，就国共和谈问题进行会谈。

曹聚仁曾对人开玩笑：“国共两党，只要榜上有名的人，几乎都认识。”且他多次在文章中介绍过毛泽东，然而却偏偏没见过他。上次离京一个半月后，当他再次来到北京时，终于如愿以偿。

10月3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曹聚仁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就问道：“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诚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接着，毛泽东就说起了他的著作。曹聚仁很惊讶，自己的那些著作，他差不多都知道，赶紧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

“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比较公正。”毛泽东说，“不妨再自由些。”

曹聚仁说了毛泽东的诗词，接着谈起了蒋经国的为人，最后，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

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曹聚仁问。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蒋经国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台湾还是他们管。”在一旁的周恩来回答，“如果陈诚愿意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亲自将曹聚仁送出门。曹上汽车时，他还为他关好车门。

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曹聚仁非常激动。当晚，他和四弟曹艺谈得很晚，从不喝酒的兄弟俩，拿出鲜红的杨梅酒痛饮起来，共同祝愿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回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他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了台湾方面。然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国共谈判却没有回应，只是对自己的故居和祖坟很关心。不久，他们让曹聚仁专程去大陆，不过主要任务不是和谈事宜，而是令他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曹聚仁专程来到奉化溪口镇，蒋氏祖坟在解放时就由毛泽东下令保护完好。他一一拍了照片，回到香港后，向蒋经国报告了大陆之行，并寄去在溪口拍摄的照片。但是，蒋氏父子由于有美国人撑腰，还是没有表态，结果两岸发生1958年台海炮战，毛泽东发出的和谈信号完全中断了。

1965年夏,蒋氏父子感慨形势,萌生和谈之心,在日月潭召见曹聚仁。三人经过几次讨论,终于达成了六项谈判条件,主要内容为:

(1)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毛泽东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将六项条件报告给了蒋介石,但是随后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国共和谈又停顿了。

尽管蒋介石败逃到了台湾,多次对大陆进行军事挑衅,准备“反攻大陆”,但作为实力强大蒋介石不知多少倍的毛泽东却作出一个惊人的决断,改变原来用战斗去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去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这是一个大胆的决断,也是一个常人作不出的决断。作为胜利者,大多会采取“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略,风卷残云,用战

斗把败者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而毛泽东却没有，“不为己甚”，不做逼人绝路的事情，不是高高在上以强力派出大军发起战争去“痛打落水狗”，也不是像当初蒋介石那样下达通缉令以“四面围剿”的方式逼迫蒋介石“狗急跳墙”，而是如同当年和平处理西安事那样，再次拿出高姿态，对处于困境的蒋氏父子伸出橄榄枝，要与他们进行和平谈判，主动缓和两岸对峙气氛，并且还主动一而再地派人去沟通联络。这是莫大的“一笑泯恩仇”的个人胸怀，又是莫大的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智慧。

遗憾的是，精诚所至，玉石“开”得太晚太迟了。